

文研通訊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9年第2期(总第十一期)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2019年第2期

总第十一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期：总第十一期（2019年2月—2019年4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辑：周诗雨

编务：陈天传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目录

01 五四百年专题

(一) “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 02

1、论坛纪要 02

- “五四与现代中国”主题论坛 02
- 分论坛一：“五四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五四与20世纪中国政治” 06
- 分论坛二：“五四与新思潮”、“五四与新文学” 10

2、专题报道 15

- 文研院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 15

(二)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 17

- 新闻报道 17
- 展品选粹 19

26 文研学术

(一) 北大文研讲座 28

- [111] 林建华 | 中国大学教育：反思与未来 28
- [112] 乔尔·米格代尔 | 公共性：融入与排斥 32
- [113] 邓小南 |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 35
- [114] 余辉 | 王翠距离黄公望有多远——重新发现《富春山居图》子明卷 40
- [115] 乔秀岩 | 从《乡土中国》到经学史——“国民性”论的启发 42
- [116] 颜海英 | 希腊世界的埃及魔法 46
- [117] 周黎安 | 经济学的制度范式与中国经验 49

[118] 刘志伟 | 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以一条鞭法和图甲制为例 54

[119] 刘迎胜 | 有关汉语的另一种书面语“小儿锦”问题研究 58

[120] 方德万 | 豫湘桂会战：二战的转折点 61

方德万 | 抗战时期战场以外的中国：战时的日常生活 64

[121] 王瑞芸 | 杜尚与西方当代艺术 68

[122] 夏含夷 | 清华简《摄命》篇源流考 71

[123] 林丰民 | 阿拔斯朝百年翻译运动与阿拉伯文化的繁荣 73

(二) 未名学者讲座 77

[45] 林丽娟 | 围城考——东方世界的希腊知识 77

[46] 章永乐 | 维也纳体系最后的“大国协调”与清朝—民国连续性的创制 79

(三) 北大文研论坛 83

[91] 林建华、裴坚、刘云杉 | 北大本科教育：自我诊断与发展评价 83

[92] 五四与现代中国 87

(四) 文研汇讲 88

[01] 袁剑 | 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 88

[02] 鲁家亮 | 墨钩与墨横——秦汉简牍文献中对标识符号的记录与使用 90

[03] 尹吉男 | 书写中国后期美术史的知识生成方法与实践——以艺术资源的紧张关系为核心 92

[04] 赵妍杰 | 家的消失：家庭在重构社会伦理中的地位 95

[05] 于溯 | 文献学视角下的中古史学 97

[06] 哈桑·法兹里·纳什里 | 伊朗“不远的过去”：从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考古学到21世纪的历史考古学 99

[07] 狄金华 | 管区组织的浮与沉——对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结构的反思 102

[08] 邱源媛 | 亦旗亦民：清代旗民二元性制度下的民众应对 104

[09] 藤田勝久 | 《史记》秦代史与北大汉简《赵正书》 106

(五) 文研读书 109

[15] 毕加索与立体主义——《毕加索传》研读会 109

[16] 钱锁桥 | 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传》研读会 111

[17] 万志英 | 经济史的写法——《剑桥中国经济史》研读会 115

(六) 文研纪念 120

[04] 陈梦家先生学术研讨会 120

(七) 菊生学术论坛 130

[13] 秦汉祭祀遗址研讨会 130

(八) 多文明研究系列工作坊 143

[03] 王洪诘 | 阿尔文·托夫勒与未来学的冷战起源 143

[04] 陈侃理 | 历法与纪年——秦汉帝国时间秩序的构建 146

[05] 林丽娟 | 景教三威蒙度赞再研究 148

[06] 付马 | 回鹘时代丝绸之路的唐朝遗产 150

[07] 范晶晶 | 新出粟特语《金刚顶经》入金刚界曼荼罗真言研究 152

154 静园学术

- 鲁德兰舒·穆克吉 | 1857年印度起义 156
- 鲁德兰舒·穆克吉 | 印度早期自由主义的矛盾 159
- 鲁德兰舒·穆克吉 | 印度与现代性的遭遇 162
- 鲁德兰舒·穆克吉 | 甘地和尼赫鲁：爱与分歧 166
- 鲁德兰舒·穆克吉 | 泰戈尔的遗产 171
- 李均 | 图像的阅读：中古朝贡图绘的跨媒体研究 174

176 文研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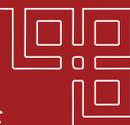
- 文研院举办第六期邀请学者欢迎会 178
- 文研院推出2019年春季“文研课程”项目 181
- 文研院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 183
-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访问文研院 183
- 燕园问道，恰是知音相逢时——记文研院邀请学者项目 185
-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开幕 187

188 文研纪事





五四百年专题



【编者按】

以北京大学为重镇的五四运动是 20 世纪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激荡的时代风潮中，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于此，展开中国近代文化最为活跃的复兴局面，也奠定了北大在中国历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回望五四，对五四的再评估与再诠释，意义非凡。

值此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文研院特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与“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今日特辟本版，深度报道系列活动之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一）“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

1、论坛纪要

“五四与现代中国”主题论坛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大学一百年来思想文化的创造、学术传统的更新，都与五四有着各种各样的承续关系；而五四运动也深远地塑造着北大师生的精神气质与思想传统，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和科学文化最为敏锐和坚韧的探索者、开拓者。有鉴于此，文研院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邀请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相聚北大讨论交流。

30 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作引言与主持。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罗志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



主讲嘉宾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方德万、王德威、陈平原、狭间直树、王汎森、罗志田）

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发表主旨演讲。

首先，陈平原教授作为引言人为本次论坛作主旨说明。五四是 20 世纪中国的关键时刻，它以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五四一周年开始，北大师生对五四的不断纪念与阐释，已成为一种“专利”。

随后，陈平原教授以“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为题发表演讲，由五四向前追溯晚清以降的“新文化”逐步积聚能量并在五四这一危机时刻最终破茧而出的过程与路径。论述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晚清以来，新媒体的产生、新思潮的荡漾、新教育的壮大，催生了危机意识的积累与传播，并培育了应对危机的新生力量。第二，新教育体制的稚嫩，决定了晚清至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是杂览、杂学的一代；不受学科边界和旧教条束缚的开阔与通达，是晚清及五四两代人最值得珍惜的阅读经验。第

三，辛亥革命前后三十年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也正是中央集权的松动、思想言论的相对宽松和自由，造就了各种思想学说自由竞争、百家争鸣的盛况，“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正是其最大的精神遗产。最后，晚清及五四时期以报章为主要思想传播途径。以报章为中心的思考与表述呈现了瞬间反应、激烈表态的对话态度，也表现出“激于时变”的五四新文化人剑走偏锋的策略思维。这些危机时刻的思考和表达，都可被看作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思想的草稿”，其丰富多彩又意犹未尽的“未完成性”也正是五四的魅力所在。

狭间直树教授作了题为“五四运动与日中关系史概略”的学术报告，分析日本在脱亚论的影响下实施的亚洲侵略与对华侵略，并探讨五四运动与中日关系的相互影响。1885 年，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是针对日本这一后进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侵略思想，其合法性来源于文明等级论——日本已跻身于欧美列强同等的“文明国家”

之列，而中国、朝鲜等亚洲各国仍处于未开化的状态。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日本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占领台湾、吞并朝鲜，并将南满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15年“二十一条”的提出，显示了日本对华政策侵略性的飞跃式升级。1919年，巴黎和会在日、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日本，导致五四运动爆发。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反日运动迅速扩大，迫使政府罢免亲日派三大高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舆论界迅速反应，内藤湖南等知识分子追随福泽谕吉的论调，认为中国对抗日本的反日运动迟早会“结束”。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签巴黎和约——拒签是五四运动孕育出的结果，是中国国民意识生长的表现，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战后的亚洲秩序与世界秩序。

接下来，罗志田教授以“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为题发表演讲，提供了观察和诠释五四运动的新框架。近代以来，在西潮冲击下，“天下”这一概念崩散，向外转化为“世界”和“中国”，向内转化为“国家”和“社会”。罗志田教授首先通过傅斯年、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表述梳理了“国家”和“社会”这两个外来概念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在他看来，在五四这一“过渡时期”，这组概念是多义的、发展的，因此，用这组“早熟”的概念作为理解五四的工具，诠释力有限。而后人对五四的理解，却往往陷入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五四就是在中国这一“国家”发生的故事，且预设国家和社会更多

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实际上，“国家”、“社会”、“人民”间的紧张甚或对立意味也因“天下”的崩散而产生，而有关认知、界定“国家”与“社会”问题的核心便是“天下”含义的现代演化。五四前后，梁启超、张东荪、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曾对“国家”进行质疑与反省。此外，这一时期也曾出现一些非国家、超国家的思路。罗志田教授表示，这种反思或许正是对“天下”的回归，如果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或可增进在国家和社会的视角之外我们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和认识。

王德威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他借助鲁迅文论“悬想”与“神思”的概念，探索五四文学革命被遮蔽的面向，及其在当代科幻文学中的回应。王德威教授首先通过《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鲁迅早期文论，解释了“悬想”与“神思”的来源。这两项概念都强调“想象力的政治”——深入现实尽头的无物之阵，探勘理性以外的幽暗渊源。1923年至1924年，张君勱与丁文江进行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鲁迅的缄默、文学的缺席，恰恰反证了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说明此时的文学已被异化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而原有的复杂、感性、物质层面的意义被遮蔽。鲁迅文学的革命性，不仅在于反映人生、改变现状，也在于直面人生晦涩幽微的物质性，认知现状深处“俱分进化”的动机。如果仅在写实、现实主义的脉络中理解鲁迅，实乃局限了其文学观的最激进面。

王德威教授认为，在现当代文学主流

论述中，“悬想”与“神思”一向是文学被遮蔽的面向，却意外地在新世纪的科幻小说处获得共鸣。“医”和“病”的隐喻，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轴之一。在这一意义上，韩松的《医院》三部曲（2018）中构造的“药时代”、“药帝国”，便与鲁迅形成隐秘的对话，就身体与国体、疯狂与理性、疾病与医药、入魔与除魅等议题展开辩证，直面个人、社会、国家、人类全体的局限。这也正是对鲁迅未完的文学革命的重新挖掘与回应。

方德万教授的演讲主题为“作为现实政治的五四”。他从政治哲学家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提出的“现实政治（real politics）”这一角度，分析具有宪政意义的五四运动。戈伊斯的“现实政治”反对理想政治的研究方法，强调检视政治主体具体的动机及行为，以及目标与结果间的复杂关系。从“现实政治”的视角看五四，可避免误读五四的抽象化，回归其复杂性。

方德万教授聚焦五四背后的宪政危机，并从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他梳理了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中国的宪政危机，讨论了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等关键人物的政治行为及其复杂动机，并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洪宪之役、府院之争、再造民国、对德宣战等重要事件背后的宪政困境。随后，方德万教授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与上海和会（即1919年南北和平谈判）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南北关系危机。他重点分析了一战前后日本和英国关系的变化、巴黎和会上中国的诉求与顾维钧的谈判策略、山东问题对日本与英美两国在

中国利益冲突的激化，以及上海和会南方代表唐绍仪的诉求等。他认为，唐绍仪和顾维钧都希望借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决原则维护宪政价值。然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南北和谈的破裂、五四运动的爆发，意味着宪政危机到达顶峰——现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再为解决政治分歧提供被普遍接受的出路。这一结果是一系列政治事件当事人预想之外的，也正印证了“现实政治”对历史偶然性、复杂性的强调。

最后，王汎森教授以“启蒙是连续的吗？！”为题作学术报告。他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自晚清以迄五四“启蒙运动”的连续性问题以及这种连续性的具体方式。王汎森教授认为，从晚清到五四的革命思潮有相当强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并不是单线的。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启蒙思潮的连续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转辙器式”的连续，即制度和思潮形成互为转辙器的关系；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迸发出具有建制性、约束性、召唤性的力量，形成一种“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连续性。另一种连续性则是议题式的连续。妇女解放、白话文、科学等自晚清以来反复出现的议题，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其讨论的“背景文化”存在差异。在这一意义上，五四运动的特殊之处主要有五点：第一是对中西方鸿沟式差异的认知出现，晚清以来对中西关系的理解改变；第二是普遍主义的、超越国族崇拜的思想出现，取代晚清求强文化下“进化”的启蒙议题；第三是政治概念新陈代谢，以科学为主的一批知识论和形而上学词汇出现，日系词汇取代传统儒家词汇；第四是整体

性的观点出现，要求民主、科学等新思想在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全面应用，以及对传统“重估一切价值”的整体性批判；第五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看待一切事物的新眼光与新方法。因此，晚清到五四的启

蒙思想在一个格局之中，但由于连接的方式的不同、背景文化的不同，相同议题在不同时代便具有了不同的历史意义。

（撰稿：杨仪）

分论坛一：“五四与 20 世纪中国政治”、“五四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2019年3月3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第一场分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韩国延世大学的参会学者分别围绕“五四与20世纪中国政治”、“五四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两大议题深入探讨。

本次论坛上半场主题为“五四与20世纪中国政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首先以“五四时期闽籍老派学人”为题，探讨闽籍老派学人与五四新一代知识人之间的联系与冲突，试图重新解读五四时期所谓“守旧派”与“激进派”的矛盾。马勇老师认为，对于新文化运动思想渊源的认识，要向前推到晚清时期。他以严复、林纾、陈衍、郑孝胥等人为例，指出闽籍

老派学人最先感受“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本质——最先投身于新知识的接受、创造、传播与推广，最先推动知识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转型。

因此，在近代中国早期思想启蒙与新知识传播时期，老派学人各自通过不同的路径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五四运动发生前后，闽籍老辈学人几乎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此时崛起的五四新一代知识人的反面，已有五四叙事架构基本上均将此冲突归咎于老派学人的保守与落伍。他指出，这种看法当然有其自洽的逻辑，但若重新排比新旧史料可以发现，直至五四时期，闽籍老派学人仍一以贯之地以维新、改良思想重建中国的知识体系，依然没有改变其对新知识的学术情怀、现实诉求及实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他们并没有倒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五四新一代知识人成长速度之快、

新社会变化之速，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激进者的极端、武断，使这些老派学人产生质疑、批评、反对与碰撞。因此，重新解读、探索五四时期闽籍老派学人，有利于重新认识两代学人在五四时期激烈交锋的内在逻辑。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则以“骈散、汉宋之争与‘学者’、‘文人’的纠葛——学术史视野下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为题，继续聚焦“学者”、“文人”在北大这个场域内的冲突及背后实质，从清代学术、思想和文学发展的线索中探幽取径，以学术史的视角追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李帆老师从三个层次展开。首先，北大文科的桐城派与章门弟子之纠葛，突出地表现为章门弟子逼走桐城派，使北大成为新文化的阵地。进而，两派之争正是清代学术之争的延展和变形：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即载程朱义理之道；章门弟子则追求“文以自然”，这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体系之争又可追溯至骈散与汉宋之争，随着晚清民初新思想的汇入，维护程朱理学的桐城派自然在学界受到压制。最后，从“学者”、“文人”的角度来看，自汉以降，学与文的分离、学者与文人的分离愈趋明显，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西式分科思想强调从文人创作转向专门学术研究，而以创作见长的文人代表桐城派，难以契合新时代的学科发展要求，按西式分科思想建立的北大文学门则逐渐容纳更多的章门弟子为教师，两派之争亦难以调和。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的报告题目为“蔡元培与五四时期中国

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进一步探讨五四时期蔡元培对于北大的体制整顿以及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制度创建及其贡献。他认为，蔡元培不仅对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理解，而且将这种现代大学理念付诸实施，仿效德国研究型高等学府体制，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胆改革。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立现代学科体系。蔡元培设置了“大学—学院—学系”三级新体制，注重文理两科、停办商科和工科、废门设系，突出了文理两科在大学学科设置上的核心地位，改变了民初的大学体制。第二，蔡元培将“教授治校”原则付诸实施，使教授能够具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保证学校不因校长人选变化而激烈动荡。第三，蔡元培特筹经费扩充仪器设备及图书，创办组织师生研习学问的学术社团，聘请专家来校任教并举办学术讲演，创办学术刊物和大学研究所，以推进北大学术研究。由此，蔡元培率先在北京大学创建了包括院系、选科制、评议会和教授会、研究所、学术社团等诸多元素在内的体系完备的现代大学制度。这套大学制度，不仅为现代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授提供了体制性保障，而且为现代大学作为现代学术研究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根本性保障，也由此奠定了北京大学作为民国时期全国学术研究中心的独特地位。

接下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邹小站作了题为“民初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的报告。他表示，一直被忽视的民初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地位。从注重历史分期的历史研究来看，这一时期的思想既不属于辛亥革命，也不属于新文化运

动——实际上是辛亥革命时期思想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联结点，也是中国思想由辛亥转向五四的重要节点。邹小站老师着重探讨了民初两个重要的思想转向：一是从国家主义、强有力政府论转向关注个人权利、关注国民的自我发展，二是从侧重政治改造转向侧重于社会改造、思想文化改造。从新文化运动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批判孔教思想——可看出，新文化运动在兴起之初，其思想倾向与思想议题，其关注个人权利与个性解放，其思想启蒙的路向选择，其对于儒学（孔教、礼教）的激烈批评态度等，都渊源有自，并非凭空而来。因而，新文化运动可以从民初思想之争中找到历史的脉络。

欧阳哲生教授最后作了题为“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从档案文献看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处置”的报告。他指出，过去人们多依从学生运动一方的回忆和新闻报道来叙述五四运动的事态演变。近年来，有关五四运动、北洋政府的官方

历史档案被陆续发掘、公开，为澄清过去在诸多历史细节上的误解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利用社会科学院、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保存的档案资料，还原北洋政府处置“火烧赵家楼”始末、审判被捕学生等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进程，来寻求北洋政府就五四事件与各方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过程，以避免人们对北洋政府的脸谱化、单一化认识。档案资料显示，北洋政府之所以没有办法办“火烧赵家楼”的学生，除了审讯材料不力之外，社会浪潮和舆论压力对于学生的理解与支援亦是重要原因。因此，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民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

本次论坛下半场主题为“五四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主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也扬首先作了题为“五四究竟是一场什么运动”的报告。在有关五四的三种表达（“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

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为全面。接着他从话语表达与历史叙述的角度分析了历来有关五四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受到国内不同政治形势、政治派别的影响，在很多具体观点上分歧很大，偏颇不小。就此，王也扬老师指出，应立足历史史实。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知不足”、求进化的过程，因而不可以割断历史的连续性。追求思想解放与个人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社会运动转向政治运动，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急切的心理状态；而后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写与表达，亦体现了思想界的矛盾与抵牾。五四究竟是一场什么运动？五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

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永瑞以“五四与连动的东亚：继续学习中的民治经验”为题，将五四运动放在东亚视角下进行考察。他以“连动的东亚”视角来重新审视五四，探讨中日韩三国在位阶结构上占着不同位置进行相互作用的东亚样貌。他针对有关五四的诸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进行了阐释，如象征化及意向化、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的关联、个人主义、爱国主义、世界主义及民众联合、儒教思想的评价与变革主体等。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全体社会的重大转型，还在于思想、文化的颠覆性变化与民众主体力量的增强，因而，可以称之为“五四革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韩钢教授与萧冬连教授，则将时间向后延伸至当代，探讨中国政治与经济变革中的特点。韩钢老师以“中国转型时期的弱势领袖政治及其启

示”为题，指出1976—1979年间中国开始发生一系列的根本变化，如经济社会政策放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启动与酝酿、精英和草根均趋向活跃等等。他认为，这种社会转型与弱势领袖政治的柔性、融通、妥协等特点相关，赋予了高层权力体制变革的弹性空间。而这段历史亦可颠覆人们既往的认知和经验，即一个社会的转型未必需要强势领袖。萧冬连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中国计划经济起源与社会思潮演变》。他指出，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具有三个特点：急、左冲右突、不成熟。民国时期不同时段内对于经济计划与计划思想有不同的阐释与实践，而计划经济的社会思潮与其他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一样，不过是对世界潮流的回应与回响。但需要明确的是，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前的经济计划有着极大的区别。同时他指出，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而非原始市场经济。

黄道炫老师点评时表示，五四也许只是一个符号，新文化运动或许更为重要。

（撰稿：李玉蓉）



论坛现场



分论坛二：“五四与新思潮”、“五四与新文学”



2019年3月3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第二场分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参会学者分别围绕“五四与新思潮”、“五四与新文学”两大议题深入探讨。

本次论坛上半场主题为“五四与新思潮”，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主持。首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瞿骏发表了题为“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的报告。报告主要围绕五个问题展开。一是聚京知识分子与地方的互动问题。二是何为地方的问题。三是地方读书人如何获得新文化的问题。四是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问题。五是作为中心的北京是如何从地方被反观的问题。其中，地方读书人对新文化的获得问题主要围绕《新青年》和《新浪潮》这两本杂志在地方上的获取渠道与阅读人数两方面展开。瞿骏老师指出，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揭示地方读书人获得新文化的重重限制。当时地方上的读书人，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阅读到全本杂志，而只能通过摘要或文章汇本来阅读新文化有关的文章。正是这些摘要和汇本，构成了地方读书人眼中的新文化的中心。尽管《新青年》是从北京大学发源，后散播各地，但作为主体的读书人有丰富的前史，

他们以各种状态与五四运动相接触，这些丰富的前史影响了他们对五四运动的阅读与接受，值得我们去探索与了解。同时，瞿骏老师也表示，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新文化除了由中心向地方传播外，中心与地方也存在一种互缘的关系。五四运动后，地方出现了大量的学生报刊，这些学生报刊本身的内容或许并不吸引人，但正是它们塑造了胡适等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基本观感和判断。对地方与中心互缘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看清地方与中心的真正关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发表了题为“人与秩序之思的跨洋环流——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与章太炎的思想”的报告。彭春凌老师指出，本次报告通过对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与章太炎思想进行分析，追溯对五四运动来说极为重要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在严复、胡适等留欧美派之外的另一种进入中国的线索。1902年，广智书局刊行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的《社会学》，这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社会学著作。岸本能武太吸收了以斯宾塞、莱斯特·沃德为代表的英美社会学中关于人与秩序之思的思考，并影响了章太炎的思想。他巧妙地用“非社会性”（unsocial）来对译斯宾塞原作中的“反社会性”（anti-social），对其“社会有机体”说进行再

编。此举有利于让个人主义传统不发达、珍视社会秩序的东亚儒家社会逐渐接纳斯宾塞的思想。章太炎也从岸本的《社会学》中领悟到，人类兼具乐群和非社会性两种属性。岸本提供的“非社会性”、“消极”等论说，进一步使儒学观念中不甚光彩的“废”、“隐”等逃群举动获得价值正当性，章太炎更从中升华出“以不作为为作为”的“抵抗政治”。在彭春凌老师看来，在英美中日各自饱含冲突危机的时刻，这些“社会学”理论的产生都反映了著译者通过解析“人”来再造秩序的憧憬。而在维多利亚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斯宾塞式个人主义假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曲折登陆中国，除了借由岸本能武太影响了章太炎外，还借由夏目漱石影响了鲁迅、周作人兄弟。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成玮发表了题为“新旧之间：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思想结构与民国学术”的报告。1914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后将讲义集结成册，是为《文心雕龙札记》，其思想主体是“为文之道，本乎自然”。这里的自然包括文体和修辞两个部分，二者共同合力，形成了文章的风格。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也与新文学对话，主要包括三点。其一是语法。黄侃认为，理解一篇文章只需搞懂字句的意思，语法的意义不大——这与《马氏文通》从整体到局部阅读方法正好相反，表现出其对现代语法不师古的批驳。二是用典。黄侃为当时认为用典不恰当的例子作了辩护：典故用之已久，但写作需推陈出新，因此会出现一些有所夸饰的典故。这与他反对过度修饰的整体文学态

度有所差别，显示出面对新文化运动关于用典的批评，黄侃需要为用典寻找新的资源。三是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正是在文言是否合一的核心问题上，黄侃在其《札记》中未能组织起合理辩护。直至黄侃离开北京南下武汉后，才在后期系统阐述了书面文字相对于口语而独立的理由。成玮老师指出，黄侃对语、文关系的积年讨论为研究黄侃后来对《札记》悔其少作的态度与其思想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实例。黄侃的思想在民国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自然之道”说。黄侃认为刘勰之“道”与儒家全然无涉，尽管这种划分过于斩截，却在当时取得广泛的影响——这为他所反对的新文学作了观念准备。尽管黄侃站在新文学的对立面，他的思想却为其所用，这也从侧面展现出了民国知识界的复杂动态。

接下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应磊发表了题为“现代觉音：太虚法师、《觉社丛书》及其回响”的报告。应磊老师首先介绍了觉社与《觉社丛书》。五四运动同时期，汉传佛教界一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18年觉社的创立及《觉社丛书》的出版。觉社的灵魂人物是太虚法师。应磊老师随后介绍了民国初年佛教印刷文化异军突起、大量出现的情况，并由1922年佛化青年团的建立指出，一个新的改变面目的佛教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兼容，而借助印刷文化与新兴佛学院等媒介，汉传佛教徒也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参与者。随后，她将研究上溯至佛教新青年的精神源头——太虚法师，并对佛教与五四启蒙的关系进行探讨。太虚法

师将投身革命与复兴佛教同时并行，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员力将，并在1918年与觉社成员共同创立《觉社丛书》。最后，应磊老师提出了两点总结性的观察。一是佛教印刷文化与主流印刷文化的边界很难划定，并非明确范畴。同时，也不能单纯将太虚视为一个佛教人物，体制内和广义上的佛教徒均活跃在现代中国文化核心的前沿，参与了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变革。二是不能简单说佛教徒参与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民国佛教期刊的勃兴不应仅仅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佛教版本。自晚清到民国，佛教印刷文化在根源上和整体上所凸显的“觉”的意识先于五四运动，是孕育并推动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一股关键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作评议。他肯定了瞿骏打破一般意义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单向性解读，回到五四时期人的感知状况的研究方法。姜涛老师认为，除了地方上的差异性，作为中心的北京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并不存在假象意义上的中心地带。姜涛老师充分肯定了彭春凌研究中的跨洋环流的视域和对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对于成玮的报告，姜涛老师则充分肯定了他在研究《文心雕龙札记》内部结构上的突出性贡献，并认为，在理论的对读之外，也可以更多着眼于当时的历史场域进行研究。对于应磊的报告，姜涛老师指出，有关佛教传播与五四之间的关系探讨，需要重构一个新的历史性的视野。

本次论坛下半场主题为“五四与新文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季剑青作

题为“国家与道德：民初共和危机与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及展开”的报告。首先，季剑青老师讨论了民国初年关于国家道德问题的理论的发生问题。民国初年，知识阶层出于对政治动荡和社会失范的忧虑，普遍陷入道德焦虑之中，这种忧虑背后是国家有机体说的影响，即国家是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有机的结合体，二者缺一不可。从这种观念出发，梁启超等进步党背景的知识分子发展出“国性”论述，试图以儒家传统为资源，为共和国建立道德基础；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会，则寻求通过宪法，将孔教确立为国教。随后，以蓝公武、吴贯因为代表的进步党知识分子也对是否应该以传统道德为立国之本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该建立与共和国相适应的新的伦理道德。共和国体能否与中国的道德传统有机结合的问题，在张东荪、章士钊等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作为理论前提的国家有机体观念也受到了挑战。张东荪将国家人格化，认为国家是人民意志的结晶。章士钊则反对国家的个人性与精神性，认为政治体制的建设最为重要。在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看来，儒家道德传统则成为了与共和国体完全不相容且必须被抛弃和否定的对象。建立在国民权利基础上的国家观念也取代了国家有机体理论，成为新文化人的主流认识。高一涵在理论上对国家有机体说进行了深入讨论与批判。陈独秀则认为，孔教和共和国政体完全不同，要想承认共和国体就必须完全抛弃和否定孔教。季剑青老师指出，如果说在历史事实的层面上，作为伦理道德体系的



现场气氛热烈

孔教是传统政治的基础，是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礼俗和文化之中的精华，那么在价值立场上对孔教的否定就必然导向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性否定。正是在这里，“五四”新文化人吹响了全面反传统的号角。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发表了题为“新大陆的旧文苑——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的报告。袁一丹老师指出，关于文学革命发生史，最有意识的建构者无疑是胡适。本次报告主要围绕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展开。报告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胡适文章《逼上梁山》背后的史观之争。《逼上梁山》实际上是胡适对陈独秀“文学革命是由产业发达、人口集中决定的”这一观点的反驳。胡适与陈独秀在1923年有过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战中，陈独秀持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是历史解释的最后之因；而胡适则持多元史观，他认为历史的解释并不能找

到最后之因，只能从多元的部分中寻找个别之因。报告第二部分还原了文学革命之前留美学界的整体氛围。当时留美学界，重实学、轻虚文是普遍风尚。在当时留美学生的整体氛围之下，胡适走向文学其实是一个特殊的选择，在胡适文学革命起始的宣言之前，留美学生圈中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对胡适的文学革命始终有着强烈的压迫感。在报告第三部分中，袁一丹老师考察了胡适《去国集》的修改与编订过程。通过对胡适诗歌《自杀篇》的分析，她表示，胡适的诗歌具有缺少感情、以说理取胜的特点。胡适对作为其文学革命宣言的《沁园春·誓诗》曾进行过长达十次的反复修改，却最终采用了最初的原稿。词中唯一没有改动的句子“更不伤春，更不悲秋”则反映出，胡适文学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杀掉伤春悲秋的抒情主体，凸显其“制天而用之”的工具性，显示出尽管胡适的文学革命是

被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催逼出来的，却处处显示着科学狂潮的痕迹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作了题为“鲁迅、曼殊斐尔与文学现代主义——以《幸福的家庭》为切入点”的报告。张丽华老师指出，鲁迅《幸福的家庭》是以经过“五四”洗礼的都市青年分子生活为对象的作品。报告中，她将《幸福的家庭》与新西兰小说家曼殊斐尔（Katherine Mansfield）的一篇相似主题的作品——《一个理想的家庭》进行对读，通过对二者关系的分析来探讨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首次使用的现代主义小说技巧及其在《彷徨》的后续作品中的表现。曼殊斐尔在文学史上以短篇小说而著称。1923年，徐志摩最早翻译了《一个理想的家庭》。在文章中，曼殊斐尔大量使用了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并运用了场景闪现的手法。在翻译过程中，产生了风格的偏离与文体的协商，这突出表现在徐志摩对小说中内心独白的翻译，也影响了鲁迅的写作——鲁迅阅读的文本是经过徐志摩翻译过后的。张丽华老师指出，《幸福的家庭》中具有三重对话：一是关于人物思想话语内在争辩的“微型对话”；二是通过场景闪现，主人公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的对峙中脱离出来的大型对话；三是人物思想“独白”与叙述者“叙述”之间的对峙和反讽的“形式对话”。其中的形式对话尤为体现了鲁迅对曼殊斐尔小说中视角转换与内心独白文体的转译与创造。随后，张丽华老师分析了《幸福的家庭》中所使用的小说技巧在鲁迅的后五四时期的都市小说如《高老夫子》、《伤逝》、《弟兄》中的呈现。她表示，这几篇都市小说

中都有鲁迅自己生活的投影，他使用现代主义方式的背后蕴含着其对自己曾经投入其中的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反思。最后，张丽华老师总结说，鲁迅的小说就是以文学形式介入不断进行的社会论辩，其中不仅仅有思想的对话性，也有文学形式的对话性——这样的对话不是静态的规则与式样，而是在不断流动、演变和协商中呈现出来的动态事件。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国华发表了题为“革命与反讽——鲁迅《在酒楼上》释读”的报告。李国华老师指出，对《在酒楼上》作品的解读是为了解答：该在五四启蒙的框架还是在辛亥革命的框架下理解鲁迅。《在酒楼上》中的主人公吕纬甫不仅仅具有以往研究者所认为的五四运动退潮后苦闷的知识分子身份，还具有辛亥革命的参与者身份。小说中出现的对吕纬甫的同情与反讽实际上来自于鲁迅对辛亥革命的记忆。随后，李国华老师探讨了《在酒楼上》一文中呈现出的革命者与知识分子的分歧问题，并认为可以分出两层：一层是吕纬甫的革命者身份无碍于其知识者身份；另一层则是，吕纬甫知识者身份有碍于其革命者身份——这是具有鲁迅特色的观点。鲁迅认为，知识者本身不是问题，他所否认或批判的是以知识者作为主体形象去重构革命者的形象，且革命者与知识者之间前后统一着。接着，李国华老师讨论了《在酒楼上》这一文本所具有的反讽性质。小说开头就显示出不确定性与反讽性。作者鲁迅是居于人物之上的，有意识地控制着小说叙述，非常注重自己与人物的距离。正是在作者的控制之下，才有了

故事的展开。作者将吕纬甫拉出了历史的洪流，使得这样一个本不应该出现的人物通过作者的控制打破抒情性的氛围，表现出对知识者将辛亥革命遗忘的一种深沉的反讽。小说的结尾设定在黄昏这样一个处于难以准确定义的临界时刻，表现出作者处于彷徨的状态之中。可以说，小说叙述最终指向是作者鲁迅的自我辩难。

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进行评议。她对季剑青的报告作了补充，认为可以在谈论国家问题时加入对民国共和国家体制的研究。对于袁一丹的报告，贺桂梅老师认为，报告结尾处可将胡适的讨论收回到新文学革命的建构层面。此外，

贺桂梅老师希望张丽华能进一步阐述鲁迅《幸福的家庭》与曼殊斐尔《一个理想的家庭》这两篇小说在文本上的关联，并表达了对李国华提出的对经典的“变态读法”的浓厚兴趣。贺桂梅老师指出，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存在往后拉伸与往前追溯这两种面相，本次论坛针对的主要是前者。研究五四运动的发生学，是对其进行谱系学式的考察。发生学和谱系学是一种批判性的研究方式，有助于研究者们跳出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来研究五四运动，重新讨论新旧关系。

（撰稿：钱婧）

2、专题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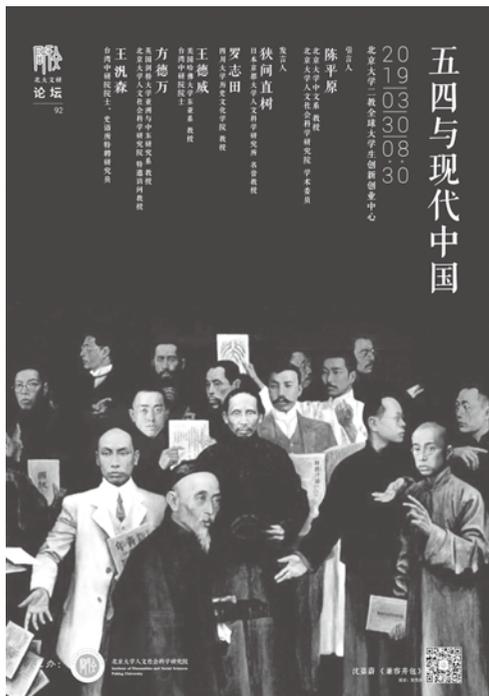
文研院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



2019年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这是20世纪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代代学人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大学一百年来思想文化的创造、学术传统的

更新，都与五四有着各种各样的承续关系；而五四运动也深远地塑造着北大师生的精神气质与思想传统，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和科学文化最为敏锐和坚韧的探索者、开拓者。回望五四，对五四的再评估与再诠释，意义非凡。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于2019年3月30日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



学术论坛，邀请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相聚北大讨论交流。系列学术活动贯穿全天。

30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主题论坛于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拉开帷幕。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以“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为题作引言。随后，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的报告题目为“五四运动与日中关系史概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罗志田的演讲主题为“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的报告题目为“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

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演讲题目为“作为现实政治的五四”。最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以“启蒙是连续的吗？”为题作学术报告。

30日下午，两场“五四与现代中国”主题论坛分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同时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延世大学的近二十位海内外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就“五四与新思潮”、“五四与新文学”、“五四与20世纪中国政治”、“五四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个议题奉上精彩的主题演讲和讨论交锋。

五四留下的精神遗产与思想资源，是一代代学人思考与对话的宝贵财富。而今天对五四的回望与再诠释，是对五四所提出问题的真诚而有力的回应，也是对中国过去、今天与未来的反思与探索。除本场论坛外，文研院还将于4月下旬组织举办“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的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回顾缔造了北大黄金时代的老两代学人，展现他们的学术建设和精神风貌。

（撰稿：杨仪、周诗雨）

（二）“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开幕



以北京大学为重镇的五四运动是20世纪深刻影响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激荡的时代风潮中，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于此，展开中国近代文化最为活跃的复兴局面，也奠定了北大在中国历史上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值此五四百年之际，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举办“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4月26日下午，展览开幕式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行，校长郝平、副校长王博出席开幕式。来自校内外多个单位的嘉宾和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参加本次开幕式。开幕式由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主持。

王博副校长指出，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才奠定起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基础，完成由传统官学 to 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开启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气，汇聚求学术求真理的师生，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就在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

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王博副校长表示，北京大学将于近日成立五四运动研究中心，在收集史料、研究历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与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建立紧密联系，以此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而北京大学也会继续努力弘扬五四精神，在当今时代作出无愧于先贤的贡献。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在致辞中指出，“五四不仅是一个‘日子’，也是一个‘时期’，更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日的游行虽未得到充分筹划，但瞬间激荡而来的决定却铸成一次历史性事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思想学术界孕育、造就了这一运动的核心骨干与精神氛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正处于关键的转折期。新术语、新概念、新的价值观、新的政治视野乃至新的社会风气，呈现出复杂而又多元的局面。本次展览以点点滴滴、真切鲜活的历史痕迹，再现北大学人探求真理的执着追求，展现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郝平校长（前排中）出席展览开幕式

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表示，五四运动因北京大学而酝酿、爆发、传播，北京大学也因这场伟大的运动而获得新的灵魂与生命。五四运动成功的关键便是身处古今中西之间、心怀家国天下的学人群体。世界学术视野与中国文化精神在他们身上兼容并包，新思想与旧传统在他们胸中激荡冲突。本次展览以实物片段为载体，探究这批学人的汇聚与融合、学术团体的创办与发展、学术思想的交锋与冲突，由此而得以见学人、见学术、见社会、见时代、见精神。此外，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最鲜亮的底色，书生报国是五四学人最真实的写照。五四虽已百年，但我们仍处于它开创的伟大变革时代之中。不忘学科初心，接续学术传统，弘扬五四精神，是新一代北大人致敬前贤、报效国家的最好方式。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指出，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为重镇，既是一场激烈的思想运动，也是一场面向整个

社会的文化启蒙运动，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本次展览的主题是“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学人”是大学之根本，一百多年来，正是通过一代代优秀学人的努力奋斗，才有了新文化的灿烂星空，才将中国文化引向了一条自主自信、健康向上的道路。百年以来，学人的努力功不可没，而五四中的北大学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亲历者，也是中华文化转型的见证者，更是北京大学的骄傲和光荣。文研院举办的“新文化的曙光”展览与鲁迅博物馆（即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新时代的先声”展览可谓异曲同工——前者以光明开启智慧，后者以呐喊惊醒噩梦——两种物质形态表现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个特点。

鲁迅曾提问“从来如此，便对吗”，胡适曾言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学生代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郑鑫认为，五四之所以如此迷人，正是因为它给所有的

“理所当然”打上了问号。五四给了青年学子一双新的眼睛，给予了他们改变世界的勇气和热情，也让新文化的曙光最终发扬光大成为潮流，而文化启蒙带来的反思则导向了创造力的迸发。经过五四的洗礼，这些学人也确立了自己的志向，成为了中国新时期“再造文明”的中坚力量。而当今，五四已过百年，我辈青年仍需谨记以史为鉴、以史为师，发扬五四精神，让五四永不褪色，让北大永远年轻。

开幕式结束后，主办方引导嘉宾和观

众至展厅参观展览。展览分为三个单元：“文化之激荡”“风气之转移”“精神之回想”，全面展现了新文化的曙光以北大为中心，经由五四运动轰动整个社会，进而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过程，同时也展示了北大在新文化思潮中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一系列历史材料。五四时期的北大学人用知识和智慧回馈国家，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文明复兴照亮了前路。

（撰稿：孔博林、周诗雨）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 专题展览精选



2019年4月26日至9月20日，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展览分为三个单元：“文化之激荡”、“风气之转移”、“精神之回响”，展品包括报刊、杂志、照片、公文和学术著作等，展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师生们在学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努力和进展，展现了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深厚渊源。

五四时期对北京大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经历了蔡元培先

生等人的改革和建设，北京大学才奠定了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制度的基础、开启了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气、汇聚了求学术求真理的师生，真正完成了由传统官学到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成为学术的中心。五四哺育了北大，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同样也引领了五四。老师辈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与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共同思考和实践文字语言的变革、新思想新伦理的介绍、中西文化的融汇、现代学术的建设、社会国家的改造，为解决“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提供方案。宽松的文化氛围和严谨的学术风气将北京大学推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前台。而

北京大学的师生们也当仁不让、为其前驱，以各种方式将新文化运动推向全国，共同助力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一、文化之激荡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强调大学及其学生“研究学术”的宗旨，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泛聘请有学识而热心学术教育的学人到北大任教。其中不仅有陈独秀、胡适、蒋梦麟、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王星拱等新派学者，也包括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旧派人物。同时，北京大学还积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杜威、罗素、杜里舒等外国学者先后来校访问、授课、演讲，使得北大师生能近距离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

除了汇聚人才，蔡元培还主导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校制度和学科制度建设。他主张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及下属系所，并基于“教授治校”的理念改革北大内部组织结构，设立大学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分掌学校立法、行政、学术和事务。其中评议会以教授为决策主体，以合议制为决策方式，成为北京大学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人才的集中、氛围的宽松、科学制度的制定和实行，为北京大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风气之转移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迁至北京，北大教授李

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工作。《新青年》成为推进新文化传播和讨论的重要阵地。文学革命的两大纲领性文件《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正发表于此时。钱玄同曾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的通信栏中扮演反对白话文和新思潮的守旧派，刘半农则对他的观点大加批判，以此“双簧戏”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文学革命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个领域都取得不俗的创作实绩，如鲁迅《狂人日记》、胡适《尝试集》。语体形式的更新助力了思想革命，使新思潮可以向更广阔的地域和人群传播。

《新青年》的编辑们通过文字批判旧礼



观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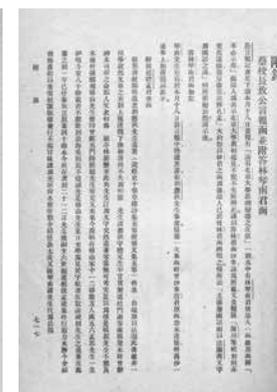
1920年2月，北京大学接收查晓园、奚滨、王兰（从左至右）三位女生进入文科旁听。暑假后，北大冲破阻力，正式录取了9名本科女生，从此开公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



张煊《驳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原文载于《国故》第一卷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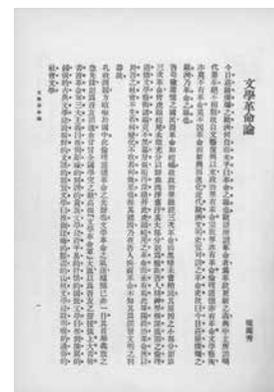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君南君函，原文刊载于《新潮》第1卷第4号



林纾《荆生》



陈独秀《敬告青年》，原文载于《新青年》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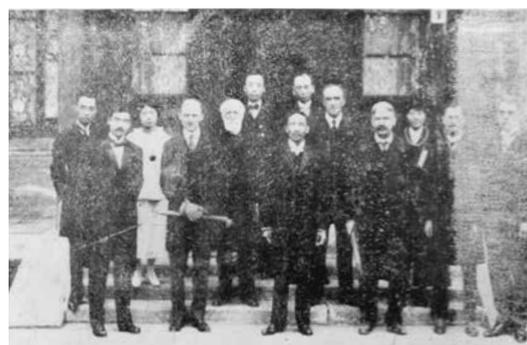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原文载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



胡适 1917 年北大文科教授聘书



1918 年理科化学实验室



1920 年 10 月授予杜威及芮恩施两氏名誉博士学位典礼后纪念摄影

教、旧道德、旧伦理，北京大学在实际行动上助推了妇女解放。1920 年，北京大学开女禁，允许女学生入校旁听，并在同一年正式招收了第一批女学生、聘任了第一位女教授。

一战的终结和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北京大学成为当时研究、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心：《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号》、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

刊载了《共产党宣言》，1920 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李大钊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等课程。胡适与李达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更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扩展。

中西、新旧文化的关系是五四时期的焦点问题。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区别与联系引发了广泛的争论。陈独秀将《新青年》的旗帜总结为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将新思潮的意义概括为

“评判的态度”和“重新估订一切价值”。林纾曾在 1919 年写信给蔡元培，表达对文学革命和新思想的反感，蔡元培则在回信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表明了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以新派学人和学生为主体、“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的《新潮》杂志与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国故》杂志意见分歧，毛子水和张煊以两份杂志为阵地争论学者应如何对待“国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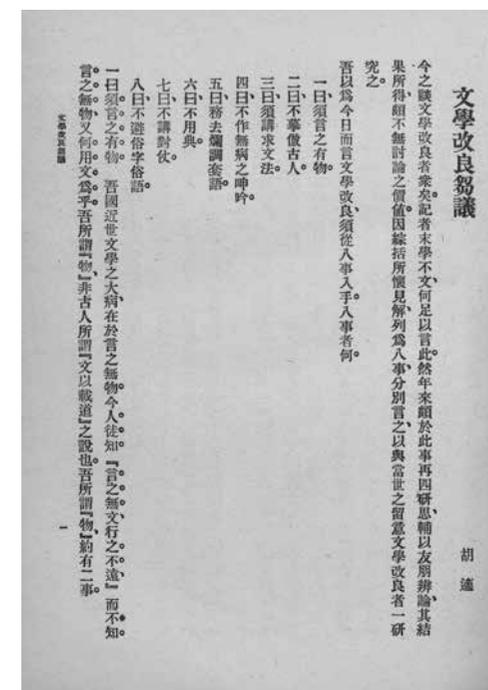
现代学术机构、学术团体也在北京大学中成长起来。1922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下设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等机构，出版《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主要刊发民俗、语言文字及训诂、目录校勘、考古、历史等领域的论文。1923 年《国学季刊》创刊，主张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方法整理国故。其中，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广泛征集民间歌谣，将其纳入严肃学术研究的范围，推进了民俗学和下层民众文化历史的研究。

白话文杂志、报刊在五四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彻底更新了人们传播交流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在北京大学校内，怀抱共同志向或对同类主题感兴趣的师生组织了各种社团、学会，促进了思想生活的活跃。当时比较重要的期刊有：《新青年》、《新潮》、《国民》、《国故》、《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日刊》，校内比较重要的社团有：进德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戏剧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校役夜班、工读互助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体育会、雄辩会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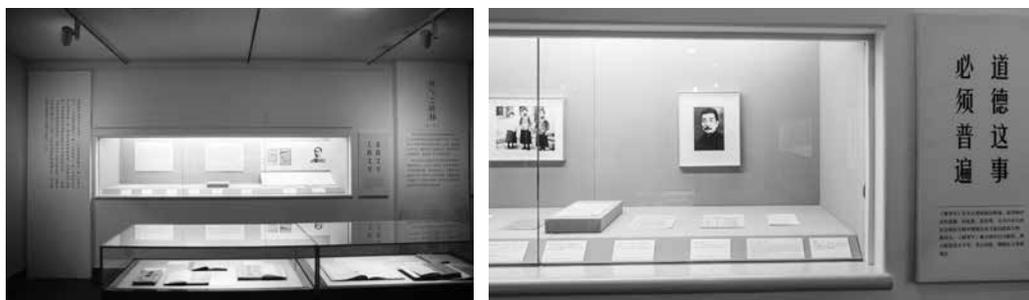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与物理学家、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璠一起整顿充实北京大学的理科，聘请任鸿隽、李四光、颜任光、王星拱、李石曾等人任教，并组建了北大化学、物理实验室。而法科则有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陈大齐、陈映璜等学者任教。

三、精神之回响

五四时期的理念、制度和人才，滋养了北大的学术传统，更为在中国创建“学术社会”与进行“文明再造”准备了条件。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禹贡学会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团体，若追溯其人事渊源，其中的核心人物及研究骨干，多出自北大。1928 年，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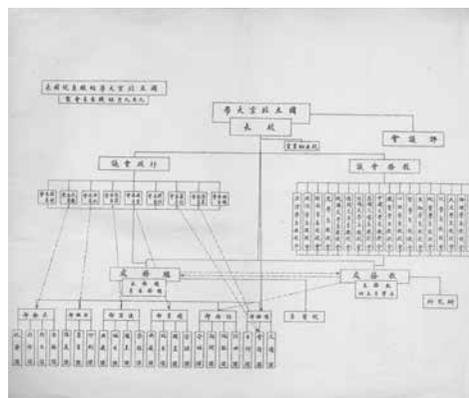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原文载于《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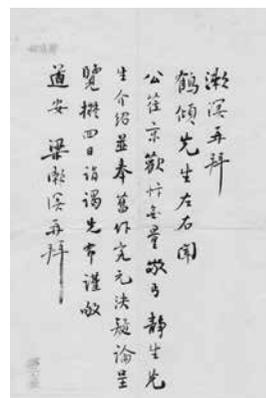
展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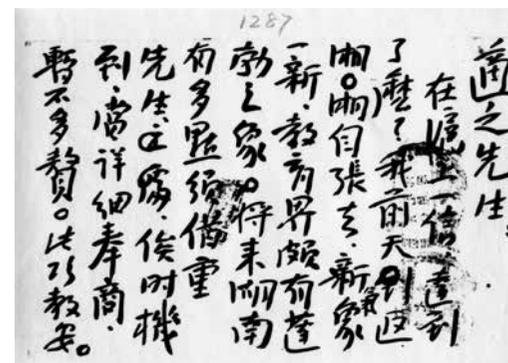
杜里舒讲座入场券



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



梁漱溟请范源廉引荐入职北大



1920年，7月24日，毛泽东寄给胡适的明信片



红楼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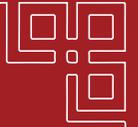
邓春兰《我们妇女解放之计划同我个人进行之方法》，原文载于《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

同年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由北京大学曾经的学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担任所长。曾受到歌谣研究会活动影响的北大学生顾颉刚毕业后供职于研究所国学门和《国学季刊》编委会，还开创了“古史辨”学派、组织了禹贡学会，成为一代历史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大家。学历不高的梁漱溟被蔡元培破格聘至北大任教，并在北大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一被视作“新儒家”开山之作的著作。

(撰稿：郑鑫)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111

林建华 | 中国大学教育：反思与未来

2019年3月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中国大学教育：反思与未来”。北京大学前校长、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林建华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文研院工作委员、元培学院教授李猛，文研院工作委员、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哲学系教授李四龙出席本次讲座。

首先，袁明教授作简短致辞。她指出，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亲历者、学习者、实践者与思考者，林建华教授对于本次讲座的主题有许多真实而独到的思考。

讲座伊始，林教授表示，本次讲座的侧重点在于本科教育。他希望通过本次讲座给予公众启示，提出一些问题，而并非提供答案。基于“问题导向”“知行合一”“跨界融合”“面向未来”的四大原则，北京大学最近成立了“北大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他本人担任主任一职，陈春花教授将担任执行主任。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林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国现代大

学的历史可追溯至一百五十年前。当时，中国大学以教会大学为主。虽在清朝末年已建立有国立大学，但现代大学在中国真正兴起则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那时，一批学者被返聘回国任教，大学的学科体系也初步建立。林教授援引三十年代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曾昭抡教授的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实验条件可媲美世界二流大学，师生的研究以及研究主动性则可媲美世界一流大学。”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产生了较大改进，并建立起了成型的教育体系。三十年代是中国大学教育平稳发展的时期。随之而来的侵华战争并没有阻滞中国大学的发展——西南联大与浙江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很高。林教授认为，人们的报国之心是保持教育水平高的重要原因。

五十年代初，许多综合性大学在院系调整的浪潮下变成了专业型院校。之后的“文革”对于中国教育的戕害是巨大的。七十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大家精神振奋，希望能把过去的时光追回来。九十年代初期，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则带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低谷……过去二十年是北大发展最

为快速的时期：教师队伍水准高，学术研究水准不断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攀升。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已成为世界之最，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并满足了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二十年来，科研经费和文章发表数量增长了十几倍，世界排名不断攀升——中国大学所取得的进步令国际同行赞叹。

讲座第二部分，林教授对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的历程进行反思。他指出，较古代相比，中国的教育观念发生许多变化：从“学而优则仕”到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就职讲演中提出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五十年代在国家工业化的背景下则产生了批判“通才教育”的工具主义思潮；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基于“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进行改革；而在今天，北大提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建立多样化的本科教育体系。

思想和文化的冲击也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战争与国家的动荡、外部势力的封锁、各种政治运动、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思潮等等均对我国教育产生了影响。林教授认为，做好教育需要提供给师生平静的氛围，让他们安心地学习与研究。所以，大学应具备屏蔽外界干扰的能力。

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的问题。从地区来看，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教育上的财力差距显著；中央大学与地方大学的教育观念差距较大。教育本应该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工具，但是，城市与农村居民在教育理念上的差距较大，贫困依然传递。除此之外，教育



北京大学前校长林建华

资源分配也不均衡。受制于教育资源与自主权不足，许多发达地区的潜力有待发挥。教育学与教育财政学的学者应着力改善这些结构性问题。接着，林教授用“双一流”计划的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分布图片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教育资源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以及其他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明显不足。

讲座第三部分，林教授基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对大学教育，尤其是北大教育的未来进行展望。他指出，从“战略合作”到“战略脱钩”，中美关系的变局（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对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中美贸易与经济关系的紧张不仅仅影响了经济，还辐射到了学界——就连美国本土学术界也受到这种冷战思维的影响。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已形成雄厚的发展基础，这包括

完整的工业基础、广阔的市场空间、空前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投入、较为完整的教育与学术体系。对于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我们应当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立足于自力更生并团结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力量，聚集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并为其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培育出更具有创造力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

大学的内涵建设也是“做好自己事情”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学是一个高度依赖个人的具有创造力的机构。充分释放学者和学生的个人潜力并将个人发展与整个大学的使命结合起来则是其要务。林教授以“齿轮箱”为比喻详述了这个问题。齿轮箱有主动轮和传动轮。而对于大学来说，每一个机构或个人都应该是主动轮，拥有内在动力。但是，只有在自身转动的同时建立一种共识，并注意到与周围环境进行协调才能使整个齿轮箱的效率最大化。所以，我们必须关注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要通过政策、文化与制度的引导建立起一种共识，完成大学的共同使命，偏废任何一点都是不可以的。卓越的大学应当聚集起最有潜力的学者，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学术发展环境，并使得他们既成为最顶尖的学者还要成为学生最喜欢的老师。要实现这几项，大学行政系统要为学术系统提供有力的支撑，营造出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管理人员学会从师生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有“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心态，要学会倾听学者的声音，要对学者群体更加宽容。

在今天，北大的本科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这要求我们要做更深入的教育

研究、了解我们的使命、了解我们的学生、了解我们的教师。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使命与愿景，理解大学的逻辑。

从外部来看，大学的社会影响力是最为直观的，而学术影响力则体现在对于人类思想与科学技术的重大影响。这些声誉主要源于大学的毕业生。从发展角度来看，大学的核心是人，而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核心的使命——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大学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要建好一所大学，应当从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开始做起。

本科教育改革二十年来，北大作了许多努力。元培计划的施行便是一例：低年级通识教育、高年级宽口径专业教育、自由选课学分制——整个计划目前已经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并逐步得到认可。在学校整体的教育改革上，按学科大类招生和培养压缩毕业总学分、修订教学计划、建设通选课程体系。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具体方面，北大设立了跨学科教育项目，在全校范围内实现自由选课及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并建设了专业教育核心课程体系。

林教授认为，本科教育改革是艰辛的。其一，所牵涉的利益面广，不仅牵扯到校内的院系、学者和学生，还需在社会评价、学校使命与社会责任等方面多加考量；其二，教育改革中传统与创新的权衡就包括社会需求变化与保持学校传统的平衡、对教育模式理解的不同而导致变化过于频繁等问题。所以，形成一个共识性的、一以贯之的原则非常重要。

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务是激发院系、教师和学生的潜力。通过调动院系的资源配置，在评价机制上引导教师和学生转变

教育与受教育的观念来给予学生更好的学习和成长体验。而实现以上的目标，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教育研究，更加了解我们的教育、教师与学生。

在教育层面，常出现以下问题：理科院系的学生入学后对专业的感兴趣程度下降较大，在专业精神上严谨度较高而思辨能力不足，学生喜欢系统性授课但是课后的交流讨论比较少等。关于教师这一层面，我们应该明确，学术发展是教师的首要诉求，人才培养则是学校的核心使命。学校既要为老师提供良好的学术发展条件，但同时也要有政策引导教师做好教学工作。同时，我们要充分了解我们的学生。总体上，北大的学生“多怀奋进之心，鲜少胸怀大志”。在美国，大学比较注重通识教育与对于建立核心价值的认识，而欧洲的大学教育则更为专业化，对于人文素养的培育沉淀在其长远的历史与家庭教育中。所以对于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教育体系，而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学生来形成适合他们的教育。当今，中国的学生是在互联网的世界中长大的。他们有着会为开放的心态和全球化的视野，呈现出个性化与多元化的特征。但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可能会感到心力交瘁，并容易受到社会浮躁、功利风气的影响。

我们应该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学生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胸怀和创造力，要驾驭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探寻成长规律，了解中国学生的实际需求，提供给他们更好的学习与成长体验。在未来，北大应该向提高通识教育水平并促进学生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向进行深入的教育改革。

最后，林教授指出，对于一所大学而言，“一流”是一个外在的标准，“伟大”则靠的是品格——既要有平静如水的学术环境，也要对社会、国家与世界抱有激情似火的责任感。

讨论环节，林教授和袁明教授回忆了许多他们求学时的难忘瞬间。李猛教授与李四龙教授则谈到了北大在推行通识教育并在校内形成新价值观所做出的努力。刘云杉教授探讨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的可能与面临的困难。陈春花教授则表示要多从学生的视角出发，通过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明确个人发展需要来促进老师与大学的不断提高。同时，学生应当对于自己所在的大学和所授课的老师给予充分的爱。

（撰稿：龚泽恩）



112

乔尔·米格代尔 | 公共性：融入与排斥

2019年3月12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公共性：融入与排斥”。华盛顿大学政治系Robert F. Philip讲座教授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首先，米格代尔教授介绍了自己的主要研究兴趣，即国家社会关系。他表示，自己的研究致力于理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社会结构如何对国家能力产生影响。他介绍自己多年前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the state-in-society approach）以及对此研究路径的新思考，并强调国家能力的局限性及其影响因素。

沿着这一思想脉络，米格代尔教授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公共性（the public）。他认为，美国众议员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在1976年的著名演讲中提出的问题仍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果人人只为私利，“那么谁将为国家说话，谁将为公共利益（common good）说话？”米格代尔教授表示，乔



乔尔·米格代尔教授

丹在演讲中提到的国家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指向公共性，促使他思考美国的公共性是如何形成的。

讲座第一部分，米格代尔教授论述了何为公共性。首先，他提出将“公共”（public）作为名词来研究。“公共”一词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应用，譬如“公众舆论”、“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公众行为”等等。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将公共当作形容词使用，而很少考虑其作为名词的意涵。米格代尔教授认为，剖析公共一词作为名词的深层含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接着，米格代尔教授介绍了公共性所包含的三方面内容。第一是规则。米格代尔教授认为，这种规则是不成文的规定，

并存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库（behavior repertoire）中，由人们所共享。每个社会都会有其特定的规则，当人们都遵循着这些规则时，彼此之间会有基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第二是边界。米格代尔教授表示，公众/公共领域（public）与公民、社会等词并不是同义词，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可以成为公众的一员。这就意味着，公共领域是具有边界的，它只接纳部分人进入，而排斥其他人。第三是普遍福祉（general welfare）。公共要求人们除了考虑一己私利，也要支持公共的福祉。

随后，米格代尔教授提出了他的问题关切。他认为，“公共性”意味着人们与谁交往、交往中遵循何种规则、如何表达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如何处理差异和纷争。他在最新的研究课题中讨论了在美国这样有着高度异质性的“陌生人”社会中，日常行为的规则是如何逐渐形成的。米格代尔教授表示，公共性形成的过程中不乏利益冲突和斗争。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哪些群体主导了公共领域的规则？这些规则对谁有利，又对谁不利？哪些群体被排斥在公共领域/公众之外？

公众在形成过程中有两种排斥（exclusion）形式。一种是拒绝给予公共界限之外的人基本的尊重。他引述了林恩·洛弗兰德（Lyn H. Lofland）所提出的仪式性尊重（ritual deference）这一概念。仪式性尊重意味着，在共同体内部，人们默认尊重其他成员的公民权利和人格，但拒绝给予共同体以外的人相应的尊重。另一种排斥是指公共界限之内发生的地位分化（status differentiation）。米格代

尔教授在此援引历史学家约翰·卡森（John Kassen）的论述：“既有的行为规范经常以隐蔽的方式阻碍民主秩序，而为私利、特权和支配性的权力结构服务”。也就是说，公众的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地位差异。

讲座第二部分，米格代尔教授讨论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文化如何成为美国主导文化，如何定义美国人，以及如何划定美国公共领域的边界。他表示，美国作为移民社会，具有很高的异质性，但有一套特定的行为方式在美国社会中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接着，米格代尔教授指出了—个奇怪现象：为何具有排他性的主导群体为自己制定的规则却成为了公共规则？一方面，“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群体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他们自觉高人一等，有着专属的俱乐部、宗教场所、教育机构等，并形成了一套日常交往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这些行为规则逐渐成为社会中的普适性规则。

对此，米格代尔教授认为，战争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两大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美国内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displacement）和人员伤亡，并为女性和农民走进新工作岗位创造了契机。第二，内战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需求，大规模的军备物资和食品需求促使原有的区域性经济向全国性经济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主导的旧有城市精英群体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人力需求，不得不打破或削弱成见，吸收新成员进入

精英群体。因而，曾经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白人群体（如犹太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斯拉夫裔美国人等）、乡村移民、女性以及其他边缘群体逐渐获得进入管理层的机会，成为销售代表、领班和经销商代理人。在这一背景下，公众的种族、民族和性别构成在逐渐发生变化。

米格代尔教授指出，上述融入过程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即边缘群体需要放弃原有行为规范，学习主导群体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主导群体在接受新成员的同时，也要求新成员经历同化过程，认同主导群体的文化。对此，米格代尔教授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样的同化，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着很大的社会流动性，通过学习主流的行事方式，他们可以使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在社会阶层阶梯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接下来，米格代尔教授提出，美国公司的兴起在这一同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文化通过美国公司自上而下地塑造着人们的观念。他以“辐条-轮毂”（spoke-and-hub）模型来描述这一结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及他们吸纳的新成员在中心，而少数族裔、乡村移民等群体在边缘位置，受到中心文化的影响。同时，米格代尔教授指出，这样的同化过程也不乏张力。例如，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便挑战了主导群体对于公共的定义，重塑了人们对于公共的理解。

最后，米格代尔教授提出问题：如果社会流动渠道关闭的话会发生什么？经济学研究发现，美国人的社会地位相

对于他们的父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他认为，这一现象表明当代社会面临着公共解体（disintegr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风险，值得警惕。

讨论环节，现场观众踊跃提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同样讨论了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那么，米格代尔教授的研究相对于安德森的研究有何异同？米格代尔教授表示，关于共同体和公共，安德森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都做了很深入的讨论。然而，安德森忽视了核心群体（core group）对于共同体的影响，而哈贝马斯对公共的定义比较狭窄，忽视了群体之间的合作。他认为，在民主社会，人们似乎持有自相矛盾的观念——一方面承认人人平等，但却对部分群体持有偏见，表现出排斥性。而这种自由主义排斥性（liberal exclusiveness）对于我们理解公共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撰稿：魏玉槐）

113

邓小南 |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

2019年3月14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主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评议。

政治制度史是学界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近年来，“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研究范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即不再拘泥于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和规定梳理，转而投向动态的、灵活多变的实施方式与功能效用，并力图借此将制度与文化氛围、社会群体乃至思想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基于这一研究背景，本场讲座以宋朝的信息渠道研究为范例，探讨如何挖掘和理解制度史的“活动”因素。讲座内容聚焦于以下三部分：其一，“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命题的背景、原因和方法；其二，以宋朝内外层级中的信息渠道研究为例，展现这一研究范式的实现过程；其三，通过探讨制度文化，勾勒和还原制度运行的“生态环境”。

讲座伊始，邓小南教授首先介绍了这一命题的含义。所谓“活”的制度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制度本身是“活动”的，

有了活动，才称得上实际存在的制度，有了活动，制度才有作用；二是对于制度史的研究，不能只重视规定，而应该关注其实际活动的方式。她引用邢义田教授（注：文研院第五期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的观点，将制度分成“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如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后者则为特定需要、目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并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能能力、意识形态等）有意建构出来——二者相加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秩序网络结构。制度试图规约某些利益关系，提供某种行为模式；而特定的官方行为模式在历史上究竟存在与否、如何存在，取决于它是否曾经通过运行过程体现出来。这种运行过程及其对多变环境的应对，一方面会带来对于制度标准和程序的扭曲，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制度的补充和润滑。换言之，正式制度往往有赖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运作才得以推行，但后者鲜见于正式文本。因此，学者必须追踪表象背后的内容。

一个制度的初衷和实施的最终效果之间经常存在明显的参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观察制度的运行方式和路径。邓小南教授以桥梁和桥墩的关系为例，形象地描绘了制

度变迁的路径和节点的关系。路径有若干节点，就像桥梁有若干桥墩，若干节点构成一个单元，若干单元组成特定路径。制度史研究者不仅要关注节点间的关联，更要关注动态进程中的延展方式，关注制度的“生态环境”，即影响制度运行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

接着，邓小南教授以宋朝内外层级的信息渠道研究为范本，具体说明了“活”的制度史的呈现方式与研究思路。在中国古代，信息主要包括消息、音讯、传播的知识等内容；它具有流动性，载体和路径就是所谓的信息渠道。信息渠道是多向、多层、多途的。本次讲座聚焦于朝向君王的信息渠道，主要以君主与臣僚、禁中与外朝、朝廷与地方三种类型为例。

君主与臣僚之间的信息互通，是古代君王获取信息的最直接渠道。中国古代早有兼听则明的理念，最著名的当属唐代名臣魏徵之语：“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从中可以看出，兼听广纳不完全是君主政治开明的表现，更是其防范重臣壅蔽的统治术。宋代信息通进方式多层多途。如南宋名臣魏了翁所言，宋代自开国以来，上至宰相，下至朝官，都有向皇帝递进信息的特定渠道，所谓“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魏了翁的描绘不乏美化夸张的成分，但亦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君臣信息沟通渠道的多样性。宋代鼓励朝廷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允许“异论相搅”，这也符合宋代多权分立和制衡的权力格局设计理念。

台谏官位于“言路”。台谏，即台官和谏官的简称。一般来说，谏官事先提出

意见，台官事后弹劾纠正。他们直属于皇帝而不是宰相的属官，甚至可以弹劾宰相。这就形成了皇帝一行政体制（宰相等）—监察体制（台谏等）的“三角形”结构。欧阳修说：“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哲宗朝谏官刘安世也这样描述自己的角色定位：“倘居其官，须明目张胆，以身任责。”

除台谏官外，其他朝臣也有向皇帝直接进言的渠道。举例而言，一是材料极为丰富的书面章奏。在《历代名臣奏议》中收录的8000余份奏议中，有7000份左右来自宋代。二是轮对，即官员轮流面见皇帝的制度。从目前传世的文集史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当初的进言与对话场景，也会注意到方方面面持有的不同态度。三是外臣觐见。外派出任、自外归朝的官员，可能有面对君主的机会。四是讲筵留对。经筵后的君臣对话，包括政治军事形势、财政得失、社情民意以及朝野事务各个方面。对谈反映出皇帝关注的重心，也是讲读臣僚期待进言的时分。五是夜对。对于宋孝宗等颇为勤政的君主而言，夜晚的内殿也是广开言路、了解时事的绝佳场所。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行政机构、监察机构、秘书机构等官员都有与君王促膝长谈的机会。六是君主特有的私人信息渠道，包括亲随、军校、宦官、皇城司、阁门司、走马承受（廉访使者）和秘密“伺察者”等。除上述常态化渠道外，遇到特别时期，如日食、地震或其他重大事项，皇帝也会诏求直言。

谈及禁中与外朝之间的沟通，邓小南教授以日本学者平田茂树绘制的“宋代行

政文书流程图”为例，重点讲解了其中的信息流通渠道。宋代的上行、下行文书，正常情况下都要通过二府（中书、枢密院）；重要的核心事务或宫廷事务，则要报送皇帝所在的禁中。在禁中协助处理文书信息，“主文字、代御批”的办事人员实际上是尚书内省的“内夫人”。

皇帝批复的意见会下行到宰相机构。但有些御笔手诏也可能不经常规渠道，直接从宫中发至相关部门，是即所谓“内降”。外朝官员对于此类内降会有所抵制。

朝廷与地方，是中央集权王朝信息沟通的又一关键渠道。宋代不仅设立了进奏院、通进银台司等正式机构作为中央和地方上传下达的枢纽，还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媒介传播信息。“邸报”是重要的自上而下的传播载体，亦即政府公文、公报的汇编。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往往通过邸报这一官方媒介传播给内外臣僚；当时也有一些商人翻印邸报内容，则称为“小报”。自下而上逐层级的信息搜集，包括财政簿书和官员的印纸历子等，用于情况申报、信息汇总。宋代政府结构的中央集权特征非常明显，包括地方州县官员在内的考核任免都出自朝廷，范围广、层级多，该如何掌握地方官员政绩？宋代中央政府下设三级结构，其中州郡一级负责逐年考核州县官员，填写考状和印纸；路一级平行设置四个部门，“监司”负责评鉴、举荐和



邓小南教授

弹劾；中央监察部门巡视、访闻、体量、弹劾，吏部负责汇总比对信息，作为奖惩任免官员的大体依据。北宋中期曾经有两次重要的改革运动，即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在两次改革期间中央都曾经派出官员按察巡视地方。这些按察使者虽然只是信息集散的枢纽，没有处分官员的权力，但也使得“天下官吏各怀危惧”。

随后，邓小南教授简要介绍了浙江金华武义县出土的徐谓礼文书，其印纸部分详细记录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内容，既包括“通用”的考核条款（如出勤、奖惩等），也包括针对性的考核条款（如地方治安、催缴赋税等），为研究宋代朝廷的信息汇聚方式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素材。值得注意的是，印纸中多次出现“诣实”、“证应”、“勘验”、“照验”等字样，反映出宋代的连带责任保证制度（“保明”）。中央政府面对海量信息，若逐一核对将面临巨额成本，“保明”制度应时而生。所谓“保明”，是要求上报信息的官员或者相关官员保证信息可靠，包括纵向的次第保明、

横向的同共保明,负有连带责任人,皆需“结罪保明”。不难看出,宋代官员间有着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既有士人主动结成的关系网络,也有官方体制中上下级或同僚之间的责任关系网络。

本次讲座最后,邓小南教授结合上述研究,集中探讨了对于制度文化和制度运行的生态环境的反思。尽管中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但制度的实际运作并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可能与当时制度周边的政治文化氛围紧密相关。王安石有言:“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因而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被称作“制度”的规则和程序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体系如何执行、对待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如何感知这套制度。南宋时程秘曾经说,当今天下利弊,人尽皆知,但“其言未必上闻,闻之未必下行”。由此可见,信息的传递和沟通存在“言一闻一行”这一链条,其中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情况。“未必上闻”可能是在言路关节上有次第筛选,“未必下行”则取决于君主和朝廷的态度和抉择。

制度是否能够按照设想实施,有赖于一系列客观条件,如是否有充分的技术手段,是否有可供比对的信息采集路径,是否有适宜合理的抉择标准等等;但更有赖于整个官僚体制以及体制内当事人的行为。在官僚体制内,官员面临着不同的仕宦前景和风险,既包括渠道开放与管控导致的体系风险,也包括官场生态和信息选择带来的个人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官员自然有“窥伺”和“预备”的动力。例如,宋太祖喜好读书,卢多逊伺知太祖调阅的

书籍,便通宵阅读,因而在朝堂上应答如流,受到皇帝青睐。再如监司前往州县按查之前,往往将需要检查的内容事先透露给州县,州县官员按照上级文书的要求,预先逐项清理作账,应对汇报。在信息流通核验的正式制度下,官员通过“合谋”的方式搭建起了灵活、隐蔽的非正式实施方式。

官场文化和官员的价值观,深刻影响着制度的设定和运作实效。信息的需求方、供给方、传输方、筛选方利益表面一致,但深层关切不同。谁真正关心信息是否准确真实?朝廷对于掌控信息始终关心甚至焦虑,但在焦虑、重视和求实三者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官场生态对于官员的“驯化”,对于皇帝“玉色”的窥测、对于朝政趋向的揣摩、对于“上情”的体恤,都造成了信息的失真甚至主动放弃。例如,孝宗时江西发生水灾却未上报,事后孝宗问及,参政蒋芾解释说:“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再如,京西地区财政短缺,户部派遣官员前往调查,而谏官范祖禹却进言阻止,认为倘若知晓财政缺口很大,中央政府反而难以应付,故不如不知晓。

“制度”并非单一运行的独立个体,更多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成文法规与惯例、习俗乃至道德意识等等混合而成的综合体。现实中的制度,挣扎于关系与习惯的双重桎梏之中,通常在冲突、磨合中踟蹰前行;在多方张力的牵引之下,“妥协”、“扭曲”乃至“异化”是其运行常态。各层官府应付朝廷政策的“对策”,历来层出不穷;即便是新出台的规范,也可能在以往习熟的氛围内被诠

解、化约,易之以话语调整及对应性包装。这种驾轻就熟、平稳调易而不惜牺牲制度积极内涵的方式,正带有赵宋制度文化的清晰印痕。

信息渠道并非通畅的道路。不同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诉求,往往是信息保真或失真的源动力。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非真即伪”的观念去认识信息。关注信息流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关系”与“行为”,才能更切实地理解制度在现实环境中的运转逻辑。

信息制度的建设,往往是政治权衡的结果。在帝制社会中,朝廷关注的焦点在于国家的政治秩序。对官员治事“实绩”的追求,是从属于维系整个官僚体制的需要、从属于政治安定之“大局”的。这就决定了所谓“追求实绩”的努力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不难看出,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习用而不可或缺的运行方式。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其渠道不畅,当年的操控者在意这系统格套俱在,可供驱使。官方“言路”的节点留有层级式的阀门,掌握其开关者,既有不肯尽职尽责甚至刻意壅蔽者,也有忠于体制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在体制内正常有序地小心作为者,对于节门或开或关的抉择,深层的考虑往往在于预期的“政治秩序”;而这些判断与抉择,正与抉择者身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

邓小南教授最后总结说,制度文化不是单纯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影响制度实施的环境氛围,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纵观历史上各个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按照其设计原貌施行,调整、修正甚至变异、走形才是制度的常态。历

史学是注重反思的学问,不仅要求治学者反思历史上的制度、事件,也要反思自身的治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历史的现实是曲折复杂的,我们也必须在曲折复杂的现实中去观察和追索“活”的历史。

评议环节,邓小南教授与周黎安教授、刘志伟教授围绕制度史与制度经济学的联系、制度史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者的生活经验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周黎安教授认为,制度史从静态的典章、制度梳理走向了“活”的制度史,与制度经济学从静态的产权制度走向博弈、变通的转向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学中的制度文化,就是制度经济学所谈到的共享信念(shared belief);历史学中的“活动”因素,就是经济学中的互动和均衡。有关信息渠道的研究为制度经济学提供了极为具象的历史场景。他还指出,在宋代这一中央集权的王朝内部已经深深嵌入了现代制度的元素——“制衡”。这一管理理念被传承至今,被许多现代企业组织所采纳和应用。最后,周黎安教授认为,学者不能止步于描述、再现历史,更要理解历史背后的一般化、规律化逻辑,从而为理解现代组织和管理问题提供历史镜鉴。

刘志伟教授则结合自己的求学和治学经历,分享了对“活”的制度史的意义和方法的理解。以往治制度史多依赖正史中《志》的记载,而较少着力于《列传》,邓小南教授有关“活”的制度史的论述,为广大制度史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思路 and 范本,让读史之人在了解王朝制度时,不要只研读《志》中的文本,望文生义,而要将《列传》记载的史事同制度文本相

互发凡，求得对制度的真理解，甚至笔记小说的记述，对我们认识王朝制度也是很有价值的。刘志伟教授认为，通过同时代的各种文献记载的活生生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典章制度能够提供的弹性空间是靠人的活动扩展出来的，而制度弹性空间的扩大，意味着制度本身可能更为稳定。这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历史非常重要。我们做“活”的制度史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认识其“活”的状态，也要从活的实践，再落实到制度本身。其实，在历朝典章制度中，“事例”就是一种由“活”的实践形成的制度化条文。如《大清会典事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提问环节，邓小南教授则就激烈转型下的制度回应、制度文化背后的理性框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解读。她指出，与现代人一样，古代士人的活动和思维空间也是有限度的，都是在某种框架之内的能动性。换言之，制度文化与当事人的活动方式有关，但这些活动方式不是无根无源的，而是相对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认知框架的。有关行为框架和制度逻辑的讨论，有助于深化对“活”的制度史的认识和研究。

(撰稿：毕悦)

114

余辉 | 王翬距离黄公望有多远——重新发现《富春山居图》子明卷

2019年3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王翬距离黄公望有多远——重新发现《富春山居图》子明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最为著名的作品，在古代山水画史上有着巨匠必临的地位，明代沈周、董其昌、张宏，清代王翬、高树程等大家均倾心临摹过。

然而，由于明代藏家吴洪裕临终前授意将其火殉，真迹被烧毁一尺多，画幅也断为两段。自此，前半部分被称为“剩山图”，同后半段“无用师卷”分隔两地。1746年，“无用师卷”被辗转买入清宫。乾隆坚持以先前被送入宫中的摹本“子明卷”为真迹，称“无用师卷”为赝鼎，使其真相扑朔迷离且持续百年。

今天，“剩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无用师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学界

主流对《富春山居图》若干版本的真贋也已初步形成共识。然而，一手文献中的文字材料却多存在抵牾之处，人们对画外故事进一步发掘的兴趣也从未止息。基于以上背景，余辉研究员通过实验考古的新方式，借助物证材料进一步对《富春山居图》摹本“子明卷”进行了考察。

余辉研究员首先指出，仿本“子明卷”经历了先后两次作伪，若能找到伪印中的真迹，则可以引出下一步线索。第一次作伪主要集中在画卷尾部。为使人们相信它是出自黄公望之手，作伪者裁去了卷尾原作者的跋文部分，并在卷尾伪造了黄公望和明代画家刘珏的跋文和印章。然而，黄公望在世年间，石质印材尚未普及，而伪造的黄公望印章为石刻而成，作伪者因而显露马脚。

画卷被作伪者出手后，又经历了二次加工，作伪者从别处移来了明代官员、孔子五十七代孙孔谔的跋文，并钐上了印章。此外，题跋上董其昌、邹之麟的作者印，明末官员瞿式耜的收藏印也均为伪造。至此，除乾隆皇帝的收藏印外，经鉴定，只有明末清初收藏家唐宇昭的收藏印有一款为真。经进一步对比可发现，唐宇昭的书法与“子明卷”上所摹黄公望的笔迹十分接近。因此，唐宇昭与“子明卷”的关系值得深究。

唐宇昭何许人也？1649年前后，唐宇昭到宜兴吴洪裕家的藏画楼云起楼欣赏古代书画时，摹得一套“无用师卷”油素本。1650年，“无用师卷”即遭当时的主人吴洪裕火殉，虽被其侄吴静庵中途夺下，仍旧损失了卷首大段。真迹遭火焚后，吴静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

庵委托江南著名的文物商、收藏家吴其贞对真迹进行修复。当时，可以用作修复依据的“火前本”共有四个：明中期沈周本、清初张宏本、唐宇昭油素本摹本和新发现的明末摹本。根据核对，余辉研究员推断，沈周本并不一定像董其昌所言那般是背临的，清初张宏本的“火前本”身份则是为提高身价而进行的谎称。唐氏油素本当时位于常州，同修复者吴其贞距离较远，故明末摹本是“无用师卷”最可能的修复依据。而唐氏油素本作为“火前本”之一，则最可能是“子明卷”的母本。

随后，余辉研究员指出，“子明卷”的作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鉴于“子明卷”的母本是唐氏油素本，故作者必须在唐宇昭的交游圈中；第二，根据画家摹写的娴熟程度，作者应雅好黄公望的笔墨；第三，鉴于“子明卷”尾部由于有跋文而被裁去了140余厘米，作者应有在摹本卷

尾上作长跋的习惯；第四，由于其上有唐宇昭的藏印，他须将摹本送予唐宇昭。根据以上条件，唯有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翬可能是“子明卷”的真正作者。

据余辉研究员统计，王翬临摹的《富春山居图》中，现有10本有案可查。摹于1686年前的粉本及摹本均来自“火前本”唐氏油素本；1694至1696年，王翬根据真迹“无用师卷”作出粉本后，又综合两个粉本共绘三次。十次临摹中，王翬所依据的根本均为“无用师卷”，而比较“子明卷”与“无用师卷”的画风可以发现，二者高度相似。因此，“子明卷”极有可能为王翬所摹。

讲座中，余辉研究员重点分享了他的两次实验考古探索经历。首先，为了复原唐宇昭制作油素本时的状态，余辉研究员利用经过浸油处理的帘史纸，摹制成了一幅“剩山图”。此外，为了厘清不同文献

中“无用师卷”相互矛盾的火殉后果，余辉研究员又进行了火焚的实验，模拟当时火殉的场景。结果证明“无用师卷”被火殉时是平放在火盆上的，被火烧去的长度约有33厘米。这一结论为部分文献记载的火殉结果提供了验证。余辉研究员强调，在有条件的前提下，艺术史研究文献中的文字材料（如题跋等）务必要与相关的图像材料核准，方可确认可信度并加以使用。

评议阶段，李松教授表示，明中期沈周本仍可能属于背临，且卷末与“无用师卷”存在鲜明差异的山石可能引出对“无用师卷”真迹身份的新质疑。李松教授进一步强调，余辉研究员在本次讲座中所应用的实验考古和技术手段是书画研究应当提倡的新途径。最后，余辉研究员就书法字体考证应如何选取和对比作了更深入的讨论。

（撰稿：张雪冷）

115

乔秀岩 | 从《乡土中国》到经学史——“国民性”论的启发

2019年3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从《乡土中国》

到经学史——‘国民性’论的启发”。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乔秀岩主讲，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评议。

首先，陈苏镇教授对乔秀岩教授的学术背景与任职经历作简要介绍。讲座伊始，乔秀岩教授由他在青山学院向学生教授汉语的切身体验引入正题。他采用《乡土中国》作汉语教材，但该书现有的译本质量不甚理想，读者难以真正理解原意。他认为，学习汉语和日语的特殊困难源于语言自身的特性。如果只是套用西方语法学理论讲解汉语，先定词性、不顾语境，必使人愈加糊涂。对此，乔秀岩教授表示，在汉语和日语领域，“文法比语法更重要”，掌握“词语印象”和“预期”是理解文字内涵的前提。

乔秀岩教授由此开始对《乡土中国》及其作者费孝通的学术背景进行介绍。他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亦以套用西方理论为起点。针对中国社会进行的研究早期以印象评论为主，如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史密斯以及林语堂等人的著述；而作为学术的“国民性”论不同于品评德行，且更倾向于社会学的命题。紧接着，乔秀岩教授梳理了国民性研究的民族学路径：由马林诺夫斯基等侧重于原始部族研究的人类学家开始，玛格丽特·米德的《枕戈待旦》、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以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别用相近的方法走近结构成熟的社会与文化，回应战时与战后重建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探究，这是一种学理上的超越和突破。

对于“怎样认识一个社会”的学术性问题，乔秀岩教授强调了塑造“理念型”和实践的重要性。近年来的社会研究常以统计为

主要手段，但分析统计的客观研究只能揭示有限的现象，主观视角的理解依旧有其重要性与必然性。人类学的内在逻辑亦指出，研究的目标在于人们的“思考方式”而非“思想”，研究者应当跳出欧美概念与价值观的窠臼，进入社会内部、剖析其内在逻辑，以同情的心态理解其他文明的思考方式，而非简单地了解他们的思想。

乔秀岩教授又以《菊与刀》为例，具体分析了本尼迪克特所理解的日本国民性。他认为，该书揭示了理解日本人思想和行动内在逻辑的关键。日本的国民性一方面指向“各得其所”，即对社会秩序的重视；另一方面强调“义理”，带有“不得不做”的被动性。据史实进行分析可知，前者体现于明治后以天皇为核心、战争时期以日本为首“大东亚”秩序的构建；后者则事关对“世间”评价的关注，希望获得周围的认可。

罪与耻是分析日本国民性时常用的一组词汇。但这不是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提出的原创概念，而是人类学的一般理论和分析方式，强调了对事物的判断标准。乔秀岩教授对它们的定义进行了区分：“罪”偏向自律，指在内心树立道德标准，“耻”则偏向他律，其道德标准来源于周围社会。他同时揭示了耻文化的缺点在日本社会中的体现：人们缺少自律性，面对陌生环境寸步难行，对竞争存在恐惧。

乔秀岩教授提到，这样的精神结构也塑造了相应的社会结构：依靠“世间”的压力维持社会秩序。在日本社会的具体情境中，这意味着为保护家、公司等组织的声誉，人们乐意牺牲成员以划清界限。与中国的家庭制度不同，日本的“家格”不能移动，个人

却可以移位。养子颇为常见，且享有和亲子一般的地位。其他社会组织中论资排辈的目的也在于保护“单一集团”的社会地位，由此削减竞争、强化秩序。

本尼迪克特虽未对中国进行研究，但她还是在《菊与刀》一书中就“耻文化”进行了中日比较。她认为，中国以“仁”为最高原则，对忠孝进行限制；日本的

“仁”蜕变为黑道伦理的“仁义”，孝与忠畸形发展，无法受到限制。乔秀岩教授指出，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别处介绍到“义理”就是日本超越孝、忠的最高原则，而在此中日比较中却忽略了。“义理”并非一套客观标准，而是来自周围的压力。米德则认为，社会变化的速率决定了社会结构，并以此解释欧洲与美国社会在传统与创新等诸方面的不同。乔秀岩教授从对待患病婴儿的具体案例出发，借米德和费孝通研究中发现的社会现象揭示社会之间的差异。

回到对《乡土中国》的讨论时，乔秀岩教授提到，费孝通的研究特色也体现于其目标的明确性：作为知识分子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因此，他在书中探讨了中国社会中妨碍现代化的特点。但费孝通并未对乡土性进行贬损和否定，而是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成书出发点。尽管费孝通充分学习了西方的学术理论，但他将理论视作一种工具，没有对社会学和人类学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

此外，费孝通曾集中论述了“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差序格局指以自我中心，由



乔秀岩教授

近及远向外扩展、亲疏有别的关系网络，也是有关中国国民性的重要观点。费孝通援引《论语》中孔子的观点，在特定情境中具体讨论和解释“仁”。乔秀岩教授将这些概念与《菊与刀》进行对照，分析了“仁”和“义理”的区别：“仁”强调自己与别人之间一对一的关系，要求在差序格局的具体情境中，对每组交往关系进行逐一考量；“义理”则强调了自己与世间的关系。与中国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不同，《乡土中国》将西方的关系模式称作“团体格局”，先在的团体概念对团体边界、成员身份和关系进行了规定。

乔秀岩教授总结，国民性研究是一种在综合多方信息的基础上得出的主观认识，只能在实践中确定其有效性。他借用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实验成果，进一步指出：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不同的认识特点——东方人倾向于掌握整体情况，抓住具体事物的相对关系；西方人倾向于依靠概念认识个体。但西方的认识模式存在盲点：人们习惯使用概念认识世界，而感觉不到这种认识方式的特殊性，也因此存在极端化的可能性。利玛窦对中国

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虽有着高度精致的文化，却没有“辩证法”和严谨的逻辑思维，不会依靠概念进行推论，因此无法相信上帝的存在。乔秀岩教授指出，这一结论与利玛窦作为传教士的切身利益有关。此外，滋贺秀三也对欧洲法学和中华法系进行了对比，认为“差序格局的社会适合礼治，不适合法治”。

在社会结构层面，中国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具体人际关系，日本以家、公司、学校等单一社会的纵向关系为核心，西方的社会关系则是以概念为媒介的“团体格局”。乔秀岩教授指出，这些关系和概念方面的差异也体现在宗教生活中。而在从语境依赖性层面对欧美、中日进行分析比较时，乔秀岩教授同样强调，西方依靠概念思考，语法符号丰富，对语境的依赖性低；中日则以具体世界的整体认识为背景进行思考，语法符号较少，对语境有高度依赖。因此，汉语并未独立于语境，需联想具体事物才能理解，解读古籍的问题也多在于此。

最后，乔秀岩教授将话题引向经学史，指出其中存在语境依赖性不断降低的趋势，并对“去语境化”的现象展开分析。他随即对郑玄和王引之两位不同时期的经学大师进行对比。活跃于东汉时期的郑玄终生致力于经学研究，强调结合语境进行研究，认为读律当与读经相同，充分考虑不同语境，解决诸律条之间的矛盾。因此，其著作往往以“注”的形式完成。清代学者王引之则以考据训诂为主，侧重于将词汇从文本中抽取出来进行归纳。乔秀岩教授认为，语境依赖性高的文化和语言孕育了汉学，人若不重视语境甚至无法生活；单靠词义和语法也很难真正理

解《乡土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排除宋清汉学——研究者应当历史地看待学术演变，对不同时期的思考方法而非简单的“思想史”进行历史探讨。

接下来，吴飞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评议。他延续对经学史的讨论，从文献点校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经学是语境化而非概念化的，相关文本工作也不能机械地按照语法进行，而应当顺着“文气”完成。对学术方式深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人而言，郑玄治学的方式是很难理解的。随后，吴飞教授就中国经学呈现出的概念化、理论化趋势提出问题。对此，乔秀岩教授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历代学者兴趣方向与治学目的不同，社会对学术的要求不同，学术方法也因此相异。如宋人解经并非以研究经书为最终目标，而是抱着治理国家的政治目的，便因此产生了理论化的需求。

乔秀岩教授还与在场听众进行交流。在回应中日两国不同的人际关系现象问题时，他指出“圈子”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不同形态，并通过比较“义理”和“义务”的概念，再次说明了本尼迪克特相关解释中存在的缺憾与不足。

（撰稿：陈洁樱）



116

颜海英 | 希腊世界的埃及魔法

2019年3月27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希腊世界的埃及魔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拱玉书主持。本次讲座为文研院“文明之间系列讲座”第一讲。

讲座伊始，颜海英教授即指出，埃及魔法是指底比斯出土的记载着古埃及魔法的纸草文献。这批文献撰写于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及，上面记载着古埃及的秘传知识，并反映了希腊化时期埃及社会的双面特征。本场讲座共分为四个部分：底比斯魔法纸草的文献内容和研究价值、希腊罗马时期魔法纸草的特征、古埃及魔法师的形象、希腊化时期埃及社会的双面特征。

讲座第一部分，颜海英教授首先论述了底比斯纸草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在罗马统治埃及时期，统治者严厉禁止收藏魔法书，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毁书活动。因此，这批能被保存下来的魔法纸草弥足珍贵。与此同时，这批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纸草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对古埃及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之后，颜海英教授指出，魔法纸草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但长期未被西方学界重视，直至近几年才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或许在于西方纸草学者主要利用纸草文献进行社会经济研

究。因此，纸草学者倾向于将涉及宗教的魔法纸草归为古典学研究的范畴。然而，古典学者却低估了其研究价值，没有深入发掘魔法纸草背后的文化与历史信息，由此造成了相关研究的缺失。

在这一背景下，底比斯魔法纸草呈现于世人眼前。这批总计126卷的纸草文献由一位瑞典外交官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希腊文文献，部分是希腊文和埃及世俗体双语文献——后者正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这部分纸草主要是魔法书和炼金方，记载着古埃及人的神秘知识。颜海英教授借哈



颜海英教授

瓦斯王子收集魔法的故事阐述了古埃及魔法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并指出在古埃及人眼中魔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古埃及人将魔法与医学等量齐观，视为凡人不可接触的神秘知识。除此之外，颜海英教授还介绍了双语魔法纸草的主要内容，即占卜方式、获得喜爱和尊重的方法、毒药制作、治疗方法以及动植物名称和类型。

与此同时，颜海英教授提出了如何看待埃及魔法的问题。她指出，魔法师是掌管秘密者，埃及魔法首先是神秘知识。所谓神秘知识是指外人难以了解的神秘话语和神秘文字，主要涉及工艺、文字和艺术风格等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神秘知识也展现了历史真相，比如前文所说的哈瓦斯的故事。这一故事中的哈瓦斯在历史中确有其人，他是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大祭司哈姆瓦斯。考古发现证实，哈姆瓦斯同样痴迷于收集魔法书，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魔法书或许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记录。此外，魔法师也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群体，他们身兼高级官员（宰相）与知识分子（大祭司）的双重角色，在古埃及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咒语与当时埃及的社会历史息息相关。

讲座第二部分，颜海英教授主要论述了魔法在希腊罗马时期与古及时期的区别。她指出，在语言的使用上，希腊罗马时期的魔法书主要以希腊文（前）和埃及文（后）双语书写，并用科普特语注释后者。经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双语魔法书包含着埃及圣书体、希腊文和埃及世俗体三种字体。由此可推断，魔法师是在边抄写边翻译的过程中完成这批魔法书

的。照常理来说，原本神秘且神圣的魔法应该以埃及文书写，希腊罗马时期以如此繁杂的文字书写，既反映了魔法师们的变化，也反映了罗马统治时期魔法和魔法师的处境。掌握魔法的埃及祭司们是很有弹性的群体，他们不仅为埃及人运用魔法，还招徕希腊人做生意，因此，使用双语也不足为奇。当时，罗马统治者禁止埃及魔法，魔法师只能四处求索，搜寻不同版本的魔法书，边抄写边翻译，这也体现了当时魔法和魔法师日趋艰难的状况。

其次，区别还体现在魔法的内容上。古及时期的魔法内容往往具有神话反转的特点，其背后反映了埃及人特有的宇宙观，即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相互贯通。但是，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魔法则呈现出国际化的色彩，糅合了多个文化的信仰，将不同国家的神纳入到魔法之中。颜海英教授指出，这种看似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与古埃及人的信仰并不矛盾，万物相通的宇宙观自然而然地会催生这种国际化的信仰观念。除此之外，内容的不同还体现在咒语上。古及时期的魔法只要求将咒语念对就可以成功施展魔法，但是希腊罗马时期的魔法对咒语要求更多，更加重视魔法师个人的作用，也更加强调施展魔法过程中的神圣体验和参与程度对魔法成效的影响。

讲座第三部分，颜海英教授主要阐述了魔法师群体的特征，并表示这些纸草文献展现了一个文本共同体和转变的文化记忆。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对魔法和魔法师采取极端严苛的态度，魔法师冒着生命危险藏书。但是，在搜书和藏书的过程中，保存和分享神秘知识的行为无形之中促成了

神秘知识的文本化。颜海英教授表示，大祭司的生成十分困难，且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古埃及人的识字率仅有5%，因此，拥有较强的读写能力和文化素养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大祭司。为保证神秘知识密不外传，大祭司通过神秘仪式选拔而出，由此披上了神秘色彩的外衣。罗马统治时期对魔法采取高压政策，魔法师们不得不将神秘知识书写下来加以收藏，并通过加密的形式进行保管，最终于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文本共同体。而藏书之处也有历史渊源。大祭司们在神庙的生命之屋中工作，其中的书之屋专做藏书之用，由此逐渐形成了较大的图书馆（如泰布突尼斯图书馆和底比斯魔法图书馆）。据罗马主教克莱门特所说，藏书包括42种，涉及法律、宗教、占卜和医学等学科，图书馆的发展也促成了文本共同体的形成。

除此之外，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文化记忆也发生了转变。之前，魔法师主要在神庙之中施展魔法，这一时期的魔法师开始进入村落从事魔法活动。这一转变主要反映了当时埃及社会现实的变化，埃及逐渐走向双面社会，魔法师们也走下了神坛。

讲座第四部分，颜海英教授描述希腊罗马时期的魔法纸草反映的双面社会特征。首先，埃及社会的双面特征主要表现为希腊化和埃及化两方面，在语言、法律、日常生活和宗教艺术上多有体现。比如，希腊文和埃及文并用，法庭分为埃及法庭和希腊法庭等等。其次，双面社会与希腊化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征服过程中推广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过程。尽管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评

价众说纷纭，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与希腊化相伴的东风西渐以及由此出现的东西交融现象。埃及双语魔法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颜海英教授指出，这是一种传统再造的过程——传统只有经过改造才能进一步延续。

最后，颜海英教授指出，这批魔法纸草反映了当地的宗教融合状况。希腊罗马统治时期，统治者一度将埃及宗教信仰与自身宗教信仰融合。托勒密五世时期高度重视埃及传统，借以塑造自身的文化正统性，这也帮助了魔法纸草的保存。直到之后罗马统治者和早期基督教对魔法实施严格禁止政策，魔法和魔法师们才转入地下。许多宗教异端却受到埃及魔法的影响，但也正是这种宗教融合促使后世学者更加关注埃及传统信仰，并在之后引发了埃及热的狂潮。

评议阶段，拱玉书教授表示，尽管埃及学与亚述学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在魔法问题上存在区别。两河流域的魔法师们比较现实，因此出现了很多教授魔法的手册，可见他们并没有将魔法视为一种神秘知识。而埃及人强调魔法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因此，埃及魔法更加具有形而上的意义。除此之外，两河流域的魔法主要使用三种层次的语言：神的语言（sacred language）、诗性的语言（poetic language）和魔语（rumble jabber）。与之对应，埃及魔法咒语使用的语言处于哪种层面需要进一步解释。

颜海英教授在回应时指出，埃及存在神的语言，也就是那些难以理解、不为外人所知的语言；而诗的语言则主要为希腊

时期的魔法所使用。除此之外，埃及魔法与两河流域魔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预测性的，而后的主流是祈福性的，且具有正面的启动性功能。到了希腊化时期，两种魔法出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祈福和预测共存于埃及魔法之中。

交流环节，颜海英教授分别就埃及魔法与犹太教及基督教的关系、希腊罗马化后埃及土著的生活状态以及中国古代巫医与埃及魔法的比较等问题做出精彩的回答。

（撰稿：殷金琦）

117

周黎安 | 经济学的制度范式与中国经验



2019年3月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经济学的制度范式与中国经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评议。

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学的永恒主题，围绕这一问题经济学中发展出了诸多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涉及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挑战了这些既有理论，“中国做对了什么”成为张五常等经济学家所困惑的问题，这也是本场讲座的起点。本场讲座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周黎安教授回顾了讨论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的相关理论，并讨论了中国增长与

理论间的分歧；其次，他提出了“官场+市场”的理论，重新审视和评价政府与市场在中国的增长机制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动模式；最后，基于“官场+市场”和既有的理论的对话，周黎安教授解释了中国增长所带来的理论困惑。

讲座的第一部分，周黎安教授指出，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中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首先，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等人从英国和荷兰兴起的历史中得到启发，提出经济增长关键在于产权制度——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契约实施是市场机制的基础和私人投资的保障，独立司法制度和产权清晰界定至关重要。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对私人财产和非国有企业的保护取得重大进步，但距离人们的预期尚有较大空间，又何以能支撑中国高速增长？

其次，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等政治学家在研究欧洲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提出了国家能力概念，国家的汲取能力（如征税）和资源动员能力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一些经济学家从此得到启发，提出只有国家具备一定的国家能力，能够提供政治稳定、基础设施和司法保护等公共产品，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基本条件。在此视角之下，中国的汲取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力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可是另外一方面，相关研究又揭示了中国在集权机构下“碎片化”的权威广泛存在的合谋变通和选择性执行，甚至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而且面对食品安全等问题，中国的国家能力似乎也不再奏效；同时，国家能力的悖论还在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空前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未能带来突破性的经济增长。周黎安教授指出，这些悖论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国家能力分布存在差异，另外一方面说明除了要有做事的能力，还要有做事的激励，要能把事做对，还要做对的事。

再次，研究中俄等转型国家差异的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等人提出了政府可能扮演的“掠夺之手”和“帮助之手”的区分。在此视角下，钱颖一等人提出的财政联邦主义、周黎安提出的政治锦标赛分别基于财税和官员晋升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基层政府为什么扮演会“帮助之手”，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些研究的不足在于，不能解释中国地区间政府行为的差异以及同一地方政府不同职位和部门官员的行为差异。

最后，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达

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提出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而经济制度的包容性则来自于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中国的故事则对此提出了挑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治集权和政治制度稳定的情况下稳步推进的，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彻底性和政治制度的持续性形成了惊人对比。但是如果深入中国决策的细节可以发现，在中国政治集权之下的“共识型决策”中有各方充分的讨论和意见表达，而且渐进式改革还实现了6亿人脱贫，那么又如何理解这种中国特色的政经关系呢？

面对中国故事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分歧，周黎安教授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官场+市场”的理论框架。“官场+市场”的发展模式奠基于以经济发展绩效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之上：官场竞争驱使地方官员改善辖区市场环境，影响辖区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命运；辖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结果（GDP和财税收入）转而又影响官员在官场竞争的命运。这一模式是一种双向嵌入关系：一方面，官场竞争嵌入在“市场竞争”之中，市场竞争引导和制约官场竞争，避免官场竞争蜕变为政治作秀或权利游戏；另一方面，市场竞争嵌入在官场竞争的逻辑之下，每个企业背后都有高度关注竞争结果的地方政府，使得企业竞争更加激烈。

“官场+市场”的模式为什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呢？周黎安教授认为是因为这一模式实现了“把事做对”、“防治政府做坏的事”、“做对的事”三个制度目标。首先，地方官员的晋升竞争导致了地区间

的经济竞争，促使官员竞相招商引资、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和产业集聚，这就克服了“市场失灵”，让政府“把事做对”，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优势。其次，产业和人才流失的危险促使地方政府积极扮演“帮助之手”的角色，充分保护企业产权，限制官员任性从而优化营商环境，防止政府做坏事，由此克服了“政府失灵”。最后，“官场+市场”引导地方官员积极探索本地区有竞争力的产业，抵消中央部委的过度监管，限制寻租、腐败和乱作为，把政治企业家精神和民间企业家精神结合在了一起，通过密切的政企合作“做对的事”。

讲座第三部分，周黎安教授基于“官场+市场”的理论框架回答了前述的理论困惑。首先，在“官场+市场”理论看来，中国地区发展的差异性背后是各地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差异性——如果官员晋升更多依赖人脉、金钱而非政绩则意味着官场竞争程度较弱，如果企业所在行业垄断程度高、国有企业比重较大则意味着该地区的企业对于市场竞争的敏感度较弱。在官场和市场竞争都激烈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相互依赖程度较高，一般都实施市场友好型政策；在官场竞争激烈但市场竞争较弱的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政府主导且取决于禀赋条件；在官场竞争较弱而市场竞争激烈的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为市场主导，政府的作为有限，而且可能存在一



周黎安教授

定的寻租和捕获；而在两种竞争都较弱的地区，一般而言营商环境较差，政府通常扮演“掠夺之手”角色。因此，基于这一理论，周黎安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未必是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而是“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结合最完美、官员和企业家匹配最成功的地区。

其次，“官场+市场”理论的作用边界可以解释中国的短板——强大的国家能力为什么在民生、质检等领域鞭长莫及。周黎安教授指出，不同于市场竞争，官场竞争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因此各地区的官员之间缺乏合作且容易出现恶性竞争；另外，官员还受到任期的影响，这使得官员倾向于不关心长期目标；最后，官员的行为还受到考核指标的引导，容易对GDP等“硬指标”回应更加积极。这三个因素深刻影响了政府行为的逻辑，比如对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教育、医疗、质检等属地化服务，由于没有跨地区竞争弱化了官场竞争，同时由于户籍束缚，导致人员无法流动而抑制了市场竞争，在两种竞争约束

都很弱的情况下，这些领域必然难以表现良好。所以周黎安教授认为，“官场+市场”的模式有其擅长之处，也有其短板和不足，这些不足恰好解释了中国高速增长中所伴随的各类问题。

再次，在市场化、全球化等竞争环境下，国家能力、纵向行政发包制与横向“官场+市场”三者之间的互动，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一方面，属地化的行政发包制赋予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以资源、决策空间和责任，而政治锦标赛又在此基础上进行目标聚焦和行动激励；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不断塑造和积累的国家能力在行政发包制和政治锦标赛之下被激活、赋能、聚焦和引导。经过几十年的漫长演进和调适，这三者使得中国既有做事的能力，又有“把事做对”的激励，还有“做对的事”的努力。另外，纵向行政发包制与横向官员晋升竞争的结合，可以进一步解释国家能力在各领域有强有弱的情况。政府绩效良好取得较大成就的一般是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纵向行政发包程度和横向晋升竞争程度都较低的领域（比如国防、外交、航天、铁路），这些领域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二种情形是纵向行政发包程度和横向晋升竞争程度都很高的领域（比如招商引资、维稳、计划生育），地方政府在目标导向和竞争激烈之下表现优异。而政府表现欠佳的领域往往是纵向行政发包程度较高但横向晋升竞争程度较弱的领域（比如社会保障、安全监督、食品药品等）。

再其次，通过拓展“官场+市场”理论，可以解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扮演“掠

夺之手”的现象。在明清时期，官员由国家任命且有晋升激励和约束，但是地方上的“吏”则是世袭且不流动，因此出现了“县官不如现管”、“小鬼难缠”的酷吏现象，吏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当代的“官吏分离”现象同样存在——地方主要领导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差异。政治锦标赛仅对地方主要领导产生激励作用，大多数职能部门则不受此约束，而且在纵向行政发包制下，作为“条条”一部分的职能部门往往是受益方，因此职能部门可能会给企业和百姓造成“合法的伤害”。周黎安教授据此认为，一些地方出现的“开门纳客、关门打狗”的现象本质上并非当地政府故意的欺骗，而是地方主要领导的“帮助之手”和职能部门的“掠夺之手”之间的较量，因此地方主要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帮助之手”能够占据上风，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最后，在政经互动的视角下，“官场+市场”可以解释产权保护、政治集权等理论中的悖论。首先，在缺乏司法体系有效的产权保护情况下，双重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对企业产权的保护，这是“中国特色”的产权保护形式，这就回应了产权理论的质疑。其次，只有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基于晋升和发包的官场竞争才可能形成；另外，地区在GDP上的竞争也加强了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政权建设和治理能力，实现了国家能力的强化，所以在“官场+市场”模式中政治集权和经济发展是高度耦合的，这是“中国特色”的政经关系。

讲座最后，周黎安教授进行总结。他

指出，在经济学的制度范式中，相关理论或者关注“市场失灵”强调政府干预，或者关注“政府失灵”强调市场中心，但都忽略了经济发展的难点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存在，然而良好的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都是极为昂贵的制度安排，从来不会自动产生。“官场+市场”的政经互动制度其实就是在地区层面克服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解决方案——在双重竞争机制下，促使地方官员“把事做对”、“防止做坏事”并“做对的事”。在这一理论中，辖区内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密切合作，辖区间政经综合体相互竞争，这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失去了分析意义。最后，周黎安教授认为，“官场+市场”将中国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悠久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为四十年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关键性制度基础，这是邓小平最伟大的创造。

评议阶段，路风教授认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缺乏解释力的一个原因在于仅仅关注交换问题，而忽略了对生产的研究。缺少了生产内涵的制度经济学，纯粹成为了一种事后解释，不仅难以解释诸多发展现象而且不可证伪。所以路风教授认为周黎安教授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通过解释政府和企业的密切合作，关注到了生产体系的变革。同时他也认为周黎安教授的框架主要解释了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地区之外的生产体系，这是其他学者值得努力的方向。

周飞舟教授指出，周黎安教授的系列

理论侧重于政府侧的解释：行政发包制解释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晋升锦标赛解释了地方政府的逻辑，“官场+市场”则进一步解释了地方政府间和地方政府内的关系，这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官场+市场”的理论中，“+”有非常精妙的含义，这是传统政治学或经济学所忽视的，这使得本来分离的政绩和企业业绩耦合在一起，实现了两者的双向嵌入。同时他也认为，周黎安教授的理论是一个宏观理论，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企业而言，政府支持和企业排他性的获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学中对此有一系列的探索，比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世定教授的研究，就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排他性的获得并非是通过产权实现的，而是由于经营代理人（企业负责人）从事经营活动时与合作伙伴所缔结的合同关系嵌入到了个人的私人关系中，这使得经营代理人的私人关系对于企业经营不可或缺，确保了经营代理人相对排他的稳定地位，这就是所谓的“二次嵌入”。

周黎安教授对两位评议人的观点表示认同。针对路风教授的评议，他指出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所有的大国崛起都是工业大国的崛起，发展制造业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最快的方式，但是难点在于发展工业化对于政企合作有非常高的要求，要同时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官场+市场”理论就重点回应了这一问题。周黎安教授认为周飞舟教授的评议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在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关系逻辑，但是他也强调这些逻辑只有在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双重约束之

下才能发挥正面作用，否则最终会沦为权钱交易。

提问环节，周黎安教授就如何解释全国性的互联网企业、如何理解新常态对竞争的影响等问题做了回答。他指出对于全国性的企业而言，具体到项目落地的环节

依然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并无不同；同时官场竞争的指标可能随着时代发生变化，并不局限于经济增长，但是双重竞争带来的互动依然存在。

(撰稿：包培合)

118

刘志伟 | 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以一条鞭法和图甲法为例

2019年4月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以一条鞭法和图甲法为例”。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评议。

在文献记载里，中国王朝的典章制度，一般都是由高层官员在中央决策层面提出，由皇帝批准施行。但是，许多资料却显示，很多制度的产生和定型往往是在基层层面——在社会经济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这

些制度随着现实环境的改变因应运作中的问题采取了某种变通办法。这些变通办法最初在地方层面各自为政地实行，进而再逐步影响到国家体制的改变。一条鞭法和图甲制，在明清国家制度变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两种制度的变革都不是在中



刘志伟教授

央决策层面设计的，而是在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种种灵活应对中逐渐形成的。本场讲座试图介绍明代基层社会经济的变动如何改变了里甲制的构造和运作方式，进而导致一条鞭法的产生；一条鞭法又怎样成为这个社会转型过程的制度基础。

本场讲座从两个常识中的错误开始。在人们的“常识”中，明代的一条鞭法开始于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此法，实现各项赋役折征银两，按地亩征收。同时，人们还认为，明代的里甲制度在一条鞭法以后方才瓦解，保甲制取代里甲制为清代的户籍制度。刘志伟教授指出，早在《明神宗实录》万历五年正月辛亥的记录中，张居正就提到了部分地方所实施一条鞭法的情况，针对这项改革的争议张居正认为“法贵宜民”，即应当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取这一办法。而且从万历六年至万历九年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来看，中央层面所统计的各项征收依然与洪武年间所定的税收结构基本相同——以实物征收且未加整合。这些材料说明，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中央某项法令实施的结果，而是各地逐步改革试验的成果。

“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这个改革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从宣德至嘉靖年间逐渐实现了“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的转变，即把原来州县摊派的实物、力役，转变为按照人丁和田亩以一定比例征缴银两，实行比例赋税，实际上改变了赋税的性质。而从嘉靖至万历初年则进一步实现了“悉

并为一条”的变化，即把夏税秋粮和赋役所折算的各项银两分别统合为地银和丁银。一条鞭法的改革自宣德年间的平米法开始，再到正统成化年间的均瑶法、成化嘉靖年间的均平法，最终在嘉靖万历年间实现了“悉并为一条”，其间经过了一百多年。

刘志伟教授在此小结到：一条鞭法，是在“配户当差”体制矛盾日深的情况下，为了稳定洪武型国家秩序，各地采取种种应对措施所实现的变革。而且这些应对措施最终都趋于一致，即将各级政府向编户索取的各项负担，折算为用白银计算的数额，由原来的按户金派，改为按丁粮（田）征银。这个过程中，各地实行的先后、范围、深浅、方式不一，先后延续了一百多年。这种新制度，是在保留原来国家财政赋税体制的基础上，在府州县政府向编户征派输纳的环节上实行的。而各地方官府实行的办法，其实又是以民间的村社和家庭在里甲人户内分摊赋役负担采用的种种方式为借鉴的。所以，刘志伟教授认为，理解一条鞭法在明清国家转型上的意义，需要理解作为当时国家基本制度的户籍体制的变动，这更需要依赖自下而上的研究。

作为明代祖制的洪武型秩序，其实是在里甲制基础上实行“配户当差”的体制。王朝征派的赋役，性质上是编户齐民的“户役”。户役的原理是以“户”为课征对象，以人力和物质的供应为主要形式，以负担均平为原则（上户承担重差，下户承担轻差），同时以“人丁事产”的多寡确定各户的等级即“户等”。明初建立的里甲制度是这种户役征派的基础，明初为了控制基层社会也为了征收赋税，以“人丁事产”

为依据编排里甲，并按照里甲轮役，依据户等分摊负担轻重。然而由于户役的形式是无法标准化的人力和物质，而且上户和下户所负担的户役差异巨大，使得承担重役的上户沦于破产的处境之中，这催生了脱籍逃役、诡寄飞洒、花分子户等应对办法。而在明代中叶以后随着阶级进一步分化、宗族的形成、香火堂等社会组织的成长，里甲编户系统难以跟上社会变化，按户等派征赋役的机制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应对征收的困境，地方政府逐渐采取了按“户”里的人丁和田粮摊派赋税，而此时白银的大量流入也为标准化的税赋提供了计量单位。这种按人丁和田粮摊派赋税的办法，其实是对民间分摊户役责任方式的模仿。事实上在此之前，每一个大户为了实现户内所承担赋税户役的均平，在户内会签订契约采取按比例分摊、按日轮值等办法分摊责任，而且在货币流行后还进而采取了将税赋户役折成货币来分摊数额的办法，一些大的家族甚至还会设立共有土地，收益用于完纳赋役。弘治年间的《新里甲日录序》也反映出，白银此时逐渐成为缴纳赋税户役的中介。

从明初“配户当差”到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转变的制度基础，是从明初里甲制向后后期图甲制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户”的内涵的变化——里甲制下的“户”是家户即家庭的户口，图甲制下的“户”则是税户即纳税的账户。近年来很多学者在不同地区的研究都揭示出这种图甲制一直延续到清末，这种制度在清代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考科举、买卖田产、

移民的家乡认同，都是以图甲户籍作为最重要的依据。

与明初的里甲制相比，清代的图甲在构造上基本保留了一图十甲的结构，二者都是编户齐民身份的根据，也都是财产登记和政府征税派役的系统。但是在图甲制下，户作为田产和缴纳税赋的登记单位不再登记人口和丁数，这种改变使得大家不再倾向于分户，户的这个性质常常和宗族的建构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成为宗族形成的一种机制，大的宗族或者钱粮会等社会组织成为缴纳税赋所依托的社会实体，一些地方宗族直接就称之为户族。

最后，刘志伟教授总结到，两税法 and 黄册里甲制，是明朝建国之初确立的基本制度，终明一代都没有废除或改变。但是在实际运作中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使得民间用种种方式来应付这套制度，而地方官府为了维持其基本原则同时保持明代国家体制和秩序的稳定，把民间的方式吸收为官方的规制，并逐步扩大运用到更多的领域。随着各地施行的普遍化，中央政府就承认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条鞭”只是在中央这个架构继续延续的情况下，各地方官府实际赋役征管方式改革的产物和结果。新制度的运行并不需要改变国家制度层面的基本框架，反而令祖制得以持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明代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都实际上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税赋的性质和图甲的原理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经过这个转型，王朝国家与编户齐民的社会重新形成了新的秩序，所谓的民间自治与大一统集权国家获得了更为稳定的整合机制。刘志伟教授认为，要了解一种国家制度，需要从这种制度下人们的生活经验

出发去理解，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

评议阶段，包伟民教授首先指出，在唐代的两税法中就有了从“人丁为本”改为“资产为宗”的说法，一些学者以此证明唐代已经有了财产税，但是，刘志伟教授的研究其实揭示出看似“财产税”性质的税赋本质上还是一种户役或者人头税。其次，包伟民教授结合《开庆四明续志》中的记载指出，在宋代已经很明显地把人力赋役算到了田里，那么为什么在宋代没有完成这个税赋征收的改革，明代的改革是否受到前代的影响？再次，相比于资料丰富的明代，宋代的资料则较为短缺，那么从后代的资料去想象前代是否可能？最后，很多人认为清代所实行的是保甲制而非图甲制，但是刘志伟教授的研究证明清代实施的实际上是图甲制。那么图甲制下家族和社会组织势力的壮大，是否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人的管理权？

刘志伟教授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明代和宋代之间不是简单的同和异的关系，而是应该研究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和脉络，这个问题需要未来进一步研究。其次，清代的保甲制事实上在乾隆以前完全无法推行下去，直到后来地方官员按照乡村社会原有的系统来编制保甲才得以推行。清代并没有放弃对人的管理权，但是并不是直接管理，也不需要直接管理，因为清代中间的自治组织非常强大，这些组织可以作为政府的代表，清代是借由管理这些中间组织来对个体实现管理的。

周飞舟教授结合自己研究当代税费改革的经验指出，刘志伟教授所阐释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隐蔽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在许多学科的视野之内。明代的“户”其实就是今天的家庭，家庭是社会学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也是许多重要改革关注的对象。“配户当差”将户作为



讲座现场

一个实体单位，其实对户造成了很强的破坏作用，但是户役的改革把户虚化成一个计税的单位之后，反而加强了户的作用，孕育了户族的社会，构成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局面。税制改革背后的动力是原有体制下的积弊和陋规，显现了国家面对基层腐败的无奈，这与当代税费改革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改革背后可能隐藏着诸多问题：一方面，对于特别贫困的农民而言，相比于分批征收各类税赋，由于一次征收所有税赋缺少周转的余地，即使降低征税总额，依然使得农民无法承受。另一方面，改革之后的定额征税使得地方政府财政和基层公共服务陷入了窘境，这就需要中央政府进行大量投入，而在明代这个可以由

宗族社会来提供，然而如果缺少了户族组织，会使得国家直接面对农民个体时承担非常大的成本。

刘志伟教授对周飞舟教授的观察表示认同，他指出，明代关于一条鞭法的主要反对理由就是一次征收所有税赋可能给农民带来的困境。但是刘志伟教授也澄清了即使在实施一条鞭法之后，乡村的役尤其是涉及乡村运作的役依然存在，特别是朱元璋所定的里甲役并没有取消。最后，刘志伟教授认为历史和现实具有很高的相似性，研究历史和研究现代社会能够相互启发。

(撰稿：包培含)

119

刘迎胜 | 汉语的另一种书面语“小儿锦”——历史、现状与研究

2019年4月10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汉语的另一种书面语‘小儿锦’——历史、现状与研究”。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迎胜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主持。

刘迎胜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的实地调

查与研究经历，呈现“小儿锦”文字在民间的发展与动向。前辈的提及与采集，激发出刘迎胜教授研究“小儿锦”历史与使用的灵感。经由三次深入的实地田野考察，刘迎胜教授获取了大量宗教文献与世俗文献资料，并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从语言、文献、释读等角度，深化了对于“小儿锦”发展脉络的认识。

刘迎胜教授将“小儿锦”定位为回族人民创造的文字，不仅见于宗教事务，亦通用于日常生活。它是一种与汉字平行存在的汉语的另一种书面文，是回族的民族文字和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族的共同书面语，同样也是当前使用于独联体中亚的东干语的前身。这种文字曾又称小经、消经、狭经、忒达尼文字等，主要使用群体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及青海卡里岗藏族聚居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底层人员及中老年妇女，由“小儿锦”写成及印刷的作品也曾广为流传，但目前已处于濒临灭亡的境地。

若以历史、民族视角探索“小儿锦”的发展渊源，刘迎胜教授认为，“小儿锦”的产生与民族迁徙、多民族文化交流关系密切。刘迎胜教授首先澄清了国内回族史学界将伊斯兰教入华上推至唐初的错误认识，根据现存的文献、家谱、碑铭等材料认为，宋元时期穆斯林通过海陆两途进入了中国，经历了从移民集团到中国的一个民族的过程，并被称为“回回”。当时多民族国家机器的公文运转具备三种官方文字：汉文、回回文（波斯文）、国字（八思巴文）。回回人入华时使用回回字，而回回字在东西文化交流上具有重要意义，极大促进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经由元明的历史发展，回回文亦在文化交流的深化中，逐渐从外文变为一种民族文字，并发挥出其拼写他种语言的传统与特性，促进了“小儿锦”文字在明中期的产生。

回应索绪尔对于拼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定义，刘迎胜教授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指出，“小儿锦”是一种拼音文字，但其中



出现的阿拉伯、波斯、蒙古语借词挑战着索绪尔的理论。在“小儿锦”应用群体内部所使用的汉语，夹杂很多经堂语词汇，不经解释很难理解，而汉文翻译表述与其口语具有一致性，直接将读音落于文字，生成“回族汉语”及相关词汇。而“小儿锦”在记录时，则呈现出相反的例证：“角”与“脚”、“泉”与“全”、“前”与“钱”等语言现象表述，说明“小儿锦”使用者虽然书写为阿拉伯文原形，但这些波斯语、阿拉伯语词汇只表示意义，按对应汉语意义而非母语拼音进行朗读。结合索绪尔对于“拼读不一致”现象的解释，对比日语汉字的“训读”，并辅以马氏墓志的例证，刘迎胜教授进一步指出，“小儿锦”虽然是拼音文字，但应更精准地表述为兼具表

音（“所得从闻入”）与表意（“所得从见入”）两种截然相反的定义的拼音文字。此外，“小儿锦”使用者时常对表意词做出“同音相训”的改造，使得小儿锦中的波斯语、阿拉伯语表意词虽然首先要通过“所得从见入”的手段获取其初始意义，但还要更进一步依靠同音词，即“所得从闻入”的语音辨别手段来获取其最终意义。

探究上述独特之处的产生原因，刘迎胜教授侧重考量民族交流中的认同与传承，认为入华的回回群体兼有汉与伊斯兰两种文化身份。具体而言，回回群体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体现于他们创制的“小儿锦”选择了拼音方式书写，使用波斯、阿拉伯文，并运用了许多源于波斯语与阿拉伯语的表意词。而他们所具有的汉传统，则体现为“小儿锦”文字赖以产生的语言土壤为汉语，所借用的波斯语、阿拉伯语词汇按照对应汉语翻译朗读，而表意词凭借汉语“同音相训”的原则拓展其意义。此外，刘迎胜教授联系小儿锦的创制、使用者身份，关注到小儿锦的创制者不是回回人中高度汉化的群体，其使用者也并非回儒相通的学问家，其使用者中受汉文化教育程度较低，而这一因素对于小儿锦独特性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综合上述论述，刘迎胜教授总结认为，“小儿锦”创制时期是在其使用者，即入华回回群体的母语已经完全转化为汉语的时代，因此创制年代不能上溯过远，明代中期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张帆教授点评时表示，刘迎胜教授的研究与讨论综合了人文社科诸维度，充分结合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

识，通过对于文化背景的分析、语言学研究等面向，彰显出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并非单纯的同化与吸收，而是彼此互动与相互影响。

互动环节，刘迎胜教授亦补充了一些“小儿锦”研究中的细节性关切，如华北与西北地区在“小儿锦”的使用与表述上依据地区性方言发音呈现出差异性，而其使用主体回回与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在使用时亦有不同之处。通过对于差异性的进一步考量，刘迎胜教授表示，可以将“小儿锦”拓展为对于本地、本民族语言的文字转译，拓宽其概念意义，并可在材料的扩充收集中，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撰稿：章涵青）

120

方德万 | 豫湘桂会战——二战的转折点

2019年4月1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豫湘桂会战——二战的转折点”。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剑桥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学院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

讲座正式开始前，邓小南院长向方德万教授颁发聘书。随后，王奇生教授简要介绍了方德万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兴趣——战争史在其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他提到，中国民间有着庞大的战争史研究爱好者群体，但国内学术界对战争史的研究较为滞后。王奇生教授希望能借此机会激励年轻学者更多地关注战争史。

接下来，方德万教授发言。在介绍本次讲座主题时，他表示，过去学界对抗战后期以及豫湘桂会战（即日军的“一号作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是中国，国外对抗战的研究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方德万教授希望各界能增加对抗战后期局势的了解。

接下来，方德万教授对豫湘桂会战始末以及各方面因素进行详细分析。他援引汪精卫1938年12月离开重庆时的报告指出，当时的汪精卫已经认为“继续抗战的结果是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下台”。历史同样验证了这一点。方德万教授就此提

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明确地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命运已经结束，并预测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他认为可以将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视作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针对周锡瑞将1943年视作转折年份的观点，方德万教授认为，1943年的国民政府确实一度达到名誉上的高峰。当时的国民政府取消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表明蒋介石对自己的未来仍抱有希望，胡宗南调集军队准备攻打延安，日方也对蒋当局较为重视。但情况在1944年之后发生了改变，一度重视蒋之作用的英、美、苏各国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并未给他太多参与的空间——这说明国民政府的地位在抗战后期快速衰落，也揭示了豫湘桂会战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方德万教授认为，1944年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之中也是很重要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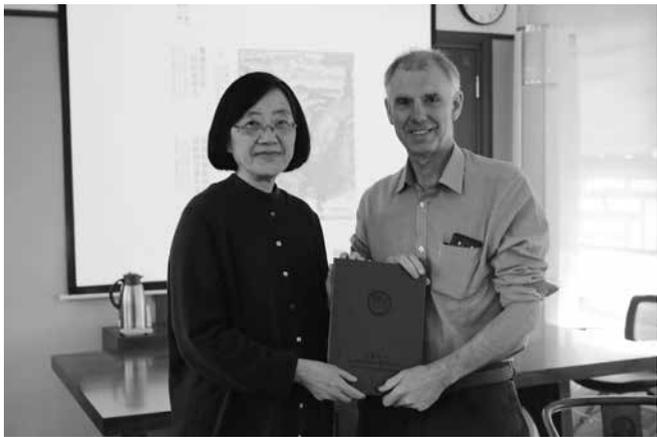
据方德万教授介绍，“二战”概念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处理战争赔款和条约等问题时，针对同时期一系列复杂的战争提出来的。其他各国也有相对应的概念，如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的卫国战争，以及英、法所使用的“大战”一词。1948年，英国政府在进行战争史研究时决定采用“二战”概念。而在“二战”期间，唯一使用“世界大战”概念的是德国。方德万教授认为，西方所使用的“二战”概念将世界各地的

复杂战争概括成了简单的反法西斯战争，忽略了国家和社会内部不同的性质和原因。他所著的《战争中之中国》正是希望把中国战场的真实情况介绍到英国。

接下来，方德万教授介绍了战场的基本情况，并解释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他指出，我们必须了解日军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规模最大的陆上会战。当时的日军集

中了五十万人和大量马匹，这意味着大量的后勤补给。同时，日军动员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表明当时在中国战场进行的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1944年，美国在中国建立了许多飞机场，其空军队伍受美国本土指挥，由中国出发轰炸日本——这些设施也成为日军最基本的作战目标。从日本资料可以看出，这场会战是由天皇批准进行的；早在1943年，日方参谋也已经开始制定作战计划。因此，豫湘桂会战是一场筹划已久的会战。

1938年后，在华日军基本停止大规模战争，转而对重庆进行空中轰炸，政治上建立新的地方政府并形成“联合政府”，汪精卫政府也是其中一部分。到了1943年，日军认为这种做法在中国战场不会成功，计划直取重庆、打败国民政府。随着美国的参战，日军失去海上优势，故需要打通大陆交通线，集合中国和东南亚陆上资源恢复军事力量，准备于1946年在太平洋战区实现反攻。当时的日本看出美英对消耗战争的恐惧，以“说服美英与其谈判”为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方德万教授（右）颁发聘书

目标，求取最大的胜利。因此，国际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理由。

随后，方德万教授详细介绍了豫湘桂战场和会战的几个阶段。河南是日军的第一个作战目标。1944年2月，日军集中军事力量从北向南行进，于4月17号渡过黄河。日军的武器优势在北方平原上较为突出，国军战场并未对日军造成很大障碍。日军于5月1日抵达郑州，并于5月9日占领京汉铁路，而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期间在河南最重要的作战为洛阳会战。国军曾希望把日本的军队引到较远的大城市展开守卫战，再从各方面切断其后勤运输线，但这一计划最终没有成功。对于汤恩伯等人的败因，方德万教授认为，当时的河南十分贫困，大饥荒后军民矛盾激烈；同时，守军自身军心散漫、缺少战斗力，国民党当局不清楚日军动机和计划，也没有妥善准备应对日军的方案。

以长沙会战和衡阳会战为代表，豫湘桂会战的第二部分在湖南展开。方德万教

授提到，湖南是兵源、粮食的重要基地，对国民政府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44年会战开始前，日军曾以武汉为后勤基地三次进攻长沙，都被薛岳成功防御。而在豫湘桂会战期间，日军专门针对城市作战进行了训练，并调整了战线宽度以保护主力部队；而长沙方面缺少准备，部队士气不佳，且存在财政等多方面问题。方德万教授以岳麓山等地的战略布置为例，说明了当时国军部队调动、后勤、交通的不足。

衡阳建有一批美国空军飞机场，在豫湘桂会战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战略目标。衡阳会战期间，国民政府作了大量宣传，认为衡阳相当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是组织反攻的良机。国军也对此进行了较好的战略准备，为保卫衡阳付出很多努力。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衡阳会战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讨论。白崇禧等人认为不应迎战，要将军队退至广西一带；徐永昌则认为应当迎战，以确保其战略位置。

方德万教授将衡阳会战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日军进攻失败，国军稳定防御；日军第二次进攻失败，守军单方面认为已经成功，甚至开始庆祝胜利。东条英机面对政治危机亟需军事上的胜利，随即输送新的部队进攻衡阳，并最终取得成功。方德万教授认为，造成衡阳会战结果的原因较为复杂。衡阳守军的失败不只是因为日本在政治危机下加大了军事投入，史迪威选择利用美国空军支持缅甸战场而非衡阳战场，也部分导致了会战的最终结果。“一号作战”的结束不仅与日军方针的改变有关，还受到了美军对武汉进行轰炸的影

响——这些轰炸实际是美军组织对日空袭的实验。

方德万教授分析了豫湘桂会战的其他后果，并把重心放在国共关系的政治层面。他将国共谈判的进程和豫湘桂会战联系起来：1943年对中共而言仍属于困难时期；1944年1月，毛泽东认为应当和国民党方面搞好关系，同意将共产党军队退至黄河以北，并承认国民党在苏区的统治。而在同年衡阳会战失败后，国民政府向中共作出承诺，战争结束后会立刻实现立宪政治，这对国民党而言是较大的转向；中共则相应提出了更多政治方面的要求。最后，方德万教授强调，从世界角度书写战争史时，应当注意“二战”性质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也就要求学者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随后，王奇生教授对方德万教授的讲座内容进行简要评议。他认为，豫湘桂会战的发动在蒋介石方面乃至中共的意料之外；而在美军无需借助中国基地即可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情况下，日军的战略目标也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方德万教授所说的“转折”也可以放在国共关系的层面。豫湘桂会战为中共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创造性政策为后来打下了基础。此外，王奇生教授提到，衡阳会战期间国军最大的问题在于军队之间的协调性，空军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方德万教授对评议内容作出回应。他非常认可中共在当时的举措，指出八路军主要在抗战前期和最后两三年发展壮大，并充分利用了日军敌后的广阔空间。对于豫湘桂会战中暴露的国军问题，他提到，1944年的日本空军并未集中在豫湘桂战

场。如果当时国军有优秀的空中作战力量，会战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对照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的问题，延安整风则通过削减派系确保了军队的战斗力，并在会战期间将军队派至不同地区，为抗战结束后的进一步作战部署作好了准备。

最后，方德万教授和王奇生教授与在场听众进行了交流。在讨论粮食产区被日军占领所带来的影响时，方德万教授对抗战期间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以荷兰为例，对照说明了两国沦陷区1945年的情况。他认为，欧洲被德国占领的地区和中国的日占区在某种情况下较为相似；英美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基本没有被占领的经历，也因此缺少对战时社会的全面认识。王奇生教授则表示，“三光”政策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体现，在双方军队反复争夺的地区实施得最为激进。

对于会战双方的胜败以及日军发动这

场战争的主要目的，方德万教授进一步强调，从军事史的角度看，军事目标不仅是一场会战的胜利，战场的失败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研究者也不应割裂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针对日本人史观所理解的对抗英美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日本在二战前复制英国殖民模式的最终失败，方德万教授回顾了“二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问题以及战时日本的殖民实践，并认为一个大帝国的建立和发展总会面临各种问题，英国乃至更早的荷兰、战后的美国在扩张过程中也存在许多血腥的暴力事件。此外，王奇生教授强调，抗战后期日军的战略重心已从进攻转向防守，不再将重庆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而是为自己的退路作打算。

（撰稿：陈洁樱）

方德万 | 抗战时期战场以外的中国：战时的日常生活



2019年4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抗战时期战场以外的中国：战时的日常生活”。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剑桥大学亚

洲及中东研究学院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

讲座伊始，方德万教授首先抛出一个问题：二战中日本投降中国的具体时间是

何时？对于“1945年9月9日9时”这个答案，方德万教授解释了蒋介石给出这一时间点的两点考虑：一是“9”这个数字所表达的寓意，二是他意图将日本投降与一战停战协定的签署时间（1918年11月11日11时）联系起来，以表明中国战场是世界战场的一部分。投降仪式隐藏着相当丰富的细节。比如，冈村宁次是何应钦留学日本时的同窗，蒋介石派何应钦接受投降书的目的是向国人表明何应钦并非投降派。再如，日本当时在中国尚有大量军队，为什么选择参加这个仪式？为什么选择投降给蒋介石而非中共？事实上，从日军司令部和东京的电报中，我们可以获知，日方这样做一方面出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考虑——日本未来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中日贸易，投降蒋介石更可靠；另一方面，日本视苏联为战后的最大威胁，如果要敌对苏联，则不应与中共合作。但胜利者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国民政府的主要部队相当腐败，与其说是胜利者“要求”日本投降，不如说是胜利者“需要”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之后，人们的情绪普遍高涨，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但是一片欢乐气氛之中也有例外，这体现在一些日记和回忆录当中。例如齐邦媛在日记中写道，1945年9月9日，她参加完庆祝活动回家后，便想起了自己的男朋友、已牺牲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不由得悲从中来。方德万教授希望用这个例子表明，此时，人民对未来的态度依旧迷茫。人民在战场以外的思想状态与精神史有密切关系。克劳塞维茨在《论战》中已经揭示：

战争与人民的感觉息息相关。如果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那么它必然会失败。因此在二战中，英国、苏联等国的领导都进行社会调查以掌握民情。

历史研究者不能将战场和战场之外的社会分开。方德万首先以两位精英阶层的代表为例，即陈克文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日记以及齐邦媛的回忆录。陈克文生于广西，毕业于广州师范大学，早年对国民革命非常热心。抗战前他在南京居住了十年左右，1935年进入行政院任职，此间对国民政府的未来持极其乐观的态度。陈克文交游广泛，与戴季陶、梁漱溟、曹禹等人都有往来。国民政府在重庆时，这些精英阶层表现得非常活泼，流连于咖啡厅等娱乐场所，这是战时重庆的一个侧面。陈克文的阅读面很广，涉及俄国小说、达尔文的理论、曹禹的戏剧、冯友兰的新理学等等，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阶层。不仅如此，陈克文还曾翻译过一本历史教科书，其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欧洲的历史是从贵族和新教镇压下慢慢解放的历史，而在解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因是知识分子。所谓“进步”的过程，就是普通人民变得自觉、自由。这也是陈克文对中国当时状况的看法，秉承着五四以来的启蒙脉络。然而抗战开始后，他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他激烈批判孔祥熙的腐败，认为一旦中国战败，孔祥熙便是罪大恶极的元凶。直到1949年蒋介石请他前往台湾时，他拒绝了这一要求。陈克文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固然与之在内战中的最终失败有关，但这样的转变在抗战初期便出现端倪——他在



方德万教授在讲座现场

南京前往武汉的过程中，便对国军撤离有所不满，他认为军队应该留下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

齐邦媛笔下的历史则呈现了另一种样态。齐、陈二人在年龄与身份方面差别很大。国民政府在重庆时，陈克文已有40余岁，齐邦媛却还是个在南开中学上课的女学生。她热爱中国文学，熟读《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红楼梦》，也熟悉现代诗人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作品，对俄国文学、法国文学都青睐有加。中学毕业后，齐邦媛进入了武汉大学，当时的老师是朱光潜先生。齐邦媛最喜爱的还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如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等人的作品。这说明当时的大学继续保持着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对接，这和战争成王败寇的伦理截然不同。

齐邦媛认为，中国正在牺牲一部分青年人来抵抗日本，但是也在保护一部分青年人来传承教育，让文化得以延续至未来。齐邦媛自己便是后者中的一员，她战后也确实这么做的，除了在台湾身体力行地从事教育外，她写回忆录的目的便是要把战争的记忆带给当代的青年。

除了以上二位的日记和回忆录，方德万教授还指出，抗战时期的“中国通史”类教科书相当流行，教育部要求学生务必修中国通史的课程，也受到了很多学生的欢迎。学生接受中国史教育、历史学家编写教材，两方都经历了一个对中国史性质和价值重认识和重新思考的过程。然而。历史学家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他们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走到后方，缺乏编写教材的资料。另一方面，笼罩在30年代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也对资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

钱穆和雷海宗是历史学家中的两位突出代表，二者在抗战前都研究中国史。抗战影响了中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史的感觉，这一点在二者的代表作中有所体现。钱穆接受的是传统中式教育，他在1941年至1942年间撰写《国史大纲》时，常怀有“最后的中国人写中国史”的恐惧感。他以比较的方法对比西方和中国的历史，认为西方的进步是在战争和革命时期，中国的进步是在和平时期；西方的文明是军事化的文明，中国的文明是和平、稳定而进步的文明；西欧有典型的封建制度，中国则很少有封建制度等等。钱穆更认为，历史要获得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平时期地方区域的积累，革除积弊，而不是一

味地依靠权力集中。与之针锋相对的是雷海宗，他强调中华文明的恢复仰赖强有力的领袖，且中华文明必须有军事化的过程，必须有权力集中的政治制度。也正因此，雷海宗所属的“战国策派”常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雷海宗还批判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更不主张用“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分期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他认为，由最初到公元4世纪左右，这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而由公元4世纪至今，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中国经历了抗战，中国文明也许还会恢复，这便是第三个复兴的时期。与以上二者不同，被称为“历史学派斗争最后的胜利者”的范文澜，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通史。范文澜认为历史有客观的规律，当然，这一规律与阶级斗争相结合。

最后，方德万教授指出，在欧洲、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社会调查来了解老百姓的态度。但在中国推行类似的社会调查的困难在于，老百姓的识字率较低，而报纸的报道又不一定客观，这给历史学家研究战场以外的底层百姓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可以说，应当综合利用佛寺道观等场所的材料、日本对中国战时经济的掌握情况等多方资料来进行历史研究。

评议阶段，王奇生教授总结道，方德万教授本次的议题非常有价值。后人看历史往往已知历史的结局，在回望抗战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乐观的滤镜，这与亲历者当时的感受很不一样。陈克文的日记显示，他直到1944年都不知道战争何时才能结束，丝毫没有乐观感。包括抗战前期的陈寅恪、胡适等人，也都抱着悲

观的态度。王奇生还提及了《王鼎钧回忆录》，与齐邦媛一样，再现了抗战时期中学生的生活。

抗战初期，西南联大的教授有半数以上加入了国民党，如著名历史学家姚从吾就曾经担任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主委。至1944年左右，知识分子亲国民党的倾向有了明显的转变，失望情绪高涨。王奇生教授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需要关心战场外的日常生活，还需关心战场上的日常生活。如抗战时期的师长丁治磐，他的日记就反映了一位国军将领在战时最关心的问题——草鞋、逃兵等等。而这些情况又可以与国民党基层政权、征兵制度串联起来，同样也是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讲座最后，方德万教授与王奇生教授就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问题、大学生参军问题、中国近代音乐史等方面与在场听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周观晴）



121

王瑞芸 | 杜尚与西方当代艺术

2019年4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杜尚与西方当代艺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瑞芸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

朱青生教授指出，艺术既是时代特征的反应，也是推动时代发展的动力。经典艺术体现了经典时代人性的需要。现代性转化之后，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就体现在当代艺术（包括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中。当下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性的各个可能面向方兴未艾，因此，导致了对经典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看法，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非常明显。如同百年前的梵高深受社会制度的压迫而未获得承认却在之后大放异彩一样，我们现在看杜尚，会有“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之感。杜尚参与开创的达达主义，以其反艺术倾向引发了革命。理解杜尚，有助于我们理解艺术史如何从技术性的艺术转变为观念性的艺术。

王瑞芸研究员在讲座伊始就引入安格尔与杜尚的两幅作品。两幅作品都叫

做《泉》，创作时间相差近半个世纪，艺术特征却截然不同：安格尔的作品呈现了一个姿态优美神情单纯的美女，而杜尚的作品则仅仅是一个实物小便池。西方艺术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呈现出了这样剧烈的变迁？我们需要通过杜尚去理解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为此，我们要先了解西方艺术的大致轮廓。

王瑞芸研究员提醒大家注意，如今学界已基本接受西方艺术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曾被称为后现代）。她总结古典艺术被现代艺术取代的理由有：社会生活方式改变；摄影技术的出现；写实艺术成为权威和唯一标准。经过文艺复兴，西方的写实手段成为



王瑞芸研究员

唯一标准，且题材严重脱离生活。库尔贝开创的现实主义突破了题材限制，而印象画派则改变了技法，放松了对写实的要求。之后，野兽派把写实变成“写意”，立体派随意拆解物体……西方古典艺术，由于太过限制人们的创作范围与形式而被艺术家改变、反抗，孕育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手法。在此基础上，西方绘画走向抽象，抽去了所有写实的轮廓，但仍然蕴含着美。

现代艺术打破了写实艺术的限制，给了艺术家创作自由。它从开始出现时被质疑甚至抵制，但最终被认为是西方艺术另一个伟大的成就——创作出许多新风格、新形式、新手法，拓宽了艺术表现范围。王瑞芸研究员特别强调，现代艺术被接受的前提是：尽管变形、抽象和古典写实在形态上完全不同，但两者都致力于表达美。

杜尚却在现代艺术全盛期就开始抛弃现代艺术。他所开创的当代艺术可以是任何俗物，甚至不必是绘画，也完全不必表现美。当代艺术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行为，可以是任何一切。杜尚在一战时期，从法国流亡美国。在1917年开设的一个独立艺术家展上，他用匿名的方式寄了小便池给展览的组委会作为希望参展的作品，却被组委会拒绝。艺术家个人行为的“艺术品”却在半个世纪后得到艺术界的广泛回响，成为一种艺术现象乃至文化现象。理解杜尚的行为与艺术风尚的转变，我们需要先了解杜尚生平以及现代西方艺术的问题。

杜尚出生于法国的小镇，其父亲是镇长和镇子上的公证人。杜尚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开始画画，进入学院。由于无法接



受学院派的束缚，他很快退学并与法国的现代派一起发展，成为一个自由艺术家。他本在这个群体中如鱼得水，但在1912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为杜尚与现代派决裂的导火索。当时评委会希望杜尚修改他的作品——《下楼的裸女》——以删除其中有意大利未来派风格的运动感，从而保证法国立体派的纯洁性。杜尚一言不发地拿回了自己的画，并决心在未来疏远这些对艺术和自己的艺术表达施加权威的人。

对于现代派的手法，杜尚有自己的坚持，那就是为了自由。但如今现代派也有了自己的标准。他看出人们一直在艺术间建立权威。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给蒙娜丽莎画胡子，以表达自己的态度。在疏远了法国现代派群体后，他开始用绘画来反对

绘画，比如画机器、在玻璃上绘画等等。乃至最后，他更是直接以生活之物来代替艺术品。

王瑞芸研究员特别强调，艺术家有自己表达的权力和自由，但是当艺术家的表达获得时代的共鸣后，他的表达才成为了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杜尚就是这样，他的反抗在半个世纪后得到了共鸣，成为了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对待艺术的态度。西方艺术在1960年的时候，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成就和理论总结都已经成熟。格林伯格作为一个理论家，为现代艺术做了理论上的总结，这意味着现代艺术也有了理论上的标准与成熟形态。他的文章发表后，美国的评论家丹拓就表示，艺术界全面的反抗就此开始了。因为一旦确定了标准，就产生了限制。

限制以两位艺术家的人生遭遇悲惨地体现了出来。王瑞芸研究员叙述了美国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与罗斯科的经历。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创作灵感已经受到抽象表现主义技法的限制而日趋枯竭时，却受制于艺术品市场的限制而不敢改换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两人都以最极端的方式离开了人世，罗斯科甚至留下了“痛恨艺术”的遗言。

可以说，任何一种艺术在变成权威后，都会对生动活泼的生命造成压迫。如果说现代艺术被当代艺术取代有其理由，那就只有一个——现代艺术限制了创作的自由。

而杜尚却是一个追求极致自由的人。他高中毕业后长期未婚，没有职业，没有财产。他不愿负担任何东西，不属于任何女人，也不属于任何团体。常人所贪恋的

财权名色，在杜尚处都成为了束缚他自由的枷锁，需要被抵制和放弃。他对一切欲望都保持警觉，对一切权威都加以质疑，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一旦他感到压迫，就会马上拒绝。正因为是这样的人，他才得以用极端的手段，来重建艺术家和艺术的关系，即艺术家必须做艺术的主人。当其他成功的艺术家以努力奋斗获得自己的成功时，杜尚以放弃、拒绝艺术的方式获得了自己在艺术史上的声誉。

王瑞芸研究员指出，面对现代社会，杜尚以无为的方式保持内心的自由，又以无我的方式化解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不同于那些有着鲜明个人特征的艺术家的态度是“我不相信个体这个词，因此，我对自己不认真”。无论对他的朋友还是传记家来讲，杜尚本身与世界的距离以及对人对事的随和特质，使之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魅力——他的艺术作品也以同样的方式展现了这种魅力。杜尚艺术的吸引力并非来自美，而是来自否定美，并非来自清晰，而是来自难解。他以玩闹的方式对待艺术，以否定艺术的方式成就艺术。

讲座最后，王瑞芸研究员总结到，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都有其宏大叙事，但在追溯杜尚而形成的当代艺术中，我们看不见宏大叙事。杜尚给了人权力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他也是在一种精神的驱使下创作他的艺术。杜尚始终给人一种轻盈的感觉。

(撰稿：王诗瑜)

122

夏含夷 | 清华简《摄命》篇源流考

2019年4月15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清华简《摄命》篇源流考”。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主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巍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李零教授对夏含夷教授的汉学研究经历与成果作了简要介绍。讲座伊始，夏含夷教授从《摄命》最后一条简文的解读与分析切入正题，由此引出《摄命》与《囧命》的关系问题。清华编者曾提出不少证据说明《摄命》是古文尚书《囧命》篇的原文，夏含夷教授则根据“摄”与“囧”二字的甲骨文文字形态与其他相关文献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摄”与“囧”的甲骨文具有相似性，《摄命》与《囧命》在内容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对于“摄的身份”这一具有很大争议性的问题，夏含夷教授整合了四种说法：第一，摄为“姪”；第二，摄为“王子”；第三，摄为“沈子”；第四，摄之为“燮”。



夏含夷教授

但如果认为“摄”周孝王给周夷王的“命”，则与《书序》《史记》等传世文献以为《囧命》是周穆王时代的文献不同，因此对于摄的身份之谜，仍有待考证。

随后，夏含夷教授就《摄命》的文本形式与文本内容进行列举与分析，由此展开对西周懿王、孝王时代的政治状况分析。他结合《史记》《竹书纪年》《述盘》《牧簋》等传世文献与出土青铜器铭文记载内容，认为《摄命》反映了西周中期王室衰微、官员不力、百姓生活困难与社会混乱的趋势，而这些历史环境(包括社会、宗教、礼制等)，对于理解西周史以及“书”至为关键。同时他亦表明自己对于一些青铜器的年代判断，相异于中国学者已有的判断。

在讨论西周时期政治写作工作时，夏含夷教授指出，传世文献在历史信息传递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特点，他引用汉学家史嘉柏（David Schaberg）在评论《剑桥中国上古史》时对“文本与文物”的分析：“大体说来，历史学家所利用的文献都有晚起抑或不明的著作背景。要么是所叙述的内容发生好几世纪以后才写的，要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是什么人写的。即使是出土文字资料，诸如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基本上也不带有信息说明其著作条件与用处，更不用说其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关系。并且，出土文字资料完全确认了传世文献的那些非常罕见的例子并不能表明传世文献的普遍正确性。如果‘传统历史’是部分根据传世文献的历史研究，那么它的出发点要么是过分不定的、要么是根据信仰的。”夏含夷教授认为，“根据信仰的这一表述，是史嘉柏对某些“传统历史”所作的最尖锐的批判，因为历史研究应该是科学研究，而非服从于信仰。

既然历史学家所应用的历史框架（包括年代框架）及其细节的信息都引用自很晚或不明的传世文献，他们对古代的叙述难以像考古学家的构拟那么确切；同时，传世文献经过抄写、编辑和收集过程，几乎不可能重构它原来的形式，那么，历史学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夏含夷教授再次援引史嘉柏的评论：“最好的历史学家利用传世文献的时候，以之为来源可疑的文物。他们注重文献可疑之处、批判对其来源最精锐的解说，而后才作出‘证据不过于局限’的结论。”夏含夷教授认为，在利用传世文献时，应当做“最狭的结论”，

而不能超出材料与证据。随后，夏含夷教授就大孟鼎、颂鼎、逯盘、逯鼎等出土文物的铭文记载来说明与论证相关的观点。

此外，夏含夷教授还介绍了他在做相关研究时的语言翻译经验，即从甲骨文到文言文，再翻译成英文，而后进行对比分析。

最后，夏含夷教授以五个问题来结束本次讲座内容：第一，《摄命》是不是西周时代的命书？第二，如果是的话，是如何传授到战国时代的？第三，《摄命》是不是《囧命》的前身？第四，如果是的话，《摄命》是如何传授到汉代的？第五，《囧命》是如何创造的？他对以上五个问题作了尝试性回答，但仍然对诸多存疑之处持保留态度。

韩巍副教授就讲座内容表明自己的“疑古”态度，并提出三个疑问：第一，《摄命》缺乏与“命”相关的程式化的记载，如职务、赏赐、礼制、仪式等等，只有空洞的道德教训，这与其他“命”的记载具有很大的不同。第二，对于《摄命》最后一条简文中之“乍”字的理解仍存疑。第三，对摄的身份怀疑，若摄为王子，则与“出纳王命”的职事相抵牾。夏含夷教授回答时指出，“乍”字与“作”字有通用之处，但对于“摄”与“摄命”的研究仍有很多不确定的问题，持有怀疑态度是应该的。

讲座最后，李零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疑”与“信”是两个普遍问题，疑不等于科学，信不等于迷信。怀疑与相信都需要证据，怀疑可能是一个起点，但仍需小心求证。他还以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为例，从口头表述到文本生成的过程中，经历了诸多主动与被

动的删改，不明真相者亦有误传，而作为亲历者，李零先生指出，李学勤先生最初的讲法与最后的文本确实存在不同之处。这说明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他指出，在国际化的学术交流背景下，翻译是必不

可少的，注解与翻译亦考验学术水准，需要给以重视。

（撰稿：李玉蓉）

123

林丰民 | 阿拔斯朝百年翻译运动与阿拉伯文化的繁荣



2019年4月19日晚上，“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阿拔斯朝百年翻译运动与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林丰民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付志明主持。本次讲座为文研

院“文明之间系列讲座”第二讲。

讲座伊始，林丰民教授首先指出，阿拉伯的翻译运动是古代文明交流的一个典型，阿拔斯朝（Abbasid Caliphate）鼎盛的阿拉伯文化和同样繁荣的中国汉唐文化构成了中古时期世界文明的“双子星座”。此时中国周边的地域往往从中国吸收先进的文化，而在中东和欧洲，很多青年学者往往到阿拉伯学习知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阿拉伯文化及其同其他文明交流的状况进行深入研究。

林丰民教授首先对“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进行了介绍。他指出，这次翻译运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哈里发曼苏尔（Mansur）时期（754年-775年）一直持续到拉希德（Rashid）时代（786年-809年）。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有伊本·穆加发（Ibn Muqaffa），他的作品是当时文化融合的典范。此外，该时期的著名翻译作品有《卡里莱和迪木乃》（翻译自波斯文）和《信德罕德》（翻译自印度文）等等。第二



林丰民教授

阶段是翻译运动的兴盛时期，从哈里发麦蒙（Ma'mun）时代（813年—833年）持续到十世纪末。这时期，麦蒙在首都巴格达建立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宫（Bayt al-Hikmah），使翻译活动进入了新的高潮。智慧宫重金聘请了各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除翻译活动之外还开始了研究性的学术活动。第三阶段从约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中叶，是翻译运动的尾声。百年翻译运动的来源文献十分广泛，包括希腊语文献、巴列维语文献、波斯语文献、希伯来语文献等等，这些文献中也包含景教等不同宗教的文献。

接下来，林丰民教授重点介绍了翻译运动的重要机构——智慧宫。约830年成立的智慧宫既是翻译局，也是图书馆、科学院，在其中经常举行各种学科的学术报告会和辩论会。出乎现代人意料的是，在智慧宫中经常进行宗教性质的争论，讨论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孰优孰劣的问题，这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宽容。如果没有这种宗教宽容的存在，根本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宫也是人才培养的中心，这里设置了天文台、医学学校、天文学学校。智慧宫的人员任命也体现了以才能为中心的标准，它的第一任馆长叶海亚·伊本·马塞维就是一名基督教徒，而景教徒学者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aq）也曾被任命为翻译局局长。

林丰民教授对翻译运动所翻译的名著进行了统计，指出该运动翻译有希腊语著作100多部，波斯语书籍约20部，印度语著作约30部，奈伯特语著作约20部。此外，从古叙利亚语、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有关文

学、艺术和科技方面的著作也有几十部。除了数量的庞大之外，翻译者们对翻译学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校勘、注释、质疑等等，借题发挥了自己的创见。同时，他们也确立了各学科的阿拉伯语名词、术语、概念和范畴体系，使用音译和意译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若遇到无法用阿拉伯语表示的词汇就创造新词。他们还依据社会中不同读者的需要进行翻译，对一些著作中因多次转译而产生的错误进行纠正。除这些贡献之外，他们还开创了集体协作译述的先例，凡是大部头的著作皆由多人分工译述和注释。

翻译运动带来了希腊世界的医学、星象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但林丰民教授指出，对阿拉伯人最有助益的是逻辑学的引入。正是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逻辑著作的翻译，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演绎法、类推法、证明理论和三段论的形式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产生了不同于前阿拔斯王朝时期以《古兰经》为代表的叙事、论理风格；人们开始用逻辑思辨的方式思考宗教，发展出了诸多宗教学科，如圣训学、《古兰经》学、教法等等，对于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由于翻译运动的巨大贡献，翻译运动的中心——智慧宫获得了极高的美誉，有人称它为“科学的源泉”、“智慧的宝库”和“学者的圣殿”。林丰民教授认为，清朝末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曾发挥和智慧宫相似的作用。京师同文馆既是翻译机构，也是教学和研究机构。如果没有京师同文馆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很难走出清末的落后状态。“闭关锁国”对于任何时期

而言都是要不得的，一种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学习外国文化的因素，这也是翻译运动给我们的启示。

林丰民教授接下来谈到了翻译运动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出于政治的需要。阿拔斯时期的阿拉伯帝国拥有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疆域。该疆域中包含有诸多彼此相异、灿烂辉煌的文化，这使得阿拔斯朝的统治者有一种危机感，意识到要统治这些文化就必须学习和了解这些不同文化。其次是社会和现实的需要，统治不同地区的阿拉伯人也需要用文化武装自己。再次是宗教方面的原因，阿拉伯帝国范围内存在多种宗教，很多人仅仅是表面上信奉伊斯兰教，有必要通过文化的交流使伊斯兰教获得更多人的承认。最后是文化和学术方面的原因，在这些原因的推动下，加之地缘文化的优势、历史的时机、古代伊斯兰教的宽容和尚学、商业传统下的开阔视野、统一的阿拉伯语、造纸术的引进、统治者的重视等优越条件，成就了翻译运动的繁荣发展。统治者经常重奖优秀的翻译家，翻译家侯奈因每月可获得五百第纳尔（Dinar）的报酬，哈里发麦蒙甚至依译稿的重量以等量的黄金给予他报酬。

随后，林丰民教授概述了阿拔斯朝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及其影响。阿拉伯文化的繁荣首先体现在奢华的生活之上：阿拉伯人实现了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宫殿和其他多种多样的建筑逐渐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林丰民教授举了两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哈里发穆斯台因的母亲有一张毯子价值一亿三千万第纳尔，毯子上用金线织出各种飞禽，飞禽的眼睛甚至是用各种宝石镶嵌而成。阿拔斯宫廷所食用的西瓜是从花

刺子模运输而来，运输时需要装在塞满冰块的罐子里。此外，宫廷驯养的宠物、使用的器具等等都是上层社会奢华的体现。

和上层社会的奢华相对应的是民间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阿拔斯王朝时期澡堂相当普及，澡堂和厕所是衡量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据传，在穆格台迪尔时期巴格达甚至有两万七千所澡堂。这些澡堂不仅是沐浴场所，也是重要的休闲娱乐处所。该时期人民有丰富的室内和室外活动，酒会、马球（Jukan）、狩猎活动十分普遍。《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些故事能够反映出这种丰富多彩景象。也有文献记载哈里发艾敏（Amin）曾经组织过一个女扮男装的服务队，麦蒙也曾召见并奖励了20个希腊舞娘。这些历史情境的出现体现了阿拉伯文化生活的繁荣。

在阿拉伯帝国中存在巴格达、开罗、格拉纳达等数个文化中心。阿拔斯朝时期文学和艺术也繁荣非凡，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发展，叙事文学也在文化交融中涌现出了《一千零一夜》等优秀的作品，《一千零一夜》既包括阿拉伯故事，也包括波斯故事和印度故事，是在吸纳了各种文化之后加工中形成的。阿拉伯本土则形成了一种玛卡梅体故事，它很可能对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产生过直接影响。也有学者认为，欧洲骑士精神的产生同样受到了阿拉伯的影响。在艺术方面，音乐引进和音乐理论也在阿拔斯朝发展了起来。

体现文化融合的典型人物有很多，林丰民教授介绍了贾希兹（Jahiz）和铿迪（Kindi）这两位重要人物。贾希兹是穆阿台勒派教义学家的领袖，他学习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

在著述中将科学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将蒙昧时期的诗歌与伊斯兰时代的诗歌、亚里士多德的学问、盖伦的医学等等融合在一起。在叙述《古兰经》的经文与圣训时，他广泛涉及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并结合无神论思想。最能体现这种文化融合的著作是《修辞与阐释》和《动物志》：前者精辟地分析了各种文化的特质，《动物志》则是各种文化的陈列室和各种宗教的大讲台。

第二位重要人物就是铿迪。铿迪被阿拉伯和西方学术界一致认为是第一位阿拉伯哲学家。他以伊斯兰教为出发点，修正了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毕达哥拉斯哲学，提出世界无始和神创问题，强调万物有源，认为宇宙第一源就是安拉——这显示出铿迪哲学思想的折衷性和神学色彩。铿迪也对一些哲学术语的界定做出过突出贡献。他界定了“理性”和“自然界”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构成的理论；在承认安拉意志决定万物生灵存在的同时，又强调自然现象对地球上生命繁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理性四分类”理论也是他的贡献，他认为理性从上到下可以分为安拉、人类灵魂中的能力、人类的才能、人类灵魂驱使下的属于人类自己的行为这四类。

林丰民教授接着指出，在阿拔斯朝，科学也相当繁荣。以医学为例，阿拉伯涌现出了很多医学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拉齐（Razi）和伊本·西纳（Ibn Sina）。拉齐被称作“伊斯兰医学家中最伟大、最富于独创性，而且著作最多的人物”，他曾任巴格达大医院的院长，在医院选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是外科上串线法的发明者，曾写过一百余部著作。其中，《秘典》（*Kitab al-*

Asrar）（后来被罗杰尔·培根翻译为《精神和肉体》）、《曼苏尔医书》（*Kitab al-Tibb al-Mansuri*）、《天花和麻疹》（*al-Judari w-al-Hasbah*）都是杰出代表。另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就是在欧洲被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的伊本·西纳。他博闻强记，博览全书。著有长诗《咏灵魂》，医学方面著有《治疗论》（*Kitab al-Shifa'*）和《医典》（*al-Qanun fi al-Tibb*）。12至17世纪，《医典》一直被用作西方医学指南，它“被当作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他著作都要长”。

讲座最后，林丰民教授提到，曾有关于“一千零一个伊斯兰的发明”的展览在欧美国家举行，这体现出对阿拉伯文化和科技贡献的认同。林丰民教授还特别向同学们推荐了《智慧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阿拉伯的太阳照亮西方》等专著供进一步研读。

讲述结束后，林丰民教授与听众就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的质与量、阿拔斯王朝和拜占庭帝国的交流以及百年翻译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借鉴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伯翻译运动的很多参与者都是生活于某种语言环境，后来又习得阿拉伯语的人，他们更能深入了解两种文化，从而更好地对语言进行翻译。林丰民教授认为，这种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来自原语言国家的人能够更理解语言的原本含义。因此，翻译需要有两三种语言背景的人的参与，也需要学习阿拉伯的共同协作翻译模式。

（撰稿：孙晓斌）

（二）未名学者讲座

45

林丽娟 | 围城考——东方世界的希腊知识

2019年4月1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围城考——东方世界的希腊知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评议。

钱钟书发表于1947年的小说《围城》中有两则家喻户晓的譬喻：“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结婚仿佛）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不论鸟笼还是围城，两则俗谚都分享类似的比喻方式，并藉之展现面对婚姻的两难处境，及婚姻具有的欺骗性。林丽娟老师指出，相似结构的婚姻譬喻曾在希腊、叙利亚、阿拉伯等文化传统中一再出现，而通过考察这些性格各异、却又彼此关联的传统，可以梳理出这一譬喻的可能源头及流变状况。

林丽娟老师首先探究了钱钟书本人掌



林丽娟助理教授

握的材料，以及后世中国学者在钱氏基础上对婚姻譬喻的研究情况。据《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钱氏本人对这一俗谚的直接了解源于美国作家John Barlett的一本引语索引，其中摘录了四则喻体不同、结构相似的婚姻譬喻。随后，钱氏又从Pierre-Marie Quitard关于法谚的研究得知，围城俗谚可能来自阿拉伯世界。钱钟书之后，又有范旭仑先生依据大仲马之《东游记》，意识到这一格言可能典出阿拉伯世界。

通过爬梳文献，林丽娟老师寻找到六种包含类似譬喻的阿拉伯语著作，并追踪了这则譬喻借助翻译运动和印刷术，从古典阿拉伯世界传入近代西方，并在西欧各

国流行开来的传播脉络。在这些作品中，婚姻譬喻大都被归给哲学家苏格拉底，而譬喻里多将婚姻喻作渔网或鱼篓，而非英法作家笔下的鸟笼、围城或其它。随着 12 至 13 世纪阿拉伯世界到西欧的翻译运动展开，阿拉伯的智慧文集一度被介绍到欧洲，随后以多种译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并很可能影响了同时代欧洲类似题材的作品。如果翻检这一时期的欧洲书籍，会发现阿拉伯作家特有的渔网譬喻曾在西欧多国的早期出版物中出现，而由于有关女性和婚姻的著作在早期西欧极受追捧，这则譬喻也随之声名远播。

但追根溯源的工作并未停止。古希腊作品中的苏格拉底曾发表不少关于婚姻的看法，那么既然阿拉伯作者多将婚姻 - 渔网譬喻归于苏格拉底名下，该譬喻是否可能源出希腊？林丽娟老师首先考察了中世纪拜占庭抄本，并在希腊语智慧文集抄本中发现了类似的归属于苏格拉底的譬喻。该文本细节与阿语材料中年代最早的版本十分接近，说明婚姻譬喻很可能经由 8 至 10 世纪的巴格达翻译运动东传到阿拉伯世界。而保存在稍晚时期叙利亚语文献中的一则渔网譬喻则表明，这则俗谚又在叙利亚文艺复兴时期从阿拉伯语被翻译进叙利亚语。

随后，林丽娟老师梳理了古典希腊时期对苏格拉底婚姻观的不同描述，并对比了古典时期的相关记述与中世纪及以后的苏格拉底婚姻譬喻的异同。她指出，在许多古典作者笔下，这位贤哲常常豁达、乐观，乐于为婚姻生活辩护。这种达观也为后世哲学家所称颂，他们从中看到了哲学与婚

姻、内在修行与世俗生活并行不悖的可能性。如果单看这支传统，这位充满人情味的老者，似乎与渔网譬喻中厌弃婚姻的哲人相去甚远。但古代的苏格拉底形象还有着完全不同的另面。作为独立的思想者，他超尘绝俗、节制欲望，并与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有不少共性。因此，苏氏有时被看作犬儒派的先驱。若考察这支传统下的苏格拉底，类似渔网譬喻的段落就多了起来，特别在古代晚期一些格言集中，都出现了描述婚姻困境的段落，它们多采用二分结构呈现两难选择，从形式到内容均类似渔网譬喻。

不过，尽管后面这支传统中的苏格拉底对婚姻看法消极，这些格言中却不包含任何譬喻修辞，只单纯描述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并不隐含决然拒斥婚姻的态度。而后世譬喻中的渔网、鱼篓等意象，则将婚姻比作某种陷阱或骗局，有着更为悲观、避世的心态。林丽娟老师指出，这一“陷阱母题”的存在绝非偶然，它广泛存在于拜占庭和阿拉伯智慧文集中。与古典世界着眼于理性权衡的面相不同，婚姻譬喻中的陷阱意涵呈现出一位中世纪的、基督教化了的苏格拉底，他规劝人们抛却尘世生活、远离女性和婚姻。而在苏格拉底形象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叙利亚的基督徒很可能一度扮演重要的角色。至此，一幅婚姻格言自西（古典希腊）向东（拜占庭、叙利亚、阿拉伯）、自东（阿拉伯）向西（近代早期的西欧）、再自西（英法）向东（现代中国）流播的文化图景，就基本明晰了。

讲座的评议人高峰枫老师梳理了林丽娟老师的论证步骤。他从林丽娟老师考索

“围城”典故的方式，联想到钱钟书本人“挖脚跟”式的治学方法，认为林丽娟老师的工作为“钱学”研究贡献良多。不仅如此，这一研究借围城譬喻为切入点，亦考察了观念的传播和迁徙，探索了经过犬儒哲学影响，又经过叙利亚基督教的改译和增加，最后进入阿拉伯传统的苏格拉底形象，以及这一形象重回欧洲的曲折历程。他赞扬了林丽娟老师研究工作的原创性，及借助古代语言知识独立发现新材料的能力。

针对犬儒学派和叙利亚基督教的问题，高峰枫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根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研究基督教兴起的学者的观点，初期教会及耶稣运动与犬儒派哲学可能在观念和形式上存在很大关联。而同时代作家疏善的讽刺对话中，也似乎显示出基督教与犬儒派间的流动性。高峰

枫老师认为，如要坐实叙利亚基督徒在格言传播中的关键作用，那么就需要排除其他地区的早期教会先行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而假使可以找到证明早期基督教与犬儒派有实质性交流和融合的材料，叙利亚基督徒的作用就未必如此独一无二了。林丽娟老师在回应中指出，同时期第欧根尼关于女性和婚姻的格言，确与渔网譬喻极其相似，因此的确无法排除渔网譬喻受犬儒派影响的可能性。但是，网的譬喻不见于第欧根尼传统，却在基督徒那里极其常见，这使得她更倾向于关注基督教传统的作用。

评议之后，林丽娟老师还回答了现场同学的问题，并勉励大家加强古典语言和现代学术语言的学习。

（撰稿：刘子辰）

46

章永乐 | 维也纳体系最后的“大国协调”与清朝 - 民国连续性的创制

2019 年 4 月 23 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维也纳体系最后的‘大国协调’与清朝 - 民国连续性的创制”。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评议。

讲座第一部分，章永乐首先讲述了其问题缘起。2011 年辛亥百年纪念以来，学界围绕清朝 - 民国过渡时期的国家主权状态、民国政权的正统性、政治建设的目标与手段三个层面展开了一系列新的讨论。章永乐认为，在讨论后两个层面时，一些论述中存在“妥协 - 限权政府 - 自由与繁荣”的联想链条，可能存在“历史意义的超载”，而要反思这



章永乐副教授

一联想链条，就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塑造辛亥革命路径的国际体系。晚近的一些研究触及了列强在辛亥革命中所谓的“中立”问题，但对列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相关论述仍有进一步系统化的余地。而传统革命史叙事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述出发，对于列强在华的经济金融组织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已有不少探讨，未充分展开的问题是：为何列强在欧洲局势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还能在中国形成外交政策协调的局面？在这一方面，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教授于2016年在北京大学进行系列演讲时对维也纳体系与“大国协调”的阐发包含着重要的理论启发。但章永乐认为，安德森教授将维也纳体系最后一次“大国协调”定位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有待商榷。为了回应以上论述，有必要对辛亥时期国际体系与国内宪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探讨。

讲座的第二部分，章永乐讨论了形成东亚地区“大国协调”的两个基础性制度：“条

约网络”与银行团。为了阐明这两个基础性制度，章永乐回溯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的诞生与在19世纪的发展。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带来了欧洲“五强共治”格局，确立了“欧洲协调”机制。不同于着眼客观力量对比的“均势”，“协调”的核心是一种通过积极沟通控制既有冲突规模，以避免下层革命的主观努力。但德国的统一加剧了欧洲内部力量的失衡，美国与日本的崛起更是冲击了维也纳体系的“欧洲中心”特征。不过，尽管西方列强之间力量对比不断趋于失衡，在甲午战争之前，它们在中国仍拥有许多共同利益。甲午战争后，列强围绕中国的斗争升级，列强之间的利益分歧以及从义和团运动认识到的直接统治的巨额成本，使得列强在1900—1901年达成外交政策协调。在20世纪初，一个复杂的“条约网络”在东方逐渐形成。1902年，英日缔结同盟，英国通过拉拢日本来制约俄国在远东的发展；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形成。“协约国+英国同盟”的架构形成后，德国一方面试图通过中国事务来分化列强，但又经常担心被其他列强孤立，对华政策经常表现出摇摆不定的特征；赢得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华积极进取，在中国东北与华中挑战日、俄、英的利益，但也遭遇了其他列强的反弹；日俄于1910年签订第二次日俄密约。

在“条约网络”形成的同时，围绕着中国开发东北以及修筑华中铁路的两笔借款，列强之间逐渐形成了银行团制度。1908年7月6日，英法德三国财团正式缔约成立三国银行团，以垄断今后的中国铁路借款业务；1910年5月23日，英、法、德准许美国财团加入联合组织；1912年6月18日至20日，

在巴黎召开的四国银行团会议最终吸收日本、俄国的财团加入，形成六国银行团。银行团成员进行协调的核心平台“银行团间会议”具有很强的外交政策意涵，可将外交官员乃至政府首脑牵涉进来。至此，银行团与“条约网络”相互的结合，成为“大国协调”宰制半殖民地社会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讲座第三部分，章永乐讲述了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大国协调”发挥作用的方式。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无论清廷还是新的革命政权在财政上都面临匮乏局面。然而四国银行团于11月8日决议保持“金融中立”，“中立”政策的倡导者英国还积极出手阻碍德、日两国给予清廷或革命政权任何借款。11月16日，袁世凯以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组阁，受到列强公使的欢迎，在列强支持下。南北和谈于12月18日正式开始，形成召开国会公决国体的决议，但因南京方面率先成立共和政府而陷入僵局。而英国私下和袁世凯敲定推袁出任共和政府首脑的基本路线，南方双方继续进行的秘密谈判将重点转向该如何促使清帝退位。南京方面的北伐努力则因财政匮乏而停滞不前。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南京方面于2月15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一旦袁世凯出掌民国中央政府，四国银行团随即给予其财政支持。在定都问题上，袁世凯同样获得列强支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五国银行团与北洋政府签约，发放巨额“善后大借款”，从而拉大了北洋集团与革命派之间的资源差距。

随后，章永乐指出，要理解“大国协调”在中国何以可能，需要结合地缘政治环境来梳理辛亥前后列强在华的利益状态。对

于西方列强而言，清末民初的中国并非夺全球霸权或区域霸权的“生命线”地带，因而其在华利益如何处置，具有一定的妥协空间。1911年，欧洲局势剑拔弩张，牵制了列强极大精力。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一开始倾向于君主立宪，但其势力范围大多落入革命派控制范围之下，因此采取所谓“中立政策”，支持袁世凯通过南北和谈掌握实权；日本内部对华政策意见不一，外交政策有波动，但受制于英日同盟；法国更重视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利益，加之其势力范围也基本落入革命派控制之下，因而追随英国的“中立政策”；德国一开始支持清廷，但受制于协约国力量，担心在华争夺进一步激化欧洲的对立局势；俄国虽想借革命来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但却受制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的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在华并没有确定的势力范围，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其在华获取利益，因而在革命爆发后保持表面上的“中立”。

欧洲的对立牵制了欧洲列强极大的外交与军事资源，其对华政策呈现出求稳的基调，因此在金融与军事上保持“中立”外表，实质上推动较为注重保护列强在华利益的实力派袁世凯掌握实权。1911至1912年的“大妥协”，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催熟”的：一方面在政权过渡上创制了一定的连续性，使得不少恐惧共和主义的地方与边疆势力接受民国统治，对于国家保持完整有一定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被“催熟”的“大妥协”，在共和建设的思路，共识非常稀薄，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也使得国内两个阵营之间的资源差距日益扩大，为后面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

讲座最后一部分，章永乐总结了国际体系与国内宪制演变关系对宪法史和政治史研究的启示。首先，应区分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并注意它们政治建设任务与基础条件的不同。一些研究者对1911对1912年的“大妥协”与英国“光荣革命”、美国费城制宪等事件之间进行类比，可能抓到了一些形式特征，但一旦将国际体系考虑进来，这种类比的内在局限性就会显露出来。其次，有必要将“半殖民地”这一概念重新带回到研究视域中，注意到清末民初中国在财政—税收体系上的半殖民性，辛亥革命过程中地方自主性的增强，使得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获得田赋、厘金、盐税等内政收入，列强控制的海关又以“中立”为由拒绝转交关余，南北双方财政都高度依赖于外债。在此前提下，列强对于中国内政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力。真正的主权独立，离不开自主的财政—军事机制：只有能够深入基层社会，汲取农业剩余并组织人力资源的政治力量，才能够在中国与外部列强的冲突中克服软弱性，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评议阶段，汪晖教授首先阐发了讲座的标题“连续性的创制”——语出其为章永乐著作《旧邦新造：1911—1917》所作序言——的含义。历史有其连绵的一面，但这种连绵并非自然过程，而是多方力量和各种条件“创制”而成，晚清—民国的这种所谓连续性就是多重力量作用，并通过一系列事件而塑造的后果。当年，《东方杂志》曾有读者来信问道，民国政府为什么还要寻求外交承认？实际上，这种重新寻求外交承认的过程，便意味着历史的连续性需要不断重新创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绵延过程。

汪晖接下来梳理了关于一战前历史过程的叙述模式变化：过去这一领域的主导性叙述是从霍布森到列宁的“帝国主义”叙述，在财政、金融方面有比较密集的论述；第二种叙述模式就是民族主义叙述，这在过去三十年来成为西方历史学的讨论重点。而章永乐的论述可被归入更为晚近的、超越民族主义叙述模式的努力。新的叙述模式强调，在通常认为是民族主义主导的时代里，仍存在一种帝国协调机制，欧洲的许多战争不仅是主权国家间的战争，更是帝国之间的战争——欧洲外部发生的变化最终导致其内部重组。在以往的“后殖民”研究中，也产生了“后中心”的讨论，即强调外部变化导致的内部中心地带的变化重组。

最后，汪晖肯定了将“半殖民地”概念重新拉回到20世纪历史叙述中心地带的方向。他尤其指出，毛泽东曾写过一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其论述的起点就是中国的“半殖民性”，即列强在无法瓜分中国、不得不保持中国形式独立的背景下，其相互之间的利益争夺支配体系中留下了某些缝隙。这些“薄弱环节”（列宁语）存在于国内许多省份的边界地带，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条件。当然，毛泽东的论述并未就此停止，他更多地讨论革命的主观条件，而这些主观条件只有在晚清以来的欧亚大陆的系列革命语境下才能理解。在今天的全球史研究中，当我们重新叙述20世纪历史的时候，应当将所有这些条件或要素组织起来，讨论在新的规模下实现“综合”的可能性，以更准确地定位全球史研究的“中国时刻”。

（撰稿：杨博文）

（三）北大文研论坛

91

林建华等 | 北大本科教育：自我诊断与发展评价

2019年2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北大本科教育：自我诊断与发展评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主持，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林建华、裴坚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作引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晓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卢晓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以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朱红出席并参与讨论。

林建华教授首先就本次论坛主题作引言。他指出，中国的大学迄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否能适应中国的未来发展以及世界挑战，是教育工作者应当去反思的问题。首先，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口号是培养“引领未来的人”，但“引领未来的人”究竟要如何培养？其次，经过本科四年的学习，我们的学生



林建华教授作引言

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常说要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抗压能力、批判性思维等等，但如何培养这些能力仍是有待细化的。第三，怎样让学生保持不断进取的动力？只有拥有持续的动力，学生才会在“已知”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未知”。当然，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在问：我们教导的学生应当成为怎样的人？他们又应当怎样看待当今的世界？这些问题是亟待反思的。

提出问题之后，林建华教授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他认为，在本科教育改革中，学校要更注重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以教师来影响学生——尽管我们的发展目

标是“研究型大学”，但教学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同时，北大的本科教育改革不仅会影响北大的未来发展，也会成为中国其他高校改革时的重要参考对象。因此，我们在研究本校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下中国其他高校的发展模式，带领中国高等教育迈上一个新台阶。

对于林建华教授谈到的“研究型大学”与教师日常教学工作之间存在的张力，裴坚教授深感赞同。在他看来，国内对“研究型大学”的理解存在偏差。研究型大学（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y）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建设”出来的，它的形成关键在于学者的学术创新能力，而不是将“发文章”的数量作为评价研究型大学的标准。事实上，在诸多学科（比如化学），中国大学在世界上的论文发表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关键是，这些文章中究竟有多少创新成分？又有多少是可以真正转化为



陈洪捷教授主持

产品的？以“发文章”为导向来“建设”研究型大学只会越来越压榨大学中本科教育的空间，让本科生、研究生越来越变成教授完成学术指标的廉价劳动力——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纷纷追随国际学术热点，紧跟“全球领先”，以求尽快发文，而这恰恰让大部分时候与学术前沿无关的本科教育越来越受到忽视。裴坚教授强调，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中之重，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研究型大学，但也不能让本科教育和研究型大学脱钩。

接下来发言的是刘云杉教授。她带来了一项针对北大本科学毕业生的调研结果，即北大的本科毕业学分一直高于国外高校。虽然近年来北大实施逐步降低学分要求，但很多课程却是“只减学分不减内容”，导致每个学分中压缩的教学量反而在不断增多，学分数量与课程难度、学业压力愈发不匹配。这样的结果便是，我们的学生在本科阶段既要面临数目庞大的一般课程，又要用比国外高校更少的课时来钻研困难的专业课程，甚至约占一半的本科生还额外选修了双学位或辅修——短短四年的时间如何做到既搞“通识”又精“专业”？

此外，刘云杉教授还指出，我们常谈的“拔尖创新人才”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拔尖”意味着成功，是以结果、评价为导向，要求“不能失败”；而“创新”却体现在知识与真理的探究上，充满着不确定性，要求“不怕失败”。“不能失败”的心态下如何能培养出“不怕失败”的创新人才呢？这也是我们学校层面要思考的问题。

三位引言人发言结束后，与谈人参与到了讨论中来。

陈春花教授带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即“面向未来的领导者的领导力由什么构成”。这项研究针对美感度、开放度、内定力、同理心、思辨性五种领导力维度展开。结果显示：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思辨力最差，开放度最高；40岁以上的人美感度最差、思辨力次之；而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从整体上来看，则是开放度最低，内定力次之。面对这样的“领导力”现状，陈春花教授指出，高校教育对未来领导者的培养或许要迎接以下三个挑战：第一，“面向未来的领导者”的内涵是什么？我们是否需要预先给这个“未来人才”确定一个画像？第二，本科教育是否应当更注重学生内在素质的培养？就目前来看，我们的本科教育还是存在过于“急功近利”和“职业导向”的问题；第三，如何能够把“持续学习力”的培养落实为健全有效的教学体系？“未来领导者”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是“未知”，我们无法以“已知”推“未知”，只能以“未知”推“未知”，而后者的关键正是学生的持续学习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本科教育的重点。

接下来发言的是陈晓宇教授。他谈到了研究型大学中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系。大学，特别是本科阶段的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教学机构，应遵循“因教设岗”的原则，即以人才培养的需求确定教师的聘任与职称。但在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指标中，衡量教师水平的首要指标却是科研成果，因此就有了“不教学就不算好老师，但不做科研就当不上好老师”的矛盾局面。教师的学术成果和教学精力往往是成反比的，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

好像很重视本科教育，号召“以本为本”，但在整体以科研成果为导向的教师评价体系之下，这样的口号喊得越响说明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陈晓宇教授希望大学可以首先按照教学需求和教学水平来聘任、评价教师，优先保证教师的教学工作做到位。另外，学校的“教师发展中心”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教师的入职培训工作，还应当为教师提供关于教学过程、职业发展的支持。

“本科教育是一个良心活儿”，随后发言的邓小南教授发出这样的感慨。她认为，对于本科教育改革，我们总是说的太多但做的太少。都说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问题是，“一流大学”是什么？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又到底有哪些缺憾？需要以什么步骤去弥补和赶超？这些都不是喊喊口号、制造出一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繁荣声势就能解决的问题。

此外，在邓小南教授看来，“教育”二字，不仅要“教”，还要“育”。也就是要由老师言传身教，让学生在师门的“养育”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素质，琢磨涵养，磨练能力。因此，想要解决学生的问题首先要解决老师的问题：我们的制度应当鼓励老师去做什么？这些制度又要怎样去落实？邓小南教授认为，教师在大学中应当更多以“做一个好老师”为荣，而不是仅仅以科研项目和各种“学者”头衔为荣。当然，邓小南教授也指出，这个问题想要得到解决就必须改革我们的整个科研评价体系——“没有项目，就不算科研，不上C刊，就不是成果”。这样的体系不改，教师就永远只能每日忙于论文发表、项目



刘云杉教授



裴坚教授

申报之中。

接下来，卢晓东教授发言。卢晓东教授指出，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要防止“折腾”——一年一个制度、一届一个方案。现在大学教育越来越多元化、通识化，北大的教学制度也在不断改变：1960年时本科改成了六年制，1989年军训时本科的毕业学分涨到了190分，最近又在不断下调……此外还包括双学位、辅修、跨院系选课等等。而这其中的每一次“反复”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当然，在经历了这么多尝试后，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其实已经走到了人才培养最艰深的部分：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如何培养面向未来的领导力人才？这和培养各个学科具体人才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对此，卢晓东教授指出，一直以来，我们的人才培养思路都是线性的，即希望学生从本科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志趣”，从此沿着自己的理想一帆风顺地成为我们想要培养出的那种人。但事实上，人的志趣、

理想终其一生在不断发生改变，在不同时期也会不断地面临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

“线性”思路其实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够考虑到这一点，相信北大的人才培养模式会有很大的改变。

渠敬东教授也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认为，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之魂，这既是对处于成长期的学生而言的，也是对教师而言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北大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不清楚什么样的人能够“引领未来”的人，那么，只需要回头去看看过去一百二十年中北大曾经培养出哪些人——他们正是当时“引领未来”的人。而今天，我们也仍是要在这个传统上，用北大的风气、氛围以及一代代通过师承流传下来的精神性的东西，去感召、培养出新的时代引领者。学校中没有教师的典范，没有感召，就不会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这是对北大每一位教师的考验。无论什么学科，走到最艰深处都不免要归于人性问题，更具体来说便是，人与自己所生活的

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教师所从事的教育实践工作就是反思这些问题的最佳契机。一个学生就是一个世界，教师在用心教导学生的同时也会获得对自己学问的反馈。总之，只有教学才能把“知识”和“未知”、实践和生活、人性和世界都生动地联系在一起。

最后发言的是朱红副教授。朱红副教授认为，本科教育改革应当从新生入学阶段就开始重视起来。我们的学生在经历了高中时期长时间、高强度、高重复性的学习后，被过度压榨了内在学习动力。加之父母、老师总是以“考上好大学”为目标来要求孩子，这导致他们在步入大学后突然进入“空心期”——失去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此外，我国的基础教育（包括高考）仍是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为主的，这种教育思路、学习模式也和大学所要求的深度学习、多元学习、批判性学习相脱节。因此，本科第一年是学生成长蜕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大学教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主张，教师应当成为一个具有共情力的教练，通过课上

课下的交往，不仅要解决学生学术上的疑问，也应当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上给学生一些参考，让学生得以在全新且安全的环境下自主思考和探索，发展出成熟的心智模式。对此，朱红副教授提出，学校在“教师发展中心”之外，也应当建立“学生支持中心”，以便在学生感到困惑时能及时给出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与谈人发言结束后，陈洪捷教授总结道，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近年来尝试了很多方案，也借鉴了许多国外名校的做法。但这些方法都是“自上而下”的，缺乏教师的参与和配合。所以，我们改革的关键仍在于教师，不仅仅要“以学生为本”，也要“以教师为本”，为一线教师制定出正向的鼓励措施和评价体系，调动起教师的教学热情。

最后，各位教授针对具体措施进行热烈讨论。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

（撰稿：孔博琳）

92

五四与现代中国

具体内容参见五四百年专题·学术论坛纪要。

（四）文研汇讲

01

袁剑 | 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

2019年3月5日下午，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一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勝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袁剑老师介绍了自己近些年关注的边疆研究内容。他表示，如何叙述中国已经成为边疆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当下，这一议题面临着“两难”情境：一方面是古代中国空间的区分性叙述，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叙述中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地方政权；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转型期的存在，体现在中国叙述层面便呈现出对于近现代中国空间的整体性叙述——在这当中，中国近代的整体走向以及边疆危机的浮现成为一种基本框架，中国领土疆域的



袁剑副教授

主体维系与部分沦陷构成了这种叙述的主线之一。如何形成对于古代与近代中国的整体性叙述，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历时性上加以厘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叙述的内在困境。而作为生活在中国空间的中华民族，在面对古代与近代的时代变迁时，同样面临这样一种叙述困境。这种困境，促成了我们对于作为思想史一部分的中国边疆及其边疆叙述的思考。

袁剑老师接着指出，我们当代的历史

叙述存在显性与隐性两种记录。古代与当代呈现出的显性记录主要是以王朝序列为主轴的历史，这种历史对于构筑我们的整体认识当然十分重要。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认知层面的内在困境，具体表现为作为王朝边缘区域的定位与地方政权的定位之间形成某种认知冲突。例如，如何在当代文本中呈现明朝视角下的东北叙述与后金政权自我叙述之间的差异，就成为一个难题，需要知识界形成新的共识。事实上，“新清史”的叙述空间正是在这种暂时欠缺共识的叙述难题中形成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处理好这样的问题：“隐性的记录”该如何呈现？怎样呈现？

在这种期待中，我们需要在王朝史的叙述框架之外，更好地去理解作为区域、文明与历史连续性的边疆空间。作为区域的边疆，往往呈现出一种碎化分布的态势。但如何在各边疆区域之间建立和叙述内在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边疆的区域化框架，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既有的研究中，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史对此涉及较多。作为文明的边疆，所指称的更多的是其自身所具有的地方性传统，在这方面，民族史的叙述较多。作为历史连续体的边疆，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知的新框架，在中心区域历史变迁的同时，边疆部分存在怎样的历史性变动？中心与边疆之间的联动关系如何展现？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叙述较为欠缺。

随后，袁剑老师论述了边疆研究中存在的阶段性特质及其内在逻辑。他认为，古代的边疆研究具有一种内在的循环特征，王朝的边疆施治成为叙述的中心议题，其

学术高潮是西北史地学。而一旦封建时代走向终结，这一研究就面临学科对象与方法上的转变。近代的边疆研究具有革命性，救亡图存的特征在边疆叙述中较为凸显。而边政学作为近代边疆研究的一大高潮，一方面在近代的边疆危机中得以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抗战及二战之后边疆危机的解除，在短期内便不再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如果我们结合整体历史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本身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民族国家化”的一部分。结合到自身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具体而微的缩影，在研究内容方面也成为近代史在边疆地区的投射。那么，在当下，我们如何在边疆研究中超越既有的循环性与革命性叙述，从而形成新的范式与框架？

最后，袁剑老师提出了“边疆思想史”的叙述可能，认为有必要从连续性中寻找叙述边疆的可能。边疆知识逐渐成为弥补曾经断裂的世界与中国之间空间的“普遍”知识分类，超越了古代原有的藩部话语，与中心区域话语共同构筑了与民族—国家结构范围相一致的中心—边疆结构。“边疆空间”成为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少数民族”的事实性生活空间，而由于“边疆”存在地域层面的联系性，因此构成了构筑“边疆思想史”的可能性。此外，古代中国的连贯性叙事与近代外国的区域性学术（如汉学与藏学、蒙古学、突厥研究等，也包括沿海中国研究）在当代交错：近代殖民帝国边疆概念的话语流动影响了殖民地及周边区域（如英法殖民地对中国西南和南部边疆的话语影响以及俄国、日本对中国西北、北方和东北边疆的话

语影响)……上述这些都为“边疆思想史”提供了现实的研究基础。它的叙述难点在于如何处理近代中国的边疆叙述与古代的逻辑衔接以及如何处理边疆区域内部之间的思想性关联。其衍生意义则体现为,它能够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边疆”纽带作用——不仅是人群的共同体,更是地域的共同体。此外,作为一种新的思考路径,“跨界民族”议题也将形成新的解释空间与框架。在具体的切入点方面,“边疆群体”和“边疆人”将是未来可能的叙述重点和方向。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们就“边疆思想史”的内涵、“边疆思想史”与“一般思想史”的关系、“边疆思想史”的学科基础、边疆与民族的结构性关系、圈层结构与边疆话语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多位老师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建议袁剑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形成更全面的思考与叙述框架。

(撰稿:袁剑)

02

鲁家亮 | 墨钩与墨横——秦汉简牍文献中对标识符号的记录与使用

2019年3月12日,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鲁家亮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墨钩与墨横——秦汉简牍文献中对标识符号的记录与使用”。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

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鲁家亮老师以“重文符”为引子,介绍了战国秦汉简帛中所见标识符号与现代标点符号在使用时的同与异,并进一步指出以往对此类标识符号研究时所利用的背景知识和局限。幸运的是,新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卒令丙四”保留了秦代对“墨钩”和“墨横”这两个标识符号的文字描述。此举或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两个标识符号的原本意涵,并梳理相关符号在秦汉简牍文献中的源流演变。

对于墨钩,鲁家亮老师指出,王国维

先生在《流沙坠简》中就已经注意到西北汉简中施加在人名之后的“L”——为了防止人误读而记,且与岳麓秦简“卒令丙四”所记“辞(辞)所当止皆臞之”的目的“以别易<易>智(知)为故”一致。而《说文》丿部:“L,钩识也,从反丿。读若捕鸟罟”的记载,可将简文“臞”与《说文》中的“L”相关联。再结合秦汉简牍中所见“墨钩”的实例及古代琴谱中减字谱关于“挑”和“钩”两种指法的描述可知,岳麓秦简中的“臞”字不必破读,其本义是指挑取骨间之肉,可引申出将原本相连的事物分割开来的含义。简文“臞之”落实在文本上,是通过符号“L”来实现的。符号“L”实际是对“臞”(其动作是“挑”)的动作轨迹的一种体现。

关于“墨横”的描述同样见于“卒令丙四”。令文规定在“书却”之时,需要对相关的多份文书加以“纂编”,当这些文书超过20牒的时候,需要在文书之间添加标题简,即简文所见“阶(界)其方,江其上而署之曰:此以右若左若干牒,前对、请若前奏”。通过对比里耶秦简所见秦代行政文书、汉代遣册、告地书、《除书》等多个实例,我们可以知道上述文献均存在一般称为“简首涂黑”的现象,由此推知“卒令丙四”中的“江(杠)其上”正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基于此,简文“江”或可读为“杠”——杠指床程,“杠其上”就是指在方上划横杠——其直观的效果就是简首涂黑。在简牍文献中,墨横(或墨杠)具有分隔和标识两个基本功能。这两个功能在战国简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前者如包山简、信阳简、郭店简、上博简等用以分章、



鲁家亮副教授

分篇以及分隔文书或不同的事物;后者如曾侯乙简中所见计结简的简首墨横。在秦汉时代的简牍之中,墨横的标识功能得到了加强。受其影响,我们在标题简、简牌以及具有计结性质的文书均看到了所谓的简首涂黑现象。若追述其源头,当与墨横(或墨杠)标识功能的发展有关。

最后,鲁家亮老师还就秦统一后是否存在对标识符号进行制度上的规整、动态行政文书与静态法律文本的比较研究以及利用简牍文献中获得的认识去解读其它载体资料的可能性等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想法。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对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与建议,包括:古代琴谱中的减字谱是否可以作为文字论证的证据、古代文献中“江”读为“杠”具体用例的缺失、段玉裁所引《滑稽传》的文本解读偏差、居延汉简EPT51·344所见墨横的位置问题等。与会学者还就简牍文献的物质形态、汉代告地书、秦汉学者与明清学者对“皇权是否下县”的理解错位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撰稿:鲁家亮)

03

尹吉男 | 书写中国后期美术史的知识生成方法与实践——以艺术资源的紧张关系为核心

2019年3月19日下午，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著名艺术史学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家、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院长尹吉男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书写中国后期美术史的知识生成方法与实践——以艺术资源的紧张关系为核心”。第六期邀访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于溯、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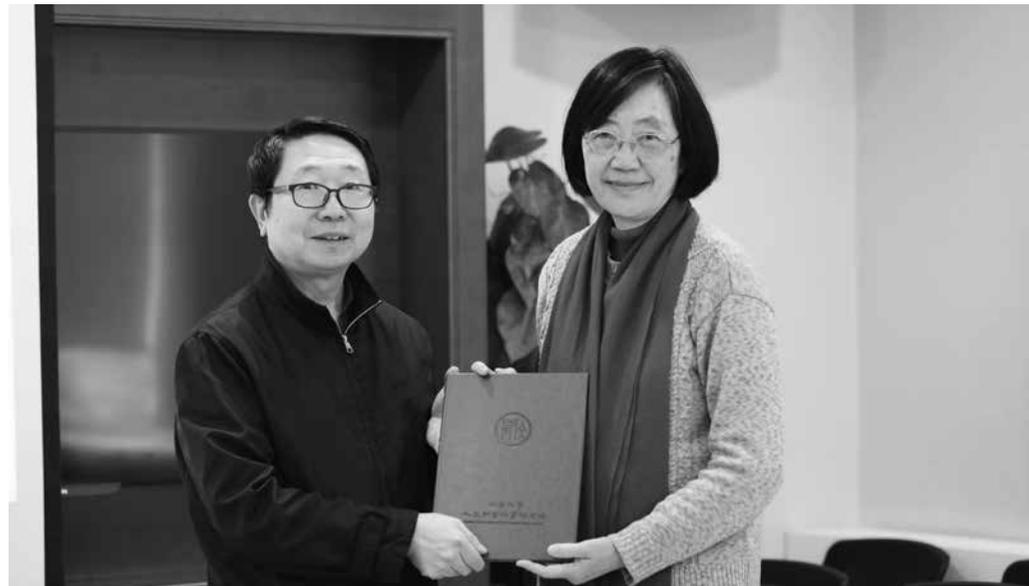
论坛伊始，尹吉男教授讨论了知识生成方法论问题。他认为，艺术史要处理两种实在：在场的实在和不在场的实在。知识生成方法主要是处理不在场的实在，美术史学者要面对过去的图像和文献资料。接下来，尹吉男教授分别通过对顾恺之、董源、谢环、杏园雅集等概念的理解，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后期美术史知识生成方法与实践的认知。

一、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以“顾恺之”的概念为线索

尹吉男教授首先以“顾恺之”的概念为

线索，讲述了自己对于中国后期美术史知识生成的思考。之所以考察“顾恺之”概念，是源于尹教授在大英博物馆鉴赏顾恺之作品的经历。他发现，鉴藏家们对顾恺之的认识和对其绘画作品的鉴定标准都并不一致。不过，其中仍然存在三项一致的认同，即顾恺之是绘画理论家、宗教题材的壁画家、女性题材的卷轴画家。但尹吉男教授认为，只有绘画理论家是真实存在的，宗教题材的壁画家和女性题材的写作画家都很难被证实。

由此，他发现：文化历史中塑造顾恺之的过程，远比顾恺之创造艺术品的过程更加复杂，他把这称之为“顾恺之的神话所覆盖的艺术史”。他将顾恺之的概念一分为二，一是文本意义的顾恺之，二是绘画作品的顾恺之。其中，文本意义的顾恺之来自于南朝人和唐朝人在文学、历史和绘画史写作中构造的文字的“顾恺之”。具体包括：刘义庆构造的文学性写作的顾恺之，房玄龄等构造的历史性的顾恺之，张彦远构造的艺术史写作的顾恺之。跨越两百年历史，这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文本意义上的“顾恺之”。绘画作品的“顾恺之”，则主要是通过宋朝人在艺术品的记录和鉴藏中构造，主要涉及《女史箴图》、《列女传仁智图》和《洛神赋图》。尹吉男教授强调，从现存的文献看，顾恺之可能画过《列女传图》。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尹吉男教授（左）颁发聘书

尹吉男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两种“顾恺之”有力重迭，使得晚明时期鉴藏家的收藏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并在将三个文本的“顾恺之”和三个卷轴画的“顾恺之”合成的过程中，有力地构筑了当时乃至今天关于六朝绘画的“知识”。因此，这个被合成的“顾恺之”并不存在于东晋，而是存在于东晋以后的历史过程中。

二、“董源”概念的历史生成

尹吉男教授认为，董源对于理解元代以后的绘画史至关重要，特别是晚明清初的绘画史，因为“董源”概念背后延伸着一个十分复杂的绘画收藏史。尹教授认为，尽管目前仍缺乏有关画家董源的南唐历史文本和他本人的自述性文件，甚至对连他的名字到底叫做“董源”还是“董元”人

们都无法确定，但董源概念的历史生成，却一方面意味着南方品评权力的最终确立；一方面也意味着江南文人心目中的绘画史主线的最终形成；与此同时，还意味着影响市场和金钱关系的鉴藏谱系也在其概念背后完成。

尹教授表示，历代画家和鉴藏家都愿意相信董源及其画迹的历史存在。不论是从宋代的“董源”、元代的“董源”到明末清初的“董源”，还是从文本角度上沈括的“董源”、米芾的“董源”、汤垕的“董源”到董其昌的“董源”，“董源”的概念都在不断发展和成熟，最后使得董源及其作品的真实性似乎已不再重要，而董源作为一个知识概念所演生的历史过程的关键一环。

三、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的业余生活与仿米氏云山绘画

尹吉男教授指出，当今天的艺术史家努力去寻找艺术史的“主线”时，就会发现“主线”是被后来的历史建构起来的，这在明代画家谢环（1377—1452）的身上就可以被印证。作为艺术史教科书意义上的“宫廷画家”，谢环传世的作品仅有《杏园雅集图卷》和《香山九老图》，另有一件《水光山色图》流传在日本。尽管谢环的多被后世当作宫廷画家，但他认为，这个身份被高度概念化，而谢环作为个人身份的文人画家的那一面被历史掩盖。

尹吉男教授表示，在谢环与友人的对话中，透露出他极为复杂的思想信息，既有“浮文胜质”的功能说，又有“诗本性情”的怡情说，而谢环关注的画家群体，如董源、米芾等人，也都是更注重绘画的本体，而非“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寓意。尹吉男教授进一步剖析谢环的生平与《云山小景图》等作品，发掘其仿米氏云山绘画和仿古作品背后的沿袭历史，最后总结道：明代宫廷画家的“院体”风格绘画的历史存在一直被作为文人画的比较系统在后世鉴赏家中具有绘画史的意义，但他们的职业绘画或者被认为是职业绘画的作品大量保留下来，而这其中，品评、鉴赏和收藏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谢环的职业画家的本质是被后期文本生产出来。

四、政治还是娱乐：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

尹吉男教授指出，1437年的“杏园雅集”是一个涉及到历史、图像、文学三重

关系的概念。其中，明代朝廷重臣杨士奇的《杏园雅集序》和杨荣的《杏园雅集图后序》是历史，画家谢环的《杏园雅集图》既是与“历史”相关的图像，同时又是与“艺术”相关的图像，而那些与图像并存的九位文臣的诗文则是文学。而《杏园雅集图》的图文背后，也常常被想象成一个“历史本身”的存在。

随后，尹吉男教授分别从杏园雅集图的传本与模式、《杏园雅集图》与“江西文官集团”、“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的深层含意、画家谢环的绘画表达的条件和基础四方面来探讨了杏园雅集的政治内涵，最后得出结论：在明代宦官逐渐专权的政治态下，谢环的《杏园雅集图》是一幅内涵丰富、显中有隐、而且十分出色的政治绘画，并非简单的娱乐；与此同时，《杏园雅集图》还是历史上少见的隐匿了真实主题和深层含意的现实绘画。

最后，尹吉男教授就艺术资源在宫廷和民间的紧张关系做了宏观的讨论。

（编辑：熊晓晓）

04

赵妍杰 | 家的消失：家庭在重构社会伦理中的地位

2019年3月26日下午，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赵妍杰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家的消失：家庭在重构社会伦理中的地位”。第六期邀访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赵京兰、熊春文、狄金华、郑少雄、黄群，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赵妍杰老师首先介绍了家庭革命的意涵以及她所作博士论文处理的几对核心关系，其中包括家庭与国家、家庭与个人、家庭与社会。本次报告会集中探讨的是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追溯“建立一个无家庭的社会”这一激进思想的来龙去脉。

报告第一部分围绕“从世界看家庭：争做无家庭的世界民”展开。赵妍杰指出，受天下士遗风熏染的民初读书人，往往带有几分先天的世界眼光；而西强中弱的格局，又使不少人也曾向往成为无认同的“世界民”。他们注意到家庭与国家都是“私”的象征，故多言及民族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共通性。在批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时，家庭也连带附上了些许负面的色彩。换言之，家庭

既受到民族主义挑战，但有时又和民族主义属同一战壕而面临世界主义的冲击，成为近代读书人最不喜欢的社会制度。

类似有关废家的思考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读书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一种反抗。读书人对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西方世界并不满意。他们将种族、阶级、性别都看成是人类自私自利的表现，转而设想一个与现存中西都不同的未来世界，能真正实现自由、平等、互助、博爱，那才是象征着光明的至善社会。

报告第二部分围绕“从社会看家庭：构建一个无家庭的理想社会”展开。清末“世界民”的想象逐渐转变为五四时代新青年常说的“社会之一分子”。所谓的做社会之一分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就像直接面对上帝一样，每个人也都直接面向社会。为了这一理想，首先就是要打破家庭。这个理想社会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个人不再承担家庭责任，而要对社会整体尽责任。

家庭本身是一个居处的生活空间。家庭革命旨在破坏家庭的同时也在建设着各式各样新的空间。家庭革命者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放大的家庭，即整个社会来关照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公立机构，

特别是用学校来取代家庭是他们分享的思路。较早些时候，康有为设想以公立医疾院、公立养老院、公立恤贫院、公立养病院、公立化人院等机构将“生育、教养、老病、苦死，其事皆归于公”。家庭革命者并不是不愿意照顾父母和子女，而是提倡一种新的养老育幼的社会模式。当家庭从保护性的

社会组织变成革命者眼中压制性的存在，那么，从弱者（包括妇女和孩子）的角度出发，在逻辑层面上废除家庭制度的确是对被压迫者的解放。若从家庭作为保护性存在这一角度出发，弱者、幼者实际上可因家庭革命而丧失了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保障。而家庭的保护性面向常常为家庭革命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们所忽略。公立机构取代家庭的前提是家庭责任可以转交给社会，这其实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家庭革命者主要考虑的是安顿和满足人的食欲和性欲，忽视了亲情对的重要性。

五四后，家庭革命的一个变化是从文学、哲学、伦理的新文化运动转向了强调经济制度的社会改造。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青年们已经从一个人单枪匹马反对自己的家庭走向了集体行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当人们将养老、育幼等原本属于家庭的基本职能交给社会，不啻于使社会变成一个家庭。问题是，原来的人群组织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赵妍杰助理研究员

而家庭是以血缘、情感为联系纽带；当个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后，这个社会靠什么来凝聚起来呢？后五四时代的青年青睐各式各样的“主义”，包括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家庭革命者以“主义”而不是血缘和亲情来凝聚社会。通过家庭革命建立一个公正、完美的社会的理想影响了青年人的政治选择，并深刻塑造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的走向。

既存研究大都是用近代中国历史的大框架（反帝反封建、现代化）进行分析，而这两个脉络中家庭革命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更核心的问题是研究者较少从家庭本身出发，来探讨家庭革命所展现出的时代意义。赵妍杰指出，家庭一面联系着个人和社会，一面关联着天下和世界。以政治力量来推行家庭革命是一种统治方式的变革——究竟是直接统治个体还是通过家庭统治个体。有关社会生活所需的责任、道德、自治、自律等精神，家庭起到了重要的培育作用。

家庭革命成功后的结果可能是个人的自私自利和不负责任，原本重家庭的习尚被抛弃，人们轻家庭、亦轻国家。家庭革命不仅引起了政治文化的根本性变迁，且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的解体。或许今人应该反思的是：人类是否应该或是否有能力构建一个没有家庭的社会？无家庭的社会值得向往吗？

赵妍杰最后特别强调，本报告所呈现的或许是思想最激烈的一个群体对废家的想象。但是，也有不少言说和思想反对家庭革命，起而保卫家庭，捍卫家庭在社会与文化中不可替代的角色——这恰恰是她目前正在写的一本小册子。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进行深入、热烈的讨论，内容涉及家庭革命与近代

中国的政治文化之变迁、运用历史文本的方式、文学文本呈现历史的丰富面向、家庭革命所接受的西方思想资源以及废家在学理层面的可行性。邓小南老师建议，应该重视家庭革命所展现出的现实生活的烦闷。刘志伟老师则从个人经历出发探讨建国初期的家庭生活，并建议报告人从样板戏《白毛女》来分析家庭革命与阶级话语的融合。于溯老师以李锐和范元甄的人生悲欢离合为例子，探讨了革命者对待原生家庭以及夫妻关系的态度。大家一致认为，家庭革命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和拓展的研究主题。

（撰稿：赵妍杰）

05

于溯 | 文献学视角下的中古史学

2019年4月2日，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于溯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文献学视角下的中古史学”。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勝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熊春文、邱源媛、冯培红、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于溯老师首先介绍了何谓“文献学视角”。文献学学者在处理文学、史学等相关学科文献时，会更多地关注到一些“内

容之外”的信息,比如书写形态,版式,装帧、卷帙等。而所谓文献学的视角,是指将这些“内容之外”的信息与“内容”联系起来研究。比如说,骈文的流行,尤其是在公文领域的长期施用,便是一个文体学问题;标点符号的使用,则是一个文献学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骈文的易断句、以及因易断句导致的相对少歧义,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使标点的施用不那么必须,从而导致我们尽管早已发明了标点,却始终不普及?



于溯老师

又比如说,合本子注的发明,是一个史学问题;卷轴装,是一个文献学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卷轴装文献若反复翻阅,来回卷伸,会对卷轴本身造成极大损害,因此这种装帧对检索信息非常不友好。而合本子注恰是通过一种“结构革命”,实现一书在手、众本在握、免于检索的功能,那么它的出现是否也是卷轴装

催生的结果?“文献学的原因”一般不是造成某种文学或史学现象的唯一原因,但却是不可忽视而常常遭到忽视的原因。

于溯老师接着解释了为什么要以中古史学为切入点。从史学史的角度说,每一时期的历史记录各有其特色,很难说哪一时段有突出的重要性;但从文献学或目录学的角度说,汉末到唐代,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中古时期,可谓是史学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史部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不仅从无到有,且甫一出现就是一级目录。这种情况,从性质上说和经子集三部都不同。汉志隋志之间的几百年时间是目录史最有活力的一段时期,而史部是造成这种活力的主要因素。另一种值得重视的目录是纪传史的史志目录,中古纪传史的史志项目和名称尚屡有调整,但和图书目录一样,这种活力在中古以后的漫长历史中归于沉寂了。

于溯老师指出,从文献学的视角看,中古史学有一些基础特质被忽略了。比如说,隋志四部通计亡书,一共著录四千八百余种书,它们的卷帙都是什么情况?这些书算起来百卷以上的只占1.5%,50卷以上只占3%,绝大多数是20卷以下的小书。卷帙大小其实和书籍的存亡流通、同主题书籍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都有密切关系,但这一点过去很少有人去关注。在隋志著录的50卷以上书中,史部书籍的比例高达5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史部的出现,就是史书的这种大卷帙特征导致的。

于溯老师认为,史部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太康初,秘书监荀勖在校书时将

皇家藏书按卷帙比较平均地分成了四类,这可能是为了让各整理者领取差不多的工作量,以优化时间成本。由此形成的甲乙丙丁四部,并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目录学意义的图书分类。所以这个目录虽分四部但取不出四部的名字,还有些二级目录的设置难以解释。当时还有“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的记载,这条材料小有问题,但总能反映出四部图书曾经大致卷帙相当的状况。像《中经新簿》这样求各类卷帙均衡的目录在历史中是十分少见的。如果不是荀勖这一次校书,史部可能就不会出现;如果

不是几种大卷帙的后汉史在太康前已经问世,史部也未必出现;如果别集大兴的时代提前,集部卷帙提前暴涨,史部也未必出现。不过,目录不仅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也能作用于学术、影响学术的未来走向。史部一旦出现,就不会轻易消失,它还会迅速吸附二级目录,部类意识的分类体系也逐渐走向明晰。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就文献卷帙与流散的具体关系,同题著作竞争的卷帙因素和皇权因素等问题做了深入讨论。

(撰稿:于溯)

06

哈桑·法兹里·纳什里 | 伊朗“不远的过去”:从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考古学到21世纪的历史考古学

2019年4月9日,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伊朗‘不远的过去’:从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考古学到21世纪的历史考古学”。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秦玲子、熊

春文、邱源媛、冯培红、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哈桑教授介绍了伊朗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伊朗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许多西方考古学家为了研究农业的起源而来到伊朗扎格罗斯中部(central Zagros)。例如,罗伯特·布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哈桑教授（左）颁发聘书

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等人开始研究扎格罗斯地区的史前社群（prehistoric communities），并发现现代人的资料对于解释历史很有帮助。相关考古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多学科的，其中有些研究者进行了民族考古学的研究。

在进行民族考古学研究时，研究者除了分析考古学的发现，也利用史前史和原史（proto-history）资料研究游牧民族的生活和农业活动。他们试图通过民族志资料揭示过去游牧民族和农业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形态。另外有一些研究通过现代资料来研究过去农业村落的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房屋功能和土地利用等方面。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量相关书籍和论文陆续出版。哈桑教授介绍了相关研究发现，其中包括李·霍恩（Lee Home）20世纪70年代在伊朗东北部主导的考古发

掘。然而，由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许多在伊朗的研究被迫中止，外国研究人员也陆续离开了伊朗，这种研究方法没有继续下去。

接下来，哈桑教授介绍了伊朗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并重点论述了伊朗地主村落（landlord villages）研究这一研究案例。哈桑教授表示，历史考古学是一个融合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近现代的人类社会。历史考古学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才进入伊朗。2003年，国际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名为“德黑兰平原的社会经济转型”的大型研究项目。项目成员露丝·杨（Ruth Young）和他本人研究了19世纪和20世纪德黑兰平原上的地主村落（Landlord Villages）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

哈桑教授表示，在20世纪60年代

和70年代土地改革之前，地主村落代表了大部分伊朗人口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而它们的废弃与伊朗的“白色革命”密切相关。该项目希望在它们完全消失前记录德黑兰平原上这些泥砖村庄的遗迹。研究人员试图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self-contained）聚落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许多功能区域。该模型有望适用于该地区的石器铜器并用时代的聚落（Chalcolithic settlements）。该研究项目选取了两个废弃的地主村落 Kazemabad 和 Hosseinabad Sanghar 作为研究对象，这两个村庄都位于比什瓦（Pishva）以南。研究人员为每个村庄都制定了详细计划，收集结构和功能信息以便进行后续分析，并记录村庄的物理状况以便研究未来损坏的速率和过程。此外，研究人员花了大量的精力访谈了同这些村落有关联的人们。这种民族志方式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理解人们是如何使用村落的空间的，以及村落的社会和经济动态与空间的关系。

讲座结束后，学者们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有学者指出，理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实质和影响十分重要。它是一个宗教革命，但同时包含世俗化、城市化等复杂的面向。此外，学者们就民族志、民族考古学等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另有学者提出，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自于西方，在17世纪和18世纪被西方学者运用在对于东方文明的研究中。这些民族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静止的和非历史的，将文明理解成静止的状态而不关注历史运动和内在的进化过程。而历史考古学作为一个考古

学研究的新路径旨在将历史带回相关研究中。对此，哈桑教授强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重要的。本次讲座所介绍的地主村落研究说明，考古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获得更丰富的研究材料，并拓宽研究思路。关于“不远的过去”的研究也可以揭示出人类社会中亘古不变的一些因素，如社会不平等形式虽然在不断变化，但始终存在着。还有学者提问，面对相同的考古发现，民族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视野是否会有不同。哈桑教授回应道，民族考古学关注游牧民的生活方式，而在历史考古学中，利用科学的研究手段可以对于动物和人类骨骼进行研究，从而展现更全面的人类生活图景。

（撰稿：魏玉槐）



07

狄金华 | 管区组织的浮与沉——对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结构的反思

2019年4月16日下午，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狄金华作主题报告，题为“管区组织的浮与沉——对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结构的反思”。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冯培文、邱源媛、郑少雄、袁剑、黄群、鲁家亮、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第六期邀请学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熊春文主持本次报告会。

首先，狄金华老师介绍了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农村基层政府的组织演变。在旧有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之后，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社一乡制、大区小乡制和大区中乡制三种不同的组织结构。这种不同使其在面对治理负荷时存在差异。同时，狄金华老师分析了人民公社制解体之后农村基层政权所面临的人员激励以及因其嵌于压力型体制与乡土社会之间所呈现的治理“结构之困”。

接着，狄金华老师分析了1980年代中期之后，不同地区的乡镇在其内部设立管区组织（或曰片区、办事处等）的状况，



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为狄金华教授（右）颁发聘书

解析了在“镇（乡）一村”、“镇（乡）—管区一村”、“镇（乡）—总支一村”、“镇—（小）乡一村”等不同结构中其控制权的分配。通过田野研究，他发现，管区组织的设置改变了基层政府治理的内部结构，它通过内部的控制权分配，不仅再造了组织内的层级以奖励基层政府的官员，同时通过区分管区干部和机关干部，使乡镇内部成员形成明显的分工以应对基层政府治理的结构之困。

随后，狄金华老师将乡镇政府与管区组织之间的控制权分配视为一套组织内部的分权治理模式，以此来分析管区组织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形成的与乡镇政府不同的分权治理模式中各要素间的协调关系，以及这种治理模式如何动态变化及形塑这种变化的外部条件为何。他认为，管区组织的设置与强化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乡镇在治理实践中所应对的激励困境和结构钳制，使得乡镇在应对各种治理任务和内部管理时，拥有较大的回旋空间；但管区的强化以及控制权的让渡同时会带来代理人行为的外部性溢出，这又会令乡镇或上级政府会对这一级组织进行约束，甚至打压。

狄金华老师指出，乡镇政府与管区组织间不同的控制权分配形态受到治理任务、治理成本和治理规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组织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乡镇则可以通过分权管区以激励管区干部来更积极地完成治理任务；治理任务越是偏向村庄（或村民）汲取资源（汲取性任务），治理难度越大，治理负荷也相应越大，乡镇越倾向于分权的治理模式；治理任务越依赖村

庄（或村民）的配合，基层政府治理的负荷就越大，乡镇政府采用直控式治理模式的绩效越差，越需要分权给村庄联系紧密的管区干部，以激励其与村干部沟通、完成治理任务；治理的空间越大、人口越多、异质性越强，越需要采取分权的治理模式；问责体系越宽松，则意味着外部制度的包容性越大，在同样的分权后果下，分权治理的风险就越小。

最后，狄金华老师总结了乡镇治理组织的三个特征——治理任务的专一性、治理规则的规范化程度以及治理的组织化程度。此外，乡镇包含着工作小组、科层部门和管区组织三种治理形态，其分别对应着运动式治理、科层治理和行政发包治理三种不同治理的机制。不同治理形态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成本有所不同。当基层政府所面临的治理任务与外部治理环境不同的时候，它们则会不断调整其治理形态。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们就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信访制度及其实践、乡村振兴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且深入的讨论。

（撰稿：狄金华）



08

邱源媛 | 亦旗亦民：清代旗民二元性制度下的民众应对



2019年4月18日下午，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作主题报告，题为“亦旗亦民：清代旗民二元性制度下的民众应对”。第六期邀请学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冯培文、郑少雄、袁剑、黄群、鲁家亮、于溯、赵妍杰、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第六期邀请学者、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狄金华主持本次报告会。

1949年，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同中国学者冯家昇出版《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on, 907-1125*）一书，提出辽、金、元、清等朝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二元性（duality）。该理论对欧美、日本、中国等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是赞同抑或反对，二元性话题在东西方学术界均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围绕该



邱源媛研究员

问题的讨论经久不衰，在产生冲击的同时，也为学界带来诸多启发。然而，囿于史料以及研究视角，以往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家制度诸层面，很难深入到基层社会。清代浩瀚的档案史料为讨论二元制下的民众生活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细节，使得相关研究成为可能。

旗人作为“国家之根本”，王朝统治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得到了清廷的特殊庇护，“旗民分治”是清代二元性的重要体现之一。旗人不隶州县，不入民籍，由八旗系统单独管理。“旗”与“民”是清代最为根本的人群分野，二者在行政隶属、法律管辖、人群构成、政治地位、

权利义务、社会功能等方面差别巨大，不允许有丝毫逾越。然而，现实生活不可能简单如一纸条文，二元性制度在规范不同人群的行为，并有意识将其区分、对立的同时，人们也会利用制度的二元性，往来于两个系统之间谋取利益。

首先，邱源媛老师介绍了十七世纪以来直隶地区的旗人与旗地。有清一代，八旗各类人群在畿辅地区，以北京城为圆心，层层分布。京师禁旅、八旗驻防环绕京师，构成严密的军事戍防体系。同时，为了满足皇室、王公与八旗人丁的生活需要，清廷将畿辅地区原有的明代庄田、军事屯田、老百姓土地等，强行圈占，设立八旗庄园，分拨给旗人。此外，还有大量民人（以汉人为主）投充旗下，进入八旗，成为旗人。其中不少人带着土地归顺，这批土地被称为“投充地”，这批人则被称为“投充旗人”（亦称“投充人”）。圈占与投充土地的范围涵盖了77个州县卫，直隶地区布满旗地官庄，其中顺天府80%以上的原民地变为旗地。

畿辅地区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旗民杂居之势。八旗与州县、旗人与民人，两种制度、两个群体并存于同一时间和空间，由此而产生了两种生存模式。二者之间既相互隔绝、又相互影响、交织和渗透，既有矛盾冲突又各自相安。人们（旗人与民人）利用制度漏洞，游走在八旗与州县之间，使旗、民杂居的基层社会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邱源媛老师选取这群以往较少被学界关注的直隶地区的投充旗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了他们如何选择性跳跃于八旗

制度与州县系统之间的生存状态，并藉此讨论二元性体制下的民间基层社会以及民众的生活状态。

随后，邱源媛老师展示了旗、民之间不同的流动原因与方式。在与土地相关的案例中，民众利用旗籍、旗地远比利用民籍、民地的情况要多，呈现出“民”进入“旗”的倾向，这与旗地肥沃，旗人有一定优享权直接相关。投充人丁虽为奴仆身份，却管理大量土地和财产，拥有一定权势。他们背靠八旗主子，让地方官员有所忌惮，对其行为不敢轻易介入干涉。同时，投充制度本身的漏洞，诸如自愿附投、旗人合法拥有民地、家庭/家族中既有旗人又有民人等状况，短时间尚可无碍，时间稍长则必然引发旗、民纠纷，而旗人的优势地位又会影响有司判案。民人因此向旗人流动，冒为庄头，利用旗地，获取利益。

与此相反，在入学科考这方面，又呈现出由“旗”向“民”的反方向流动。投充人以奴才身份进入八旗，对旗人主子有着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入学、考试、任官受到颇多限制，直到乾隆三年（1738）才获得考试资格，“归入汉军额内考试”。仅仅三年，乾隆六年（1741），清廷又封禁了投充人丁的科举之路。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乏投充人中举之事，但从清廷禁绝其科举的整体政策倾向以及其他一些诸如马步箭射等限制来说，投充人参与旗人科举是有较大难度的，从而催发其冒入民籍，由民人系统考试入仕便不足为奇了。

最后，邱源媛老师指出，金、元以降，

作为王朝政治中心，华北最为明显的地域特征是国家的强大投影，政治事件与国家制度对其基层社会的渗透直接而深入。相应的，基层社会对国家的感应甚为敏锐，反应也更为迅速。同时，华北也是族群问题纷呈之处，族群的冲突、融合、迁徙、流动不仅形塑了本区域历史，对中国整体大历史的走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千百年来众多族群的共存，彼此之间势力的消长，多种语言、文化的碰撞，“多元”默化成为华北的日常。

清代史料之丰富，是此前各个朝代无法比拟的。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各类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使研究者能够更为清晰地观察和认识清代基层社会的种种细节。关于八旗人群的考察，关注制度交错地带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不仅有助于理解华北区域内不同人群的生活状况，也有益于推进学界对二元性制度下的族群关系、区域社会等相关问题进行更为立体而客观的思考。

(撰稿：邱源媛)

09

藤田胜久 | 《史记》秦代史与北大汉简《赵正书》——秦、楚、汉的正统论

2019年4月23日，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日本爱媛大学名誉教授藤田胜久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史记》秦代史与北大汉简《赵正书》——秦、楚、汉的正统论”。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尹吉男、赵京兰、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狄金华、郑少雄、黄群、袁剑、于溯、赵妍杰，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一、出土文献与《史记》研究

藤田胜久教授的报告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为出土文献与《史记》研究。藤田胜久教授指出，在使用文字研究历史的时候，可以将中国古代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期是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的时代，第二期是由晋至唐的纸写本时代，第三期则是宋代版本出现后的时代。藤田教授围绕着这三个时期的文献展开讨论。

藤田胜久教授对简牍帛书时期与《史

记》相关的出土文献进行考察，他发现，这些出土文献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上的文献是与《史记》编辑有关的文献，广义的则是与《史记》中所有历史关系相关的文献。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利用了大量的汉代资料。这些资料大致有两种用途，其一是记录，包括传世的典籍、竹简、帛书，以及汉代保存的法律、日书等资料。近年来，在古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汉代用以记录的文献资料。另一种用途则是通信，藤田胜久教授表示，有关通信的文献最早在战国中期的秦国被发现，这是因为，这里的通信不仅仅是指书信，而是与行政有关。直到战国中期，才出现了由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系统，而正是这样的行政系统的产生，才有了通信的需求。与通信有关的文献主要包括公文书和书信等，其中有的文献上还附有如何处理实现行政决策的记录，非常具有研究价值。而这些与通信相关的文献与古代的交通息息相关，因此在一些古井与遗址中多有发现。

随后，藤田胜久教授围绕着由晋至唐的纸写本时代进行讨论。他指出，目前所见最早的纸写本出现在晋代，在由简牍向纸质文献转变的过程中，承担记录这一功能的书籍文献变化较早；而承担通信功能的文献则较晚才开始转变，这是因为，用以通信的文献，其形式受到行政的影响，只有行政上发生改变时才能推动通信文书的改变。而即使通信文献由简牍变为纸质文献之后，仍然保留着简牍的形式，如木牌等。反映出了承担记录功能的文献与承担通信功能的

文献在载体上的不同之处。

接着，藤田胜久围绕宋代版本出现之后的第三时期展开了讨论，并介绍了中日韩等国《史记》的各种版本。

二、《赵正书》的性质及《史记》中秦代历史的编纂问题

报告的第二部分，藤田胜久教授分三方面对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赵正书》的性质以及《史记》中秦代历史的编纂问题展开考察。

首先，藤田胜久教授指出，《赵正书》并不是纪年性的文章，而是以对话为中心的记录资料，文末附有评论。这种形式的文章也见于汉代初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的第二章和第四章。而《赵正书》中对于秦二世不听谏言导致秦亡的议论，也常常见于关于秦的战国故事类中。西汉末年编纂的《战国策》原本，



藤田胜久教授

其记载时间到秦灭六国之前，而以《战国策》、《史记》为基础编纂的敦煌文书《春秋后语》则一直写到秦末为止。因此，以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婴等言论为中心展开的《赵正书》可以视为收录了秦代故事的《战国策》，尽管该篇并非与秦代同时期的历史材料，却也反映了一定史实的历史故事。

随后，藤田胜久教授讨论了《赵正书》与《史记》的关联。《赵正书》中有关蒙恬列传、李斯列传的部分，跟《史记》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可以证明它与《史记》的取材同源。《史记·秦始皇本纪》和《赵正书》中围绕着二世皇帝胡亥帝位继承的内容却有所不同。而在汉代，关于始皇帝之死存在着很多历史故事。由此可知，司马迁在创作本纪时采用的材料与《赵正书》不是同一系统，这也显示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在本纪和列传的素材使用时采用了不同的编辑方针。

最后，藤田胜久教授表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否定了胡亥即位的正统性，将长子扶苏视为正统，这位扶苏推测就是陈涉、吴广所诈称的扶苏和项燕之扶苏，是顺从楚地民意的楚夫人之子。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认为天命由秦正统的扶苏转移到与楚怀王有关联的项羽，故在《史记》中设了项羽本纪。而作为这种天命的预兆，就是秦始皇临死之际，把扶苏作为正统来记叙，而胡亥则是篡夺了皇位。因此，秦帝国灭亡以后，在司马迁笔下展示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把天命移向楚，再者是将天命移向汉。《赵正书》与《史记》中关于二世继位的表述不

尽相同，为我们探讨《史记》的编纂以及司马迁的历史观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赵正书》的性质与《战国策》历史故事的关系、《赵正书》的成立年代、益阳简牍《秦二世元年诏书》与《赵正书》的关系、《史记》本纪与列传完成顺序、司马迁的历史观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撰稿：藤田胜久、钱婧）

（五）文研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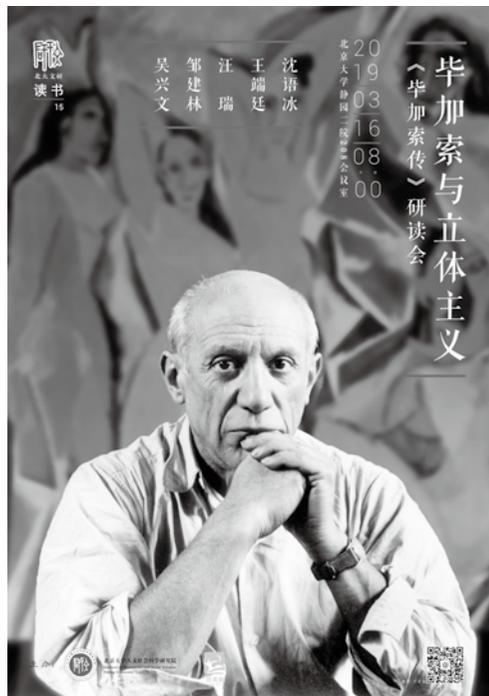
15

毕加索与立体主义——《毕加索传》研读会

2019年3月16日上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毕加索与立体主义——《毕加索传》研读会”。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志毅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沈语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瑞、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教授邹建林、启真馆第二策划部主任叶敏、台湾资深出版人吴兴文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会议的研读文本为英国著名传记作家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所著的《毕加索传》。启真馆第二策划部主任叶敏简要介绍了作者与该书的翻译出版情况。编写《毕加索传》是理查德森毕生最重要的工作——他为此贡献了大半生的时光。而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也与毕加索本人、亲属及其工作室工作伙伴有着密切互动，可被视作“最了解毕加索的人”。纪念理查德森，研读《毕加索传》，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王端廷研究员首先对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做出解读。从专业角度来看，“立体主义”（Cubism）被译为“立方体主义”



更为确切，即力图将自然界的人、物几何形体化，在一个平面上呈现上下、左右、前后六个面的空间态。立体主义是对传统焦点透视绘画的彻底颠覆，经历了从早期发展、分解、再至综合的演变过程，而毕加索可被视作立体主义代言人。谈及立体主义与非洲艺术、原始与现代艺术之联系时，王端廷研究员进一步分析道，“非洲

艺术产生立体主义”、“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的”等论点放之于艺术史具有一定的史学含义。西方历史按照螺旋形轨迹发展，在毕加索所处的时代，侧重于关注人与自然，使得不同时期的艺术有了沟通的可能。但立方体主义并非原始艺术的翻版。没有非洲艺术，立方体主义艺术依然会生存发展。二者相遇实为巧合，恰是在立方体主义产生之际，非洲文化的价值才被呈现。立方体主义代表人类的不同生命状态，原始艺术是人类童年的艺术，但艺术不会完全回到童年，而是带着对童年的回忆迎向艺术的未来。

有关具体文本，汪瑞副研究员分享翻译《毕加索传》一书的心得体会，并主要以雕塑为眼分享系列作品，呈现毕加索作为雕塑家的种种。1917年至1932年是毕加索多种艺术风格集中爆发的时期，正如他本人所言，“雕塑是一个画家能为绘画做出的最佳注解”。这一时期的毕加索既在平面绘画中尽力表现雕塑感，亦在雕塑中对安格尔等人的风格有所吸收，探索抽象雕塑与面具雕塑等新面向。通过作品的分析与比较，汪瑞研究员解释认为，毕加索在这一时期与诸位艺术家互动密切、深受影响，并在雕塑风格、材质等层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其成就并非一本书可以写尽。而由毕加索审视现代与古典之联系，现代艺术必须借着凌驾古典艺术，迫使古典主义为现代艺术开放，方能完成它的使命。

沈语冰教授聚焦毕加索后立体派作品的原创性，具体解读立体派相较于西方绘画传统的联系与突破。毕加索后立体派突出特点在于轮廓更加清晰，在保留原创新

破性的同时维系着与西方传统绘画的关联。沈语冰教授进一步指出，文艺复兴以来，画家在平面上全方位呈现人物形象，运用了连续的正反面与侧面、镜中形象、反弹的观众视野以及蛇行人物这四种手段，呈现出相较以往的独特性与原创性。

吴兴文老师跳出绘画、雕塑的视角另辟蹊径，以版画、藏书票和插图本分析，梳理毕加索的伟大之处。他认为，“创意是通过原创的感受呈现出来的”，创意的钥匙，将诸多经验合成，将零散的想法联结映之于物。毕加索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作了诸多版画，而不同时期的作品各有其特点，他强调，版画是毕加索诸多成就中被忽视的一环，通过研究其版画，我们同样可以收获良多。

邹建林教授以毕加索作品中的窥视母题为切口，兼谈毕加索著名作品《亚维农少女》的图像渊源，解读分析在神话衰落之后，裸体画的存在理由与意义。结合具体作品，邹建林教授认为，毕加索的女性裸体有双重含义，一是男性观看和欲望的对象，二是美和艺术的化身。在神话衰落的背景下，艺术家需要向“现代生活”寻找裸体女性的出场理由，由此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裸体画（妓女、浴女、女模特）。在瓦尔堡的意义上，她们都属于古典女神形象的“子遗”。毕加索作品中的窥视母题，可谓对现代目光的反思，涉及到观看的伦理问题——既要满足观看的欲望，又不可冒犯道德禁忌。

（撰稿：章涵青）

16

钱锁桥：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传》研读会

2019年4月13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传》研读会”。《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9年1月）作者、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作引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凤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毛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刘文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李珊出席并参与讨论。

林语堂先生是近代历史上与鲁迅、胡适齐名的著名文学家，有多年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他的精神遗产横贯中西，对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也为跨文化交际与互动带来崭新的理解。

本次研读会的文本为钱锁桥教授所著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钱锁桥教授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98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96年获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钱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性、中西跨文化研究等。《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笔路延绵，涉猎广泛，根据林语堂先生的生平追溯其思想轨迹。作者向人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是作为批

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角色的林语堂。

首先，钱锁桥教授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思路。作者1980年代沉迷于西方理论、译介福柯等人的著作，对身份认同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西方哲学家对“我是谁”的问题都是在西方语境内进行拷问并回答的，东方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并未得到恰当的阐释。随着在美阅历的增加，钱锁桥教授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需要得到拷问与回答。后来，作者在1980年代偶然读到林语堂先生的《中国人》一书，发现林先生也在书中探讨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便对其展开研究。林语堂先生有多年美国生活的经历，中英文作品皆具，在跨文化领域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林语堂先生在“中国文化的重生”问题上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比如，如何使中国文化得到重生以及如何得到重生等。这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构造具有深远影响，也是这本传记的研究目的所在。

接下来，毛亮教授发言。他认为《林语堂传》对林先生作了最完整的介绍。林语堂先生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强烈感知力的人，他能在西方价值观和中国本土价值观中找到交合和接驳点。比如，林语堂散文中倡导的“幽默、性灵、闲适”的观念，本质上与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兴起时，当时重要的文化人所构建的、新的市民生活的价值观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毛亮教授看来，林语堂先生最



《林语堂传》作者钱锁桥教授作引言

大的成就是他用中国人传统中国有的话语和观念，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引进来，把原本陌生的英美传统与价值观念融入中国的社会文化之中，并使其能够扎根和成长。林语堂先生所倡导的价值观，符合当时新兴的、现代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当然，在当时的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各种左和右的激进革命话语，而这也决定了林语堂先生在当时的局促处境。但是，林先生的著作在文化上让中国人得以容纳西方的文化和理念，他的作品也拓展了中国文字的表达能力。王风教授补充表示，钱锁桥教授和林语堂先生有相似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经历，这为其研究林语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作者为此书的写作投入了巨大精力，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能够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林语堂先生的思想。钱锁桥教授回应道，林语堂先生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强大的文化感知力和洞察力。在那个时代，他不仅让中国人了解了西方，也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语境里需要林语堂这样的人的。

牛可副教授认为，像《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这样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人物传记是非常少见的，并且指出本书最大的切入点是中国人的“他我之辨”。在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下，林语堂先生是一个重要且有意思的人。“我是谁 / 我们是谁”这样的自我认同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仍然被追问。牛可教授表示，林语堂所体现的跨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是逼迫我们在新的情境之下思考两个问题：一，我们由什么构成；二，在与他人的比照下，我们该如何认识自己。

牛可副教授指出，除了胡适的自由主义、鲁迅的激进文化批判之外，林语堂可以被看作是在中国成长并不充分的世界主义元素的代表。世界主义者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能够把其他国家的文化拿来充实自己。中国本土文化的力量过于强大，研究外国知识的最终目的经常也只是为了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换句话说，即通过讨论别人来服务自己。林语堂先生所承袭的世界主义精神是美国对外研究的文化基础；但是在中国，对外研究却往往有较重的民族主义色彩。牛可教授还表示，虽然林语堂先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从他的作品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强大的中国情感，特别是从其后来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充分的世界主义者。钱锁桥教授对此作出回应，他表示林语堂先生确实是中国世界主义的先驱，不过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西方语境中是对立的，但在中国语境下却可以共存，中国现代知识思想的冲突是看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 世界主义还是非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 世界主义。

刘文楠副研究员就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之间存在张力，而林语堂先生处在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他想重现文化中国，同时却不断地被政治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所束缚。他希望他用现代语汇构建起来的文化中国，可以赋予中国新的意义，使其在现代民族国家之林中重新站立起来，但是确实也无法摆脱政治中国的局限性。他晚年回到台湾，也是希望能够为文化中国的重生找到立足之处。钱锁桥教授作出回应，他认为林语堂先生对文化的判断是基于政治的，不存在文化与政治的分割。如果政治重生，文化也能重生。

接下来，张丽华副教授发言。就“跨文化”问题而言，钱锁桥教授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例，即如何摆脱单一语言和民族国家的界限，为我们呈现和解析以林语堂为代表的民国知识人在古今中西之间进行的文化旅程。张丽华副教授表示，本书最大的贡献是钱锁桥教授对林语堂与赛珍珠、华尔希关系的钩稽以及对其英文著作在美国策划、制作、出版情形的描绘。林语堂的英文著作，中文学界也有不少研究，但这些研究仍然是从传统的作家作品的研究思路出发，即将这些文本视为林语堂个人的作品或著作。钱锁桥教授利用庄台公司留下的林语堂和华尔希、赛珍珠的来往通信，为我们还原了这些英文著作是如何在华、赛二人的策划下共同制作出来的。钱锁桥教授对这一历史图景的再现，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文学史、思想史上的林语堂的认知，也向我们提供了社会史、出版史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视角。

林语堂的跨文化书写，可以上溯到陈季同和辜鸿铭。19世纪下半叶，陈季同在法国的情形，与林语堂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的情形颇具可比性。他们分别担当起向法国人、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使命，并且都不约而同地翻译和改写了唐传奇。林语堂有一部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是对二十篇中国传奇、志怪小说的翻译和改写。陈季同也有一部改写自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小说《黄衫客传奇》在法国出版。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曾高度评价该书，认为《黄衫客传奇》应该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然而像陈季同这样的跨文化写作，很难在我们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文学史叙述中得到准确和恰当的定位与评价。这不是陈季同的问题，而恰恰是我们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需要反思。对此，张丽华副教授指出，《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是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界限和方法的一个有效契机。

相比于林语堂的政治批评、文化批评，他对于语言文字“科学化”的执迷是最打动张丽华副教授的地方。林语堂是语言学博士，他在莱比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音韵学》；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编撰了英文教科书《开明英语读本》；在1940年代，林语堂为探索和发明“明快”打字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致力于《当代汉英词典》的编撰。张丽华副教授表示，林语堂将汉语语言文字系统化、科学化以及融入世界的冲动和努力，可以说是以科学为津梁来“跨越间隔”。林语堂沟通中西文化的愿景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在其语

言文字“科学化”的努力中得到了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体现。

接下来，李珊助理研究员就中国人的英文书写进行讨论。李珊助理研究员表示，钱锁桥教授的这部著作让我们对于林语堂的生命历程有了更多的认知，尤其是对于他在美国期间的经历，以往学术界了解得还比较少。她非常赞同钱锁桥教授对于林语堂在抗战期间创作的英文小说的定位，就像钱教授所说的，尽管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地位得到提升，西方的普通民众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且遥远的国度，对中国最大的印象依旧停留在饥饿和贫困的认知上。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著作打破了当时西方人的固有认知，向西方人展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与鲜活的中华儿女形象，进而呼吁英美切实地支持中国抗战。李珊指出，读钱教授的著作，让她想到，近代很多中国人的英文著作里面有一个共性现象，即他们都试图向西方展现中国的进步，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他们的对话对象有关，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以后，许多被称为“死硬派”的外国在华记者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歪曲为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煽动的结果，呼吁列强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在这一点上，林语堂和他的批评对象汤良礼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诠释中国，向西方解释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李珊认为，这也是我们理解林语堂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具有的民族主义面相时需要考虑的，并且这与近代中国和西方始终处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之下这一事实密切相关。另外，李珊也谈到了林语堂在英文著作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学术接榫的努

力，他试图将中国的传统学问纳入西方科学知识的框架之下，1930年代陈衡哲、江亢虎等人都曾经撰写过这样的英文著作，而通过钱教授的研究，我们看到林语堂也非常有这样的意识。钱锁桥教授对以上评论作出补充，他表示，要研究民族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首先要清楚是哪一种民族主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最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徐兆正以青年人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徐兆正认为，林语堂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普世主义者。作为自由主义者，林语堂先生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最后落得两边不讨好的境地。作为民族主义者，林语堂先生并不像胡适和鲁迅那样，对传统文明进行激烈批判，反而对再造文明有着同情和理解，他的内心怀着再造中国文明的义务感，充分肯定了在中国文明中融入现代性元素的做法。作为普世主义者，他将目光转移到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中，然而他逐渐发现自己缺少一种话语资源，这可能也是林语堂先生晚年重新转向基督教的原因。

提问环节，听众踊跃提问，会场气氛热烈，钱锁桥教授和与谈老师就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交流，加深了参会人员对于林语堂先生及其思想的理解。

（撰稿：希琳）

17

万志英：经济史的写法——《剑桥中国经济史》研读会

2019年4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经济史的写法——《剑桥中国经济史》研读会”。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万志英

（Richard von Glahn）作引言，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主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出席并参与讨论。

中国经济史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热点，该领域的成果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俯拾皆是，然而既具可读性又不失学术品味的著作并不多见。万志英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一书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和写作体例的全新探索和尝试。该书叙事视野宏大，横跨自青铜时代至20世纪初近3000年的历史，融合了作者本人在中国经济史领域长期深耕的经验和成果，因此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万志英教授首先对本书的写作动机



万志英教授作引言

和主要观点作以介绍。他指出，目前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偏见和空白。第一是西方学界对中国经济史本身的忽视。西方学者虽然对中国政治制度、法律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经济史的贡献并不显著，甚至没有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综合研究。近年来的许多量化历史研究，往往基于中国文献中支离破碎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欧洲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缺乏基本常识和理念框架，因而也无法评估所用量化资料的质量。第二是断代史研究方法的缺陷。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趋向与朝代更迭、政治历史的转变并不完全匹配。因此，利用断代史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就存在偏差。与此同时，断代史学者

很自然地对自己所研究的时期有所偏重，认为这一时期必定出现了经济革新和商业繁荣，进而造成了结论的局限性。要研究中国经济演变的真正内涵，必须打破朝代史的束缚，根据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加以判断。第三是对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不足。西方经济通史往往过分强调近代和现代的经济发展，而仅用很少的篇幅介绍古代史，也即“现时偏见”（Present Bias）。本书力图从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弥补上述缺憾。

万志英教授着重明晰了加州学派在中国经济史和国民经济学中的意义。自彭慕兰《大分流》一书问世后，学界就基于中西比较的视野，在全球经济史领域展开激烈辩论，也因此促成了很多新研究的诞生。对此，万志英教授指出，加州学派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提出某一种具体的历史解释（如彭慕兰的“大分流”观点），而在于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加州学派的基本原则是，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规律同历史的时间资料结合起来，承认经济

学理论的局限性，也尊重历史的鲜活性，从中发现新的视角和结论。

万志英教授的介绍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广泛共鸣。刘志伟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剑桥中国经济史》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启发很大。首先，该书是一部真正“打通”了通史脉络的著作。以往有关经济史的研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经常从近现代的经济向前追溯，却很少关心中国经济的基本原理和长期发展规律。而该书在前三章着墨甚多，重点讲述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勾勒出了中国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的基本逻辑，有助于读者对中国经济史产生基础性、结构性的思考。其次，该书着重强调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史发展的影响。例如，在第七章“江南经济的全盛期”中，作者从财政政策入手论述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尝试；第八章“市场经济的成熟”也谈到了诸多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的问题，而非就经济谈经济，对于经济史领域研究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此外，万志英教授还擅长以小见大，借助具体的历史案例讲述宏观经济的面貌。这一写法也是难能可贵的。

刘志伟教授对《剑桥中国经济史》一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本书在讲述明代经济史的过程中，漏掉了明代正统至正德年间的百年历史，而这恰恰是一个打通明代经济史脉络的关键时期。明代经历了从“洪武体制”到嘉靖年间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深刻转变，但

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要么习惯性地从近代历史向前追溯，要么着眼于南宋至明代的经济逆转，都忽视了这一百年的历史。这是不足取的。此外，作者虽然明确表示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推动力这一观点，但在讨论明清经济史的过程中，仍不自觉地将市场作为主要动力，这似乎是明清经济史学者不可摆脱的一大“惯性”。

接着，魏明孔研究员发言。他认为，当前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的著作并不少见，但以300多页的篇幅写成一本中国经济通史，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其中蕴含着作者高屋建瓴的学术框架和扎实的学术底蕴。正如李伯重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延续，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必须回看过去，从历史中发现今天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根源。”因此，本书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问世，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与已有的经济通史著作迥乎不同的是，本书采用了专题式的写法重构中国经济史。全书分为九章，每章的题目都是对于所述时代特征的高度概括，读者仅看题目即可描绘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脉络与核心，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此外，在每章的写作中，作者还根据研究需要，采用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等多种研究方法，展现出吴承明“史无定法”的方法论特征。作者还将欧洲经济史研究的

观点和案例与中国经济史的论述巧妙结合起来，令读者耳目一新。魏明孔研究员还就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起点、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路线等具体问题与万志英教授进行了商榷。

何平教授则就《剑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主题和方法进行了讨论。目前有关中国经济史的汉语文本已经非常丰富，那么如何对这本西方学者的著作给予客观公正的定位？何平教授认为，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对已有史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即一方面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的过分强调，另一方面也突破了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方法，还创造性地引入了熊彼特式创新的解读视角，使得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更为丰满而多元化。

在何平教授看来，西方学者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往往在本科期间就接受了全面的通识教育，这对其在后续专门领域的研究大有裨益。而这又恰恰是国内学者的欠缺之处。例如，在研究17世纪白银问题时，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白银短缺引发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进而导致了明代的灭亡。何平教授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这是将现代经济观点粗糙地套用到了历史上，以为货币可以引导经济的走向。事实上，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双轨制货币体制，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与市场、与白银货币并不发生关联，因而以通货紧缩解释明代灭亡未免牵强附会。这说明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对中国历史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了解。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在研究货币、金融等专业问题时也不免受到知



李伯重教授主持

识结构的限制。由此不难看出，通识性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格外重要。

随后，周建波教授发言。他指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中国学者的史料丰富，侧重于对史料本身来龙去脉的分析；而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性、概括性强，侧重于用很短的篇幅讲述宏大的历史场景和深刻的结论。万志英教授的著作看似引证史料并不丰富，实际上是从大量文献中抽象出极为精辟的论述，给中国学者以很大启发。

周建波教授还结合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兴趣，与万志英教授就本书第四、五章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本书批评了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观点，即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促成了豪强与依附民之间的相互扶持。周建波教授认为，谷川道雄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社会愈是动荡，人们的危机感就愈强，也就更加需要关心、帮助别人，由此形成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也有所反映。其次，本书认为在隋朝时，均田制在南方并没有广泛展开。则其实不然，均田制至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这是因为，均田制是一个实行了三百余年的大型土地改革，与屯田制仅仅着眼于荒地和流民不同，均田制将现有土地也纳入到管理体系之中，这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在隋唐国家力量日益壮大的背景下，均田制理应得到了大范围推广。再次，在本书第四章“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中，作

者重点描绘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状况，即“贵族庄园经济”；而周建波教授认为，无论是王室庄园、贵族庄园、寺院庄园，其管理原则和运营方式都是一致的，即人身依附关系强、自然经济色彩浓。因此应将这些经济形式统一于“庄园经济”概念之下，不应割裂开来。

颜色副教授也发表了对《剑桥中国经济史》一书的想法和思考。经济史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宏观来看，包括人口、资源、生产力等；从中观来看，包括农业、工业、贸易等；此外还有很多微观和具象的主体。如此庞大的研究范畴，本身就给学者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万志英教授的这本新作进一步延拓了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即不仅关注于财政、货币、土地这三个热点领域，而将更多的因素考虑进来；其中关于生产率、市场经济等问题的探讨，涉及了近年来学界的许多前沿研究，具有极强的学术创新性和开拓性。

颜色副教授也对本书的后续更新和补充提出了建议。第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应当具备较强的问题导向，这其中既包括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等大问题，也包括许多具象的小问题。倘若能够在书中的每个阶段、每个专题中介绍与之相关的问题或讨论，那么在叙事逻辑上将更为浑然一体。第二，本书对于明清时期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介绍较多，而对此前历史时期的联系则着墨较少。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尝试从青铜时代开始，简要勾勒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人口、可耕地面积、经济规模



等进行估测和衡量。第三，本书虽然涉及了与经济生活相关的制度因素，但主要关注正式制度，缺乏对非正式制度的描述，而后者对于明清经济转型具有关键性影响。第四，本书将1900年作为历史叙事的终点，但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等事件与20世纪的近代化、工业化紧密相连。因此，以1900年结尾似有不合理之处，选取19世纪中期作为结尾可能更为适当。

与会嘉宾逐一发言后，万志英教授还与在场师生就重商主义的内涵、明清时期的非正式制度、货币在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指出，《剑桥中国经济史》的出版并不代表这一领域通史研究的结束，而恰恰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希望后继学

者能够从此书中获得有关中国经济史的有益启示，并完成更多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最后，李伯重教授总结发言。他提出，现有的经济史著作，要么是专业写作，内容力求精深，只有同行能产生共鸣；要么是教学写作，内容力求面面俱到，提供给学生全面的知识体系，但可读性并不强。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就在于其内容不仅能够获得史学界同行的关注，也引起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高度热忱。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必须兼顾论述的学术底蕴和可读性。万志英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一书正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并将带给中国学术界更多、更新的思考和启发。

(撰稿：毕悦)



（六）文研纪念

05

陈梦家先生纪念座谈会

陈梦家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驰骋于文史两界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尤其在甲骨文、青铜器、汉简、明清家具等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垂范今世，推为重镇。新世纪以来，中华书局已出版先生著作多种，影响广远，意义重深。2019 年 4 月 14 日，“陈梦家先生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本次活动是“北大文研纪念”第五期，由文研院、中华书局联合举办。

上半场

上半场由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做引言，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陈梦家先生亲属赵晖、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徐汝聪、湖州博物馆副馆长刘荣华、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夏含夷、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潘思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先后发言。

座谈会伊始，顾青简要介绍了陈梦家著作出版的情况。2004 年，中华书局出版《西周铜器断代》，同年确立陈梦家著作集的出版计划，之后陆续将《殷墟卜辞综述》纳入著作集出版。2006 年，书局出版《中国文



字学》《梦甲室存文》《梦家诗集》作为陈梦家先生诞辰 95 周年纪念。十年后正式整理出版《陈梦家学术论文集》作为陈梦家先生诞辰 105 周年献礼。2017 年则出版《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二辑。

在陈梦家先生诞辰 108 周年之际，《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定补本）》全三册、《中国铜器综述》、《中国铜器综述》英文

稿全部影印出版。《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定补本）》补充了两篇作者的自序和 845 件铜器图像，通过对原照片和拓片的扫描，额外增补了 40 张照片和器皿序号。《中国铜器综述》据英文稿本进行翻译，对原著中的讹误进行订正，并对相关的参考文献和资料进行了复核。《中国铜器综述》英文稿保留了作者创作之初的原貌。顾青表示，陈梦家诗文补编正在编校过程中，《北欧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加拿大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两部书稿正在整理，陈梦家先生编年诗集正在进行编阅，预计明年出版。

接着，王世民研究员回忆了作为学生与陈梦家交往的细节。青年时期的陈梦家见多识广，观察敏锐，对后辈关怀备至。1957 年，王世民成为陈梦家的学生和研究执行员，协助他进行青铜器研究。1979 年，王世民在夏鼐的主导下开始着手整理陈梦家的学术著作并在 20 年后终于出版。王世民认为，陈梦家在研究甲骨文、铜器、汉代简牍以及其他方面都融会贯通，自成体系，取得了高水平的学术成就，其论著旁征博引，逻辑严密，往往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由此及彼，逐步深入扩大研究范围。在研究方法上，陈梦家接受现代考古学理念，根据资料进行文史类型学分析，注重多方面的关联和对比，力求对相关资料进行彻底清理，因而为青铜器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王世民指出，当代年轻学者应当发扬陈梦家先生勤奋的治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随后，孙庆伟教授谈到阅读陈梦家著作对自己的影响和启发。孙庆伟提出，一方面，陈梦家学术研究的鲜明特点在于其系统性，《西周铜器断代》迄今仍是研究甲骨文和西

周铜器的必读经典。另一方面，陈梦家学术研究的倾向性体现了“学有天性”的特点。正因其治学方法与传统的古器物研究完全不同，陈梦家成为器物研究从传统到现代方向上升的开拓者，也启发后辈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时从个人特点出发。陈梦家的“学有天性”值得当代学人深思，他的勤奋、方法、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今天学者应当学习的治学精神。

接着，陈梦家夫人赵萝蕤侄女赵晖回忆了和陈梦家夫妇相处的往事。1937 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陈梦家教书，赵萝蕤管家务，先后和闻一多、梁思成是邻居。1944 年，费正清和金岳霖为陈梦家联系到去芝加哥求学，陈梦家在此期间跑遍美国的大小博物馆拍摄青铜器照片。赵晖记忆中的姑父陈梦家为人温和儒雅，总是沉浸在学问中。陈梦家在古文字学、考古学、甲骨文、青铜器等领域均颇有建树，但在赵晖心目中，陈梦家的诗歌给她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正如赵萝蕤所说，“梦家用感情写诗，纯然的感情流露，品读他的诗，一如他的人。”赵晖饱含深情地朗诵了陈梦家的诗歌《燕子》和《一朵野花》，以表对姑父的怀念。

除了在考古学方面的成果，陈梦家在古典家具学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更是一名优秀的收藏家。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徐汝聪随后展示了入藏上海博物馆的陈梦家收藏的明式家具。家具收藏是学问与研究之外融入陈梦家生活的一部分，学术研究对陈梦家的影响也在其收藏作品中融会贯通。徐汝聪围绕三个关键词，介绍了明式家具的特点及陈梦家在其中的地位。第一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德国国立建筑学院（包豪斯学院）的

设计理念对欧美世界的设计理念影响巨大，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一部分工艺美术学院。包豪斯强调现代设计教育必须结合艺术与技术，打破艺术家、工匠与工业之间的界线，这一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国当代艺术设计。第二是德国人与古董店的关系，西方抽象艺术理论奠基人古斯塔夫·艾克是第一个到中国研究花梨家具的外国学者，花梨家具则是当时与包豪斯理论最为呼应的中国艺术制作。1944年，杨耀先生与艾克合作完成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是明式家具研究史上的重要材料，也是第一次提出“明式家具”的概念。1984年8月，陈增弼教授结集出版了《明式家具研究》，这是中国学者关于明式家具研究的第一部学术性专著。第三个关键词是古典家具的收藏者，陈梦家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徐汝聪认为，在收藏领域，陈梦家的藏品在质和量上是古典家具个人收藏品中最优秀的。陈梦家在收藏中带有独特的研究、品味和情趣。作为一位考古学家，他的收藏是广泛和有灵感的；作为文物学家，他的收藏又是科学和标准的；作为诗人，他的收藏是漂亮而富有诗意的。

随后，刘荣华副馆长介绍了陈梦家家具的收藏流传、家具地位和陈梦家传统艺术的中庸论。陈梦家的家具收藏开始于1947—1949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已经收集了一批精美的明式家具。1966年，陈梦家的家具收藏递藏于其夫人赵萝蕤，1998年交付至赵萝蕤之弟赵景心。2000年，26件藏品入藏上海博物馆，2013年，赵景心将17套23件陈梦家家具捐赠至湖州博物馆。陈梦家是最早认识和欣赏到明式家具所具有的

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人，有“现代收藏研究明式家具第一人”之称。湖州博物馆馆藏的陈梦家家具中，有国家一级文物4套5件、二级文物7套10件、三级文物6套8件，弥足珍贵，堪称浙江省内博物馆最具份量的文物捐赠之一。另一方面，陈梦家的家具收藏也体现了其传统艺术的中庸思想。在学术论述中，陈梦家提出一切事物之表现都要有节度，以求得“中和”之结果，其家具藏品同样体现了从容平和、简约玄淡的意味，令观者在闲适、雅静的氛围中，得到乐赏和怡情，反映了陈梦家所欣赏的中和、中庸的审美论。

夏含夷教授则回归学术领域，介绍了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的学术研究情况，展示了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发表的四篇文章及芝加哥博物馆的同期图录。同时，为了纪念陈梦家造访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75周年并庆祝《陈梦家著作集》出版，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宣布4月14日为“陈梦家日”。夏含夷指出，在西方主流学界看来，陈梦家的学术贡献甚至高于唐兰。而夏含夷本人在学习中文学术写作的过程中，也将陈梦家的研究论文当做写作范本学习和模仿，陈梦家学术作品的典范性毋庸置疑。

潘思婷研究员进一步介绍了陈梦家在美国期间的学术活动。潘思婷提出，陈梦家于1944年12月至1947年9月在美国写作了《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接触了一百余位相关人员以丰富和完善相关资料。1945年，陈梦家到达芝加哥大学，计划进行为期九个月的教学活动和个人研究。陈梦家的美国之行是太平洋两岸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费正清、梅贻琦、

金岳霖等人的努力下，陈梦家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前往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陈梦家积极授课，并参与在职教授的讨论，进行中国艺术研究，翻译了一些中国青铜器的铭文并进行注释。在此期间，陈梦家结识了许多美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他从不同学科视角看待自己的研究课题提供很大帮助。陈梦家与艺术史学家巴赫霍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者也影响了他从艺术风格的角度进行的青铜器研究。

除了广泛参观博物馆，陈梦家还结识了卢芹斋，后者成为他收集青铜器资料最得力的助手。卢芹斋为陈梦家提供了一批活跃在美国的艺术家和收藏家名单，并协助他拍摄了青铜器的照片和拓片，提供了数百张青铜器照片。陈梦家于1945年至1946年期间在美国进行了三次收集青铜器资料的旅行，回国前仍从芝加哥前往欧洲继续造访各大艺术博物馆和知名收藏家。在此之后，陈梦家前去夏威夷和洛杉矶，这一阶段收集的材料在其英文手稿中没有体现而在中文著作中进行了补充，体现了陈梦家著作的不断完善与丰富。

最后，朱凤瀚教授谈到陈梦家学术格局的启示意义。朱凤瀚强调，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等著作涉及不同的时代和学术领域，但每部著作都有一个各自的研究体系和系统的研究格局。在研究某一个领域的具体学术问题时，陈梦家能够对问题牵涉到的历史背景、所涉及到的学科理论和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做整体思维，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体系性的研究架构。朱凤瀚认为，《中国铜器综述》的分章架构已

经明显体现出与同一领域学者的不同，在记录铭文之外把视野扩展到考古发掘与地域分布，从而把中国青铜器研究更深刻地纳入了考古学研究范围中。朱凤瀚提到，陈梦家学术格局集中体现在《西周铜器断代》中。一方面，本书建立了系统的研究架构，以铭文内容为线索，将铜器和铭文串联，抽取铭文反映的若干经济政治制度进行专题考察；另一方面，能够启发读者提高眼界，解决尚未攻克的问题，进而引领学科发展。陈梦家的系统性的学术格局远超同时期的学界同仁，也对当代学术研究具有启示意义，更提醒中国研究者们对中国青铜器包括其他类文物的研究中要开拓视野，具有国际眼光。

下半场

座谈会下半场由孙庆伟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北京燕山出版社原总编辑赵珩先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零，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夏含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睿、研究员雷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苏晓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田天，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员曹菁菁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益飞，中华书局编辑李碧玉参与讨论。

座谈会开始，苏荣誉研究员以“陈梦家先生中国青铜器的技术观”为题发表了看法。首先，苏荣誉研究员介绍了陈梦家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研究领域的研究。他指出，《中国



全体嘉宾合影

铜器概述》、《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Style of Chinese Bronzes*)、《殷代铜器》、《西周青铜器断代》、《寿县蔡侯墓铜器》等是陈梦家先生在青铜器研究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接着,苏荣誉研究员讨论了陈梦家先生研究青铜器的重要参照。他认为,叶慈(Walter Percival Yetts)、高本汉(Bernhard J. Karlgren)、郭沫若、梅原末治、郭宝均、容庚、李济、唐兰、罗越(Max Loehr)等学者都对陈梦家先生的青铜器研究有所启发。其中,郭沫若先生对于陈梦家先生的影响最大,影响了陈梦家先生研究的整体格局和追求。随后,苏荣誉研究员介绍了陈梦家先生的中国青铜技术知识溯源。一般来说,金石学家不在意青铜技术,而艺术史与考古学家关注青铜技术。陈梦家先生的青铜技术知识主要来自阅读,主要包括叶慈、近重澄真、道野鹤松、梅原末治、小松茂、郭宝均、王献唐等人的著作。

紧接着,苏荣誉研究员讨论了陈梦家先

生的中国青铜器技术观。1954年,在《殷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及其铸造》一文中,陈梦家先生第一次提出《考工记·六齐》是非常理想化的工作,价值有限。此外,在这篇文章中,陈梦家先生讨论了小屯青铜遗址的铸造模范及其要求,以及失蜡法同模、器的关系。苏荣誉研究员认为,陈梦家先生对于青铜铸造的看法是准确和富有远见的。最后,苏荣誉研究员对陈梦家先生55岁盛年离世感到痛惜,表示若先生继续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研究必有更大突破,局面必早有改观。

王睿研究员就陈梦家先生研究方法的转变和陈梦家先生著作的翻译过程发表看法。王睿研究员认为,《中国铜器综述》一书中精华的部分是其中考古学、类型学的研究,其精妙程度可以和梅原末治的研究相提并列。但是,陈梦家先生却甚少提及这本书。王睿研究员推测,这可能是由于陈梦家先生认为青铜器研究并不适合采用类型学的

研究方法。王睿研究员表示,陈梦家先生回国后转变了研究方法,参考郭沫若先生的研究,将青铜器研究置于历史研究背景中,回到历史文化研究这条主路上来。但遗憾的是,陈梦家先生的生命太短暂,没有来得及来系统论述他的新研究思想。

此外,王睿研究员谈到了《中国铜器综述》一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她表示,翻译过程十分艰辛,历时十余年。翻译和编辑团队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增补了大量的地图、照片,多次校对、勘误。同时,为了更好地保存陈梦家先生的学术成果,此次不仅出版中译本,也将英文原版一并出版。王睿研究员希望用这项工作向陈梦家先生致敬,感谢他非凡的才华和禀赋。

接下来,杨泓研究员追溯了自己同陈梦家先生的交往经历。首先,他表达了对陈梦家先生文风的钦佩。不同于大多数的考古学家学术性较强的文风,陈梦家先生的文章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此外,杨泓研究员也拜读过陈梦家先生的诗歌,并感到很深的触动。随后,他追忆了自己同陈梦家先生从相识到熟识的经历。1958年,杨泓研究员到考古所编辑室工作,开始同陈梦家先生交往。1961-1965年这几年间,两人的接触较多,杨泓研究员常到陈梦家先生家做客。此外,两人在学术上也有一些往来——陈梦家先生关于汉简研究的文章均由杨泓研究员编辑,陈梦家先生需要借阅资料时也常请杨泓研究员帮忙;杨泓研究员的一些研究也受到陈梦家先生的影响,同陈梦家先生的交流帮助他拓宽了视野,打开了思路。最后,杨泓研究员表示,陈梦家先生的著作的整理出版意义非凡。陈梦家先生的学术思想在今天并不过

时,他的视野和方法尤其值得后辈学习。

赵珩总编辑也追忆了自己同陈梦家先生的结识的经历,分享了他对陈梦家先生为人的认识。据赵珩总编辑回忆,1957至1960年这三、四年时间里,他同陈梦家先生频繁接触,每月至少见面两三次,多的时候甚至每周见面。他表示,自己的父亲同陈梦家先生是忘年交,自己的家也成为陈梦家先生心情最阴暗和压抑的时期难得的放松身心的去处。

赵珩总编辑表示,陈先生有着广博、丰厚的文化修养和底蕴。陈梦家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成为诗坛的重要人物,不久后转向研究考古学。自此,中国诗坛上少了一位诗人,考古学界升起了一颗新星。赵珩总编辑刚认识陈梦家先生的时候才八九岁,但陈梦家先生十分尊重孩童的好奇心和兴趣,常指点幼年时期的赵珩总编辑画画,也带他看戏。陈梦家先生在戏剧方面兼容并蓄,不仅看京剧,也欣赏地方戏,写作了大量的戏曲评论文章,并曾经出资支持邯郸衢州的豫剧团。赵珩总编辑认为,陈梦家先生不仅在专业领域有很高的成就,也在戏曲、音乐、家具等方面有着广博的知识和兴趣,这种融会贯通的能力值得后辈学习。

接下来,董珊教授发言。在他看来,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算起,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在甲骨学史上,1956年出版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恰处于继往开来的中坚点,有无可取代的地位。

“据陈梦家所统计,在甲骨文发现的前五十年间,已发现甲骨文逾九万片,著录发表的约三分之一,各类研究论著近千种。已有的甲骨学成果有待整理,之后的研究方

向亟待指明，都需要学术史的总结。《综述》总结前人、当代学者以及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详细论及发现研究史、语言文字、分期断代、方国地理、政治宗教、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研究水平，又基本笼罩了之后甲骨学研究全部局面。至今仍是甲骨学入门与深入研究之必备书。”

“《综述》出版之后，已有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3期）和裘锡圭《评〈殷虚卜辞综述〉》（《文史》第三十五期，中华书局，1992年）两篇重要的书评，对《综述》的价值和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评价。在《综述》中，陈梦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的简评不可能全面，先举出两点来谈。”

“关于汉字类型的‘三书说’。《综述》指出象形、假借和形声是古汉字的三种基本类型。这种看法，是对唐兰的象形、象义、形声三书说的批评和发展。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肯定了陈梦家的看法，并发展为表意、假借和形声三书说。近年黄天树先生提出以有声字和无声字为汉字构造的两种基本类型的‘二书说’（《论汉字结构之新框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1期），也是继续发展了陈梦家的观点。所以，陈梦家三书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关于甲骨分类断代研究的贡献。目前甲骨学界，都遵循李学勤在1957年《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提出的分类和断代分为两步的断代方法。但追溯学术史，断代方法经历了复杂的研究和实践过程。1932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奠定了断代研究的基础，尤其是董作宾的‘贞人说’影响巨

大。但是董作宾似乎认为同一时代的甲骨文应该有同类的书法、文法和事类等，因此将甲骨分类和断代混为一谈。陈梦家《综述》虽然没有十分明确地指出分类和断代是两个步骤，但他认为不同字体的卜辞可以属于同一时代，所以他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分类和断代分为两步来做。可以说，陈梦家是首先将字体分类的重要性置于贞人之上的学者，他所创用的宾组、师组、子组、午组、出组、何组、黄组等类组名称，至今仍多为学界所沿用，他的多数断代结论也基本是可靠的。从董作宾到陈梦家，再到李学勤，以至于近年的黄天树的《殷虚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将考古类型学引入甲骨断代并取得主宰地位的过程。在此历程中，陈梦家首役获胜之功难以磨灭。”

“最重要的，是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作为整理出土文献学术范式的重大意义。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各人文学科普遍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要求学者传播有系统的科学知识。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出土文献资料，无异于一斛散珠。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能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是将出土文献学与西方社会学著作范式相结合的代表作。陈梦家在治出土文献方面极为广博，他尚着有《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体系完善，论述深入的通论性著作，大大提高了出土文献作为历史研究史料的价值。写作一部好的通论，需要作者有尽精微致广大的史才与气魄，比起细枝末节的发明创见不知困难多少倍。象陈梦家先生这样当时就罕见的通才学者，在学科分工愈加细密的今天，越发难得了。所以说，陈梦家的《殷虚卜辞

综述》尽管当时便存在一些问题，今天看有些知识又不免老化，但作为学术史上的著作范式，则是历久弥新，仍经得起新世纪的检验。”

韩巍副教授就陈梦家先生学术研究的大局观和研究方法发表看法。他认为，陈梦家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宽广，在重要的研究领域都有综合性的研究。此外，陈梦家先生善于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看法，并罗列该领域重要的研究问题，指出当下的研究水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晚辈后学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随后，韩巍副教授对陈梦家先生的研究方法发表看法。陈梦家先生的小学功底稍弱，有时会在论证的过程中出错，但是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对的。对此，韩巍副教授表示，这与陈梦家先生善于结合史料有很大的关系。陈梦家先生善于将材料放在历史背景下进行讨论，通过分析推测出字的大致意思。此外，陈梦家先生善于将各类材料分类整理，并进行类别和整合，条理清晰地进行论证说理。韩巍副教授认为，陈梦家先生在美国工作的经历对于他融会贯通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帮助。他表示，《中国铜器综述》一书正是陈梦家先生学术转型时期的著作，此书的翻译和出版对学界学习陈梦家先生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帮助。

雷勇研究员介绍了陈梦家先生和故宫的渊源。1956年至1957年，故宫博物院铜器专门委员会和文物修复委员会相继成立，陈梦家先生均任委员——这体现了先生和文物修复的渊源。此外，雷勇研究员认为，陈梦家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紫外光检查真假的方法是富有远见的。遗憾的是，这种

方法至今尚未在文物科学部门推广开来。2009–2010年，雷勇研究员赴芝加哥美术馆访问交流，接触到陈梦家先生在芝加哥美术馆的工作，十分钦佩。陈梦家先生在诗歌、家具收藏、文物保护、工艺方面的研究工作都给雷勇研究员带来许多触动。

曹菁菁女士介绍了陈梦家先生《海外中国铜器》书稿的发现过程和学术价值。首先，曹菁菁馆员介绍了意外发现书稿的经历。2007年，曹菁菁馆员和同事在国家图书馆整理库房时发现了300多张青铜器照片和一摞书稿，后证实为陈梦家先生编辑的《海外中国铜器》第二辑。接下来，曹菁菁馆员就陈梦家先生《海外中国铜器》书稿的学术史意义发表看法。她表示，陈梦家先生善于扬长避短，在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基础上，用西方的视角来看待青铜器的问题，并不拘泥于金石学的框架。以往的青铜器研究往往不讲青铜器本身，而只有照片、铭文、拓本等，而《海外中国铜器》书稿中则对中国青铜器进行了概述。曹菁菁馆员认为，这一体例是受到叶慈等西方学者的影响。最后，曹菁菁馆员表示，应当客观看待陈梦家先生学术研究上的不足。陈梦家先生有时在细节上不够严谨，会出现小的错误，因此在阅读陈梦家先生著作时，应当参考后续研究对相关论述的正确性进行考察。

田天副教授分享了她在翻译《中国铜器综述》一书过程的感想。在翻译过程中，田天副教授不断揣摩目录。目录涉及到青铜器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文字学、年代学均分别单列一章。田天副教授认为，该书的目录可以体现陈梦家先生对什么是中国铜器、如何研究中国青铜器的整体看法。田天副教授

还提到，她对历史背景一章印象尤为深刻，钦佩陈梦家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介绍历史背景的卓越才能。此外，田天副教授认为《汉简缀述》这本书的重要性可能被学术界低估了。陈梦家先生将汉简研究放到整个遗址当中去思考，考虑它们的物质形态，体现出他作为考古学家的专业素质。田天副教授表示，陈梦家先生的著作是能够跨越时代，跨越语言，跨越国别的，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我们应该认真严肃地对待陈梦家先生的著作。

苏晓威教授分享了他从陈梦家先生治学方法中得到的几点启示。第一，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需要有学术忠诚和情怀。陈梦家先生由姐姐抚养成人，一开始做学术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陈梦家先生依然十分用工刻苦，可见他对于学术的忠诚和情怀。第二，做学术需要有激情的想象力。陈梦家先生热爱文学和戏曲，这与他在学术研究中展现出的丰富的想象力不无关系。第三点，要有对学术重要性判断的能力。陈梦家先生不仅有很强的综合性研究能力，也善于把握重要的学术性问题。反观当下的学术界较为浮躁，许多人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而不关注论文本身是否具有学术意义，值得学者们反思。第四点，要有优秀的学术表达能力。陈梦家先生的文章简洁明快，条理清晰，值得学者们学习和借鉴。

接下来，陈均副教授分享了他对陈梦家先生写作诗歌和研究戏曲的两段经历的理解。陈均副教授认为，陈梦家先生在编辑新诗诗选之后成为新诗流派的第二代掌门人，而当陈梦家先生放弃诗歌写作而转向学术之后，新诗作为诗歌流派的影响力也逐渐衰落。

此外，陈梦家先生的新诗具有充满感情和讲究形式这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既体现在他对青铜器的认识中，也是他欣赏地方戏的原因。陈均副教授推测，陈梦家先生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看地方戏的。一方面，陈梦家先生第一篇关于戏曲的文章发表于1954年。另一方面，陈梦家先生对于地方戏的关注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50年代初，国家提倡地方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在此背景下，川剧和豫剧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也成为陈梦家先生最喜爱的地方戏。陈梦家先生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简朴、论人情的文章，提出包括传统艺术、公共艺术在内的中国艺术应当具有这些特点。陈梦家先生也用简朴、人情来阐释青铜器和地方戏，体现出他总体的艺术观。

李碧玉编辑介绍了她在编辑《中国铜器综述》过程中的感想。李碧玉编辑在参加工作之初接手了《陈梦家学术论文集》一书的编辑工作，用古籍整理的方法完成了包括陈梦家先生遗稿在内的论文集编辑。此次编辑《中国铜器综述》，李碧玉编辑同王睿、曹菁菁、田天三位译者往还稿件多次，不断增补内容，核对引文准确性，使书稿更加充实、完善。此外，本书中增加了多条译者按语，在陈梦家先生原文有明显讹误的地方，改正原文，并在按语中说明原文和修正依据；在怀疑陈梦家先生有错误但不能确定的地方，保留原文，并在按语中说明此处可能有错，以及相关依据。此外，为了使得本书更符合陈梦家先生所定的体例，也为方便读者阅读，所有的拓本都和照片及文字描述放在一起，并将尽可能多的拓本恢复至原来的大小。

夏含夷教授就陈梦家先生在芝加哥期

间发表的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夏含夷教授谈到，在《中国铜器的风格》（*Style of Chinese Bronzes*）一文中，陈梦家先生除了点的风格以外还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周代（特别是西周早期）谥号是生称还是庙号，以及《竹书纪年》与周代年代问题。他认为，陈梦家先生关于成王鼎、“康宫”问题以及周代年代的论述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此外，陈梦家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还完成了《周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Chou*）、《白金汉收藏的中国铜器》（*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Malcolm氏所藏康侯簋及其相关铜器》（*Malcolm's K'ang Hou Kuei and Its Set*）等学术研究。

接下来，夏含夷教授介绍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于陈梦家先生上述文章的评价。戴思维（J. LeRoy Davidson）在评价《中国铜器的风格》一文时认为，陈梦家先生采用的“商代—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春秋—战国”断代方法虽然遵守中国政治历史，但是与艺术阶段不一致。罗榭（Max Loehr）在评价《白金汉收藏的中国铜器》时表示，在一些地方，陈梦家先生的解释过于简单，应该多考虑相关问题和材料。夏含夷教授表示，他十分佩服陈梦家先生，将他视为典范。陈梦家先生的研究虽偶有错误，但往往可以提供新的视角。学者们应该客观地认识陈梦家先生的学术作品的价值及其不足。

最后，李零教授作总结发言。李零教授感叹“余生也晚”，想见陈梦家先生其人而不得，只能通过阅读陈梦家先生的著作来缅怀其人。李零教授认为，陈梦家先生作为古文字研究的第三代学者，做出了十分杰出的学术贡献。陈梦家先生在治学方面具有博通

的特点，从甲骨到汉简，所有古文字的门类几乎都有所涉及，并且在每一个方面都有非常有体系的研究。李零教授认为，陈梦家先生由诗人到学者的转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表示，诗人需要许多可贵的品质，比如真诚的热爱和兴趣，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在我国的老一代古文字学家中，郭沫若先生原本是文学家，王国维先生最先也对文学感兴趣。类似的，陈梦家先生也是从文学转向考古学。他作为诗人的想象力对于他的考古研究很有帮助，他的热爱也驱动着他不辞辛劳地进行研究，将考古视为生命、生活中的一部分。

李零教授还谈到如何认识陈梦家先生学术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他表示，后人给陈梦家先生的著作找错无伤大雅，可以促进学术不断进步。陈梦家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时往往饱含热情，突然对某一个题目感兴趣时便说干就干，说学就学，集中地阅读相关材料，十分投入。但陈梦家先生并不是做事十步九回头的人，不会反复地检讨自己是否在论证中犯了错误。换句话说，陈梦家先生并不追求完美，在研究中难免会犯一些错误。李零教授表示，陈梦家先生的治学的精神，尤其是他像热爱诗歌一样热爱学术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习。李零先生感慨，陈梦家先生和王国维先生命运相似，二人都热爱文学，均在五十多岁时离世，让人不胜惋惜。

至此，本次纪念会圆满落幕。

（撰稿：刘诗予、魏玉槐）



（七）菊生学术论坛

13

考古发现与历史记忆——秦汉祠畤的再认识

2019年3月23日至24日，由商务印书馆、文研院合办的“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论坛的议题为“考古发现与历史记忆——秦汉祠畤的再认识”，来自国内外二十余名学者参与讨论。

第一场

23日上午，第一场论坛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王芬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开宗明义阐明了此次会议的宗旨：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在于“因革损益”四个字，研究祭祀，也即是从“因”字入手——古人主要依靠祭祀来传递历史记忆。秦汉祠畤分东西二系，《史记》《汉书》说的封禅主要指山东境内封禅泰山、祭祀八主（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的活动；郊祀主要指在陕西、山西境内围绕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的祭祀。李零教授的发言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他首先辨析了“祠”“畤”的概念，并简要介绍了《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中所记载“祠”“畤”的情况。“祠”与“庙”不同，宗庙在宫里，

陵庙在陵前，是祭祖的地方，而祠是郊祀之所，祭祀对象是天地五帝、名山大川和各种鬼神。“祠作动词，指郊祀，作名词，指郊祀之所。秦汉时期，祠是郊祀之所的泛称。《封禅书》《郊祀志》偶尔以庙称祠，有时可以互换，含义好像差不多，但汉代的庙，多指宗庙、陵庙。”“畤”是郊祀之所中地位最高的一种，主要流行于秦代和西汉，专指祭祀天地五帝的基址或场所。“古人多以止、阼训‘畤’，以‘畤’为神灵之所止，也就是降神的地方。”西土之畤以雍地为中心，向西可至甘肃、宁夏、青海一带。文献中与陕西地区有关的主要有十畤，即所谓“西土十畤”，其中吴阳武畤、雍东好畤最初可能昉自西周，西畤、酈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畦畤是秦时的畤，北畤、秦畤是汉代新立的畤。秦时的畤主要祭祀族神（周秦族神有别：秦人祭祀二昊、周人祭祀黄炎）。秦的雍四畤（酈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雍地并无祭黑帝颛顼的畤），后来加上北畤（祭黑帝），就是汉代最著名的“雍五畤”。汉代的特殊情况在于秦畤的出现，“它也祭帝，但五帝围绕太一，只是太一的佐神，与所有秦畤都不一样”。

在明确了祠畤概念和功能后，李零教授介绍了近年来所发掘的相关遗址及考古发现。指出甘肃礼县的鸾亭山遗址和西山坪遗址，与秦汉十畤中最早的西畤有关；而以雍地为中心的祭祀遗址包括血池遗址、吴山遗址、好畤河遗址等，汉代的祭祀不一定只在前代的祭祀地上“叠加”，血池遗址和吴山遗址附近

可能还有更早的祭祀遗址，应在这两处遗址外围寻找祠畤，尤其是吴阳上下畤；好畤河遗址在今乾县范围内，该地有好畤河村和好畤村，前者经常有西周铜器出土，雍东好畤可能正在此地，如能在该遗址寻找到西周之畤，则意义重大。山东地区的祭祀则格外重视山川祭祀，八主祠遗址群的讨论是23日上午会议的重点。李零教授在对八主祠的分布做了简要的介绍后，指出天主祠、地主祠、兵主祠形成了天地人“三才”的结构（所谓“人道先兵”），而阳主、阴主为一组，在胶东半岛北岸，日主、月主为一组，另外搭配位于胶东半岛南侧的四时主祠，形成类似于宇宙模式的架构。八主祠并非是汉宣帝一朝祭祀情况的反映，而应是齐鲁莱莒四地祭祀系统拼合的结果。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的报告以“山东地区‘八主祠’考古”为主题，主要汇报了近年来山东八主祠田野考古的工作情况。在实地考察后，栾教授确定了大体的田野工作思路，决定采用聚落考古



李零教授发言

理念指导下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考虑到祠祀地点地理位置较为分散，相互之间距离较远，其产生和发展必定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相互之间未必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祠祀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应该是统一的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因此，最初在这些地点的产生和持续发展，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相当的影响，应该是依托一个相当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这个中心不应该远离祠祀地点。故而栾教授将调查区域设定在了“祠祀地点”到最近的“中心聚落”（与祠祀地点同时代或略早）两点之间，如“日主祠—不夜城”、“阳主祠—三十里堡城”、“月主祠—归城”、“阴主祠—曲城”、“天主祠—临淄城”、“地主祠—梁父城”，但兵主祠始终缺乏相应的线索。随后，栾教授报告了2009年以来田野调查的实施情况。称调查的重心主要在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地主五祠。月主祠附近残存有秦汉行宫夯土台基；烟台芝罘保存有阳主庙；莱州阴主祠系统调查区域内的三山岛上可以采集

到周汉的遗物，因此周代就有人在此处活动，但由于没有发现成组的玉器和祭祀坑，三山岛是否为祭祀地点还不能确定；荣成山头日主祠系统调查区域内的酒楼遗址曾出土了两组玉器；而地主祠系统调查区域内的梁父山（今映佛山）附近发现了龙山时期的陶片，梁父城的北城墙也较为良好地保存了下来。并称据后期记载和研究，与兵主祠相关的地点有三处，即汶上蚩尤冢、阳谷蚩尤陵（原称皇姑冢）和巨野蚩尤墓，但其具体位置经多次实地考察仍无法确定。栾教授进而报告了2010年以来八主祠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情况。月主祠祀址位于归城城内南端，坐落在莱山主峰西侧一个小山包上。大型夯土台基在归城南端。在台基之南数百米处清理出一座保存较好的秦汉时期长方形窑址。同一时期新泰梁父城的重点调查和勘探也在进行，尽管地主祠的位置尚不明确，但梁父城城址的形制、范围和时代都可确定。日主祠附近的荣成不夜城城址、招远曲城周代城址、城内文化堆积及附近的窑址、三十里堡秦汉城址经过调查后，都发现有大汶口、龙山等史前时期的遗址，表明这些历史时期重要祠祀遗存所在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同时，这次调查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日主祠、阳主祠、月主祠和四时主祠的位置；圈定了天主祠、地主祠和阴主祠的范围，但兵主祠的定位则还需进一步的努力。报告最后，栾教授提出了由近年来山东“八主祠”考古工作而产生的几点思考：一是采用系统调查方法的效果，即将祠祀遗址放在一个空间之中，看其与聚落的横向关系，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认识和

理解祠祀遗址。从效果上看，空间分析相对成功，但历史变迁的分析尚不明确。二是历史考古与史前考古的区别，前者的最大特点是历史文献的存在，如何利用文献即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关键。

第三位报告人是烟台市博物馆研究员林仙庭。他向与会学者报告了山东半岛秦汉祭祀遗址的发现与调查情况。林老师首先介绍了莱山月主祠的发现与调查情况。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之前山东老一代学者、文献学家王献唐（1896—1960）曾就归城出土的一批青铜器撰文指出归城并非莱国的国都，引起林老师的质疑；如果能在归城之南的莱山发现秦始皇祠主的遗迹，则可以用这些考古材料证明此处的莱山正是《汉书·郊祀志》中记载的莱山，归城为莱国国都的疑点也可以释却。经过重重波折，林老师果然在庙周家村发现了庙堦遗址、夯土台遗址。这两处的发掘收获了大量的建筑文物，其中有形形色色的踏步砖、铺地砖，从直径7厘米的半瓦当到直径39厘米的汉代卷云纹大瓦当，到直径60厘米的秦代多重云大瓦当，由此可知当时祭祀建筑的宏大规模。接下林老师介绍了日主祠成山头遗址的发掘情况，特别展示了成山中峰雷达建筑北侧发现的三块平板花纹砖，因其依次叠压、状如台阶，故而称之为踏步砖，但与莱山夯土台遗址出土的踏步砖对比，此处出土的踏步砖立沿更短，可能是为了适应成山中峰的坡度。成山中峰山坡处还发现了不少秦汉时期的砖瓦碎片，其中一件瓦当带有文字，是至今在山东半岛各个秦汉祭祀遗址中唯一发现的一件文字瓦当。而至于芝罘岛的

阳主庙，由于当地驻军改造营房，曾在地基下挖出了八件玉器，这组高规格的瘞玉应与秦始皇东巡登芝罘有关，但阳主庙周围没有调查到秦汉时期的遗迹遗物。在芝罘岛中部，大疃村东山前的东周遗址和西汉墓葬则提供了另一条佐证，遗址西部的一座小墓中出土的几块平板砖与莱山夯土台遗址出土的平板砖无异，都是秦汉时期的建筑用砖，但与该墓葬简陋的规格不符，可能是从别处所得填补至此。之后果然在大疃遗址出土了类似的铺地砖，可见大疃村确实是一处西汉建筑遗址。综合这几处遗址调查和出土文物的发掘，林老师总结道，山东半岛的八神祭祀是海洋文化的反映，八神祭祀遗址所在之地应则是先秦古国文化的中心。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睿的发言围绕“齐鲁莱莒”四国与八主祭祀的关系展开。王老师首先指出，八主祭祀只存在于秦和汉的前半段，在汉成帝改革时期便废止，但相关的“历史记忆”便散落在碑刻、方志和文人的诗作中，祭祀地点也发生了若干种分化，必须通过考古工作进行辨识。琅琊台上的琅琊刻石（清末崩毁后被移走）最能明确印证《史记·封禅书》中记载的八主祭祀。此后王睿老师依次回顾了日主祠阳主祠、天主祠、地主祠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情况，尽管根据《史记》中明确的地理记载，八主祠的位置大体可以确定，但八主祭祀出现的时间一直成疑。《史记·封禅书》曰：“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其实提供了多种可能。综合考古工作的结果，可以发现八主祭祀

遗址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祭祀地点的周围都有大规模的居邑或城址，而祭祀地点自身都不适合人类居住；二是八主祭祀遗址都发掘出周代的文物，如月主祠遗址出土了战国齐国的瓦当，日主祠遗址出土有战国的陶鼎、商末周初的陶鬲等。如果以周代的封国观之，天主祠的位置属于齐地，地主祠位于鲁国腹地泰山脚下，兵主祠在曹鲁分界之处，阴主祠、月主祠、日主祠都属于莱地。阳主祠本在纪国，直至春秋时期纪国被灭，四时主祠则在莒地，在战国晚期才归于齐。周代的分封制边界分明，只有齐统一这一区域之后，才有可能论定“八主祭祀”的系统。至于“八主祭祀”为什么会出现？王睿老师指出，天、地、日、月、四时，这些都是人们容易感知的要素，对于它们的祭祀很早便出现，而八主祭祀中的阴主、阳主和四时主，是阴阳和四时第一次作为神被祭祀。以上七种物质都是战国宇宙生成论中的中重要构成要素。其中“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版本与八主祭祀系统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强调阴阳对等，但对宇宙起源的解释不同。八主系统并不承认“太一”创宇宙的重要性。何谓兵主？《鹖冠子》有载：“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由此可见，兵主就是人主。八主祭祀中包含战国时流行的“三才”模式，意图用天地代表的自然法则作为人间秩序的终极依据，从而把天地人贯穿起来。如果进一步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发掘，可以发现八主系统与马王堆帛

书《黄帝十六经》和《鹞冠子》中观念的相似性，它们都强调宇宙是自然生成的过程，都显现出阴阳对等的特征，且都提及了兵主，都属于稷下学宫的黄老道，应该被视为战国晚期思想家对古老历史记忆的再改造和利用。王睿老师进一步挖掘建立八主系统的历史逻辑。指出战国时期，思想家们面对周代血缘制崩溃的必然命运，纷纷献计献策，多种学术思想转化为意识形态。《管子》《吕氏春秋》《周礼》等皆可视为代表作，前二者以“五行”为理论基础，与“四时”强行配比，以求政治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周礼》则用“天地”和“四时”来进行社会秩序的划分，《周易》则猜测宇宙运动和人事之间的互动规律……“八主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它基本上否定了以周代血缘制为基础的祖先祭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建立新型的祭祀体系，是战国晚期思想家带有政治目的创造出的祭祀形式。”

焦院长总结出了对西汉陵庙的几点认识：西汉陵庙自惠帝之后出现，至汉阳陵定型。主要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其位置均在帝陵附近的近汉长安城一侧；二是其形状均为平面方形，边长一百丈，且为四面对称；三是陵庙建筑具有门阙两出的特点，四是建造时使用了四神砖、四种颜色的建筑材料等特殊材料；五是在西汉陵庙均发现了祭祀遗存，表现出浓郁的祭祀特点。为进一步确认西汉陵庙的形成过程，焦院长又举出了周秦晋庙与王莽九庙、西汉陵庙进行对比。指出西汉陵庙与周秦晋时期的庙制度具有明显不同，而与王莽九庙的形制接近，因此从周秦晋向西汉庙制转变

的转折点值得探索。焦院长总结出周秦晋庙与西汉陵庙的五点区别，平面形状上，由品字形变为正方形；布局上，由中轴对称变为四面对称；方向上，偏离减少，由8度变为358度59分26.2秒；建筑形式上，祭祀色彩加强且发展出四方四色四神的独特形式；性质上，由周秦晋庙可以住人的“宫”转变为西汉陵庙无人居住的“庙”。为了进一步探索西汉陵庙在西汉早期的发展过程，焦南峰院长从文献中寻找与西汉陵庙具有一定联系的渭阳五帝庙，并总结出了德阳庙与渭阳五帝庙的三点相似之处，一是地理位置相同；二是时间相近，两者仅相差十年左右；三是形制相近，西汉陵庙面有三门，而渭阳五帝庙面有五门，且与五帝颜色一一相对。焦院长据此推测，渭阳五帝庙废弃后，德阳庙沿用其旧址建立，西汉陵庙由此定型，直至王莽九庙仍得以延续。指出西汉陵庙形成的必然性在于汉代先祖祭祀的必要性、常态化和专门化以及包括四方、五行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与的兴起与传播；而其偶然性则在于渭阳五帝庙的地望。报告的最后，焦院长也提出了一些仍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西汉陵庙的蒲池沟水问题与西汉陵庙面三门和渭阳五帝庙面各五门无法对应的问题。

山东省威海市的杨机臣先生发表了题为“威海历史文化亮点与影响”的报告。威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出土遗址达到六十多处，威海先民逐海而居，世代传承，创造出了与大河文明紧密相连而又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从文化层面梳理分析，威海的历史文化亮点主要有八点：一是日主文化，其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夷莱子国建立的“不夜城”；二是东夷文化，威海境内是早期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海通文化，威海在战国和唐代时就已经成为了对韩、日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四是文登学文化，威海境内古属北齐天统年间设县的文登县，因秦皇东巡路过此地文山召集文士而得名，东汉郑玄也曾在此学山讲学；五是卫所文化，明代在古文登县设立了三卫即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威海以此得名；六是甲午威海之战；七是英租时期的文化，八是红色文化。对于上述提到的威海市的众多文化亮点，杨机臣先生指出，日主文化和红色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与重要开发意义，并进一步对日主文化和红色文化进行了阐述。同时，杨机臣先生也呼吁与会专家能够进一步围绕着日主祠课题与不夜城与不夜县课题进行研究。

第二场

23日下午，王芬发表了题为“史前东方地区的祭祀遗存”的报告。王芬教授谈到，在我国沿海的考古地区中，海岱地区在其早期发展中常常被认为祭祀不太发达，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态势。然而，“八主”即天、地、兵、日、月、阴、阳、四时这八种祭祀对象都曾出现于山东半岛，因此，通过研究从海岱地区出土的与八主相关的祭祀遗存，可以寻找到寻找海岱地区早期祭祀的线索。而海岱地区大量出现的祭祀遗存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距今8000年以前的“后李文化”发现了少量不同类别的祭祀遗迹。而在距

今7000—4500年前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中，祭祀活动则与社会分层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汶口文化典型代表的大口尊的外沿之上出现了刻画有日、月、鸟、山、火、云气等与祭祀太阳和祭天有关的符号。这些带有与祭天有关的图像符号的文物主要出土于大汶口晚期的陵阳河遗址、大朱村遗址以及尉迟寺遗址。王芬教授推测，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出现的这类带有祭天符号的文物，与其“日出之地”的地理位置，当和少昊崇拜有关。指出由于大口尊绝大部分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之中，表明这种祭祀行为与墓主身份有关，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上王权阶层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关联。随后，王芬副教授又围绕着史前牙璋展开了讨论。玉牙璋在夏王朝具备核心礼器功能，是第一种被普遍接受并具有强烈礼制意义的政权象征物。海岱地区有几个主要的玉牙璋出土地：沂南罗圈峪村、临沂的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北岭和海洋司马台遗址。从出土年代上来看，沂南罗圈峪和临沂大范庄都处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或末期，是目前发现的玉石璋年代最早的地点；而五莲上万家沟和海洋司马台则处于龙山文化前期。从出土地点来看，这些牙璋的出土地都与山川有关且远离居住区。值得注意的是，沂南罗圈峪村的牙璋是村民在山川缝隙中发现的，这表明在当时牙璋是被有意放置在山川之中的。王芬教授据此认为早期牙璋与山川祭祀有关。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发展，相关的礼仪活动日渐复杂，与祭天、祭山川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祭祀形式和内容。大汶口文化晚期

是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心聚落产生，社会分化加剧，早期权贵阶层形成，这在墓葬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王芬教授从埋葬、聚落、器物三个角度对聚落内部空间中的祭祀进行了考察；并指出，聚落内部的公共性祭祀台基，与丧葬仪式和葬后祭祀密切相关的牲祭、人祭、器物坑，以及重视棺槨、大量酒器做礼器的丧葬俗制，均体现出当时的祭祀重视血缘族亲认同，强调血缘、亲族和权力的结合，重集体参与与等级分层、重次序与仪式的特点，而这与祖先崇拜密切相关。“这些与祖先崇拜有关的祭祀行为，构成了史前海岱地区早期礼制的重要内容，在区域权力格局构建、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郑禄红发表了题为“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的报告。郑禄红研究员首先介绍了琅琊台遗址的地理位置，称琅琊台位于今天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三面环海，南边有一个小岛，名为斋堂岛。在琅琊台上发现有两处夯土遗迹，分别称之为大台、小台，二者之间直线距离为一公里。随后，郑禄红研究员梳理了琅琊台的历史沿革与自1973年开始对琅琊台进行的五次考古探索。目前在琅琊台发现的遗迹主要包括夯土层、陶管道、石砌构筑物等，从中出土的遗物除去著名的琅琊刻石碑，就是大量的砖瓦陶片等建筑遗物，从时代上看，这些遗物大多属于秦汉时期。通过2015年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勘探，琅琊台大台夯土堆积的分布范围得到了确认。大台夯土

大致呈T字形，主要随山势修建，尤其是南部的夯土，因为地势形成落差，可与《水经注》种记载的做琅琊台作三层层台相参照。小台夯土底部首次发现了陶制管道痕迹，底部行层较厚，上部行层加细。此外，在大台还发现有用石板砌筑的台子，共三处，与发现的夯土带相接，从其功用上讲，应该是起到护土的作用。其中的两处石砌构筑物均位于大台北夯土带上，应该属于下山道路的一部分，而这个下山的夯土路，就是《齐乘》等文献中所提到的当地老百姓口中的“御路”。而根据目前考古发现，从功能上看，琅琊台大台是秦汉时期帝王驻蹕之所，因此在大台上发现大量砖瓦、陶管道等建筑遗迹，而小台则是祭祀之台。

山东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的燕生东教授作了题为“从出土材料看越国迁都琅琊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燕生东教授首先对文献中记载的越国迁都琅琊问题提出了疑问，《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文献中均记载了越王勾践迁都至琅琊。但根据出土文献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系年》与《竹书纪年》等记载的战国早期越国的重要战事活动主要在鲁南南部、鲁中南和鲁北，而不是鲁东南地区和齐国国都临淄东部地区，因此文献记录不支持越国迁都琅琊之说。而从山东地区发现的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越国文化遗存来看，山东地区出土了大量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的原始陶器，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越国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高度重合，胶南琅琊一带未发现春秋末年至战国早中期的越人遗存。因此，考古实物材料也不支持

越国都城迁都琅琊之说。那么，越人迁都琅琊的文献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燕生东教授从鲁东南沿海发现的西汉时期越人后裔“土墩墓”和原始瓷器这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发。称近十几年来，鲁东南沿海地区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西汉中晚期的“土墩墓”，胶南琅琊周围和日照地区数量尤多，且分布最为集中。这些墓葬多位于丘陵山上，呈连续排列，一个封土堆内掩埋几座甚至几十座墓葬。墓内出土了大量来自江浙地区的、通过海洋运输而来的原始瓷器，还伴出来自南方地区的漆器、印纹硬陶、丝绸等遗物。“土墩墓”在该地区是突然出现的、属于非本地传统的一种埋葬形式，但与江浙一带东周时期越人的土墩墓最为相似。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好与汉武帝剪灭瓯夷，大批越人后裔北迁有关。此外，燕生东教授对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出土大量南方系遗存以及出现特殊的“土墩墓”埋葬形式的现象提出了三种猜想：一是此处原为越人旧都，与今江浙关系密切的越人后裔为强调自己的外来性，死后多集体埋在“土墩”墓，并随葬从南方海运而来的大量高温釉陶等物；二是由于这些“南方系遗存”在西汉中晚期突然集中出现，推测与汉武帝灭瓯越，部分越人后裔北迁至原来的旧都——琅琊有关，这些外来人采用“复古”的埋葬方式凸现与本地人的区别；三是由于记载勾践迁都于琅琊的文献出现较晚（《越绝书》《吴越春秋》均形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早期），如果越人向北迁都琅琊之说不成立，或许还可以认为，这些汉代文献的作者是以“当代”越人后裔居住情况来想象或建构“古

代”越人自古就在此居住了，并附会越人迁都琅琊的“历史记忆”，构建了越人曾北上迁都的“历史事件”。燕生东教授据此总结，西汉中期越人后裔北迁鲁东南沿海一带，为东汉时期《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作者根据越人后裔在今胶南琅琊居住的社会情境来想象或勾践“古代”越人迁都琅琊事件提供了历史记忆或历史依据。胶南琅琊一带发现的大量西汉中晚期越人后裔墓葬，或可对后世文献《越绝书》《吴越春秋》所载越人迁都琅琊之说的形成年代和过程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

第三场

24日上午，论坛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主持。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首先以“天地合祭——秦汉时祭考古发现带来的思考”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宗庙时祭是秦汉时祭考古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秦汉礼制文化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秦汉时祭考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2004—2005年在礼县鸾亭山（西时）、2016—2018年在凤翔血池（北时）、2018年在宝鸡吴山遗址（吴阳下时）等三处遗迹的勘探和发掘工作。称虽然这三处遗迹所处年代相近，但是形制特征各有不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玉器组合的比较，三处遗址均出土了玉人，但在鸾亭山遗址还发现了圭和璧，在血池和吴山遗址则发现了璜（珩）和琮；二是祭祀场所的比较，鸾亭山遗址保留了相对完整的祭坛景观，在血池和吴山遗址则主要发现了祭祀坑群，而祭坛和祭祀坑群合二为一恰可勾勒

出秦汉国家祭祀的完整面貌；三是祭祀单位的比较，鸛亭山遗址的祭祀单位种类较多，包括过亭式房子、灰沟、圆形烧土坑等，而后两处遗址的祭祀单位则主要是车马坑。总体来看，血池和吴山遗址的形制结构大同小异，而与鸛亭山遗址大相径庭。梁云教授指出，应从古代用玉制度的角度入手，解读上述差异性。《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也即古代祭天用圭、璧，祭地用琮。因此血池、吴山遗址出土玉琮的祭祀坑，应是祭地的遗存，其祭祀的对象是地主。这表明，秦汉时祭除了祭天外，还包括祭地的活动，但后者不见于文献记载，是考古发现提供的新信息；目前考古勘探发掘呈现的还只是秦汉时祭的局部和片段，其全貌还有待更为细致的研究和考察。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带来了主题为“血池遗址考古发现与秦汉雍郊祭天礼仪程规的复原研究”的报告。雍城是自战国时期到王莽之前长达 700 多年的秦汉国家祭祀中心，是唯一由天子亲往祭祀之地，也是表达“君权神授”“国强民丰”等政治理念的场所。自本世纪初开始，有关城、陵、国人墓葬的发现和布局，已经显现出了雍城的基本格局和历史沿革；但遗憾的是，文献中大量记载、且与都城关系密切的“畴”（秦汉郊祀场所）却不见踪影。血池遗址是雍郊地区“畴”文化遗存的首次发现，标志着雍城考古的突破性进展，填补了学术领域的一大空白。指出血池遗址考古遗存主要包括坛场、祭祀坑、建筑遗迹和道路系统等四个方面，对于探究秦汉雍城畴祭场所的完整



结构和功能区具有重大意义；另出土玉帛、车马器、兵器、陶制建筑材料等四类文物，为确定遗址的年代和畴祭性质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材料。血池遗址是继鸛亭山遗址后，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畴”遗存，且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当吻合，功能结构趋于完整。血池遗址的发现，有助于完整复原秦汉雍郊祭天礼仪的场面和流程，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例如，血池遗址对于确定从长安出发的汧渭古道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血池遗迹的得名，为复原祭天礼仪中的省牲和聚血环节提供了具象生动的历史场景。在今后的遗址保护利用过程中，应坚持“考古先行”的原则，通过持续开展工作，服务于当前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的需求。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游富祥结合自身考古研究经历，分享了 2018 年陕西吴山祭祀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收获。称镇山是一种特殊的名山大川，作为国家镇物存在，寓意深远；吴山作为中国五大镇山中的西镇山，承载了身后的历史和政治内涵。吴山遗址是一处自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祭天遗址，保存状况较好，且与雍山血池祭祀遗址性质相同，即为秦汉雍五畴之一。经过近三个月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共探掘面积 800 平方米，发现车马祭祀坑 8 座，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包括保存完整的马骨、青铜车马器、玉器等，为确定遗址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佐证素材。经鉴定，吴山遗址的上限年代较血池遗址略早，但具体年代尚待进一步研究。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山遗址发现的 8 座车马坑中，有 7 座均出土铁锛，这表明铁锛已经不仅仅是农具，而是与车马器、玉人、玉琮一样，具有鲜明的祭祀属性；而与吴山遗址同时期的血池遗址中却并未发现铁锛，说明铁锛是吴山遗址特有的祭祀用品，针对特定的祭祀对象，这对判断吴山祭祀遗址的性质有重要的指示意义。《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畴，祭皇帝；作下畴，祭炎帝。”炎帝因发明耒耜农具而被历代奉为农神，故以铁锛祭祀炎帝最合适不过。据此判断，吴山祭祀遗址应为秦灵公所立祭祀炎帝的下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刘瑞报告的主题为“汉长安城天地祭祀与城市布局的几个问题”。称据文献记载，西汉早期的祭祀系统和宗庙制度极其庞大复杂，

这是由于战国时属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各种祭祀，在统一后的汉王朝中基本都得到了尊重和推崇。汉初并无祭祀天地的礼节，文、景时期虽祭祀等级逐渐提升，但并未增加新的祭祀种类；及至武帝，儒生地位日益提高，对天地的重视愈发加强，祭祀天地的礼节才正式确立。王莽以长安城为中心，明确以南北向为祭祀的主方向，进行祭祀的重新布局。“长安不是一天建成的。”长安城祭祀主方向的变化，反映了城市布局的动态变迁。刘瑞研究员认为，西汉早期的长安城是一座朝东的城市。经考古发现，长安城五座年代各不相同的祠畴，大致分布在一条自东向西的祭祀线上，即从甘泉宫延伸到后土。至西汉晚期，都城主方向才转而朝南，形成了自尖山到田井的南北轴线。传统观念认为，北为阴，代表地；南为阳，代表天。长安城都城轴线的重大变更，恰恰是汉代天地观念的阐发。这种观念屡见于我国古都城中，如战国时期秦帝国兼有南北和东西轴线，其中南北轴线从嵯峨山延伸到阿房宫；今北京天坛和地坛的相对布局，也反映了“南天北地”的要求。对于城市轴线以及各时期营建思想的研究，对从全局上认识汉长安城布局、从历史角度认识古代都城设计理念等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田天带来了主题为“从秦的庙制再谈秦汉祭祀的连续性”的报告。宗庙在古代中国存续时间长于帝国传统，宗庙制度可被看作具象化的古代家族关系、家国关系；反过来，宗庙制度也制约着家族中人，反映出礼制、人情及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史学界普遍

认同“汉承秦制”的观念，但在祭祀、宗庙等与文化、礼仪相关的诸方面，秦的影响也还值得更细致地探究与梳理。事实上，西汉一代所行用的宗庙制度，与祠畤祭祀传统一样，都来自秦代。里耶秦简保存了秦始皇二十六年的一份“行庙”记录；近年新公布的岳麓简文中，更明确提及“秦上皇祠庙在县道者”，即指县邑均有太上皇庙。这说明汉代的郡国庙应上溯到秦代的群县庙传统，而后者则在文献中失载了。田天教授还结合相关历史文献，重点解读了秦二世的宗庙改革。《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軼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秦二世设立的迭毁制度受到了贾谊的猛烈抨击，认为其“重之以无道，坏宗庙”，这一制度也并未被西汉完全继承。但秦设立帝国宗庙祭祀制度上所作的推进，值得再次考察。田天副教授总结说，在研究汉代诸多制度时，应注重秦汉制度的承继和延续性，特别要放在秦大一统的背景下加以探讨，这是未来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富强结合当地最新考古研究进展，分享了莱州东海神庙考古调查与勘探的情况。莱州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夏朝至清朝，行政区划几经变更。东海神庙为我国历代封建朝廷帝王祭海之地，为国家祀典之所。《汉书·地理志》记载，在东莱郡临胸县（今山东莱州市西北）有海水祠，这可能是莱州东海神庙的渊源之一。宋代正式修建东海神庙；经元、明、清几朝多次翻修和扩建，东海神庙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经过调查和勘探，

除部分建筑损毁较严重外，诸如戟门、东西廊坊、大殿等主要建筑的规模和布局业已探明；另出土了较多建筑构件和少量生活用具等文物，且时间跨度较大，有些文物甚至可追溯到宋代。未来对于东海神庙遗址还存在广阔的勘探和研究空间。最后，王富强副馆长集中探讨了海洋祭祀礼制与华夏文明的宇宙观的关系。学界对于祭祀礼制的探讨，主要是站在中原文明、农业经济主导的文化背景下，对于滨海聚落的海洋崇拜乃至帝王海祀的关注不足。早期滨海聚落中祭拜遗存的发现无疑可以作为海洋祀典的源头，但从聚落的原始信仰上升到宇宙观，应该较陆地经历了更艰辛、更漫长的历程，而且是伴随着东方滨海区域文明化的提升而展开的。“从汉唐的海水祠、海神庙，到宋元明清的海神庙和妈祖庙，海洋信仰的层次不断提升、更加清晰，反映了海洋信仰随着中国政治中心东移而深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第四场

24日下午，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主持最后一场论坛。第一位作报告的是甘肃省考古所王辉研究员，他介绍了甘肃省内与秦汉祭祀相关的三处考古发现（鸾亭山遗址、四角坪遗址与天水平南遗址），并根据三处遗址的挖掘情况与出土文物进行了分析与判断。他认为鸾亭山山顶在汉代是一处皇家祭祀场所，该处出土的玉器为研究汉代郊祀用玉及相关礼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而四角坪遗址出土的战国晚期的板瓦、筒瓦、瓦当、地砖等建筑材料与勘查所发现的夯土版筑

结构，表明该遗址功能的单一性，应为一处祭祀遗址；平南遗址所存的两座方形坑形制和埋藏方式，亦显示其很可能是秦汉时期的一处祭祀遗址。不过，王辉研究员强调，这些遗址为研究秦汉祭祀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勘测确认与细致的文献研究。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丰的报告题目为“东海子与秦汉朝那湫渊遗址”。他从祭祀、诅楚文、考古钻探及环境分析四个方面展开对朝那湫渊遗址的介绍与分析。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及朝那鼎的出土情况，他指出朝那湫渊与黄河、汉水、长江在秦汉时期并列为祭祀的四大名川，而秦人祭祀湫渊的传统应与战争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诅楚文”石刻即为有力证明。至于朝那湫渊的确切位置，始终存在争议，2007年11月固原原州区开城镇马场村出土的一块残碑铭文，揭示朝那湫渊具体位置应在固原的东海子。据此，宁夏考古所等单位对东海子进行了考古勘探、钻探，通过对东海子的地层钻孔取芯及样品的环境分析，指出东海子地层底部较正年代应处于全新世早期，具有地层受扰动较小、气候较为冷干与历史环境稳定的特征。同时数据表明，东海子在西汉时期（2000年前）发生了明显的针叶林退化现象，推测森林退化与西汉时期人为砍伐活动有关。对东海子的环境分析，为研究秦汉朝那湫渊遗址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检测历史文献与现代技术手段是否完全吻合提供了一次有益尝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李旻作了题为“考古人类学视野中的《禹

贡》空间秩序”的报告，他通过比较《禹贡》文本中的空间秩序与考古学构建起来的历史空间格局，来探究《禹贡》空间思想的发生与记忆传承，并试图重构战国时代晚期成型的帝国蓝图。他认为帝国山川——“圣地”——的连接构成了第二次大一统的空间网络结构，而这些“圣地”都是历史记忆的载体与知识来源。从两个时间幅度，即《禹贡》空间思想的短纪年（short chronology）和长纪年（long chronology），李旻教授不断推衍出多重的历史空间秩序，认为《禹贡》空间结构具有宗教性与表演性；而《禹贡》自述的龙山时代至西周时期，具有大幅度拓宽的空间网络与高地社会的连贯性特点，为《禹贡》的空间幅度与知识幅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最后，他引用法国汉学人类学家沙畹、葛兰言对雒祭禹步象征巡游九州的分析，指出《禹贡》文本是一份宗教篇章，也是一份对政治空间蓝图的系统表述，它阐述的是一种辐凑结构的王权理想，并非对现实的历史性描述，亦启发后人应尽量保存文献，而不是基于现代人的理性全部否定；“信古”也不是要放弃史料的批判精神与方法，而应避免出现历史的真空与跳跃。

日本东亚大学教授黄晓芬作了题为《东亚文明视野下的祭祀遗存》的报告。她试图在东亚文明的宏观视野下思考东亚不同地区祭祀遗存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她根据对陕西三原县嵯峨乡天井岸村的汉代祭祀遗迹的实地测量与文献分析，建构起三原遗迹与汉代长安城的联系，指出汉代长安城建筑具有精确的正北方位测定技

术，以渭水为中心呈南北阴阳对峙；而汉墓“法天象地”的墓葬形制的发展与变革亦有有力的说明了汉代长安城天地山川与人工建造物均呈现出以轴对称配置与中轴线特征。接下来，她介绍了汉魏时期交趾郡（今属越南）太守士（燮）王墓与日本飞鸟宫藤原京立地景观均具有南北轴线对称特点，指出古代东亚祭祀制度之间的共性与东亚文明的传播与联结。

自由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就论坛两天内报告中尚存疑的具体问题进一步展开了讨论，认为需要重新审视以往有关秦汉祭祀制度的研究，需要结合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对秦汉祭祀制度的因革损益进行新的分析与探究。最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进一步强调“国家祭祀”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祭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尤其在改朝换代时期，秦汉祭祀的变革性与继承性对于政治的整合与统一至关重要；而今人在勘测与考察每一个古代祭祀遗址时，不仅需要注重遗存的地表建筑所承载的多重历史意义，亦需关照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论坛最后，李零教授对本次论坛做总结发言。李零教授回顾并阐述了“秦汉祠畤与历史记忆”这一论坛选题的初衷，强调自三代到秦汉祭祀制度之“因革损益”对于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的影响。他认为，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犹如破案，需要不断还原现场进行求真的探索；同时历史充满了变化，如何认识“历史记忆”本身就成为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他强调：“疑、信互为表里，疑不等于科学，信不等于迷信，建构说往往沦为虚构说，解构说往往

沦为证伪说。”而对于秦汉祭祀制度的研究与探索，为重新思考疑信问题、延续性与断裂性问题，以及历史记忆问题提供了孔径。

（撰稿：周观晴、钱婧、毕悦、李玉蓉，
校读：孟繁之）

（八）多文明研究系列工作坊

自2018年12月起，文研院发起创办“多文明研究”工作坊，以校内外青年学者为主体，聚焦古今文明历史进程的根本性问题，探讨经典阐释、文明交流、古今之变等领域。2019年3月29日、4月24日，“多文明工作坊”第二、三场（第三至七期）于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

03

王洪喆 | 阿尔文·托夫勒与中国的未来学

2019年3月29日上午，“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该期工作坊分为两个话题：“阿尔文·托夫勒与中国的未来学”，由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主讲；“时间的制度化：中国古代的纪日与时辰”，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姚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出席并参与讨论。



王洪喆助理教授

讲座伊始，咎涛老师介绍了将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讨论的原因，指出了这两项研究都有关技术变化、时间观念以及人们

力图掌控时间或通过时间控制人的话题，虽然历史的时段差别较大，但符合“多文明工作坊”不同学科和领域进行相关探讨、碰撞与交流的理念。

王洪喆老师就“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与中国的未来学”这一主题展开了讲述。他首先介绍了《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这本著作以及它在八十年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之后第一时间就被中国文学界、文化界片段性地译介到了国内。1983年，中国文化界积极邀请托夫勒访华，并正式出版该书中文版。这本著作对中国各界人士和管理层产生过不小的冲击，重构了中国之前的唯物史时间观，甚至有人指出“其巨大影响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天演论》”。1983年6月到9月，也就是在托夫勒访华和《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出版之初，仅《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有关新技术革命的报导就有160多篇。截至当年年底，该报刊登的有关新技术革命的报导多达400多篇。为何一个西方商业作家的写作在八十年代中国被抬升到如此的社会与政治高度成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命题。

关于这种潮流的出现，曾有过学者做出过不同的解释。王洪喆老师指出，当前普遍存在的是一种“冲击—回应”式的解释，即认为《第三次浪潮》的出现和译介是一种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西方思维对中国的“冲击”，它带来的是西方社会的最新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一种对它的“回应”，试图通过以西方为师赶上世界的潮流。大量当时的回忆录和档案的叙事似乎支持了这种解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很多

做法，例如“863计划”等都是在这种反应中产生的。但王洪喆老师认为并不是这么简单。他通过“第三次浪潮”传入过程和中国八十年代未来学相关历史材料的重新梳理，指出一个商业作家的写作及其社会动员不可能对中国带来足够的指导意义。《第三次浪潮》的广泛传播，带来的是对书中内容更广泛的社会辩论，尤其是针对其中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吸收西方的经验和观念，同时根据自身的传统形成甄别和辩论的过程，不同团体之间的理论论争、协商和互动中形成道路论争，才最终推动了改革开放中的诸多选择。实际上当时的国家战略行动如“863”计划的实施中并不能看到很多“第三次浪潮”的影响，反而是对日本经验的学习更加凸显出来。

最后，王洪喆老师指出，托夫勒提出的是一种强烈的时间焦虑感，并非重点关乎技术。他写作的特征是重新限定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线性时间焦虑。在从《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到《第三次浪潮》的体系中，托夫勒认为未来的冲击是“避不可避”的，在未来世界划分人群的将不再是阶级，而是对技术变革的接受程度，能够适应变化的人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而无法接受的人甚至只能在“保留区”中生存。从这种类似文化人类学的路径中可知，托夫勒的未来学更像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现代化理论，而中国也是把它当作一种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进行接受和消化的。只有从当时中国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才能对“未来学”的流行做出更好的解释，而不应当使用简单的

“冲击—回应”论。

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七、八十年代的时代特点和道路选择上。管涛老师认为，王洪喆要做的其实是一个当代史问题，而托夫勒的理论确实是一种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在多种曾经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并不是例外，传入中国时只是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时代需求，不宜过分强调其技术性的维度，而应从理念或意识形态的全球史这个角度予以关照。中国的现代化学派实际上在当时继承的是两个思想资源，一个是在解放前中国知识人的现代化探索，另一个是西来的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那个时代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等出版了一系列探讨世界与中国未来走向的书，“走向未来丛书”是一个例子，这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和知识人的精神，可以被视为一个时代现象，从而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夫勒现象可以被视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个案，能够通过他来反思那个时代，包括知识与政治、甚至技术官僚与政治的关系。孙飞宇老师指出，《第三次浪潮》的流行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类似之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学界拥有长久影响力的原因就在于它为中国学界反思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考资源。同样的，《第三次浪潮》所呈现出的时间焦虑也是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道路焦虑、文化认同焦虑所并行的，这才导致了它的流行。事实上《第三次浪潮》并没有德、法译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流行也和中国的时代特殊性分不开。

在热烈的讨论中，王洪喆老师对未来学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厘清。

从管涛老师所提示的意识形态全球史的角度，托夫勒的未来学并不是系统的预测未来，而只是“投射欲望”(雷蒙·威廉斯语)。当时进入中国的全球未来学思想资源要比“第三次浪潮”更加丰富，比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在更强系统论的未来学者眼中，美国的未来学观念从不去质疑当下的军事帝国主义和工业利润结构，反而以此为基础去推断未来的趋势，其技术决定论的趋向，缺乏强调“施政”(policy making)本身的重要性。挪威哲学家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将建制未来学称作“时间帝国主义”(chronological imperialism)，意思是这些未来版本是用来维持现状的控制结构，并将目前价值和利益的延续作为塑造未来本身的唯一可能性，从而剥夺了未来的世代对这些可能性进行民主选择的权力。由此，考察“第三次浪潮”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必须首先细查未来学运动在西方60-70年代展开的丰富脉络，及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多重交流和多元应对，以此反思文明“冲击—反应”论对改革的单一解释。

(撰稿：孙晓斌)



04

陈侃理 | 时间的制度化：中国古代的纪日与时辰



陈侃理老师就“时间的制度化：中国古代的纪日与时辰”这一主题进行讲述。他首先指出，时间的制度化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总体层面上的制度化是指一个群体有意识地建立共同遵守的时间规范和准则；而个体层面上的制度化是指个人的时间秩序与时间观念被制度所驯化，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纳入群体、社会特别是国家的规范之中。以古代中国为例，命名和表示日期的“纪日”以及划分一天中的时段的“时辰”就经历了一个逐渐制度化的过程。

首先是序数纪日的产生与制度化。陈侃理老师指出，秦和西汉的行政文书中使用的都是干支纪日法，其标准格式是“年+月+朔+日干支”。干支纪日法的六十甲子循环不受天文历法的影响，虽然在现代人看来相当麻烦，对秦汉之前的人来说却是更为自然而可靠的，只是在用来计算官员履历等等时长的情形下会遇到困难。当时的占卜书等文献中已经出现数字化的时间观念，之所以产生计算更为简便的序数纪日法，是由于每月中日序数对应的干支日取决于朔日，也就是初一，在历朔安排不统一的情况下，序数纪日会导致日序数与干支日错位，对事务安排和信息沟通产生影响。因此，序数纪日通行必须以实现历朔的统一为前提。汉景帝时期民间开始小范围地使用序数纪日，到了汉武帝以

后逐渐大范围通行，原因是汉武帝推行了历法改革，并且举行颁历仪式，将新历推行到全国。此时，司马迁等受到儒家思想的官僚主张“正朔统一象征天下有道”。这样的观念，是武帝统一历朔的思想动力之一。汉宣帝时期，序数纪日已经被用于军事期会，表明历朔统一的程度相当之高，序数纪日已经能够适用于最重要的场合。到了东汉时期，序数纪日最终在日常行政和生活中成为主导，“年+月+朔+日序数+日干支”的形式成为官文书记录日期的标准格式，序数纪日制度化，并逐渐取代干支纪日成为主导性的时间标尺。这一结果既是生活中实际运用的需求，也是官方规定的结果。此后，原本用干支规定的各种节日也固定在序数日上，反映出时间标尺和习俗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其次是十二时辰纪时法的产生。十二时辰纪时法均匀恒定地划分一天中的时段，不随季节变化，虽然现在看来十分科学，但和古人的生活方式不合。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然地使用“鸡鸣”、“日出”、“平旦”等有季节变化的日常现象来划分时间。缺乏精确测度绝对时间的计时工具，也使得计算匀定时间十分困难。十二时辰纪日法的产生首先源于历法上的需要，在这种需要的基础上，将漏刻（水钟）和太阳方位的观测结合起来，随着漏刻、钟鼓楼等计时、



陈侃理副教授

报时方式的出现和改良，才逐渐制度化。

最后，陈侃理老师指出，个人时间秩序的制度化是和总体时间的制度化相联系，并且和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的发展为时间测量的精确化与制度化提供古人不可想象的充分条件，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也需要严格制度化的时间秩序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管理生产者，制度化的时间才真正的普及。现在我们就“日用而不知”地生活在这种人为构建的制度之下，如果不加反思，很容易把它当成了自然之物。研究时间的制度化，说明其构建的过程，恰可起到解构的作用，把被绝对化了的制度“相对化”，从而更加自由地设想未来。这也是历史研究的意义之一。

讲座之后，与会学者关于其他文明中的纪日法及其与中国古代纪日法的相似性展开了讨论。贾妍老师指出，在古巴比伦也存在以“六十”为单位，和以“七”为单位的复杂计时方式，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历法，这和古代中国比较相似。陈侃理老师认为，古代文明普遍存在一种循环的时间观，这和我们

现在的线性时间观不同，我们觉得复杂的计算，当时的人可能并不觉得复杂，因而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对东西方古代文明纪日相似性原因的研究，存在“东来说”、“西来说”、“多起源说”等诸多观点，实际情况如何则有待商榷。咎涛老师提出，古代的复杂的纪日或计时方法，可能主要是上层的需要，比如有政治的、祭祀的或管理上的需求，而在民间，主要还是另外一套比较简单易行的适应一般性需求的方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能是常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对于统一时间的要求并不很多，长期以来很难说存在一种体制，体制化的时间管理是比较晚才出现的，民间当然也有个别的“专家”来兼职“负责”这些事务。在穆斯林社会的历史上，历法的建立与运行主要是跟信仰关系密切，比如要计算朝觐、斋月、日常的礼拜时间等等。这些主要是由宗教人士负责的，西方历史上也是如此，一来是存在民间历与法定历的不同，二来是历法与时间基本上也是由教会或教堂来“管理”的；中世纪中、后期则开始出现因应商业社会需要的“世俗时间”。

关于为何在秦朝统一后没有出现诸如“太初改历”的现象，陈侃理老师认为，这和秦、汉政治观念的不同相关。秦朝的“大一统”所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更多的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统一，而汉朝儒家观念下的统一则扩大到了人的精神和观念领域，这才导致了汉朝时间制度化的大发展。

（撰稿：孙晓斌）



05

林丽娟 | 景教三威蒙度赞再研究



2019年4月24日上午，“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第三场（第五至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分为三个话题：“景教三威蒙度赞再研究”，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主讲；“回鹘时代丝绸之路的唐朝遗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付马主讲；“吐峪沟新出粟特语《金刚顶经》入金刚界曼荼罗之梵语真言”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陈侃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赵悠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咎涛表示，本次工作坊的三个研讨选题有一定的共同性：都是有关丝绸之路和欧亚学的研究成果。本着工作坊的宗旨，相近主题的共同研讨以及不同学科视角的碰撞，对于深化研究是有意义的。

第一位主讲人林丽娟就“景教三威蒙度赞再研究”这一主题展开讲述。她首先介绍了这一主题的中心文献——赞美诗《荣归主颂》（*Gloria in Excelsis Deo*）。《荣归主颂》又被称为“大荣耀颂”（*The Great Doxology*），是基督教历史上最悠久的赞美诗之一，早期多吟唱于日课，后来多用于



林丽娟助理教授

安息日和宗教节日礼拜仪式之上，一直被传唱至今。这首赞美诗的希腊语版本一般认为最早见于4世纪的基督教典章制度文献《使徒律令》（*Constitutiones Apostolicae*）第七卷之中，但是它也有许多其它古典语言版本存世，包括叙利亚语、拉丁语、粟特语、中古汉语等等。而其中文改写本就是景教三威蒙度赞，景教三威蒙度赞很可能于8世纪由西安景教碑的作者景净从叙利亚语中译出，译文中既有很多专名来自准确的叙利亚语音译，又有很多佛道用语取代基督教用语的情况。

林丽娟指出，景教三威蒙度赞被认为是唐代以来、所有现存汉语景教文献中唯一可以和叙利亚语传世文献对应起来的材料，而其它文献都是叙利亚景教徒到达中

国之后的原创作品。吴其昱先生的“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也曾证明了二者的对应关系。但最近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中文的景教三威蒙度赞从内容到形式都和叙利亚语传世本有所差别，中文的诗句更长，且增加了不少原文所没有的意象。林丽娟通过文本考据指出之所以中文的翻译更长是因为叙利亚语版本的结构多采用“三圣赞”样式的三句排比，而中文诗句则依循七言四句诗的构造，因此译者往往会采用拆分、增补和调整顺序的方式，将三句翻译成四句。

事实上，类似的差异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于《荣归主颂》的其它版本。林丽娟随后梳理了《荣归主颂》的流传史。过去学者们有的认为《荣归主颂》的最初版本是希腊语，有的认为最初版本是拉丁语。两个希腊语版本孰先孰后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根据上世纪初学界一度占据主流的观点，叙利亚语版本（S）和《使徒律令》的希腊语版（C）要早于另外一个希腊语版本（A）；而上世纪中叶又有学者尝试论证《使徒律令》版本是阿里乌派异端对A版本的篡改，叙利亚语版本S分享了C的某些特征，并添加了原本没有的段落，从而成为三个版本中最晚的版本。通过整理不同版本之间语言结构和文本赞颂对象的区别，林丽娟指出，持前一论点的学者采用了20世纪初流行的发展论的观点看待礼拜仪式，即认为礼拜对象必然存在从礼拜圣父到礼拜耶稣基督的线性发展过程。这种“进化论”式的推论很可能简单化了具体的历史进程。林丽娟也对后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S带有阿里乌倾向，

恰恰相反，东支叙利亚基督教所从属的东方教会接受了尼西亚信经，明确地反对了阿里乌主义。而根据上世纪后半叶发现的新材料，S中多出的段落可以在另一个希腊语版本中找到印证，并不能排除这段话来自一个更早版本的《荣归主颂》的可能性。

关于三威蒙度赞前身的流传，林丽娟表示，尽管现在我们拥有更多《荣归主颂》的版本，但综合所有的情况考虑，恰恰很难给出一个严格的流传顺序以及回答关于何者为最初版本这一问题。通过对三威蒙度赞这一个案的研究，林丽娟认为，西方传统的校勘学方法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荣归主颂》所从属的礼拜文献。这类文献往往难以采用谱系学的方法得出精确的“树状图”，它们是一种“活着的文献”（Living Literature），服务于实用性的目的，在流传过程中更容易被添加、删减或改写。

在随后的评议环节，贾妍提出了是原典文本更加重要还是在之后的历史中修改、添加的枝蔓更加重要的问题。她认为，二者都有文本学上的意义，在有些情况下，“后来添加的东西”反而更能表现出文化流传中的重要事项，因此对于文本学的研究，其最终目的并不一定要追溯原文，对“枝蔓”的研究也很有必要。

（撰稿：孙晓斌）



06

付马 | 回鹘时代丝绸之路的唐朝遗产



随后，付马就“回鹘时代丝绸之路的唐朝遗产”这一主题进行讲述。他首先通过图片展示了中国西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该地区的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主干道，即天山北道、天山南道和昆仑山北道，其中最早为中原王朝所利用的是天山南道和昆仑山北道。天山北道成为东西交通的干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天山南北两麓的自然环境迥异。在唐代以前，两地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态。天山南道经过的地区多为因天山融雪而形成的绿洲区域，属于定居文明；天山北道经过的地区则是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唐朝统治东部天山地区之后，在天山北麓展开一

系列军政、路政和民政设施的建设，以适应其驻军和交通需求，为定居文明在当地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回鹘人继承了唐朝的物质遗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天山道，在其沿线形成一系列城市聚落。

付马接着对中古时代东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变迁状况做了介绍。唐朝对东部天山地区的直接统治始于632年，结束于790年。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位于东天山的伊西庭三州，是唐朝的“正州”，受唐朝的直接管辖；第二层为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安西四镇，是设有唐朝驻军的羁縻州，仍保留当地土著的统治秩序；第三层为更外围的羁縻州，不受唐朝的直接控制，仅与唐朝维持朝贡关系。唐朝退出东部天山地区以后，该地区受回鹘汗国控制。840年，回鹘汗国覆灭，其余部西迁东部天山地区，后来建立西州回鹘政权，统治当地3个世纪之久。正是在这段时期，天山南北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族群文化的统合。

付马指出，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经历过两次转型。汉朝就对天山北麓的情况有清楚的了解，但因为匈奴的活动，天山北麓不能为汉朝所用。根据《隋书》的记载，天山北道在7世纪初才正式成为联系中原与西方的干道。天山北道兴起的背景是突厥汗国对中央欧亚的控制及其治下粟特商人的商贸活动。

唐朝控制中亚之后，天山北道实现了第一次转型。7世纪中叶，唐朝在西域建立道路馆驿系统。8世纪初，唐朝改庭州为北庭都护府，置瀚海军，在天山北道驻派重兵。到8世纪中叶，唐朝已经在天山北麓地区建立起完善的基础设施，形成一些以汉人驻军为主体的定居聚落。

天山北道的第二次转型出现于回鹘时代。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在唐朝势力撤出西域后近80年以后，唐北庭治下的北庭、轮台、清镇等城依然存在，并且是回鹘的重要据点。这有力地证明了回鹘继承了唐朝在天山北麓所建设的基础设施。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城的作用已经发生了转变。回鹘时代的文献表明：唐代以军事用途为主的镇戍守捉城在回鹘时代转变为城市聚落，改变了天山北道以游牧文明为主的文化形态。此外，在天山南道的绿洲地区也发展出了新兴的绿洲城市聚落，显示了回鹘时代建设的结果。与此同时，唐朝的制度遗产也在回鹘的统治中体现出来，回鹘仍旧采用和唐朝官制类似的节度使、镇守使等称号，虽然其统治制度和政治运作方式有所改变，但反映了唐朝的政治遗产并没有被回鹘人所抛弃，反而成为回鹘统治制度的一种来源。

在之后的评议阶段，陈侃理指出，唐朝在官方文书中所使用的很多地名明显是中亚语言的音译，这或许表明在唐朝的建设之前，该地就存在有同名的城址聚落，唐朝的一部分军镇或许是在已有聚落的基础上建立，这部分是否属于唐朝统治的遗产，可以单独做些辨析。另外，文中回鹘统治时期文书中唐式官名遗存的发现和考

证很有意义，不妨详加论证，独立成文。对此，付马表示，唐朝之前是有一些城市的，但是唐朝将之前的旧城和新城一起建设，从而构成了原来没有的系统，从中立的角度来看，这个系统对于后人来说无疑是唐代的遗产。

（撰稿：孙晓斌）



付马助理研究员



07

范晶晶 | 吐峪沟新出粟特语《金刚顶经》入金刚界曼荼罗之梵语真言

范晶晶就“吐峪沟新出粟特语《金刚顶经》入金刚界曼荼罗之梵语真言”这一主题进行讲述。她首先介绍了吐峪沟的位置以及新出粟特语《金刚顶经》写本的发现和基本状况。通过比对，找到了这件写本所对应的梵语原本，即 Sarva-tathāgata-tattva-saṅgraha（《一切如来真实摄》），在汉译佛典中也找到了对应的经文。该经在中国历史上曾被翻译过三次，第一次是开元十一年（723）金刚智的翻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第二次是天宝十三至十四载（753-754）不空的翻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第三次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施护的翻译《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此外还有贞元二年（786）般若的译本《诸佛境界真实摄经》，但是内容较为简略。

范晶晶随后介绍了这篇文献的内容。它是在入金刚界曼荼罗之前礼拜四方佛的咒语，先后礼拜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之后是灌顶师在坛场的告诫：“若有不见大曼拏罗者，汝不应为说此三昧法”，即不应将此密法透露给不具资格之人。从内容上来看，这是一个灌顶仪式的用书。对这一仪式的记载，除了《金刚顶经》之外，还见于不空编撰的各种瑜伽仪轨中，如《金刚顶莲华部心念诵仪轨》等。在敦煌写卷中，



范晶晶助理教授

也存有不空编撰的金刚顶瑜伽仪式的数十件抄本，由此可知这一文本的流传之广。不过，在流传的诸多版本中，文字的差异也是存在的。日本僧人空海曾经回忆在唐朝灌顶的经历，可与这一写本互为映照补充，说明当时密教的灌顶仪式。

关于这件《金刚顶经》写本的抄写和流传情况，范晶晶认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空在河西的译经和传法活动与之密切相关。不空其人与粟特渊源极深，其母姓“康”即为粟特的常用姓氏。后应哥舒翰之请远赴河西，不空在河西的主要活动是翻译经书、开灌顶坛场。正是在此期间，哥舒翰请他翻译了《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

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根据《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的记载，在武威开元寺时，不空曾为数千人开灌顶道场，并授金刚界大曼荼罗。这件新发现的《金刚顶经》写本，可能与这次活动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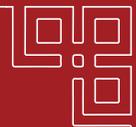
最后，范晶晶总结到，新出土的写本一方面是研究粟特佛教的新材料，另一方面又证明了金刚乘经典在西域地区的流传。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她指出，在唐代佛教的鼎盛期，汉地已然成为一个佛教中心。不仅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很大，也辐射至其他周边地区。例如五台山的文殊道场，就曾吸引印度僧人前来朝拜。这次发现的粟特语《金刚顶经》写本可能是译自汉文佛经，体现了汉地佛教对西域的影响和回流。

赵悠在随后的评议中提到，新出粟特语《金刚顶经》写本是否由中文译出的假说，也许可以借助汉粟两种译本翻译策略的一致性来讨论，推测它们的经手群体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引申开来讲，汉译佛教经典和中国古代其它宗教译典的风格相比，与古典汉语写作的亲近性相对较低。有学者认为这种翻译策略属有意为之，是佛教身份建构的一部分。汉粟两种译文在这方面的统一性或许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策略的普遍性。除此，这部写本的使用群体、其主持翻译的动机和辐射力等问题，都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经典流通的过程，乃至背后的政治考量。

（撰稿：孙晓斌）



静园学术



鲁德兰舒·穆克吉 | 1857年印度起义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穆克吉教授（右）颁发聘书

2019年4月15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1857年印度起义”。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一讲。

王邦维教授首先对穆克吉教授的学术背景与任职情况做了简要介绍。随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穆克吉颁发聘书。

本场讲座由一个小故事引出。1857年5月10日的清晨，住在印度西北地区米鲁

特小镇上的英国人在去教堂的路上，突然听到一阵印度士兵的喧闹和零星的枪声。很快，这些印度士兵们开始闯入当地白人的家庭。要知道，此前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这么做的。这些印度士兵开始杀掉所有能找到的白人，然后开始攻击政府机关、监狱，以及法院……当这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几十个印度士兵，离开了米鲁特，前往德里。在离开之前，他们切断了米鲁特与外界的电报通讯线路。当天发生在米鲁特的事情并没有为外界所知。

5月11日早晨，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莫卧儿帝国的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在皇宫的阳台上接见了这群来自米鲁特

的印度士兵。士兵们表示希望巴哈杜尔·沙二世成为他们的领袖。皇帝本人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但却仍然犹豫不决，他像过去二十年里常做的一样，一遇到问题就咨询他的英国顾问。然而在英国顾问到来之前，这75名印度士兵占领了德里，并杀掉了城里所有的白人。然后他们再次来到皇宫与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对话。这次，他们的语气不同以往——“要么你成为我们的领袖，要么我们就杀掉你”。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起义的性质，在巴哈杜尔·沙二世成为领袖的那一刻就发生了变化，起义诉求变成了恢复莫卧儿帝国的旧秩序。当然，起义的合法性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这里，穆克吉教授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自德里重新回到莫卧儿王朝皇帝的控制下之后，从5月12日到14日，这48小时之内，整个北印度毫无动静。直到48小时之后，距离德里最近的小城阿里格尔（Aligarh）才收到了“德里易主、莫卧儿皇帝号召起义”的消息。从地图上看，阿里格尔大概位于德里东边六七十英里的地方。又过了一天的时间，消息才传到了再东边的一座城镇伊达瓦（Etawah）。因此，穆克吉教授在这里特别强调，有关“首都德里重新为莫卧儿王朝皇帝所控制，英国人被击败了”的这一极其重要且极具代表意义的消息，最先向东传播，随着消息在马背上从一个城镇传递到下一个城镇，整个北印度才逐渐慢慢地得知情况并纷纷响应。正因为如此，穆克吉教授指出，各个城镇起义的时间之间经常会有一两天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往往取决于城镇之间

的距离，以及骑马传递消息所需要的时间。

穆克吉教授特别强调了起义初期德里控制权的转移，以及莫卧儿皇帝成为起义的领袖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他引用了1857年6月初一位英国官员的感慨——“之后不过短短几周时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如同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

对于席卷北印度的这场起义，穆克吉教授表示，印度士兵的骚动只是一个信号，在后来攻击白人和当时行政机关的行动中，士兵、市民与农民都有参与其中。这是1857年印度起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除此之外，穆克吉教授强调在回顾和研究1857年印度起义中，还需要特别注意另外两个特点——即信息的传递以及起义的合法性。信息的传递，主要是指起义前预言与流言的传播，比如印度士兵中有关涂油子弹的流言、北印度村庄之间烤薄饼的传递、兵营之间莲花的传递等等。在流言传播的过程中，其实真相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听到流言或预言的人为什么会选择相信并为此战斗、牺牲？

穆克吉教授表示，这就得从更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所推行的西化模式，在普通印度人看来虽然无所谓好坏。但熟悉的东西被改变了，过去的传统变得不再合法，这就会让他们感到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促使了流言的传播以及被接受。同时，穆克吉教授特别指出，当时英国军队里的印度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家庭出身。因此，这些北印度的士兵们对西化政策之于自身日常生活的冲击感更为直接和深切。

起义的合法性问题则关系到起义的目的和性质。穆克吉教授指出,起义需要领袖,士兵们选择了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作为领袖,也就是选择了英国人统治之前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因此,1857年印度起义带有封建复辟的性质,反对的是“弗朗机”,也就是白人的统治。另一方面,从现存为数不多的起义方资料来看,起义也与宗教有关。穆克吉教授指出,现存起义方的资料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英国档案中的审讯材料,一类是起义组织的宣传材料。审讯资料中,这些即将被处以极刑的印度人,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表示他们的“dharma”与“deen”受到了威胁,因此不得不揭竿而起。穆克吉教授解释说,“dharma”与“deen”分别是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中相当于“宗教(religion)”的词。但同时,这两个词的内涵又比“宗教”更为宽泛,确切地说,更接近“way of life”(生活方式)的意思。因此,在穆克吉教授看来,起义的过程虽然体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空前团结,但起义的性质并非完全的宗教性质。

讲座最后,穆克吉教授将话题转向1857年印度起义过程中的暴力问题。无论对于印度还是英国,1857年都是充满血腥的一年。穆克吉教授详细描述了英国将原本计划派往中国的军队调回印度本土镇压起义的血腥与残忍,但他同时也并未避讳印度起义军曾经在坎普尔对已经投降了的英军以及妇孺所犯下的暴行。穆克吉教授强调,再现这些残忍与血腥的过去,是为了让现在的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暴力的本质以及所谓复仇的循环往复。最后,穆克吉

教授强调,鉴于那段历史太过血腥与暴力,他是少数几个拒绝对1857年印度起义进行纪念的学者之一。

讨论环节,现场观众提问踊跃。针对大起义的经济因素,穆克吉教授建议大家阅读他的第一本书《1857-1858年阿瓦德起义:民众抵抗的研究》(*Awadh in Revolt, 1857-58: A Study of Popular Resistance*),其中对于导致起义爆发的经济因素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不过,穆克吉教授坦陈,该书构思并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代的他与大多数亚洲人一样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暴力是重要的,尤其是在反帝运动中。现在,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发生了看法上的变化,暴力并不应该被提倡。这一变化在他第二本有关1857年起义的书《*Spectre of Violence: The 1857 Kanpur Massacres*》有所体现。穆克吉教授特别强调,“民族主义”是20世纪的概念,比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就与“民族主义”有很强的联系,对此,他将会在随后的讲座中做具体的阐述。

讲座的最后,王邦维教授感谢穆克吉教授的精彩演讲,让我们对于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这一印度历史上极为重要、也极具争议性的事件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撰稿:乐恒)

鲁德兰舒·穆克吉 | 印度早期自由主义的矛盾

2019年4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印度早期自由主义的矛盾”。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二讲。

讲座伊始,穆克吉教授即指出,要认识英国在印统治的实质及随之传入印度的“自由主义”,有两个重要事件值得关注:一是英国建立统治初期印度学院教师亨利·德罗齐奥(Henry Louis Vivian Derozio)的解雇,二是19世纪后期关于《伊尔伯特法案》(Ilbert Bill)的争议。

印度学院(Hindu College)建于1817年9月,2000年转制为大学(Presidency University),是印度第一所开展英文西式教育的机构,也是印度最富盛名的教育机构。1793年,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根据1784年的相关决议,需要在二十年后,也就是1813年对其在印度的贸易与统治许可进行再次评估。在1813年特许状(1813 Charter Act)中,英国政府决定特别拨款十万卢比用于在印度发展教育。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将教育视为其在印统治的重要一环,但尚未明确规定发展什么样的教育。此项决议得到了加尔各答上等阶层的热烈响应,他们积极

筹措资金和政府一起推进教育的发展,为印度学院的组建提供完全的资金支持。此前已在印度开办学校的英国人大卫·哈尔(David Hare)为学院提供土地,政府则对包括楼舍在内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持。因此,印度学院是在官方和私人力量的联合下组建而成的。印度学院校规的第一条例充分体现了其办学目的、教育对象以及教育内容,“学校主要面向有名望的印度教徒子嗣,使用英文和印度语教授欧洲和亚洲的文学与科学”。

穆克吉教授接着提到了第一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就是17岁的德罗齐奥(Henry Louis Vivian Derozio)。他在印度学院成立的第九年被任命为教师,只比平均年龄十五六岁的学生们年长一点。德罗奇奥来自清教徒和英葡(Anglo-Portuguese)混合背景家庭。当时的加尔各答有“白城”和“黑城”之分,前者居住着白人统治者和特权阶层。德罗奇奥则在加尔各答城外的一个小出租房内长大,并不是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他在不知名的小学校中接受教育,成绩十分优异,14岁时便已是诗人和作家。德罗奇奥于1926年回到加尔各答担任一份报纸的副编辑,并在同年入职印度学院。

关于这位没有学历的年轻人究竟如何得到印度学院的聘用,至今仍是未知。可以肯定的是,德罗奇奥作为老师十分出色,可以说是印度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一段传奇。

德罗奇奥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将成为一名兼具理智和批评力的思考者看作是一种道德责任（moral duty）。此外，他认为，思想应发生在自由地交流碰撞中，每位学生都要能够清晰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教学方式上，德罗奇奥鼓励学生把阅读范围扩大到教学大纲规定的书目之外，他自己经常在学生面前大声朗诵，并邀请学生们在学校之外和自己交谈。德罗奇奥写于1829年的一首诗表达了他作为教师的初衷的期待，诗中这样写道，“像年轻的花儿一样在绽放着 / 我看着你们的思想一点点地打开 / 挣开思想的蒙蔽，多么甜蜜”。作为教师，他看重真理、责任与正直品质的培养，通过阅读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帮助学生们实现思想的解放。

德罗奇奥的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学院的学生们几乎都来自上等阶层的传统家庭，日常生活被约束在严格的宗教仪式与禁忌之下。而印度学院中却是完全不同的氛围，在老师德罗奇奥的影响下，这些年轻人开始摆脱传统信仰的束缚，向周围的世界发问，进而质疑宗教、质疑禁忌。他们率先对种性限制和食物禁忌发出挑战，思考这些似乎已习以为常的宗教仪式究竟意义何在。然而，学生对于传统的叛离引发了家长们的愤怒。他们意识到其所熟悉的社会正在被自己的子女所质疑甚至是威胁，始作俑者正是德罗奇奥。于是，家长们联合写信给学校委员会要求解雇德罗奇奥，表示如果德罗奇奥不离开印度学院，就强迫自己的孩子退学，并且鼓动其他人不再将孩子送进印度学院。

彼时，印度学院校委会中有两名英国

成员，一位是大卫·哈尔，另一位则是后来成为牛津大学梵语教授的威尔森（H. H. Wilson）。在学院针对德罗奇奥问题展开的首轮讨论中，二人都认为德罗奇奥作为教师无可指摘，不应被辞退。但校委会中的印度教成员则将德罗奇奥视为一切问题出现的源头，他必须离开。基于此，两位英国人表示这是关于印度人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选择放弃投票。最终参与决定的成员全部来自印度教背景，只有一人投票支持德罗奇奥。

1831年4月25日，德罗奇奥正式辞职。他在写给威尔森的信中说，自己的辞职是被迫的，不然就会被学校强制解雇。然而他从未收到过正式的指控，更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他的被迫离职没有经过公证的审判，但他明白人们并不会认为他作为教师有所失职。威尔森对此回信说，校委会鉴于德罗奇奥带来的公众压力而不得不让他离开。1831年12月，德罗奇奥在贫穷与霍乱中与世长辞，他视为生命的学校和学生被夺走，活着已没有意义。从始至终，校委会中的两位英国人没有给予德罗奇奥一言一语的支持，哪怕在他离校甚至去世之后。

为进一步剖析德罗奇奥的思想，穆克吉教授再次谈到他与威尔森的通信。信中，威尔森向德罗奇奥提出三个重要问题：“你相信神吗？”“从道德上看，学生难道不应当敬重并且顺从他们的父母吗？”“你认为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应当被允许吗？”对于第一个问题，德罗奇奥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的回答，而是表示，自己从未在公开场合宣扬无神论。他所传授给学生的，是怎样正确地认识问题，因此无论是支持还

是反对无神论的学说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德罗奇奥借用休谟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休谟认为，对于抽象而不确定的哲学问题，人们不可能得到肯确的答案，因此，对话与交流是必要的。因而德罗奇奥攻击的对象并不是关于神的信仰，而是对其盲目的崇拜。他要求学生探索信仰存在背后的理性依据，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宗教传统之中的学生无疑是一种挑战。同样，对于其他两个问题他也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而是再次强调质疑的重要性，也就是培根所说，“以确信为始，将止于怀疑……”。

穆克吉教授总结道，从德罗奇奥身上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启蒙主义线索，从培根、弥尔顿、洛克到雪莱与休谟。他的诗歌创作也深受其影响，尤其是济慈和雪莱。这些启蒙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教育理念。他不可能不了解学生们的保守家庭环境，但有意将他们拉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与学生家长以及印度学院校委会之间的嫌隙也由此产生。英国政府希望利用教育来稳固其在印度的统治，彼时在印的全部英国人不过五千余人，他们需要培养一批懂英文的印度人来协助他们进行国家的管理和控制。印度家长们则希望孩子通过对西方知识的学习在英国统治的政府中得到一份工作。但是德罗奇奥的教育并不在于让学生们得到工作，而是让他们获得价值。在拉丁语中，教育的含义是帮助人向前发展，这才是德罗奇奥对于教育真正的理解。教育应当培养开放的思想与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人人生来具有思考的能力，因而知识与教育带来的是平等。然而，正是由于非特权阶层的出身背景，德罗奇奥最终

在不公正的审判下被逐出印度学院——这深刻反映出印度新自由主义发展中的矛盾。

穆克吉教授谈到的第二个重要事件涉及到司法问题。在1882年的印度，英国人只能由英国法官审理。对此，一名印度公职人员指出，无论何种肤色的政府人员都是平等的，印度法官同样应当有权审理白人。这项提议得到了由自由主义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任命的时任印度总督里彭（Lord Ripon）的重视。在他的授意下，总督委员会中负责法律的伊尔伯特爵士（Sir Courtenay Peregrine Ilbert）起草了《伊尔伯特法案》（Ilbert Bill），规定法官有权审理在法庭被控告的任何人，不受肤色限制。这项法案在印度白人中引起骚动。无论是政府官员、商人还是律师，他们一致认为，在对所谓平等和自由原则的追求中，白人在印度所享有特权的根基被撼动了。他们联合起来写信表示抗议，甚至绑架威胁总督里彭并扬言要送他回英国。迫于此，《伊尔伯特法案》多次修订，最终版本中平等与自由原则大打折扣。一位官员总结，我们都明白，黑总归不是白。在理论上确实应当存在平等适用于欧洲人和印度人的法律，但如果将其付诸实际，我们在印度将无利可图。

穆克吉教授分析道，英国统治者理论上支持所谓的自由主义，但事实上却压制其发展，其中体现出的矛盾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内部。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的休谟曾说过，“黑人无法和欧洲人实现平等”（Negros are not equal to the Europeans）。《论自

由》的作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认为，民主和自由不适用于印度，其文明发展程度太低，无法消受。由此可见不同肤色人种的不平等在自由主义中的渊源——查特基（Chatterjee）称之为“殖民差异准则”（The rule of colonial difference）。关于平等，首先有一个普遍的概念，即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殖民地差异体现在他们并不被看作是平等原则的主体，以1789年《人权法案》为例，起草者（华盛顿等人）本身都是奴隶主。因此，就像印度学院在不公正的情况下驱逐了他们优秀的教师一样，印度公职人员也无法和他们的同事们享有同样的权力。

讲座最后，穆克吉教授对印度的自由主义问题又进行了补充。他指出，密尔将不同的社会根据文明发展情况进行排序，

把印度乃至亚洲放在末流，欧洲人则占据高位。其理论在于印度社会依然处于未开化的野蛮状态，因此需要在白人的帮助下进行文明化改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决定印度社会需要被文明化，这种文明化的进程由英国人来控制的合法性何在？随后，针对和同时期英国自由主义发展的比较问题，穆克吉教授指出，雪莱被牛津大学驱逐的原因正是在于他宣扬无神论思想。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德罗奇奥从未直接否认神的存在，也没有鼓动学生反抗家长，他只是在学习和思考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他被解雇的原因不在于教授的内容，而是教学的影响，而这在19世纪的英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撰稿：万舒心）

鲁德兰舒·穆克吉 | 印度与现代性的遭遇

2019年4月19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印度与现代性的遭遇”。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校长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胥涛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三讲。

讲座伊始，穆克吉教授即表示，随着

英国统治的确立，现代的观念和制度通过现代教育学、数学、天文学、政治科学、哲学等学科作为媒介传入印度，这些学科知识帮助塑造现代印度社会，使之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同时，英国人的进入也帮助印度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从19世纪初开始，印度人对这些现代性也开始有所反应。

穆克吉教授接下来讲述了四位对现代

性有积极反馈的杰出人物，并以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诠释本次讲座的题目。第一位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un Roy）被称为“现代印度之父”。他出生于1772年，自学梵语、波斯语、拉丁语、阿拉伯语，精通英语。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并曾经向喜马拉雅的高僧学习。穆克吉教授认为，他有可能到过拉萨。总之，上述种种原因使他成为一个聪慧的人。

在接触西方的现代化概念之前，拉姆著有一本反对宗教的书。他认为，宗教无关乎仪式，是对不可描述的强大实体的信仰。他还认为，神是不可描述的。1816年，拉姆移居到了加尔各答。作为一名杰出的研究西方的学者，他主张设立印度大学，倡议西方教育，反对偶像崇拜和种姓制度。这一点在写给印度总督的信中有所体现：他要求推进印度的现代教育。拉姆还认为，英国政府应当确保印度人民拥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思想自由等权利。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英国的统治是神所赐予印度的礼物。正因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神的馈赠，所以英国人也有责任在印度推行现代化。

为了推进印度现代化，拉姆主导了一次重要的社会改革——第一次印度社会立法改革。1829年，根据他的提议，政府禁止了萨迪（殉夫）制度。这次立法试图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印度社会进行改革，对



穆克吉教授在讲座现场

于印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拉姆被称作“现代印度之父”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其他的英国制度，对于英国给印度人民和印度工业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他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可以说，拉姆不带批判地完全接受了英国的统治及其带来的现代化观念。

第二位是伊斯瓦尔·钱德拉·维迪耶萨伽尔（Iswar Chandra Vidyasagar），一位传统婆罗门学者。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教育和社会改革领域。维迪耶萨伽尔的梵语意思是“智慧之海”，这一头衔对于梵语学习者来说是最高荣誉。维迪耶萨伽尔出身贫寒，幼时前往加尔各答学习。19世纪中叶，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宽阔的胸襟和高尚的品德扬名于此。为了增加些收入，他做起了文印生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横向联合”。

维迪耶萨伽尔的一个重大贡献是给予孟加拉语字母以科学依据。孟加拉字母源自梵语字母。他依据英文字母顺序科学地

建立了孟加拉字母的体系。此外，他的第二大贡献是为孟加拉语引入了标点符号系统。在此之前，孟加拉语并没有标点符号。后来，维迪耶萨伽尔成为了他的母校——梵语学校的校长。做校长期间，他改变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在保留梵语的同时为高年级学生设置了学科，如外国文学、数学等。维迪耶萨伽尔试图将梵语学习和西方教育相融合，因为，他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让他们将这样的教育推广到周围的农村和大众。此外，维迪耶萨伽尔推行《印度寡妇再嫁法案》。因此，他成为了一个人身安全威胁的争议人物。

第三位杜特 (Ramesh Chunder Dutt) 是一名文职机构人员，著有一本《早期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Under Early British Rule*)。杜特在其中运用了现实的研究方法，描绘了英国在印度统治时印度经济的图景。这是一部具有先驱意义的书，因为它用理性来批判英国统治下印度经济。杜特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政府的任何举措都该是为了公民的福利。但是，英印政府并不关心印度人的福利，只关心为本国创造财富——英国通过资源、商品掠夺和直接的财富掠夺实现自己的目的。杜特认为，印度实际上在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买单。

印度的农业种植方式从全年种植被改造成了商业种植，生产出的农产品也都被运往英国和欧洲销售。印度农民所支付的农业税奇高，甚至达到了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这样的税赋使得农民陷入债务的恶性循环。由于逆工业化（英国破坏印度工业的方式），原本不用务农的人被迫务

农，这就降低了土地人口比。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产出随之变少，饥荒大行其道。在杜特看来，可以通过为农民提供灌溉水源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杜特还曾向印度政府建议修建运河，但未被采纳。政府要投资修建的是铁路，因为这有助于运输商品。由此他意识到，英国的统治实际上是在印度制造贫困。他建议：“读我这本书的读者应当用英语去翻译这本书，从而能让英国人读这本书，继而向英国制造压力，使得英印政府改变统治印度的方式。”杜特还表示，如果英国人改变他们的统治方式并且以适当的（或说以治理本土的）方式统治印度，那我们应该接受他们的统治。

拉姆和杜特，一个完全接受了英国的统治，一个批判了英国的统治——二者都没有否定英国的统治，也没有完全拒绝异邦统治下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上述三位人物对于现代思想接受是不充分的、片面的。

第四位是我们熟知的甘地。1915年，甘地举家由南非迁回印度。1909年，甘地利用船上的十天时间写了一本书——*Hindswaraj*（《印度自治》）。如果根据方言法案，他的书会被禁止出版——法案规定一切用印度本土语言撰写的书籍不得出版。甘地非常聪明，他用英文重新撰写。在甘地看来，这本书里蕴含着这一生最核心的思想，由此对它十分重视。

但是，尼赫鲁并不喜欢这本书。1946年末，甘地在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本书，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但是我想说，哪怕我是这世界上最后一个矗立着的人，我也会坚持我这本书中的观点。”

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甘地反对英国统治。他说，英国的统治是不道德的、邪恶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西方文明的表现形式，现代化意味着不断的商品生产和工业文明，而工业化文明又不断带来商品。越来越多的商品只会导致人们贪婪，贪婪导致竞争，竞争引起冲突，冲突带来暴力，暴力则带来死亡和毁灭。文明本应该让人民富裕，而非毁灭。神使生命富足，而恶魔使生命毁灭。印度需要拒绝这邪恶的文明。因此，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甘地解释为什么印度应该拒绝西方文明。

1905年，印度人民开始反抗英国统治并开始接受自治（*swaraj*）。但是，他们只是尝试获得自治，而非质疑英国统治和西方文明的本质。甘地说，如果我们保留他们的教育、司法、政治、行政制度，我们获得的只是没有英国人的“英国式统治”。这是政治自由，不是自治。如果只是摒弃英国的统治而不摆脱英国式统治的影响，印度仍会被邪恶的文明影响，而我们需要摆脱的就是这些负面影响。

甘地认为，印度的一些地方（内陆和偏远村落）未被工业社会和西方文明污染。那里的人们仍延续着几千年的生活传统。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如何摆脱工业化以及西方文明的影响。那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在甘地看来，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一套规则，并从下四个方面考虑：简单生活、非暴力、不怀恨意、真理。一旦参悟了这些，你就会发现，村落中的人不为私利而是为了群体利益而活。换句话

说，他们的生活基于对责任的认识。如果印度想要重建自身，就要从乡村开始。

这里甘地赋予了 *swaraj* 新的意义——自我治理，即每个人都依照原则行事。不用依赖于国家的治理才是真正的自治。这是甘地的信仰，也是他想带给印度民族运动的。因此，他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改变形象。甘地将自己的形象变得和印度普通农民一样。接着是闭关，一年内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和活动，取而代之的是游遍印度乡村，以期更加了解印度。最后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国的统治存在是因为印度的合作。若印度拒不合作，英国的统治者就无法维持统治而选择离开。

穆克吉教授最后说道，我们能在甘地的著作和工作中发现，他对于现代性是排斥的。

（撰稿：高熙睿）



鲁德兰舒·穆克吉 | 甘地和尼赫鲁：爱与分歧

2019年4月24日晚上，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甘地和尼赫鲁：爱与分歧。”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主讲，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建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四讲。

刘建副教授首先对穆克吉教授和当天讲座内容作了介绍，他特别提到了在国家观念和发展模式方面，甘地和尼赫鲁的分歧与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分歧具有可比性。之后，穆克吉教授开始了本场讲座。

穆克吉教授从印度独立时尼赫鲁的演讲切入。1947年8月14日的晚上，尼赫鲁发表了著名演讲，宣告印度独立。演讲以一句著名的话开始“Long years ago, we made a tryst with destiny.”（很久以前，我们和命运有个约会）。穆克吉教授指出，相比广为流传的“tryst with destiny”，他认为更重要的词是“we”。尼赫鲁使用“we”一词来指谁？他当然不会把甘地也放在“we”里。因为甘地当时并不在德里。当印度宣告独立时，甘地在加尔各答东部的贫民窟，他并不是庆祝活动的一员，他通过缺席表达了不赞成。8月15日早上，一名英国记者问甘地：“甘

地先生，您关于印度独立的愿望已经实现，您要对印度和印度人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甘地回答：“今天不是传递信息的一天，今天是斋戒和祈祷的一天。”甘地不能接受印度独立的方式——印巴分治，宗教为界，而非以统一的方式。所以，被称为印度“国父”的甘地在国家诞生时并未在场。

在正式论述甘地和尼赫鲁的关系时，穆克吉教授首先表示，二人关系非常紧密，但并非一直融洽。他们之间有太多分歧，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两人最后的分歧关于印巴分治问题——尼赫鲁接受分治，而甘地不接受。在印度独立还没到半年的时候，甘地就被刺杀了。当时，一听到消息尼赫鲁就赶到了柏拉屋（Birla House），他像个孩子一样在甘地的遗体前啜泣。分歧并不能消除他们之间的私人纽带。那天晚上（1948年1月30日），当他对全国宣告甘地的死讯时，尼赫鲁说，“光明从他的生命中离开”。其实这是对于他个人而言的。

两人第一次会见是在1916年国大党在勒克瑙的会议期间。甘地在前一年从南非回国，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印度政坛。尼赫鲁发现甘地与其他政治领袖大不相同，但他并没有被甘地所迷倒。他发现甘地太过遥远，不关心政治。至于甘地是如何看待尼赫鲁的，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在这第一次见面后，甘地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或

许正如尼赫鲁不太喜欢他一样，从一开始他可能也不大喜欢尼赫鲁。在这一时期，尼赫鲁和其他政客一样，是“西方化的上层社会年轻人”，这并不能吸引甘地。所以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彼此并无好感。

然而这种情况在几年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到了1919年，当甘地发起他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时，尼赫鲁对甘地的态度彻底改变了。尼赫鲁写道，他的热情被点燃了，因为那是“一种摆脱困境的道路，一种直接、开放、还可能有效的行动方式。”他想立刻加入运动。穆克吉教授引用尼赫鲁的原话：“我不去想后果，违法、进监狱，或其他怎样，我不在乎。”这种热情也使他在1920年全身心投入甘地发起的不合作运动。在自传中，他形容自己的热情使他“不顾一切”、“如痴如醉、极度兴奋”。穆克吉教授称这体现了一种乐观主义和他无休止的热情。但同时他反问：尼赫鲁当真毫不犹豫地、完全地接受甘地本人、他的观点和领导了吗？没有。尼赫鲁对印度政治中出现的宗教意识感到担忧，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他经常发现自己不能同意甘地的某些表述、使用的某些习语，他认为甘地的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太难理解了。但他仍相信甘地是个伟大的人、与众不同的领袖。

甘地和尼赫鲁经常给对方写信因为两人都很繁忙，去全国各地组织运动。穆克吉教授强调两人关系中其实大部分是建立在信件来往上的。他们之间的第一封信是在1924年3月12日。穆克吉教授在这里提到了解两人关系的重要史料：从1924年3月到1948年1月两人之间的日常通信。穆克

吉教授认为从第一封信便可看出两人私人关系的特点。因为尼赫鲁在信中称呼甘地为“My Dear Bapuji”，而Bapu在印度通常意味着父亲。所以他通过称呼甘地“Bapu ji”来表达自己的尊重。而且，他在落款时写的是“Yours affectionately”，并不是那么正式的用语。穆克吉形容这一封信以尊敬开始，以爱结尾。

穆克吉教授进一步指出，尼赫鲁在起初并非绝对信奉甘地和其非暴力思想。他思想开明，乐意去观察这场运动、这种思想会走向何处。但同时，私人关系已经建立，如果尼赫鲁对甘地有疑问，甘地使用自己的影响去约束尼赫鲁不断增长的激进主义。关于尼赫鲁的激进主义思想从何而来，穆克吉教授补充了一些背景。由于他妻子的病，尼赫鲁不得不常去欧洲。第一次是在1926年，之后在1930年代前半段非常频繁地飞往欧洲。而这一时期，欧洲在一战后正在经历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大动荡，持续通货膨胀、失业日增、政局严重不稳、社会充斥不公。而这些现状催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其中便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欧洲发生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后果。而如果可以取缔资本主义制度，便可消除或缓解社会不公，减少失业。同时，俄国革命正好爆发在1917年，所以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尼赫鲁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看到的是这样的欧洲，而且他很快被社会主义吸引了。穆克吉教授认为他转向社会主义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发现在欧洲遇到的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扩

张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在亚非地区的表现，这让尼赫鲁发现甘地发起的争取自主的斗争并不仅是印度的独特现象，而是亚非地区共同的现象；另一个原因是他十分关心如何减少（如果不能消除的话）印度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而他发现社会主义可能是解决之道。他记录了自己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当他 1926 年第一次从欧洲回来时，他写道：“我的视野变得开阔了，民族主义在我面前变成了狭隘且不合适的信条。政治自主、独立无疑是必要的，但它们只是迈在正确方向上的一步，没有社会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建构，国家和个人都不会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他带回来的是对当时印度来说全新的意识形态。对包括甘地在内的国大党人来说，他们不会认为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而社会主义代表着未来，是尼赫鲁把这种激进主义带给了国大党。

接受了这种新的激进主义，尼赫鲁认为国大党应该致力于独立的目标。穆克吉教授补充说道，直到 1929 年，在国大党的官方计划其目标并不是独立，而是自治领地位。在 1927 年国大党在马德拉斯（Madras）的大会上，他提出“印度人民的目标是完全独立”并获得通过。甘地对这项决议非常恼火，他写信给尼赫鲁说“你的步伐太快了。你不清楚这份决议所带来的后果。”尼赫鲁对甘地的评论非常不满，在回信中他非常直接地说：“（这项决议）表达了我对一个全国性组织以自治领地位为理想和目标的态度，这种理想令我窒息。”这是尼赫鲁第一次对甘地发表不同政见。他写道，虽然“我尊敬您，并且相信您是

可以领导这个国家走向胜利和自由的领袖”，但是他“不能完全同意您之前的一些发表出版物，包括《印度自治》（Indian Home Rule）。”但他同时写道：“我认为您比您的那些小书伟大。并且我凭直觉感到无论我怎样不同意您，您伟大的人格和品质都会带领我们走向胜利。”

在他对《印度自治》某些内容的批评中，他写道：“我认为您对西方文明有很深的误判，夸大了其缺点。您曾经声称印度没有什么可向西方学习的，她在过去达到了智慧的顶峰。我完全反对这个观点。我认为西方或工业文明必定会征服印度，可能有些变化与适应，但主要还是以工业主义为基础。”穆克吉教授在这里指出，甘地对西方的反对建立在反对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而尼赫鲁对西方的部分接受建立在接受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尼赫鲁继续写道：“您对工业主义的缺点有过很多尖锐批评，但是却很少注意到它的优点。每个人都知那些缺点。根据西方大多数思想家，这些缺陷并不是工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致，其以剥削他者为基础。我记得您曾称在自己看来劳资双方不应该有冲突，但是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冲突不可避免。”穆克吉教授认为，尼赫鲁在推动一种新型的工业主义，其不包含资本主义所暴露的问题。

甘地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回应尼赫鲁。他没有直接回应这个话题，相反，看到尼赫鲁从自我抑制中解脱出来并能清楚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感到宽慰。他说：“我清楚地看到你必将发动公开的论战反对我和我的观点。你我之间的基本分歧如此之大，

以至于我们之间看起来没有会面的基础了。我无法对你掩饰我的悲伤，我失去了一个如此勇敢而忠诚、有才干且诚实的同志。”但是他希望不管他们之间政治分歧有多大，尼赫鲁都会坚持他们的私人友谊。尼赫鲁对此非常痛苦，他回信辩解自己并没有想过任何与甘地的论战，他告诉甘地：“没有人能像您一样启发和感化我，我绝不会忘记您对我极大的仁慈与善意。”

穆克吉教授认为，尼赫鲁无意中已经开始塑造他和甘地之间在未来的一种新型关系。之后他将不断地明确表达自己与甘地的分歧，有时其措辞已经到了反抗的地步，但是又会退让，或是考虑到他与甘地的感情纽带，或是顾及甘地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特殊位置。苏巴斯·鲍斯（Subhas Bose）曾直言：“他（尼赫鲁）的头朝向一方，而心朝向另一方。”穆克吉教授说这里“头朝向的”是指社会主义，“心朝向的”则指与甘地在一起。在甘地这边，他对尼赫鲁时不时的爆发十分有耐心。他十分喜欢尼赫鲁，承认并尊重尼赫鲁对他的依赖，尤其在尼赫鲁的父亲去世后。在 1946 年末，甘地在给尼赫鲁的信中说：“我要像一个智慧的父亲，不会比莫蒂拉尔先生（Motilalji）对你的爱少。”他称尼赫鲁对他的影响“特殊且如此自然”。

接着，穆克吉教授指出这种分歧与依赖的张力在尼赫鲁对《甘地—欧文协定》（Gandhi-Irwin Pact）的反应上表现得最明显。1931 年 3 月，签署该协定后甘地停止了不合作运动。在他的自传中，尼赫鲁回忆了自己在得知该协定后理想破灭和无可奈何的心情。他回忆自己在那一晚打

心自问：“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英勇奋斗一年所要达成的吗？”他用 T.S. 艾略特的著名诗句形容自己的心情：“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1932 年 1 月甘地为反对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关于划分不可接触者特殊选区的提案而发起绝食至死抗议，身在狱中的尼赫鲁听说后在监狱日记里写道“我为他哭泣。”他为此极度苦恼，在他看来，甘地为了一个次要问题而作“最后牺牲”，他不知道这对独立运动的意义何在。政治考量被个人（内心）损失所取代，在给他女儿英迪拉的信中，尼赫鲁写道：“我被完全吓坏了，不知道该干什么。恐怖的消息传来，Bapu（甘地）决定要绝食至死。我被他占据的内心世界摇摇欲坠，到处都似黑暗与空虚。我会再也见不到他了吗？那当我困惑需要智慧的指引时我该找谁呢？当我痛苦、悲伤需要安慰时又该找谁呢？”尼赫鲁给甘地发了一封电报，以较克制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苦恼，但在电报结尾处，他说：“我怎么能擅自给一个魔术师提建议呢？”穆克吉教授认为尼赫鲁使用“魔术师”一词，可能是承认甘地具有感受人民内心并领导其进行运动的罕见天赋。

相似的绝望和失望的情绪也曾在 1933 年压倒尼赫鲁，那时他在狱中听说甘地已经停止了不合作运动。他感到内心空虚，并对甘地关于“国大党应该转向社会工作”的言论感到惊恐。“一个巨大的隔阂，”他写道：“看起来在将我与分开。我感到内心受到刺痛，这些年来将我和他连接在一起的忠诚之弦突然断了。”约一个月

之后,在1933年5月8日,甘地开始绝食后,尼赫鲁在监狱日记中写道:“当我看到了绝食过程中的骚乱后,我越来越想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方式。这是纯粹的宗教运动,清晰思维与理智也无法阻挡之。尽管我们有感情联系,但恐怕我在心理上渐渐与他远离。”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决:“我越来越肯定,至少就现在进行的这种行动来说,Bapu(甘地)和我之间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政治合作了。我们最好各自走不同的道路。”

但穆克吉教授强调,两人关系从未破裂,这从之前引用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些原因。尼赫鲁表示他和甘地之间有“强烈感情联系”。这得到了回应,在甘地开始绝食时,他写信给尼赫鲁说:“你在之前即与即将开始的绝食作斗争,因为它满是血与肉……我多么希望你能理解这样做的绝对必要性。哈里真运动(Harijan Movement)太过庞大复杂,不能仅仅靠脑力和理智的努力。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坏的东西。我不能离开宗教,因此也就不能离开印度教。如果印度教舍弃我,我的信仰可能成为我的负担。我通过印度教去爱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很多信仰。如果将它拿走,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不能容忍印度教有‘贱民阶级’(这样的划分)。如果你不凭直觉去看真相,那我便不会通过争论使你信服。我知道即使你不支持我,我也仍然保有这些苦难日子里你珍贵的爱。”穆克吉教授认为这体现他们从不回避分歧,也都强调两人之间的感情联系。

这封信让尼赫鲁深受感动,他形容它

是“独特的心声”,并且回了电报,说:“我对自己不理解的事情能说什么呢。我对这个国家感到生疏,在这里,您是唯一一个熟悉的标志,我尝试在黑暗中摸索道路,但我跌倒了。”穆克吉教授指出,甘地是尼赫鲁的个人依靠。

但意见分歧一直延续在两人的讨论与争论中,甚至到1946年的冬天,甘地在世的最后几年。尼赫鲁在自传中表示,他认为甘地在《印度自治》中的观点是“完全错误且有害的学说,没有实现的可能。”“这种想让人去智以返璞归真的想法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人类的光荣和胜利便是经受磨难、诽谤和沮丧。物质环境压迫人的心灵,这是可接受的。当今的文明有很多罪恶,但是也有很多优点,并且它有能力强使自身摆脱这些罪恶。为了摧毁其根与枝叶,便要移除这种能力,将其打回到昏暗无光且不幸悲惨的存在。”

甘地从未对这些分歧产生愤怒。这些分歧也并未阻止他在1942年1月15日宣布尼赫鲁是他选定的继承人。在那天的国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甘地说:“有人暗示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即尼赫鲁)和我疏远了。疏远我们需要远远更多的意见不合。当我们成为同事时我们就有分歧。但是我说过好几年了,并且在此重申,不是拉贾戈巴拉查理(Rajagopalachari),也不是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而是贾瓦哈拉尔将成为我的继任者。你不可能通过拿木棍不断击水就能把水给分开,将我们分隔开也是如此困难。当我去世后,他会接过我的事业。”穆克吉教授在这里提示我们思考

为什么——为何尼赫鲁与他有如此多而激烈的分歧,甘地却如此无条件地接受、相信他?穆克吉教授说自己在浏览档案和书信时偶然发现了一份信,那封信的内容给了他答案。

甘地的得力助手瓦拉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在1939年7月3日写给尼赫鲁:“自从你离开后,Bapu(甘地)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吃饭。当他开口时,他说:‘如果

贾瓦哈拉尔经常来的话,我也许就可以退出政坛和公众生活了。’……请快点回来。回到这个受伤的老人身边,只有你能帮助到他。”“可能你不知道,他爱你胜过爱其他所有人,当他发觉自己的行为使你不快时,他就心生悲凉、郁郁而思。”穆克吉教授将这句话作为讲座为结尾,他认为,没有什么政治分歧能将这份爱抹去。

(撰稿:何杨)

鲁德兰舒·穆克吉 | 泰戈尔的遗言

2019年4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泰戈尔的遗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主讲,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建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五讲。

首先,穆克吉教授介绍了泰戈尔对西方文明态度的转变过程。他认为,泰戈尔对西方信仰幻灭的转折点在于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泰戈尔曾经和19世纪印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孟加拉族)一样迷恋西方文明,信仰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他的这种信仰很早就开始瓦解了。19世纪90年代,泰戈尔在一系列文章中抨击白人优越、傲慢的态度以及白

人的种族歧视政策。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斯瓦德西(Swadeshi)运动,有效推进孟加拉民族实现独立。

1919年5月,泰戈尔写信给印度总督,将英国的统治者描述为“一种拥有最有效的组织来毁灭人类生命的力量”。这是一种由“复仇的激情”所驱动的力量,可能会让普通的印度人“遭受不属于人类的堕落”,英国的统治者也因此违背了自己的“道德传统”。这些主题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在1941年4月“文明的危机”演讲中,泰戈尔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他批评的对象是西欧文明,特别是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接下来,穆克吉教授介绍了“文明的危机”涉及的主要内容。“文明的危机”通常被视为泰戈尔最后的遗嘱,见证了西方文明

和英国统治在他心中的幻灭。泰戈尔在这次演讲中承认，他最初对英国的迷恋源自于对英国文学的深厚仰慕。但在直面印度的现实时，他才意识到文明标准的制定者会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抛弃原定的标准。

泰戈尔眼中的印度人民是贫困的，他们缺乏食物、衣物、水、教育和保健等基本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文明种族却对数百万印度人所遭受的苦难持蔑视态度。泰戈尔坚信，在任何一个拥有现代政府的国家都不会存在这样严重的无视。从那以后，泰戈尔不再乐意把英国文明称之为文明，他说，“如果把它叫做文明，就如同甘地曾经把西方文明称为‘所谓的文明’一样”。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伤害，即以一种可怕而残酷的方式分裂了印度人民。泰戈尔认为，如果没有高层的暗中鼓励，这种分裂——被他称为印度历史上耻辱和不文明的顶点——是不可能发生的。不仅如此，英国统治者还用手中的“大棒”建立了所谓的法律和秩序。泰戈尔认为，这只是一种外部的存在、看守的规则，不能唤起印度人对西方文明的尊重。西方人向印度人展示的是权力而不是自由，它严重阻碍了印度走向文明的进程。

泰戈尔没有停止对英国统治的谴责，他试图将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与其他幸免于被西方文明污染的国家作对比。第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利用大机器和文明化管理为其人民带来繁荣和进步，这令泰戈尔心生敬佩。随后，他提到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尽管泰戈尔眼中的日本是文明的，但他在给日本好友野口（Yone Noguchi）的信中还是批评了日本侵略其他亚洲国家时的绝对权力。1937年，泰戈尔在另一封写给居住在日本的印度革命

家鲍斯（Rash Behari Bose）的信中指出：“日本现在对手无寸铁的东方人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937至1938年前后人们不可能自豪地以日本为榜样”。1941年，泰戈尔又恢复了对日本的钦佩，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随后因为偷袭珍珠港被投掷了原子弹。

第二个例子是苏联。他认为，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给普通民众普及教育时的杰出表现对该国减少贫穷、消除文盲很有帮助。除此之外，苏联的文明并没有造成阶级和教派之间的分裂，在政府分配国家资源时，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没有被区别对待，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泰戈尔。由于以上原因，泰戈尔对苏联政权持赞扬态度，他并不认为苏联政府是一个专制压迫的政权。

任何熟悉苏联历史的人看到泰戈尔的这些评价都会感到震惊，可是，期望泰戈尔对苏联的了解与我们今天的水平相同是不合时宜的。穆克吉教授认为，泰戈尔不可能不知道苏联已经在1941年4月与被视为邪恶化身的纳粹德国结盟了，他之所以还以苏联为例，很可能是由于泰戈尔和其他人一样对斯大林在波兰实施的杀戮毫不知情。1941年以后，斯大林对待犹太人、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方式被陆续揭发，正如最近研究所表明的，苏联政权恰恰正是泰戈尔所否认的那种极度压迫人民的机器。

泰戈尔曾谴责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政权是为了破坏人类生命而组建起来的，实际上苏联政权对于人类生命的破坏比英国统治印度还要严重。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一样，都是邪恶的化身。如果说19世纪的孟加拉对英国文明的信仰是时代的幻觉，那么

在20世纪30年代，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盲目信仰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幻觉。尽管泰戈尔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并不相同，但他也被苏联政府塑造的假象所迷惑，犯了轻信的错误。

另外两个例子是伊朗和阿富汗。泰戈尔写道，前者从两个欧洲大国的碾压中重生，走上民族复兴和自给自足的道路，例如过去存在于穆斯林和索罗亚斯德教徒之间可怕的斗争已经在该国终结。泰戈尔认为，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它从欧洲布下的阴谋网中解救了自己。当谈及阿富汗时，泰戈尔表示，虽然阿富汗在教育和社会政策方面处于落后地位，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以自身文明为荣的欧洲国家能够战胜它，这也是它充满潜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当代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这场演讲结束后的几十年中，伊朗和阿富汗都发生了战争，二者沦为伊斯兰狂热主义的“剧场”。

1941年时，泰戈尔的内心早已充满痛苦和绝望，如果他看见后来上述四个国家的下场，他一定会感到更加悲哀。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泰戈尔离世后（1941年8月）的狱中日记中所写道的：“或许（泰戈尔）去世了也不错，他没有看到后来发生的更加恐怖的事情，毕竟他已经见证过世界上太多的悲哀和不幸了。”

接下来，穆克吉教授提到了这篇演说翻译时遇到的困难。泰戈尔在1941年4月发表演说时已过于年迈，他的两个好友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他在这篇演说翻译成了英文。然而，如果将孟加拉语文本与英文译本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显著差异：泰戈尔在文中五处使用到的“穆萨曼（Musalman）”一词在英文翻译中都被省略了。穆克吉教授

指出，英文翻译中根本没有使用过“穆斯林（Muslim）”一词，取而代之的是“主要社区（major community）”，或者干脆拒绝为宗教社区命名。这样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泰戈尔论点的锋利感和直观性。此外，原版中没有任何一个短语与“游牧的野蛮人（nomadic savages）”有丝毫相似之处，“野蛮人”这个词完全是译者加上去的。由此可见，这篇演讲的英文翻译过程中存在诸多省略、扭曲和添加。在穆克吉教授看来，译者引入这些变化的原因让人费解，另外，让泰戈尔赞同译文删改的原因更加引人深思，毕竟目前已经有一些证据清楚表明泰戈尔在当时的确看到并批准了这些译本。

泰戈尔在这篇演讲中表达的愿景可以被视为他送给世界的临终礼物。穆克吉教授将这一愿景同他临死前所写的最后一首诗联系起来讨论。1941年4月初，泰戈尔的侄子索门德拉纳斯（Saumyendranath）请求他写一首歌颂人类胜利的诗，泰戈尔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作诗回应，这首诗后来出现在“文明的危机”这篇演讲的末尾，也成为迎接孟加拉新年的歌曲，名为“Sabhyatar Sankat”。穆克吉教授认为，这首诗和这篇演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泰戈尔垂暮之年乌托邦式的愿景，他不顾疾病和精神上的痛苦，在生命的终点迸发出使人铭记的创造力。尽管他的愿景带有欺骗性，但正如泰戈尔所说，人只有通过忍受欺骗才能赢得不朽的和平。

评议阶段，穆克吉教授就相关问题与在座学者和同学作了更深入的交流，会场气氛热烈，本次系列讲座圆满落幕。

（撰稿：希琳）

李昀 | 图像的阅读：中古朝贡图绘的跨媒体研究

2019年3月20日下午，“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十一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图像的阅读：中古朝贡图绘的跨媒体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昀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史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静，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薛磊，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耿朔出席并参与讨论。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李昀开门见山地指出，朝贡图绘是中古绘画的流行题材，在唐代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的《礼宾图》、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维摩诘经变《各国王子图》等作品中均有对诸州诸蕃客使的描绘，而李昀对于这些朝贡图绘的研究侧重于人物的衣冠符号。

李昀通过图像、榜题、题跋、画录、文集相互比勘的方法试析传世卷轴画中的朝贡图绘，认为国家博物馆藏宋摹本《梁元帝职贡图》、台北故宫藏《王会图》（唐阎立本）、台北故宫藏《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梁元帝蕃客人朝图》三者均为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摹本，《王会图》之名为误植，而《蕃客人朝图》一名则首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为梁元帝所作。而进一步分析题跋，李昀指出在元明之时（指三个跋文的年代）尚属于台北故宫藏《唐阎立本王会图》的康里巎巎、王余庆、王肯堂三跋文，在清代经人移配，将其中康里巎巎、王余庆的跋文植于国家博

物馆藏宋摹本《梁元帝职贡图》之上，这一现象可解释为拆配，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将这种做法称为“拆真配真”。

李昀进一步在石窟壁画的朝贡图绘中寻找线索，将《王会图》与敦煌莫高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的《各国王子图》联系起来。唐《王会图》，即王者元日受朝之图，参照《逸周书·王会篇》而作，其特别之处在于呈现了元日朝会时，内外依次、四方列位的场景。“凡国之异，各依其方”，四方标志着方位感；“鸿胪导客，次序而列”，内外依次代表着重要性与强弱，这两组概念均为帝国中心长安礼仪空间之展示，极富政治意涵。《大唐开元礼》记载在蕃主来朝及元日朝会时，蕃主、蕃国诸官均服其国服，皇帝头戴通天冠、身着绛纱袍，与《维摩诘经变》下部表现的意向吻合，均为四方与内外关系的图像重组。敦煌壁画《王子图》中，亦保留着大量贞观《王会图》中的线索，是专属唐代的粉本。而经由分析比照，李昀认为，洞窟壁画的朝贡图绘呈现出长安气象、秩序崩溃、吐蕃植根、画院粉本四个阶段，反映着唐帝国政治的状态与面貌，而其图绘风格也逐渐由最初的写实，转向后期的想象与固化。此外，卷轴画与壁画中诸蕃客使的冠服特征，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反映着使者的身份及与唐帝国沟通交流的状况。

李昀在考证阐释的基础上，从方法论层面做出归纳，以画样、画谱与画作为眼探索图像中的符号，推究使用图像材料以及图

像与文本结合的研究方法。

针对朝贡图绘中白麻纸白描画是画家初稿抑或传摹画样的问题，李昀通过分析比照卷轴画认为，唐代尚可见的文献记载，重要性远低于平常仅见文字描述的前朝人物衣冠形象，加上当时人对域外人物题材的偏爱，使得南北朝时期的外国人物成为难能可贵的摹绘题材，伴随着

该题材的流行出现了便于携

带、易于摹写的白描纸本《职贡图》，而至五代及宋，进一步出现了将此白描粉本穿凿附会为萧绎职贡图初稿《蕃客人朝图》的情况，并以讹传讹、渐成定论。如果考虑到《职贡图》诸多摹本之间，存在与《历代帝王图》相似的后人增补的可能性，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因此，分析宋人题跋记述中何者为母本证据、何者为摹本信息至关重要。以阅读台北故宫藏《王会图》为例，李昀通过勾连文献、卷轴画与壁画的方法进一步揭示了图像所传达出的信息：使者所佩戴的金蝉貂冠通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代已不常用，而绘有宋已不用的貂蝉金冠，可见宋代摹本较真实地体现了梁元帝《职贡图》原本所存信息，因而《王会图》可被视作反映南北朝交聘与互动的直接史料。因此，研究图像并与文本建立联系，游走于卷轴画、壁画与文献中跨媒介探索中古朝贡图绘，可获得相当丰富的史学信息。

针对李昀在分析朝贡图绘时的图像阅读脉络，五位与谈人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切入做出评议与补充。王静副教授认为，卷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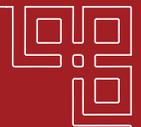
李昀主讲

与壁画两个系统的交互，绘画与文献的交互，体现出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而对于追溯王会与职贡的源头与发展，王静建议应从经典文本入手，探究图像与史实之间或并行，或相互反映的关系。薛磊副教授则从艺术史的角度进行评议，他认为应从断代的角度审视如何使用图像证据。孙正军进一步对此作出补充，他认为“以图证史”的方法之所以遭受批评，症结在于该方法草率的关联方式，学者应慎重审视王会图与职贡图之间的分别，对于关联再作深入考辨。而深入到图像的内容，耿朔认为应在文本与图像、图像与图像间，思考信仰空间与世俗空间的关系，并考虑构图间的关联性，在接近真实与理想化之间寻找调和，进行图像的生成过程研究。史睿教授总结认为，对于图像的阅读与跨媒介梳理，应跳出刻板印象，先做图像与图像的梳理，再做图像与历史的解释，避免将历史解释框架加在图像框架之上。

（撰稿：章涵青）



文研回望



文研院举办第六期访学者欢迎会



第六期访学者与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2019年3月至6月，文研院迎来了第六期访学者。18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北大访问、访学，专业覆盖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史等各大人文学社会科学学科及相关领域。未来几个月内，他们将在文研院搭建的高水平交流平台上，切磋问道、启迪思想。

3月4日下午，文研院院务会成员、行政团队举办活动，欢迎新一期访学者报到。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主持，部分往期访学者代表参加活动。

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代表文研院向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大家共同观看文研院的宣传视频，进一步加深对北大学术传统和文研院宗旨的了解。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提及文研院建院之初便确立的三条原则，也是一直以来努力

的方向。第一条是涵育学术、激活思想。学术需要内在的思想力量，思想需要学术的根基，文研院希望搭建能凝聚、有厚度、可辐射的学术平台。第二条是近者悦、远者来。敬畏学术，尊重学者，在学术事业中，学者的活力是决定性因素。她强调，访学者项目是文研院研究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六期访学项目已累计支持百余名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在此开展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第三条是清新风气，一流标准——我们追求一流的开放环境、一流的前瞻思维、一流的沟通方式、一流的和谐关系。为此，文研院致力于为访学者提供思想交流、经典研读、成果发布、合作交流的平台，并为后续学术计划提供支持。她希望各位学者能够围绕前沿议题持续深入，推动文研院工作不断前进。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表示，世界一流高研院的经验告诉我们，学术史上的重大创建，许多都通过跨学科的激发、碰撞得以体现。当今学者大多从事专业研究，只有突破自身学科固定思维方式与研究模式，才能触及核心与前沿问题。基于此，文研院的访学者制度以内部报告会和交流会为核心：不同专业且研究领域差别极大的学者，受益于此从事日常研究工作以及每周固定的学术交流，并于其间产生共鸣、启发和理解。这一过程中，一个有活力的学术共同体得以孕育。很多时候，学问能否有大的格局和创见，有知音和友情的滋润特别重要。所谓知音，便是性情相仿、对相似问题有追求有思考的人；所谓友情，则是这一群体自在从容地对学术问题进行单纯探讨时产生的共鸣。文研院致力于营造的正是这样的氛围。

接下来，两位往期访学者代表发表感言。第三期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刘未表示，访学研究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对学术道路的规划，使他反思围绕小课题做科研工作的方式，重新界定研究领域。第五期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颖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她表示，离开二院的这段日子，一直在怀念——怀念这个幽静的小院子、怀念同期的学者、怀念每周三的报告会、怀念气氛欢快的聚餐时光，更怀念跨学科交流与激情讨论。几个月的访学经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并得以从复杂周密的立场和态度重新看待自己的专业。

第六期访学者分别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进行介绍。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刘迎胜是国内著名的元史专家。欢迎会上，他动情地回忆起20年前参加的一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经由威尼斯到中国的航船上开展互动。那次经历帮助他极大地丰富思考的广度与深度，而文研院的交流氛围让他想起当年在船上的密集讨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是国内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领域的代表学者。他回忆了驻访的生活，期待被重新“带回”到年轻时的状态——静下心来多读书，并在自由交流中了解学术最新发展。著名艺术史学者、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求学时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如今又作为访学者回到静园二院。他回顾治学生涯，历史学的研究经验在转向投入到艺术史研究实践中时仍继续发挥着“效用”。交流与开敞，也是他对文研院驻访生活的期待。

文研院是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本期访学项目迎来四位外籍学者。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Hassan Fazeli Nashli）的研究领域为欧洲考古与伊朗考古，尤其关注伊朗乃至中东地区从远古时期的平均分配社会逐步转变为阶级社会的历史过程。此次驻访期间，他受文研院邀请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开设伊朗考古学课程，为同学们带来难得的伊朗考古学的前沿成果。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他的研究致力于理解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变迁，并期待在中国驻访期间产生新想法新知识，对伊朗的学界有所贡献。日本爱媛大学教授藤田胜久专治《史记》研究与战国秦汉史，

他计划在驻访期间更深入地研究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对《史记》这部综合性史学著作进行全新的理解和探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教授秦玲子也是日籍学者，研究领域为宋元史与日本汉学，目前正撰写日本汉学历史。韩国延世大学国学院教授赵京兰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现代思想研究，她计划在访问期间延续对“天下”问题的思考。

对中青年学者而言，文研院一流的研究环境，营造的学人凝聚的平台，可谓充满吸引力。来自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邱源媛、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群、近代史研究所的赵妍杰、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袁剑、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溯等，都期待着在文研院提供的优渥环境里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学问，并与同期学者进行全方位的交流互动，融入这一温暖的学术共同体。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鲁家亮的研究领域为简牍与秦汉史，他早在读书期间就蒙藤田胜久先生的教益。能在文研院的平台上重逢这样的学界前辈和青年学者，让他深感机会的宝贵。

大家十分向往文研院对跨学科探索的鼓励与包容。如来自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郑少雄近年来从对四川康区的历史人类学兴趣出发，越来越关注作家阿来的文学创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冯培红主要研究敦煌学与隋唐史，与其他专门史和艺术史、考古学关系密切，他渴望与北大诸多老师、同期访学者增进交流。

文研院致力于为学者提供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在四个月里，他们得到充分的保障，按照自己的思考节奏推进研究。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的熊春文报告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一是要从中国农业发展思路重新梳理费孝通先生早期与晚期思想的变化；二是细读攻读韦伯对诸古代文明农业社会学的著述。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狄金华从事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他表示，农村社会的变迁并非仅仅是当下的问题，要全面地理解这一变迁，需要充分的历史感。文研院浓厚的人文取向和北大的历史研究实力，能够帮助他找到把握问题的历史向度。

报到次日，刘迎胜主讲“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与审音勘同”文研课程，邀请学者的内部报告会拉开帷幕。

（本文于2019年3月11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文研院推出 2019 春季“文研课程”项目

自2018年秋季学期开始，文研院正式设立“文研课程”项目，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专题课程，为北大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助力。2018年秋，文研院联合相关院系推出四门课程，分别是：台湾清华大学赖建诚教授主讲的“经济史的趣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歌教授主讲的“现代日本政治学方法”、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主讲的“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王炳华教授主讲的“换一个角度认识新疆”。

2019年春季学期，伴随新一批访学学者的入驻，文研院“文研课程”项目翻开新的一页。本学期文研院共开设两门课程。3月5日，由文研院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

联合开设的“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课程在红五楼5211室开课。文研院2019年春季访问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 Hassan Fazeli Nashli（哈桑·法兹里·纳什里）教授担任授课人。纳什里曾任伊朗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朗新石器时代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考古（10000-3000BC）。

该课程共14次课，内容包括介绍伊朗概况和环境，按照时间序列系统介绍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基本认识，涉及当地最早的人类与其文化、农业的出现与扩散、城市与文明社会的发展等重大问题。纳什里期望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等院系的学生通



哈桑夫妇同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右）、助理教授邓振华（左一）及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左二）合影



刘迎胜教授主讲，学生环绕聆听

过此课程的学习，掌握伊朗考古学发展现状、早期历史等知识。

同日，由文研院与北大历史学系联合开设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与审音勘同”在静园二院开课。文研院 2019 年春季特邀访问教授、著名元史专家刘迎胜担任授课人。刘迎胜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与中国海交史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蒙古学学会副会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

该课程共 14 次课，内容包括介绍伊朗概况和环境，按照时间序列系统介绍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考古学研究现状与基本认识，涉及当地最早的人类与其文化、农业的出现与扩散、城市与文明社会的发展等重大问题。纳什里期望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等院系的学生通过此课程的学习，掌握伊朗考古学发展现状、早期历史等知识。

“文研课程”项目旨在发挥文研院作为学者凝聚平台的优势，在“文明：中华与世界”这一核心关怀之下整合优质课程资源，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文研院将一如既往地开拓新的项目，更好地服务于北大师生。

（本文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崔璨）

文研院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

具体内容参见五四百年专题·学术论坛专题报道

（本文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访问北大文研院

应文研院的邀请，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 Edward C. Henderson 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于 2019 年 3 月下旬访问北京大学。其间，王德威以“微物，即物，与极物——当代小说与后人类想象”为题发表讲演，并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主题论坛。此次来访系 2019 年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组成部分，由文研院与国际合作部联合主办，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王德威，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有《从刘鹗到王赉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三〇与八〇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等。凭借其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极具生命力的阐释，王德威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是论述中国文论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3 月 27 日下午，王德威公开讲座在二体地下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平原担任主持。

讲座中，王德威从近期热门电影《流浪地球》谈起，分析这类作品所反映的理论思考。他提到，这些作品将宇宙这一更广阔的、不可知的领域作为背景，进行对人类未来的描绘与对人类命运的想象，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什么是后人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被纳入人类与宇宙的关系领域。相对于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传统议题，这可以视作问题意识的超越。

王德威介绍并区分了微物、即物与极物三组概念，并介绍了当前比较文学界“后人类”研究的现状。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王德威也从“后人类”的理论视角展开了精彩解读。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借助于人“轮回”间从动物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情形，从人文立场描绘了人的希望、向往和绝望，其出发点和结束点依旧是

“人”等。王德威将文学分

析从围绕“人”进行书写的作品延伸到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领域。董启章等作家都曾从器物、建筑等角度出发，分析“物”相对于人的超越，以及它们在具体用途之外的实践意义，由此揭示文学的后人类想象中“非人”的一面。

3月30日，“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主题论坛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本次论坛旨在汇聚国内外一流学者，回顾五四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社会与伦理变革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王德威受邀出席并在主题演讲环节作报告。

王德威的报告题目为“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他借助鲁迅文论“悬想”与“神思”的概念，探索五四文学革命被遮蔽的面向及其在当代科幻文学中的回应。王德威通过鲁迅《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早期文论，解释了“悬想”与“神思”的来源。这两项概念都强调“想象力的政



王德威教授

治”——深入现实尽头的无物之阵，探勘理性以外的幽暗渊源。1923年至1924年，张君勱与丁文江进行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鲁迅在这场论战中的缄默、文学的缺席，恰恰反证了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说明此时的文学已被异化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而原有的复杂、感性、物质层面的意义被遮蔽。在王德威看来，鲁迅文学的革命性不仅在于反映人生、改变现状，也在于直面人生晦涩幽微的物质性，认知现状深处“俱分进化”的动机。如果仅在写实、现实主义的脉络中理解鲁迅，实乃局限了其文学观的最激进面。

（本文于2019年4月18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崔璨）



燕园问道 恰是知音相逢时——记文研院邀访学者项目

2019年3月，来自国内外的18位学者一起聚在静园二院，他们来自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史等人文社会学科。接下来的4个月，他们将在钻研本学科领域的同时，突破自身学科固定思维和传统的研究模式，与知音就彼此感兴趣的学术内容展开讨论。

他们是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截至目前，文研院邀访学者项目已接受上百位海内外学者在此驻访，开展研究工作和学术交流。

孕育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

长期以来，北京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形成了谨严深厚的专业传统。近年来，学科边界的延展，问题意识的交叉引领了国际学界的发展，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对话中，生长出许多前沿议题。文研院作为院系结构的一种补充，其成立伊始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更多跨学科界限的互动交流，孕育有活力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

邀访学者项目正是承载这一使命的重要平台。目前，“入驻”文研院的过百位邀访学者中，有资深教授，也有学术新锐；有来自大陆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也有来自港澳台地区和世界13个国家的学者。通过严格的申请选拔，专家学者们汇聚在一起，将文研院视为共同的精神家园。

跨学科的交流、讨论究竟能产生什么

效果？如何突破目前的学科专业限制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学术体验？这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人和历史的学科，除了学术素养外，眼界和视域特别重要，能否理解其他人的研究和表达也特别重要。“‘人以群分’并不应该是以专业来分，而是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有内在需求、有所感悟之后，将一群有着相同性情，对相似问题有追求有思考的人聚在一起。”渠敬东向记者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科学史上有所建树的群体都是像森林里的蘑菇一样，一簇一簇出现的，可以很自在、很从容地对学术问题进行最单纯的探讨。文研院希望为邀访学者营造这样的氛围和环境。”

年轻的学者曹晋是德国图宾根大学汉韩学系的助理研究员，来自文研院邀访学者项目第一期。北大是曹晋的母校，她曾在历史系度过7年的本硕时光。作为一位长期留学国外的年轻学者，曹晋需要一个能让她了解国内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同时能够沉潜下来激发新的学术灵感的环境。“文研院无疑是同时满足这两点的最好的平台。在这个小院子里读书，心自然就会沉静下来；而交流的窗口却随时可以打开，我可以和隔壁的邀访学者讨论，也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学者，听到最新、最前沿的学术讲座。”

曹晋也为4个月的“邀请”生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段日子，我可以专注地闭关修炼，也可以加入‘武林大会’、和师友‘比武论剑’。”每次参加完文研院组织的不同学科的讲座、论坛和讨论会，曹晋便觉得“武力值”又上升了一点。“文研院就是这样一个将‘汇聚江河’和‘挹彼注兹’合二为一的所在。”



第六期邀请学者马孟龙（前排左二）教学制作地图

让思想者回归单纯自主的工作状态

量化的测评、资源的争夺、行政工作的负累常常让中国学者难以沉潜于高质量学术研究之中。文研院邀请学者项目尽可能地为学者们卸下这些有形无形的枷锁，为他们提供一个从世俗化的纷扰中抽离的机会，让思想者回归单纯自主的工作状态。

“我们邀请的访问学者，他们在不同的学校都有自己的职务，但是文研院请他们来本身就是把他们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渠敬东告诉记者，文研院在举办活动时不会按照职称来组织，通常都是老中青学者混合在一起，不同的学科混合在一起。“比如我们有一期邀请了著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教授，老先生已经80多岁，但同时论坛中也有数位‘80后’的学者，大家一起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没有什么‘学术阶级’需要跨越。”

邢义田是文研院第五期邀请教授。他来自宝岛台湾，多年来一直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从事秦汉史、罗马史和出土简牍的研

究工作。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台湾学者似乎比大陆学者更能沉下心专注于学术，有广阔的思辨空间。但是在邢义田看来，文研院和他所经历过的学术机构相比，思辨的空间更大，同时更加充满活力，更有“人情味儿”。

在短短的4个月中，邢义田在年轻的文研院里不仅与学科内的同行“煮酒论剑”，更与来自五湖四海各领域的学者们共同交流彼此感兴趣的话题。文研院行政班底的团队合作和密切配合让邢义田感受到了作为学者的“轻松自在”。他用“完美”来称赞文研院的行政工作。“很多老师都非常羡慕我们这些能来北大文研院访问的学者，因为这里能够得到最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最得力的幕后团队的配合。”邢义田提到，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有任何的困惑，第一时间都会有人尽量解决。“细节上的用心让人感动，我很享受我们每一次的‘学术聚会’，在不大不小令人舒适的环境里，大家都很放松地畅所欲言。在这里是我真正轻松自由工作的一段时间。”

用最简易的语言传承博大思想

2018年9月开始，文研院正式推出了“文研课程”项目，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专题课程，文研院邀请学者也会作为授课教师为学生们传播人文科学的经典内容。

赖建诚是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耕耘多年。作为文研院第五期邀请学者，他在元培学院为同学们开设了一门名叫“经济史的趣味”的课程。每周一晚上，在地学楼教室里，赖建诚带领大家一起探讨历史现象中的经济学原理，或者以经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看似定论的历史共识，通过“十万个为什么”式的讲述，将原本复杂的经济学知识讲得通俗易懂。同时，这样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也给选修的同学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越来越多的邀请学者加入到“文研课程”的传授中，在老师们看来，教学不仅不是研究之外的负担，反而是一种教学相长的“享受”。渠敬东告诉记者，有

的老师在文研院做邀请学者时已经退休，但通过在课堂上火花碰撞，有来自北大的学生对老师的授课领域有了强烈的兴趣。

“知识的传承就是这样生根发芽的。我们特别希望这样好的学术资源在北大扎下根，为北大所吸收。”

涵育学术，激活思想，这是北大文研院的基本宗旨。文研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认为，邀请学者项目正是“涵育”与“激活”的有益尝试。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多领域的交融汇通，文研院凝聚了邀请学者所贡献的思想成果，学者们收获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加有力的学术支撑，彼此共赢。邀请学者项目迄今已举办六期，为文研讲座、文研课程、未名讲座、静园雅集等品牌学术活动提供了可贵的学术资源——“这一切还只是开始，愿生机盎然的静园能够迎来更多学者，共叙情怀！”渠敬东由衷地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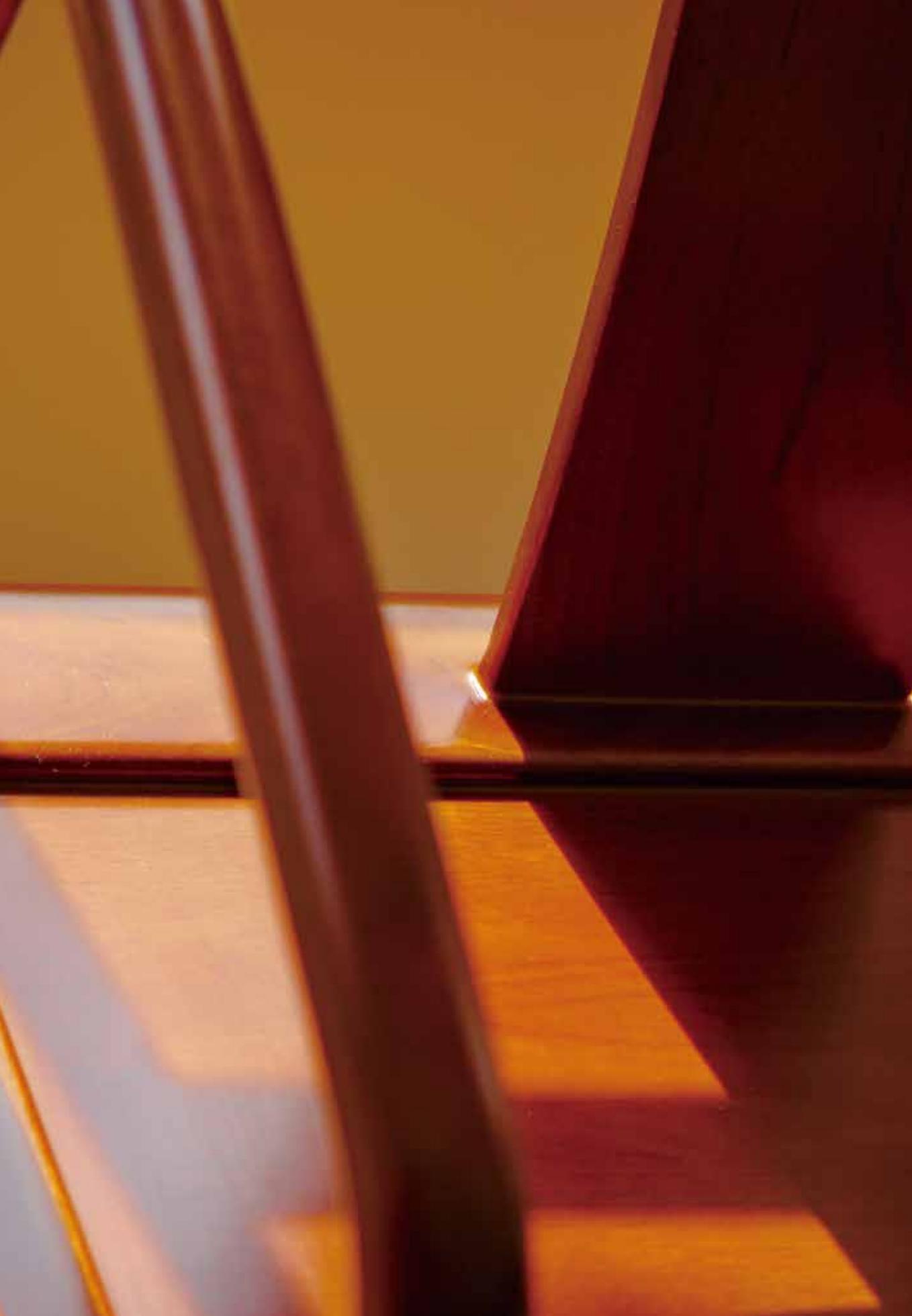
（本文于2019年4月19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燕元）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开幕

具体内容参见五四百年专题·专题展览新闻报道

（本文于2019年5月1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17-20

2019-02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应邀参加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乡村仪式与戏剧——兴化元宵工作坊”，并探访位于福建宁德市古田县的林耀华先生故居“金翼之家”。

20

2019-02

兴全基金市场部副总监李小天来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共同商讨未名学者项目进展和未来合作计划。

22

2019-02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活动协调会举办，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出席，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参加会议并听取学校精神。

25

2019-02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的北大学人群像”展览筹备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第六期邀请学者赵妍杰、第四期邀请学者高波、第二期邀请学者袁一丹，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行政助理胡甲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王思渝参加会议。

28

2019-02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武艺、武将来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商讨“文研工坊”合作项目的设计与实施等事宜。

2019-03

2019 春季学期文研课程启动。本学期开设两门：第六期访问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 (Hassan Fazeli Nashli) 教授主讲的“伊朗考古：从旧石器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系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开，第六期特邀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迎胜主讲的“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与审音勘同”系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合开。

01

2019-0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来访文研院，与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商讨学术合作问题。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一期在二体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中国大学教育——反思与未来”。北京大学前校长、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林建华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文研院工作委员、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文研院工作委员、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人文学部副主任李四龙出席本次讲座。

04

2019-03

“五四与现代中国”论坛筹备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中文系教授王风、吴晓东，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欧阳哲生，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会议并商讨筹备事宜。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欢迎会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 (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袁剑、于溯、赵妍杰以及往期邀请学者代表刘未、周颖，文研院院务会成员及全体行政人员参加。欢迎会由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主持。

05

2019-03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一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报告会由第六期邀请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冯培红主持。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 (Hassan Fazeli Nashli)、秦玲子、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07

2019-03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一次）在静园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少雄和助理研究员赵妍杰作主题交流发言。郑少雄交流题目为“一个人类学者为什么讨论阿来？”，赵妍杰交流题目为“从家庭在西方思想中的地位看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勝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黄群、鲁家亮、袁剑、于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与讨论。

08

2019-03

文研院举办海报设计工作坊，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学生助理团队进行设计指导。

11

2019-03

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来访文研院，与文研院第六期邀请教授尹吉男、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共同商讨学术活动事宜，其中包括秦汉祭祀研讨会（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三期）、陈梦家先生纪念研讨会、西北考察计划等。

12

2019-03

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生院助理教授孟爱莲（Elena Meyer-Clement）来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商讨中德梅里安研究中心筹备事宜。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鲁家亮做主题报告，报告题目为“墨钩与墨横——秦汉简牍文献中对标识符号的记录与使用”。报告会由第六期邀请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于溯主持。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勝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袁剑、赵妍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二期在二体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公共性：融人与排斥”。华盛顿大学政治系 Robert F. Philip 讲座教授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13

2019-03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韩芳老师来访文研院，与院长助理韩笑及部分行政人员共同商讨文研院邀请项目与“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的北大学人群像”展览宣传工作相关事宜。

14

2019-03

“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三期在二体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主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评议。

15

2019-03

文研院行政团队内部分享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编辑助理周诗雨、行政助理王瑞主讲，分享题目为“如何招聘管理学生助理”和“如何鉴赏一件书法作品”。

16

2019-03

“北大文研读书”第十五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毕加索与立体主义——《毕加索传》研读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沈语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端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瑞、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教授邹建林、启真馆第二策划部主任叶敏、台湾资深出版人吴兴文出席并参与讨论，启真馆总经理王志毅担任主持。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四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王翬距离黄公望有多远——重新发现《富春山居图》子明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

19

2019-03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尹吉男做主题报告，报告题目为“重写中国后期美术史的知识生成方法与实践——以艺术资源的紧张关系为核心”，报告会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勝久、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袁剑、于溯、赵妍杰，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参与讨论。

20

2019-03

北京大学教务部“师说”栏目组为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录制“北大师说”系列采访。

“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十一讲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图像的阅读：中古朝贡图绘的跨媒体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昀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心教授史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静，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薛磊，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耿朔出席并参与讨论。

21

2019-03

Ars Libri Lid. 图书公司总裁 Elmar W. Seibel、副总裁 John Rutter、中国总代表王红路博士到访文研院，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共同商讨图书馆相关事宜。

“北大中国史”丛书筹备会在静园二院 117 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陈苏镇、张帆，三联书店党委委员孙晓林、编辑冯金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与会议，共同讨论编撰“北大中国史”项目事宜。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第六期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群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熊春文作主题交流发言。黄群交流题目为“灵魂是一场幻梦吗？——漫谈古希腊诗文中的冥府主题”，熊春文交流题目为“‘两个费孝通’？——《皇权与绅权》重读偶得”。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冯培红、狄金华、鲁家亮、袁剑、于溯参与讨论。

23-24

2019-03

“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三期“考古发现与历史记忆：秦汉祠畤的再认识”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3 月 23 日的论坛由德国考古所王睦、故宫博物院王睿主持，北京大学李零、山东大学栾丰实、烟台博物馆林仙庭、王富强、故宫博物院王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禄红、山东省威海市文化学者杨机臣、山东大学王芬、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燕生东作主题发言；3 月 24 日的论坛由甘肃省考古所王辉、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焦南峰主持，西北大学梁云、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田亚岐、国家博物馆游富祥、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焦南峰、首都师范大学田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宁夏考古研究所罗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曼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孙庆伟、曹大志、国家博物馆信立祥、王月前、张晓磊、故宫博物院宋小军、国家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聂政参与会议。

24

2019-03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五期在二体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从《乡土中国》到经学史——‘国民性’论的启发”。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北京大

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乔秀岩主讲，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评议。

25-30

2019-03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受邀访问德国，与柏林自由大学等德国七所大学相关负责人共同向德国教育部 BMBF 申请成立中德梅里安研究中心项目。

26

2019-03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妍杰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家的消失：家庭在重构社会伦理中的地位”。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赵京兰、熊春文、狄金华、郑少雄、黄群，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27

2019-03

自 2019 年起，文研院计划在两至三年内持续推出以“文明之间”为总题的系列讲座三期。首期系列讲座贯穿 2019 年的春季和秋季学期，以“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为主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围绕从埃及到中国这一广袤区域上的文明形态，加以深入阐发。3 月 27 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六期、“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系列讲座第一讲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希腊世界的埃及魔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拱玉书主持。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系列讲座在二体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微物，即物，与极物——当代小说与后人类想象”。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主持。

28

2019-03

“五四与现代中国”论坛筹备会在静园二院中厅举行，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全体行政人员参加会议。

“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经济学的制度范式与中国经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主讲，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评议。

29

2019-03

文研院学术海报设计内部培训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优秀学生助理周文杰为海报设计团队做设计培训。

“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第二期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该期工作坊分为两个话题“阿尔文·托夫勒与中国的未来学”，由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主讲；“时间的制度化：中国古代的纪日与时辰”，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主讲。本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主持，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姚骏、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出席并参与讨论。

30

2019-03

文研院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相聚北大讨论交流。30 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在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主持并作引言。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罗志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发表主旨演讲。

30 日下午，“五四与现代中国”第一场分论坛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上半场议题为“五四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邹小站和主持人欧阳哲生教授作主题发言；下半场议题为“五四与 20 世纪中国政治”，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主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也扬、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永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萧冬连作主题发言。

第二场分论坛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上半场议题为“五四与新思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瞿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成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季剑青作主题发言；下半场议题为“五四与新文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主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李国华作主题发言。本场论坛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副教授姜涛评议。

02

2019-04

文研院行政团队内部分享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学术助理石涵主讲，分享题目为“工作经验与审美设计”。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助理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文献学视角下的中古史学”。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勝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熊春文、邱源媛、冯培红、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03

2019-04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的北大学人群像”展览筹备会在静园二院中厅举行。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曹宏，第六期邀请学者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会议。

04

2019-04

“北大中国史”编撰项目讨论会在静园二院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荣新江、陈苏镇、朱凤瀚、陆扬，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帆，三联书店党委委员孙晓林、编辑冯金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参与工作讨论。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第六期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冯培红作主题交流发言。邱源媛交流题目为“文献史料在口述史研究中的作用”，冯培红交流题目为“驼背上的鱼”。第六期邀请学者、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主持，第六期邀请学者刘志伟、藤田勝久、尹吉男、赵京兰、秦玲子、熊春文、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赵妍杰参与讨论。

08

2019-04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展览筹备会在静园二院中厅举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与相关行政助理参加会议。

09

2019-04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伊朗‘不远的过去’：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族考古学到 21 世纪的历史考古学”。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八期在二体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以一条鞭法和图甲法为例”。文研院特邀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评议。

10

2019-04

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系主任、梅里安北京中心德方筹建委员会委员多米尼克·萨克森梅耶（Dominic Sachsenmaier）来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商议梅里安北京中心筹建事宜。随后，二人共同前往国际合作部与郑如青副部长交换筹建意见。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九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汉语的另一种书面语‘小儿锦’——历史、现状与研究”。文研院特邀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迎胜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主持。

“文研工坊之学者之书”项目正式启动。4 月 10 日上午，中央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来访文研院，与参与项目的学者孙飞宇、闵雪飞、叶少勇、魏斌进行第一次交流对话。本项目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武将主持。

11

2019-04

“文研工坊之学者之书”项目第二次交流对话在静园二院地下咖啡厅进行，中央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同参与项目的学者张鸣、渠敬东、戴锦华、程乐松、车浩、高峰枫进行文本分析和讨论交流。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四次）在静园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作主题交流发言，交流题目为“田野里的小观察与历史上的大问题——水上人的‘社’”。第六期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担任主持。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藤田胜久、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袁剑、赵妍杰参与讨论。

12

2019-04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豫湘桂会战——二战的转折点”。文研院特邀教授、剑桥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院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

“文研工坊之学者之书”项目第三次交流对话在静园二院地下咖啡厅进行，中央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与参与项目的学者邓小南、王洪喆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讨论交流。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一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杜尚与西方当代艺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瑞芸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主持。

13

2019-04

“北大文研读书”第十六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传》研读会”。《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作者、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作引言，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凤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毛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刘文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李珊出席并参与讨论。

14

2019-04

“北大文研纪念”第五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陈梦家先生学术研讨会”。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与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主持。学者王世明、杨泓、朱凤瀚、赵珩、李零、夏含夷、潘思婷、罗丰、苏荣誉、顾青、徐汝聪、刘荣华、赵晖、王睿、董珊、陈均、韩巍、雷勇、田天、曹菁菁、黄益飞、李碧玉参加会议。

15

2019-04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二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清华简《摄命》篇源流考”。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主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巍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1857年印度起义”。文研院特邀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Rudrangshu Mukherjee)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一讲。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期第二场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抗战时期战场以外的中国:战时的日常生活”。文研院特邀教授、剑桥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院教授方德万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五场在二体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围城考:东方世界的希腊知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评议。

16
2019-04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狄金华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管区组织的浮与沉:对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结构的反思”。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胜久、尹吉男、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郑少雄、黄群、鲁家亮、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前夕,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策划制作《文明之约》系列节目。节目组对正在文研院进行讲学的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教授方德万进行专题采访。

17
2019-04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印度早期自由主义的矛盾”。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德敏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二讲。

18
2019-04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五次)在静园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主题交流发言,交流题目为“‘舍民称旗’与‘讳旗称民’:制度缝隙下的民众身份选择”。第六期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

19
2019-04

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主持。第六期邀请学者尹吉男、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参与讨论。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少诚来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部长渠敬东、副部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共同召开“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筹备会。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在英杰交流中心召开的北京大学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文研院行政团队内部分享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宣传助理崔璨主讲,分享题目为“如何筹办一场文研TED?”。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前夕,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文明之约》节目组对正在文研院讲学的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鲁德兰舒·穆克吉进行专题采访。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印度与现代性的遭遇”。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三讲。

“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三期在二体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阿拔斯朝百年翻译运动与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林丰民主讲,外国语学院教授付志明主持。

23
2019-04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日本爱媛大学教授藤田胜久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史记》秦代史与北大汉简《赵正书》”。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赵京兰、哈桑·法兹里·纳什里、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狄金华、郑少雄、黄群、鲁家亮、马孟龙、袁剑、于溯、赵妍杰,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六场在二体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维也纳体系最后的‘大国协调’与清朝-民国连续性的创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评议。

24

2019-04

“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第三场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分为三个话题“景教三威蒙度赞再研究”，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主讲；“回鹘时代丝绸之路的唐朝遗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付马主讲；“吐峪沟新出粟特语《金刚顶经》入金刚界曼荼罗之梵语真言”，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助理教授陈侃理、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哲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赵悠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读书”第十七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经济史的写法——《剑桥中国经济史》研读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作引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参与会谈。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甘地和尼赫鲁：爱与分歧”，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主讲，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建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四讲。

25

2019-04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访学计划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泰戈尔的遗言”。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印度阿育王大学历史学教授鲁德兰舒·穆克吉主讲，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建主持。本次讲座是穆克吉教授系列讲座第五讲。

文研院第六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第六期邀请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和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作主题交流发言。马孟龙交流题目为“传世文献怎么读？出土文献怎么用？”，袁剑交流题目为“人与时代：关于拉铁摩尔研究的实践与反思”，第六期邀请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鲁家亮担任主持。第六期邀请学者刘迎胜、刘志伟，藤田勝久、秦玲子、冯培红、熊春文、邱源媛、郑少雄、黄群、赵妍杰，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参与讨论。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开展前，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前往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观展并提出指导意见，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雷兴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等陪同。

26

2019-04

“五四运动”百周年之际，由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研院联合主办的“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来自校内外多个单位的嘉宾和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莅临本次开幕式。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副校长王博，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文研院工作委员、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主持，王博副校长、黄乔生常务副馆长、邓小南院长、孙庆伟院长、学生代表郑鑫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